

斯大林传

× × × 出版社

第一章 回顾童年、青年时光

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斯大林的母亲叶卡特林娜·格拉泽——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也就是以后的斯大林，1879年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城，经历了儿时和读书年代——流传在格鲁吉亚的民间故事影响了斯大林——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时的斯大林——格鲁吉亚人反对俄罗斯化——1895年以“小乔”为笔名发表诗歌文章——地下组成读书会——1898年加入（第三集团）“麦撒墨达西”——产业暴动发生在高加索——斯大林进行社会主义演讲实习——正教中学把斯大林开除——农奴制留下深深的痕迹

大概是1875年的时候，可能是在1875年的前一年或两年，维萨里昂·伊凡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一个年轻的高加索人，从吉第里洛村——高加索首府梯弗里斯附近的一个村落里出走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哥里，哥里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城镇。这个年轻人在哥里干起了鞋匠行业。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农民家庭，仅十年前格鲁吉亚的农民还被称为农奴。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一出生身份就是奴隶。但是，假如说他的奴隶身份一直伴随他，就不可能自由地离开他的故乡，也更不可能从事工匠——这一独立的职业。而且事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实上，他的先辈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样幸运。土地是他们固定呆的地方，最好的情形，只是由一个地主的奴隶变为另一个地主的奴隶。在维萨里昂小的时候，一些登在格鲁吉亚报纸上的广告报道，地主求购或出售“五百亩土地或一千亩土地和五十名农奴或一百五十名农奴”。奴隶买卖经常带有欺骗性质，这一点在格鲁吉亚法院档案中的一些案件可以证实，同时有三个或更多买主购买同一农民家庭。

维萨里昂心情十分愉悦地离开了他的村子。他获得了自由人的身份，而且他希望通过独立的工匠的工作挣得一些财产。在哥里，他和叶卡特林娜——汉巴勒乌里农奴格奥尔基·格拉泽的女儿结婚，这个女孩和维萨里昂同样出身寒微。当时，许多家境穷困的农民的女儿到亚美尼亚或俄罗斯某个资产阶级家庭去做女仆，叶卡特林娜也是如此。叶卡特林娜刚刚十五岁就嫁给了维萨里昂。但是，在那个地方，人们思想成熟早，所以早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夫妻两人在哥里郊区租了一间破房子，一个月交一个半卢布的租金。这件破房子包括一间厨房和另一间住屋。住屋地方狭小，不到五个平方米；由于光线只由一个小窗子透进来，所以很潮湿。破房子外面是萧瑟的院子，又因为屋子和院子间没有台阶，内外地面是平的，所以下雨的时候，泥水就往房子里灌。砖铺成的地面，一张沙发、一个凳子、一张小桌和一张铺有稿荐的木板床组成了所有的家具。朱加施维里原来的破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一座供游览该地的旅游者参观的纪念馆。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放置着快要散架的旧椅子、榫头和钉锤的小作坊也供人参观。

就是在那间破旧又便宜的屋子里，叶卡特林娜从1875年到1878年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生了三个孩子。但是，不幸的是，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三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就都死了。1879年12月21日，快二十岁的叶卡特林娜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也许是命运的作弄，这个男孩性格固执、体格健壮，受洗时被赐予了名字是约瑟夫。这样，东正教的地方神甫就登记下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这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约瑟夫·斯大林。

人们很少知道斯大林小时候的情况。斯大林脸上的麻子是六七岁时得天花留下来的。血液因为左手长疮而感染了，他又一次病倒了。根据斯大林的回忆，当时他险些丧命。斯大林对他的姨妹阿利卢耶娃说：“我不知道当时我如何得救的，是乡下郎中的膏药还是我强壮的体格？”不易弯曲的左胳膊就是那次病的后遗症。为此，斯大林在1916年被宣布免役。

斯大林一出生就处于穷困的家境。他的父亲曾经企图挤入资产阶级下层中去，但是失败了。他的鞋匠营生难以维持生计，所以他的妻子——叶卡特林娜不得不日夜辛劳地做洗衣妇，以弥补家用，就连房租也要依靠她的收入。有些斯大林的传记作者的推论是，斯大林的父亲必定是把他挣得的一点点钱用来买伏特加酒了，这一点在斯大林同学的回忆录中也有所反映。如同很多东欧语言中所说：“醉得像个鞋匠”一样，酗酒大概是鞋匠的职业病。回忆录还说，维萨里昂十分暴躁地对待他的老婆和孩子。斯大林小时候的朋友伊雷马什维里写道：“可怕而无端的殴打，使斯大林变得像他的父亲一样，那就是无情又冷酷。”他以各种方法，比如忍耐、机警、逃避等，对付父亲的暴行。他从生活中获取的一些教训对他的将来是有用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维萨里昂也不完全是酒鬼和暴徒。进取的精神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他较好的品质。否则，作为一个农奴的儿子，他不会放弃本乡的懒散生活去追求不安定的城市生活。“酗酒的鞋匠”和“鞋匠哲学家”都是东欧民间的谚语。它们用来形容那种往往是两方面都具有的职业癖好。也许斯大林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沉思的性情。斯大林不经意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通过这个线索去了解他父亲的内心矛盾。他的父亲对他的家庭变得阴沉、恶毒和凶狠正是由这一矛盾引起的。维萨里昂是一个不独立的鞋匠，离开故乡后，他去了梯夫里斯。维萨里昂在梯夫里斯成为某个阿德里汉诺夫鞋厂的工人。他对工人这一身份深感屈辱，他的理想是自己成为主人，而不是从一个农奴变成一个雇佣奴隶。他以不养家糊口为代价去同命运抗争。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容易冒火和发怒。斯大林在早期的一本小册子里，用他父亲的遭遇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斯大林写道：“如果有自己小鞋铺的鞋匠，由于与大厂主竞争失败而破产，成为梯夫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诺夫的一名雇佣工人。他进阿德里汉诺夫的工厂的目的，是想积些钱以便有足够的资本开一家自己的鞋铺。可见这个鞋匠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并没有使他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这个鞋匠无疑是作者所举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小规模鞋铺，生意萧条，甚至老板的名字，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父亲的故事的组成部分。斯大林父亲——维萨里昂心中的矛盾之处，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同他的“小资产阶级”野心之间的冲突。

维萨里昂并没有能够赚到足够的钱来重新经营鞋铺。1890年，他在梯夫里斯死去。那时斯大林才十一岁。父亲的离去可

斯大林政治传记

能没有影响到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因为母亲照样要去替别人洗衣挣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的儿子。从此以后，对于约瑟夫而言，父亲的模样已不清晰——他很少说起他的父亲。当然，斯大林及官方出版的斯大林传记从未提及其父亲，大概是由于斯大林对父亲的暴行不堪回首。

对叶卡特林娜·朱加施维里，也就是斯大林的母亲的情况知道的要多一些。她和她同时代的广大妇女是一样的。一首俄罗斯诗歌是这样写的：

命运已经为她们准备了三种考验：

第一种是同一个奴隶结婚；

第二种是成为这个奴隶的儿子的母亲；

第三种是终生依顺这个奴隶。

所有这些可怕的考验，

困扰着俄罗斯大地的妇女。

叶卡特林娜是东方农妇的典型代表，具有驯顺和坚忍的性格。她顺从于丈夫，勇敢面对命运带来的磨难。对于斯大林——这个唯一幸存的儿子非常疼爱。她是一名虔诚的教徒，教堂是她多难生活中的唯一安慰。她是文盲，但为了出名的儿子，她在老年时才开始学习读文章。只要同她接触过的人都一致称赞她，“她娴慧的性格没有因长期多灾多难的生活而改变，在待人接物上非常平和”。甚至在斯大林高升之后，她还保持着纯朴的秉性。她曾经同她儿子在克里姆林宫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仍是返回了她熟悉又可爱的高加索地区。但是，她还是以让人觉得有趣的方式，努力做好斯大林母亲的角色。有一次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高加索的波热姆温泉阿利卢耶娃碰到了老太太，当时天气很炎热，这位老太太却身着又厚又严肃的黑色衣服。这位老太太在回答为什么要这种不舒服的打扮时说道，“我必须这样的原因是这儿的人都知道我。”

叶卡特林娜明智地做出决定，把年仅九岁的约瑟夫送到哥里的正教学校去。当时有很多这样年纪的穷孩子成为鞋匠或木匠的学徒。但是叶卡特林娜并不想让她的孩子成为鞋匠或木匠的学徒，也许这个决定会改变她的生活。她要她的儿子继续他的父亲已经失败的事业，提高自己的地位并高于他穷困的父母。她想象她的儿子将来成为一名教区神甫，受人尊敬。这个前景是美好光明的，这是由于正教学校在刚刚几年前对农民的孩子是不开放的。

从 1888 年到 1893 年这五年的时间里，约瑟夫在哥里的学校里学习。他常常是班级内最好的学生或最好的学生之一。这个长着麻脸却很聪明的穷孩子很快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注意，他毫不费劲的将功课学好。同时他们也看到他任性并喜欢出人头地。他越想这样做，就越感觉到他的大多数同学生活得更丰裕；而他的一些同学也由于他的穷困而瞧不起他。但是，他在班上却有一种优越之处，他能够更轻松地朗诵课文，而那些出身富裕的孩子却不行。在操场上大家都听命于这个鞋匠的孩子，是由于他比他们更大胆、更灵活。正是在这所阴暗的教区学校里，小约瑟夫，也就是未来的斯大林，首次明白了阶级仇恨和阶级区别。

在同一个地方，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少数民族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在成年后专注地进行了研究。朱加施维里的本族语言是格鲁吉亚语。对于俄语，叶卡特林娜的丈夫不知道会不会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说，而她则是一点都不会说。俄语是学校里大部分课程的教学语言，课程表中规定每周只用格鲁吉亚语教小部分课。约瑟夫年龄小，自然很快学会讲俄语。但是在学校之外及家里，他仍然说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或高加索方言是斯大林的某些同学的民族语言。在学校里，所有的人都说俄语。人们对政府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表示强烈不满。为了捍卫民族语言，就连青少年也举行示威罢课。当时格鲁吉亚的学潮很普遍。学生袭击、殴打俄罗斯族的老师，更有甚者放火烧学校。斯大林在哥里学校读书的时候，没有参加类似的学潮，然而愤怒情绪仍存在他的心中，被压抑着。

本地的自然、传统和民间传说对斯大林早期生活产生了影响。哥里位于三条河谷汇合处。那里小麦和葡萄往往高产。城外有陡峭山壁，有三条河流，其中一条是库拉河，库拉河两岸，拜占庭古老城堡的墙垣，田野处于城内狭长道路之间，城镇混和着农村的气氛，小斯大林在其中乐不思蜀，使他能够远离无聊的家庭从而欢快的玩乐。大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朱加施维里家庭生活的无聊和烦闷。乡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人们称之为“金羊毛之乡”。以后的斯大林从这种健康的环境中练就了一副强壮的体格。那里也存在相当多的故事和传说。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大帝都曾经在那儿征战过。课本上记载着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是有关土耳其和波斯入侵的。闻名于世的高加索强盗也被记载入民间故事和诗歌。根据民间传说的记载，这些强盗常常被人民称为民族英雄，比如说抗争俄国沙皇的格鲁吉亚贵族，农奴的领导人物，为人民报仇的人。这些人民的英雄对贫穷的和受压迫的人非常大度，但是却很痛恨富人。他们在雪峰和山洞里隐藏，在不经意间从隐藏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冲到道路中，将敌人杀死。所有这些民间传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哥里四周出现过强盗而且在小约瑟夫读书的时候也有强盗出现。周围穷困的格鲁吉亚小乡绅没有明确的社会地位，收入也不固定，但在精神上还是处在氏族和采邑已经消失的世界中。一些莫名其妙的袭击常常在这些小乡绅之间发生，或者是袭击不注意把他们自尊心伤害的人，或者就是袭击引起小乡绅敌意的人。于是关于袭击和不凡成就的故事在所有地方流传开来。这些故事虽然涉及强盗的行为，但还具有浪漫气息。这些当地的“绿林好汉”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在野外进行强盗方面游戏的小孩是这些“绿林好汉”的坚定模仿者。

所以，朱加施维里在哥里的五年学校生活在某些方面是令他快乐的。但是朱加施维里已觉察到民族和社会的不平等，这一觉察使他在日后成为革命者和叛逆者。当然那时他的这种想法不是很强烈。据苏联官方回忆录和传记作者说，斯大林在哥里时已经读过达尔文写的书，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斯大林当时年纪如此小，读达尔文的著作是不现实的。但他也许是通过学习简单易懂的概要获得了对无神论的模糊概念的，斯大林在思想上已经反宗教了。有事实证明了斯大林那过早的智慧。在1895年，斯大林已经在格鲁吉亚一家主要刊物上发表了诗文，那时他才离开学校仅一年的时间。可以肯定斯大林在哥里时就已经试着写了一些诗歌。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作者提及到，在哥里，斯大林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有所了解。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那时，外高加索的首府梯弗里斯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寥寥无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传播到哥里学校去的可能性很小。为斯大林辩护的人仅仅是想忙于证明，斯大林在小时候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正宗信仰者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接下来的事只是证明下面的假设：青年斯大林离开了哥里学校，当时他的情绪是叛逆性的，这种叛逆情绪的表现是反对社会不公平，并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当斯大林在高年级读书时，存在于格鲁吉亚诗歌中的怀旧的民族主义对他的影响，远远胜过所有社会学思想对他的作用。根据斯大林同学瓦诺·克泽霍越里回忆：“在哥里学校高年级读书时，大家对格鲁吉亚文学很了解，但大家的发展方向和思想方向缺乏老师的引导。大家现在仍记得恰夫恰瓦泽的诗《强盗卡科》。我们当时对祖国的热爱源于卡茨贝格的英雄形象，我们在离开学校时，都渴望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但是大家对如何服务都没有清晰的想法。”由于斯大林对他的老师没有显露出自己的叛逆情绪，老师把斯大林看成优秀学生，并对斯大林进入第二阶段学习起了帮助作用。

第二阶段就是斯大林于 1894 年秋就读于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斯大林母亲的梦想几乎马上要成为现实了。叶卡特林娜是一个贫穷的洗衣工，她没有能力让斯大林读中学，由于哥里学校的校长和本地神甫的帮助，斯大林得到了上学所需要的钱。斯大林对前途充满信心，从而深感欢欣鼓舞。从诗情画意的农村小镇转移到繁华热闹又发达的高加索首府，单是这一小小的变化就使人目眩。十五岁的斯大林，已经足够成熟，以至于他完全知道他的新地位的优势。这种优越性就在不久以前，是一个农民孩子想象不到也无法实现的。斯大林经过四十英里的路程到梯弗里斯去，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深感高兴。与二十多年前诱使他父亲离开吉第里洛村到哥里去的目的相比较，斯大林这次去梯弗里斯的目的是更为现实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从 1894 年 10 月到 1899 年 5 月，斯大林一直就读于正教中学。这段学习时光对斯大林智力的发育来说，具有决定意义。这时，没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对斯大林的思想起作用。

1890—1900 年，格鲁吉亚的社会受两个问题激荡：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关系；高加索摆脱农奴制的影响。

整个十九世纪，沙皇俄国一直致力于征服高加索和巩固对高加索的征服成果。格鲁吉亚从 1783 年起，就已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俄罗斯的属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格鲁吉亚人的命运同波兰人的命运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波兰人每一代都为获得独立地位而反抗起义，而格鲁吉亚人则不同，他们从未认真地想与俄国分离。他们对俄国有反抗心理，但民族自立的愿望却不是很强烈。由于格鲁吉亚人意识到，格鲁吉亚保持自身独立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俄国作为众多的可能征服者之一，还是最不可怕的，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对俄国的抱怨就减弱了。当格鲁吉亚面临要被土耳其和波斯征服的危险时，格鲁吉亚最后一个君主就向俄国沙皇屈从了。宗教的考虑对这一选择也起了决定作用，因为格鲁吉亚人同俄罗斯人一样也信奉东正教。对俄国人而言，高加索是与奥斯曼帝国抗争的一个军事堡垒，它的重要程度稍稍低于多瑙河诸国。俄国在高加索修建了很多的军事用途的公路，接下来又修筑了铁路网，这些举动对高加索工业发展起了刺激作用。这是俄国一方面进行统治一方面又赎罪的特点。

俄国文化对格鲁吉亚的影响是第二个问题。格鲁吉亚的古代文明比俄罗斯的古代文明还要久远，格鲁吉亚人虽然在这方面引以为豪，但格鲁吉亚的观点却是一种东方半封建社会和半氏族的观点。不同于格鲁吉亚，俄国的观点带有欧洲特色。根

斯大林政治传记

据历史学家 G·恰恰普里泽所说：“由于受到西欧、特别是俄国文明的影响，格鲁吉亚上层阶级的生活中带有欧洲习惯和风俗的印记。”沙皇的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沙皇竭力要使这个国家俄罗斯化；另一方面，沙皇又想保证格鲁吉亚教士和乡绅的忠诚。在西伯利亚或中俄流放着格鲁吉亚末代王朝；但是那些被流放的皇帝的儿子们，却能够在圣彼得堡为他们的人民进行有意义的文化工作。里面有一部分人，例如巴格拉梯阿尼弟兄，就成为格鲁吉亚先进分子的代表，有一部分欧洲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格鲁吉亚文，这就使格鲁吉亚的文学和历史被俄国所认识并熟悉。泰穆拉茨·巴格拉梯阿尼被当时沙皇，即尼古拉一世任命为皇家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与此同时，俄国的革命思想在高加索也传播开来。叶尔莫洛夫将军将高加索征服，从而成为 1812 年波罗金诺战役的英雄。叶尔莫洛夫将军表现出有些倾向于“十二月党人”。他庇护了一些大作家，这些大作家大多与反叛者有联系，如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别斯土舍夫等人。一整团人被放逐到高加索，这些人全都参加过起义；其中有许多士兵在服役，这些士兵本来是知识分子军官，但后来被开除了。这部分人同少数有教养的格鲁吉亚人相互联络，并对这些格鲁吉亚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当然，他们对格鲁吉亚人的爱国主义持同情态度，甚至进步于他们的格鲁吉亚朋友，大力宣扬格鲁吉亚农民的解放。

这些早期的联系，为俄国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影响和自由奠定了基础。恰恰是沙皇本人，虽然不情愿，却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这一影响。出于这个原因，沙皇将高加索定为一个政治犯的流放地。对于每一代俄国人，新的思想和新的革命者都在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弗里斯、库泰依斯等地出现。十九世纪前叶的那些作家和军队反叛者的事业继承自俄国贵族和官员出身的民粹派。俄国的恐怖主义者和波兰的起义者随之而来。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又产生了全新的一代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就是从中俄放逐而来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未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正是其中一位，斯大林的岳父塞尔哥·阿利卢耶夫，他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

当由俄国革命派传进的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进入高加索时，沙皇们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努力通过各种方法使这个国家处于落后的状态中。俄国的农奴制是在 1861 年被废除的。一直到 1864—1869 年间格鲁吉亚的农民才获得解放，甚至在 1912 年以前，格鲁吉亚的农奴制度还以“临时劳役”的形式艰难地存在着。俄国行政当局十分希望格鲁吉亚乡绅能够支持他们，使改革滞后。在俄国，解放农民的消息很快地传到高加索乡间，这个时候它才被迫着手实行农奴制改革。当时农奴处在革命的边缘，而且鉴于他们以前多次起义，再不解放他们真是太危险了。但是比起俄国，格鲁吉亚的改革对地主更有好处。农民们获得的人身自由是以他们几乎一半的土地被剥夺为代价的。他们还不得不为被允许留下的土地交付补偿金，而这些补偿金是他们不可能交付的。现在，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可以从下面的叙述得到体现：其一像美国南方废奴后实行的分成制，其二订立一份关于“临时劳役”的合约。1911 年，一个权威性的内容还写道，俄国的奴隶制现在已在俄国消失了。但是在外高加索，尤其是在格鲁吉亚，还没有法律来对临时劳役实行禁止性措施。但是在俄国农民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已逐渐实行一种有关农奴制的新方式。

斯大林政治传记

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就是生活在这种渗透着农奴制的环境中。农奴制沉重地压在直接受其影响的农民身上，使所有家庭、学校以及整个生活模式都受其压迫。这就是整个沙皇帝国的情况。列宁认为，俄国 1861 年的改革在进行的彻底程度上远远不如美国改革。由此，列宁得出的结论是：长久以来俄罗斯人与黑人相比，更具有奴隶制的烙印。列宁的评论是夸大的。原因就在于作为一个宣传革命的人，他急切地想看到俄国社会彻底摆脱掉封建残留的东西。但是如果列宁的评论对俄国人来说是不完全真实的，那么这一真实性在高加索人身上得到体现。高加索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又多又新的“奴隶制痕迹”。农奴制的生活模式的特征是对人的直接的和公开的从属关系，完全表露在外的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野蛮的暴力行为以及人的尊严的丧失。假装、欺骗和暴力是被压迫人民的主要武器，这些被压迫人民是极为愚昧的，通常来说他们无法通过有组织而公开的行动来维护自身权利。

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作为一个学校是奇特的。这所学校是格鲁吉亚，尤其是整个高加索最重要的学校之一。它主要是用来培养有知识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像农奴制的精神保护区。恰恰是在这所中学内，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同封建教会的传统产生矛盾。

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看起来像驻扎士兵的地方，修道士严密控制其中的一切生活。其中的人是彻底与外界隔离开了。学校的规则要求学生必须天天呆在学校里，但如果向本班负责的修道士提出申请，可以出去两个小时。白天的功课全部是关于经院神学的说教和没完没了的祈祷。出身贫苦的学生过着半饥半

斯大林政治传记

饱的生活，一间寝室竟住着二三十人。在思想上，这所学校既是兵营又是修道院。曾经在里面读过书的一个学生说道：“生活是如此的单调和悲惨，我们好像是犯人，虽然没有犯任何罪行，却不得不数年内不可外出。每一个人都很忧郁和沮丧。我们没有青年人的欢快，只是天天闷在走廊和屋子里。当展示出青春的活力时，立即被班长和修道士压制。”学生必须到教会图书馆借书，只可以看修道士允许看的书。梯弗里斯的正教中学当然也是一个推行俄罗斯化的工具。如果有谁违犯了其中的规则，就要被关起来一段时间。修道士们毫不放松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监控，学生的行李被搜查，学生间的交谈被窃听，一点点怀疑都要汇报给校长。

但另一方面，这所学校也是政治反对派的聚集地。这座学校培养出许多后来成为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舆论界著名的人物和领袖人物。1930年，外高加索共产主义大学历史系公布了一些关于梯弗里斯宪兵队的档案，其中有些报告是关于这个学校政治上叛乱的。这些报告的时间跨度是二十年，从1873年直到斯大林入学之时，有力地证明了学生中的激进思想。

1873年，一个宪兵上校就向他的上级汇报，根据被截获的信件中所写的内容，有一部分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学生读过达尔文、巴克尔、穆勒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书。曾经在一次突击检查中，查到了两本非常具有煽动色彩的作品：雨果的《小拿破仑》和勒南的《耶稣传》。调查结果显示，有三个教员在班上所讲的课程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校长因为这一罪行把这三名教员开除了，同时向宪兵队告发。其中几人被判了刑，另外几个人因为罪行已经被确认，所以当时没被告发。报告指出，格鲁吉亚爱国精神鼓舞了罪犯。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一激动的情绪导致了 1886 年 6 月的事件，当时一个名叫约瑟夫·拉吉耶夫的学生刺杀了校长巴维尔·楚德茨基，原因是他因为反俄被学校开除。约瑟夫·拉吉耶夫是哥里地区牧师的儿子。根据梯弗里斯的宪兵头子报告，梯弗里斯中学认为自己同俄罗斯的中学相比较处于最不公平的条件。学校中的学生常常怀有一种对宗教排斥的情绪和对俄罗斯人的敌视的情绪。改造这样的学生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梯弗里斯人自尊心是病态的，并且很容易生气。他还说，因为鼓励人民反对俄国，有几家格鲁吉亚报纸被查封，这所中学也成为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集中地。结果，这座中学连续几个月没有运营。格鲁吉亚大主教保罗在这次事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保罗曾经向宪兵队头子暗示，这次暗杀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行动，而不是个人行为。他认为一个叫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的人是第一嫌疑人，原因是校长在一年前受到他的攻击。后来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奠基人之一正是吉布拉泽。吉布拉泽也是朱加施维里的政治导师之一。米哈伊尔·茨哈卡亚也在 1886 年被学校开除了。茨哈卡亚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成为列宁的朋友、格鲁吉亚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的主席。

在朱加施维里入校仅仅几个月以前，这座学校中所有格鲁吉亚学生正式罢课。1893 年 12 月 4 日，扬可夫斯基将军即梯弗里斯的宪兵司令向圣彼得堡电告：“正教中学的大部分在校生已经宣布罢课，要求开除老师或是换老师，另外还要求建立格鲁吉亚文学讲座。”格鲁吉亚的大主教一整天企图规劝学生不要罢课，但结果没有成功。校长要求出动警察，于是警察封闭了梯弗里斯中学，并将学生赶回家中。但是警察头子说：“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封闭这座学校对学生将是一件不公正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事情，因为这些学生只是想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在离校前，学生们发下誓言要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八十七人在该学期终止以前被学校开除。米哈伊尔·茨哈卡亚这次又被认为是组织这次罢课的首领之一。拉多·克泽霍越里也被学校开除，他从前在哥里学校读书，只比斯大林大三岁，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在政治上的老师兼好朋友。在这些报告中，没有提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内容，罢课者主要是因为受格鲁吉亚爱国主义的驱动。

当十五岁的朱加施维里进入梯弗里斯时，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上次罢课的情况。学生们肯定了罢课事件，并对开除八十七人之事议论纷纷，因此新生对于在学校中教授本民族文学的要求都持同情态度。所以朱加施维里一开始就受到政治动乱的影响。但是同在哥里学校一样，他对教师还是没有表露真情。同样，他在梯弗里斯学校仍是一名优等生，能干、刻苦并守纪律。朱加施维里对新学校有很强的好奇心。俄罗斯僧侣海尔莫杰尼斯是学校的校长；教导员是格鲁吉亚人阿巴希泽，格鲁吉亚人的身份使他欺下瞒上，急于讨好俄罗斯当局。年轻的朱加施维里因此可以在学校中了解到专制统治的概况。学校处于恐惧和紧张之中，因为俄罗斯人校长清楚的记得上一任校长是被暗杀的事实；而格鲁吉亚人教导员一方面唯恐领导不高兴，另一方面又时刻警惕学生中可能发生的动乱。但是，学校僧侣对学生的监视控制和搜查越严密，那些异端思想在学校中产生的影响就越大。对这些青年学生而言，新近被开除的学生是他们的精神榜样，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同这些已被开除的同学保持联系，使他们的影响在学校中可以得到继续传播。

当斯大林在读一年级的功课时，他常常偷偷溜到城里去，

斯大林政治传记

联络革命派人士。这从下面的叙述可以反映出来：1895年10月29日，这时他来梯弗里斯大概一年了，他的一首诗作发表在格鲁吉亚刊物上，这个名为《伊伯里亚》的刊物是由自由派的爱国者伊里亚·恰夫恰瓦泽主编的。这首具有激进性质的诗带有爱国的意味。朱加施维里把这首诗献给著名的格鲁吉亚诗人R. 艾里斯塔维。朱加施维里不想在学校暴露自己的身份，让人以“梭赛罗”这一笔名发表这首诗。他还偷偷地从城里不固定的图书馆中借书。他喜欢读格鲁吉亚的诗歌，同时也非常喜欢阅读俄国和欧洲的名著或小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和果戈里这三大著名俄国讽刺作家是他尤为喜爱的，在斯大林原来的论文或演讲中常以这三位作家的著作为引证。雨果的小说和萨克雷的《名利场》俄译本是斯大林看过的最出色的外国作品。对斯大林的思想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达尔文主义生物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简易读本。当时，自然和社会的唯物论和实证论观点深刻影响了青年一代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和自由主义分子。

不管对斯大林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传记作者，都对格鲁尔吉泽对斯大林的评价持赞同态度。格鲁尔吉泽是斯大林的同学，曾经在哥里当老师。格鲁尔吉泽说：

我们时常在作礼拜时看藏在靠背椅下的书。然而，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就会被老师发现。约瑟夫甚至在吃饭时也在看书。……当问他问题时，他的回答总是那么从容不迫。

在学校极端郁闷的气氛中，唱歌是我们缓解情绪的最好方法。当约瑟夫以他美好的嗓音引导我们唱民歌时，我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们的心情是快乐的。

但是，伊雷马什维里却指出斯大林性格不好的一方面。他说，朱加施维里是学校中非常善于争辩的学生，他的知识较其他同学渊博，能够巧妙又强有力地提出自己的论点。但是朱加施维里无法忍受自己落后于其他人。当他辩论不过别人时，他就显得心情很烦躁。只要在辩论中稍有失败之处，他就变得非常不高兴。所以有几个同班同学回忆说，他在某些时候会妒忌获胜者，用恶毒的流言和诽谤来报复获胜的对手。这种行为在和他一样大的同学中也存在，但却使他难以同别人很好的相处。

只是在他入学的第三年开始的时候，教士们才发现这个优生正在走入歧途。1896年11月，一个教士在操行册上写到：“看来朱加施维里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今天我从朱加施维里手中没收了雨果著的《海上劳工》，从书中发现了那个图书馆的廉价图书证。”校长在批示这一报告时写道：“为了惩罚朱加施维里，要关他长期禁闭。为了雨果的《九三年》一书我已经警告过他一次了。”确实，对于一个未来要当牧师的年轻人，雨果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作品是很难说对他有什么帮助的。操行册上关于朱加施维里的不良记录越来越多：“晚上11点的时候，我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儿没收了他从廉价图书馆借的勒杜劳的《各国文学发展史》……朱加施维里曾在教堂楼梯上看这本反动书籍，当时被我发现了。算上这次，我们已经十三次发现他看类似的书籍。我已把这本《各国文学发展史》交给训导员神甫。”这一记录是1897年3月间写下的，而第一次违背规则只是发生在四个月之前。校长命令道：“给朱加施维里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严重警告的处分并长期禁闭。”但当时没有记录说他偷偷地阅读社会主义的著作。然而，从他同代人的回忆和他本人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朱加施维里在高年级读书时就已经第一次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他参加了学校中的一个地下的辩论组织和在城里的一个秘密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组织被称为“麦撒墨达西”。他是在1898年8月加入“麦撒墨达西”的。把社会主义的书带到学校去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而且关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书也很难得到。雅罗斯拉夫斯基对我们说，当时梯弗里斯只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俄译本，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想阅读就只能抄写来看。我们能够想到，朱加施维里在想方设法离校的数小时内，肯定看了一些社会主义作家写的小册子和书籍的。

“麦撒墨达西”成立于1893年，朱加施维里十九岁前后加入这个组织。尽管这个组织的思想具有某些格鲁吉亚的爱国精神，但它仍是梯弗里斯为数不多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中的一个。用“麦撒墨达西”这个名字是为了与“麦奥里达西”相区别。“麦奥里达西”是一个进步的自由派组织，在八十年代格鲁吉亚的知识界起了领导作用。诺亚·饶尔丹尼亚、齐赫泽和策烈铁里共同创立了这个组织，这三人很快就以温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而闻名于格鲁吉亚以外的地方。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那个因袭击校长而被开除的学生是这个组织最主要的发起人。自由派报纸《犁沟报》成为“麦撒墨达西”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宣扬思想观点的阵地。

后来，朱加施维里回忆他为何信仰社会主义时说：“我本人的社会地位促成了我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学校中严格地不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和实行耶稣会的纪律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它将我压倒……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使我极为仇视沙皇的残暴统治。”外界发生的事件则是最后的导火索。当时，梯弗里斯工人的罢工非常猛烈，这几次罢工对工人阶级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巨大的程度令人直到今天都想象不到。在后来的几年里，大家对经常性的罢工已经司空见惯了，就已经不再那么激动了。然而，工人出乎意料的力量已经在前几次罢工中显现出来；罢工是社会斗争的一种新武器，类似于其他新武器，这种新武器也同样引起了人们过分的恐惧和希望。罢工显示出将会出现剧烈震荡，这已被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所察觉——这是符合俄国当时的情况的。

当时梯弗里斯已是一个小型的产业革命中心。工业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宗法的高加索的新冲击在梯弗里斯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居民稀少的地方或者某些的山民，即与世界经济和历史隔离的山民所居住的地方，已经成为石油工业者、酒商、小麦与烟草工厂主的聚居地。”这就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列宁对上世纪末梯弗里斯情况的描述。在英法资本的帮助下巴库和巴统的石油工业已在开发之中。除了石油、酿酒、小麦与烟草加工这些工业外，乔杜里的丰富锰矿也作为一个新工业出现了。1886年到1887年，格鲁吉亚的库泰依斯和梯弗里斯工业生产总值仅仅有一千万卢布，然而在四年里产值就达到三千二百万卢布。同时，产业工人，不包括铁路工人，从一万二千增加到二万三千。梯弗里斯处在外高加索铁路的中转站的位置，这条铁路把里海和黑海两岸连结起来。因而梯弗里斯的主要工业是铁路工厂，铁路工厂也成为当时高加索工人运动的神经中枢。那时的高加索工人运动是刚刚兴起而且是秘密的。闹闹嚷嚷的亚洲式集市和这些工厂，是梯弗里斯生

斯大林政治传记

活中的两个矛盾的部分。朱加施维里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观察那些东方商人的习惯和作风——这些东方商人的作用、习惯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无论如何，东方世界是不适合他的，高加索生活中的新因素已经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朱加施维里。

朱加施维里的导师中有两三个人本来是打算当教士的，但是后来成为革命者。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是“麦撒墨达西”的领导人之一，而且是朱加施维里十分重要的亲密朋友。另外，朱加施维里还同沙爱·祖鲁启泽和拉多·克泽霍越里交往。朱加施维里仅比祖鲁启泽小三岁，祖鲁启泽在“麦撒墨达西”中已经是一个出名的知识分子了。他为事业而热情地奋斗，却不幸得了肺病，死于五六年后。祖鲁启泽在格鲁吉亚地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表明祖鲁启泽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有写作天份和文学气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通俗著作是祖鲁启泽众多作品中的一部。沙爱·祖鲁启泽同朱加施维里一起，时不时地去拜访《犁沟报》编辑部。对于那些既是自由派又是社会主义派编辑的文章，他开始时觉得很了不起，以后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克泽霍越里是他的另一个良师益友。克泽霍越里不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对于他已经信奉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也设法让其他人也信奉这一思想。他已在高加索以外开阔了视野。他是1894年被学校开除的，八十七人中间就有克泽霍越里，之后他去了基辅。基辅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心，相比梯弗里斯，基辅更为开放。他在基辅呆了几年，还联系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秘密小组，而这些社会主义者又同彼得堡思想相同的人有联系，甚至同在英国、法国，还有在瑞士

斯大林政治传记

流亡的领导人有联系。返回高加索之后，克泽霍越里为了使他自己的运动成熟起来而急着干些事情。他考察周围，想查看有没有建设一个地下印刷所的可能性。克泽霍越里认为印刷所是任何革命宣传小组的首要可靠的根据地。地方上那些格鲁吉亚报纸是没有用处的，这些格鲁吉亚报纸的性质既是自由派又是社会主义派的，因为这些报纸的编辑十分谨慎地书写每个字，并把每一篇文章交给沙皇的审查机关进行审查。这种宣传过分小心且没有任何说服力，是不能起任何作用的。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为了逃避审查而想尽一切办法。所以，需要有一个秘密的印刷所。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克泽霍越里才注意到了刚刚加入“麦撒墨达西”的朱加施维里。

祖鲁启泽和克泽霍越里想交给朱加施维里一项特殊工作，这项工作就是主持几个工人的学习小组。给几个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知识是朱加施维里的主要任务。工人们都集合组成有十多人到二十人的小组。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非常缺少有这方面才能的人来启蒙它的成员，所以每一个来组织的志愿学生都做同样的工作，这些志愿学生不明白阐述这个组织的理论的小册子和书。这些小组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马合烟气和汗臭味的窝棚里，门外有一个人站岗，为了警惕警察的突袭。授课使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而且朱加施维里感到自己提升了，自己的劳动是有用的。在这儿，他表面上在阿巴希泽教士看管下非常恭顺，却在思想上瓦解帝国和教会的基础。比他岁数大得多的工人们恭敬地听朱加施维里给他们上课，这些工人把他当成自己的领导人。

集会之后，朱加施维里必须马上回到学校，向教士解释自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己为什么很久不在学校，然后以伪装的虔诚到教堂去祈祷。这种事令朱加施维里感到既难堪又屈辱。这种生活是具有双重性的：不仅要假装为正教徒；而且作为一个已经成名并且在城里已是一个关键性人物的革命者，现在却又必须重新充当未成年学生，听任上级的训导与责备。他到底应该坚持到什么时候呢？

这一问题是朱加施维里在学校的最后一两年里常常思考的问题。朱加施维里全然地欺骗教士们，但这种行为并未使他不安和顾虑，因为他仅仅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肯定侦察过他和偷偷搜查过他的东西。他们所教的东西全是可怕的欺骗。他的虚伪只是用以对付他们的虚伪。他在这场虚伪与欺诈的斗争中处于优势；而且毫无疑问，他胜利了，并且从中得到乐趣，这使他忍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处境。当然，他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学校。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离开学校他就失去了生活来源。那个组织没有任何物质来源，不能够帮助他，而他又不想拖累母亲。工人或职员的工作他是肯定不会做的。学校生活虽然令人郁闷，但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去辩论、阅读和梦想，所以他不愿轻易放弃。如果是一个蛮壮又缺乏缜密思维，同时又有远大理想的青年人，他就会不计其后果冲破学校的大门，但是作为一个前农奴的儿子，虽然他现在的工作是为了解放所有人民群众，但还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农民的情性。确实，继续留在学校需要整日的伪装，但这些东西他从童年时就已经习惯了，现在更几乎成了他的又一个品性。

但是，他的处境越发艰难。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校方还没有发现他在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他成功地隐瞒了他宣传社会主义活动的事。但是他同校方的冲突已变得非常激烈。1898

斯大林政治传记

年9月29日的一个报告说：“下午九时，在饭厅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给一群学生读一些书，这些书是学校禁止的。所以，我们搜查了学生。”又过了数个星期，操行册上又写道：“……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学生被搜查的过程中几次想争辩些什么……对反复的搜查提出抗议……并且声称，这种搜查只发生在我们学校。朱加施维里经常对校方人员表现出无礼和不尊重。……”

在朱加施维里加入“麦撒墨达西”这个组织之后不几个月，也就是1899年5月29日，他被学校开除了，理由是无故旷考。斯大林后来说，他是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学校开除。这不是校方的理由，但学校对他的政治忠诚性产生怀疑。他在这所学校生活了五年。当离开这座半修道院半兵营似的学校时，他毫无悔恨。

朱加施维里 - 斯大林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农奴出身，这使他不同于其他革命领导人物。大多数革命领导人物都来自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列宁是一个大学生，曾十分好奇地观察过农民的生活。然而，他作为一个贵族的后代，从没有在农民中生活过，列宁不属于农民阶级。托洛茨基是一个有钱的犹太人的儿子，他是通过观察，明白什么是剥削和贫穷。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齐切林和其他许多人同样是通过间接经验了解社会的弊端。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只是他们研究的理论性的社会学问题。这些理论性问题后面的现实是他们从未亲身经历的。对于加里宁、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科夫而言，他们本身就是工人，而且这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像大多数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俄国工人一样，他们同这些俄国工人在农村里还有根基。但是谁也没有像朱加施维里 - 斯大林那样，在年轻时就亲自感受到了农奴制带来的痛苦。

二十岁的朱加施维里的地位提高了，已经属于知识分子。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稳定而体面的阶层，而是处于半游民状态的仍然穷困的阶层。但是，朱加施维里仍然无法亲近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们。革命者中那些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接触的只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因为有知识的工人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宣传，并希望可以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建立起友谊。对于广大群众，因为他们不能很快地接受社会主义的观点，革命者称这些迟钝的群众是无产阶级中不自觉的和落后的部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十分了解那种落后性的沉重负担。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记得，上一代的许多革命者，他们属于上层阶级，怀着“深入群众”的理想，到人民中去为他们的幸福而进行宣传或进行其他有意义的活动，结果却被农民怀疑而被凶残的杀死或者因为他们的出卖而受害。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希望，政治经历和启蒙运动最终会使下层迟钝的广大群众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然而，当时那些宣传者和理论家同仍受蒙蔽的群众之间的确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另外，上层阶级的青年人通常最初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赎罪感和同情心而信奉社会主义的。正是这种同情心和赎罪感，使他们认为被压迫阶级在精神上是高尚的。

对于俄罗斯政治和生活上的落后方面，年轻的朱加施维里非常敏感。这种敏感是奇特的，差不多天生就存在，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敏感性还有所增长。虽然这时朱加施维里对先进工人表示关心是想通过这些进步的工人接近落后的群众，并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使落后的群众摆脱懒惰和温顺的习性，但是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叛乱是不乐观也不理想的。他不仅对地主、资本家、教士和沙皇宪兵表示怀疑，而且对于工人和农民也是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在为工人和农民的幸福而进行奋斗。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奉，完全不是因为赎罪感。他对于农奴阶级无疑是有某种同情的，但朱加施维里对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更加仇视。出身上层阶级的革命者的阶级仇恨，是后天发展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从他们的理论信念中培养出来的。阶级仇恨对朱加施维里来说是他的第一天性。他信仰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学说符合他的感情特点。他的观点中毫无多愁善感。朱加施维里 -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理性的、残酷的。

他性格中的这些特点在未来对他既有利也不利。上层阶级出身的革命者进入社会主义运动，这些革命者带有他们那些阶级中特有的文化习性。这些革命者一方面背叛了本民族的偏见和信念，另一方面使革命中增加了诸如知识、思想、演说及高雅举止等有价值的东西。确实，他们背叛了本阶级而加入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由于道德上的敏感和智力上的精炼。朱加施维里的生活恰恰缺乏这种美好品质的培养。而且不同的是，由于他的敏感性和鉴赏力随肉体和精神上的悲惨景况而减弱，别的领袖中几乎没有人会有社会自卑感。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果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也能够干出不朽的事业。比如说列宁，他具有很高的天份，无论在哪个政权的统治下，列宁都会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族领袖。托洛茨基是一个文人，具有很高声望。另外，还有像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是能够在学术界成就一番事业的。他们全都是非常出众的作家或演说家，在早年就显示出作为一名思想家的干劲、创造力和丰富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想像力。年轻的朱加施维里聪明并具有一般大家都应知道的才能，但缺乏丰富的想像力和开拓性。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虽然他能够比较顺当地向工人小组讲授社会主义。后来事实也证明，他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官气十足和等级严格的俄罗斯，朱加施维里 - 斯大林在社会阶梯上本来是爬不高的，虽然他具有很大的理想、有毅力并且运气不错。在教会里，他也不会获得很高的职位。环境使他无法不自卑，就在斯大林成为一名不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时，他也仍然非常自卑。

第二章 秘密社会主义者

创造未来革命的人——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高加索的影响——1899年斯大林任职于梯弗里斯天文台——1901年他由于革命活动而进行秘密行动——对《斗争》报进行编辑——斯大林的第一篇政治散文作品——对资产阶级的评价——反对暴政的一种武器是“人民的好奇心”——1901年斯大林从梯弗里斯到巴统——开始使用柯巴的假名——建立地下印刷所——军方同工人的冲突——1902年斯大林入狱

在1898年8月，朱加施维里参加“麦撒墨达西”这一组织。这一年的三月份，在明斯克城十多个社会主义者秘密开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巧合表明，朱加施维里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在转折点时加入社会主义者行列的。这时，俄国还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只有一些由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的人组成的宣传小组。这些小组中的讨论和辩论，外面的人是基本上不了解的。甚至现在，有些肤浅的研究者还认为这些讨论是空谈。但是恰恰是这些“宗派的”宣传者却创造了真正的历史，这些宣传者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整整一个世纪以来，俄国知识分子反抗沙皇专制主义的压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过；但是在这一世纪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才在革命派中上升到统治地位。八十年代末，民粹派提倡的农民性的社会主义还占居优势。据民粹派认为，俄国是一个封建的和农民的国家，当代产业主义过分追求利润，这是有很大缺陷的。我们应力图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应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即以农村中残余的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民粹派认为，只要废除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就能实现精神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一旦废除了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事业就有根基了；那时农民就将成为领导阶级，国家的生命力在于农民。大多数民粹派都认为斯拉夫文化是至上的，对传入本国的欧洲影响持反对态度。

但是，另一股潮流从他们的行列中又出现了，这一潮流就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朱加施维里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年，在沃罗涅什民粹派秘密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民粹派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的观点是支持农民；另一个集团由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领导，主张把西方工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融入俄国革命运动中。当时普列汉诺夫开始显示出其能力，他是俄国最有才能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者，并且还是整个一代俄国革命者和列宁的导师。普列汉诺夫怀有这样的信念，即将侵入俄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将对俄国的原始农村公社和封建宗法结构以毁灭性打击，而民粹派却想把他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入侵之上。普列汉诺夫说，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将要在俄国产生，并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欧的方式来为工业社会主义作斗争。要从纯粹的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斯拉夫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种空想，而且很快这种希望会破灭。普列汉诺夫由此得出论断，革命者现在就必须将产业工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人阶级组织起来。

普列汉诺夫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俄国的现代工业才刚刚起步，只有最大胆的思想家才能在新事物萌芽时看出重大的意义，并把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刚刚萌芽的工业无产阶级身上。看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扬一种空想理论。

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民粹派或者想通过农民的觉醒以推翻沙皇专制，或者想杀死沙皇和沙皇的臣子而推翻专制制度。因为民粹派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中已蕴含了农业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们认为只要摧毁封建专制就可以了。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党人谋杀，民粹派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恐怖主义者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品德——“一群像瑞慕斯和罗慕洛那样喝母狼奶长大的英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身于贵族或显贵家庭，却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甚至献出生命。苏菲娅·皮罗夫斯卡娅是此次恐怖活动的一个领导者，苏菲娅是圣彼得堡总督的女儿。但是，这次刺杀沙皇的成功导致了他们的衰退和灭亡。民粹党人曾经希望，这次行动能彻底打击专制制度。但是，杀死一个专制沙皇却不可能摧毁整个专制制度。其后的亚历山大三世，他的统治更加残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同意以恐怖主义活动的方式进行革命，用恐怖主义的方法将个别人秘密杀害对革命是无用的。他们说，推翻一个现存制度不单单是通过少数几个人可以实现的。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会行动起来与整个专制制度抗争。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数量少所以不能单独起作用，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产生出大量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所以在这一天没来之前，他们只能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鼓动人们信仰社会主义，并促使具有共同信

仰的人组成了松散的小组。

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工业和工业产生的工人阶级随着时间的发展在力量和人数上都增长起来，劳工纠纷随之多了起来。九十年代，一些青年革命者认为，民粹派的学说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朱加施维里进入正教中学的那一年，也就是 1894 年，列宁发表了小册子《什么是“人民之友”？》，在小册子里列宁对民粹派的反驳沉重打击了民粹分子，虽然在几年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更先进的农业社会主义翻版。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有一个令人不解的方面。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争论时，他们说，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现代工业的社会主义是不充分、不完备的。在西欧，社会主义者在为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在盼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于它的进步性，在于它的文明影响和它吸引人的氛围，等等。普列汉诺夫、列宁甚至包括斯大林，他们的一些早期作品，读起来就像在宣扬资本主义。这种倾向在实践中令人迷惑。有些宣传者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部分论点，而另外一些宣传者又强调另一部分。有些人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却转而致力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说，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些人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在利用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机而实际上在赞颂资本主义。在西欧，社会主义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发展的误区；而在俄国，自由主义却一定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带来的。所以那些追求资本主义的人同坚定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显现出来了。

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些追求资本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已无法弥合。“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对这些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别称。他们是集合在少数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周围的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等。这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社会学和经济学，但却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方面视而不见。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在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中引起了混乱，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多为温和派，所以就加深了混乱的严重性。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实行恐怖手法，包括暗杀与暗杀的可能性，这就使马克思学说显得比其他当代革命学说更加温和。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必须作大量工作来消除这一混乱情况，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重新加以强调，并把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区分开来。

在书籍、小册子和报刊中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激烈地展开辩论。这场辩论传播到俄国所有政治反对派的中心去，梯弗里斯也不例外。“麦撒墨达西”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它的成员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它的温和派成员却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朱加施维里加入“麦撒墨达西”这个组织时，双方的辩论已十分激烈。由挪亚·饶尔丹尼亚领导的右翼处于优势地位。朱加施维里参加了左翼少数派。

这次辩论还没结束时，新的辩论产生了。头几次的劳工和罢工纠纷促使了“经济主义”的产生。“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称谓，但这种主义在法国被称为工团主义，“经济主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义”是带有非政治色彩的工联主义。“经济主义者”只愿意从事支持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改善的活动，对政治问题则不予考虑。他们担心工人阶级会因为反对沙皇和宣传社会主义而遭怨恨。经济主义者认为，工人应致力于黄油面包问题。社会主义者反驳说，“经济主义者”轻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争辩说，时间会证明，只要工人真正理解了政治的重要作用，工人们能够成为政治思想最强大的阶级。如果工人阶级的领袖害怕谈论政治，工人阶级必定无法提高到面包黄油水平之上。

1901年的时候，“经济主义者”在国外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仍然是多数派。但是，那些政治家们仍坚持斗争以反对多数派。尤其在高加索，“经济主义者”在一个短时期内在众多政治家中还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在梯弗里斯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派去的代表的不懈努力，“经济主义者”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朱加施维里和祖鲁启泽、克泽霍越里以及其他的人，都对革命的政治活动持支持态度而反对“经济主义”。

最后，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对两个相关的问题开始感兴趣。他们的成员这时快速增多。到1900年，在梯弗里斯，社会主义者已多达数百人。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秘密小团体中，工人的人数已超过知识分子的人数；社会主义者同工厂联系密切，这一联系促进了社会主义者同庞大工人的联络。讲解社会主义原则已经成为在群众中进行的系统的政治和工会工作，时机成熟了。俄国的俗语称之为“从宣传过渡到鼓动”。当时“宣传”的含义大大不同于今天。“宣传”的意思并不是用政治手腕来使一般公众大吃一惊，不是向轻信者传播某种观念，或者人为宣扬领袖人物。相反，它的意思是在学习小组中大家平等地商谈问题，互相交换想法而不是空喊口号。这在当时，大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多数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发现，像那样的宣传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是为了以广大人民为基础进行有系统的政治工作，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党和一个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全国领导机构，使它具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有能力去调控各个地方小组的活动。也就是说，建立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全国性政党也被提上了日程。

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在沃罗涅什代表大会上的分裂已经二十多年，但这类似的政党还没有建立起来。只有一些地方小组，它们由地方领导人所领导。在朱加施维里成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时，情况没有得到改善。1898年明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在建立全国性政党的问题上进行了首次尝试，但是警察逮捕了很多的参加者，他们的决议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只是理论原则。普列汉诺夫当时正在西欧流亡，所以没有和俄国联络上。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觉察到，应该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这时已经三十岁的列宁正流放在西伯利亚东北部叶尼塞省的某个小村中，他焦急地等待着三年流放的期满。列宁在西伯利亚写了一些短文和一本经济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使列宁一时间成为一名有声望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但是他仍然焦急地盼望流放的结束。他非常希望促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

列宁流放结束后，就联系上了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朋友。列宁的朋友们主张，列宁应该同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事商讨此事。列宁非常赞同他们的主张。几个月内他就出国了，同马克思主义的先辈和新生代共同创办了一个事业，这项表面看似不激进的事业在俄国甚至世界历史上却很出名。这就是在1900年的最后几天在斯图加特创立的《火星报》。报纸的名字

斯大林政治传记

蕴含着俄国革命的星星之火的燃起。报纸不仅仅限于对时事进行评论，他们努力使俄国读者可以看到每期报纸，他们是通过由地下工作者偷偷地把它们运过国境做到这一点的。在当时这种送报方式并不稀奇，过去几十年的俄国报刊，很多也是由地下工作者偷偷运送进入俄国的，虽然不是每期都能运到。《火星报》的特点很独特，使它成为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尝试。《火星报》还是俄国国内地下党的组织中心，这正是它的特点。编辑部派出许多代表和特派员，在全国秘密地旅行，联系地方小组，或建立新小组，努力使这些小组同国外的编辑部定期联系，并按照《火星报》的建议行动。由此，松散的秘密运动，就由《火星报》编辑部统一领导。《火星报》的编辑部从慕尼黑移至日内瓦，后来又从日内瓦移到伦敦，沙皇的警察对之无可奈何。报纸的编辑们很快就充分了解了分布在俄罗斯帝国各地的小组的内部活动和力量；评论家和编辑记者就变成了地下运动的真正的领导者。编辑部也成了中枢领导机构。这时他们已经可以使那一松散运动成形，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政党。所有支持他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都称自己为“火星派”。《火星报》因而变成了革命的支持力量。

《火星报》的特派员仍然注重高加索。在梯弗里斯，“火星派”主要由青年社会主义者组成，朱加施维里也称自己是“火星派”。同样，他这时也是焦急地等待着报纸可以定期地从秘密邮递中传来。新报纸的到来是值得庆祝的事情。报纸上有他十分相信的论证，每一期报纸都给朱加施维里带来了大量坚实的论点和精神食粮，这些在同对手辩论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报纸还使朱加施维里充满信心。他这时已经能够用简单又有力的语气将对手击败，这些都是通过在当地的可靠人士向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传达而实现的，是国外的著名理论。当然，虽然朱加施维里在梯弗里斯是知识分子，但由于太年轻，又缺乏教养，所以不能向《火星报》投稿。但是他的思想已经成熟到足以吸收和消化报纸所宣传的主要思想。对于那些工人，这时朱加施维里已经不仅仅传授给工人社会主义的一般观点和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沙皇专制，而能够详细地向工人解释反对农民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原因及证据。朱加施维里此时在思想上是又更进了一步，这反映他在格鲁吉亚发表的一些文章中。

朱加施维里被中学开除后的这两年是他思想和政治发展中的关键时期。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在离开梯弗里斯中学时还不清晰。马克思主义吸引了他，但他却不十分了解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能将马克思主义吸收掉。他的格鲁吉亚爱国主义已经升华成一种更为广阔的信仰，即相信国际社会主义不但能够消灭经济的剥削，还能消灭种族和民族的压迫。但是他还具有些许爱国主义思想。两年左右的时间，朱加施维里受到普列汉诺夫、列宁和他们的同事的著作的影响，他的思想完全成熟了，这反映他在1901年发表的头一批文章中。格鲁吉亚爱国主义在他头脑已不存在。他完全致力于和“民族”问题不同的“社会”问题；他在讲话时已经能够用“不妥协的”和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词语。

在被学校开除后，从1899年5月到年底这几个月中，朱加施维里既没有工作，又居无定所。他先是到哥里的母亲家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回到梯弗里斯。在梯弗里斯，可能是他以前的工人学生为他提供了住处。在朋友介绍下，他靠在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些中产阶级家庭中教课聊以糊口。1899年年底，他在梯弗里斯天文台找到一份职员工作。职员的工资水平非常低，但对他却极为便利。他的工作比较清闲，在天文台里独自拥有一间屋子，这是他第一次单独拥有一间屋子。这时朱加施维里经常在他的屋子里举行集会，并希望以天文台工作为掩护，摆脱警察的监视。幸运的是，他成功地逃脱了接下来几个月中警察对“麦撒墨达西”成员的逮捕。他尽量使自己保持沉默。朱加施维里已具有了一个优秀秘密工作者的特点，即不多说话、机敏沉着、谨慎。

在天文台工作的前几个月里，朱加施维里和一些同事积极筹划高加索的首次五一节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既可以团结工人，又能形成对政府的一定威胁。但这次行动还是小规模。在行动当日，四五百工人聚集到梯弗里斯远郊区的盐湖，警察很少来这里巡视，工人们在红旗下整齐地排成队。由工人自己制作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画像也高高地举起来了。这个温和的集会类似东正教仪式，区别在于东正教仪式举着圣像而这次行动举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朱加施维里在会上作了演讲，这是他第一次的公开演说。其他也有几个人发表了演说，然后大家一起高唱起社会主义者的歌曲，最后集会匆匆结束了。现在看来，这次集会可能既不是关键性行动又像是非常拘谨。但是当时这次行动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通过类似的行动社会主义开始发展本身的实力。下一次五一节示威准备组织工人在繁华地区公开反抗暗探局。

那年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两件颇有意义的事，一件是铁路工人的罢工；另一件事是列宁的朋友维克多·库尔纳托夫斯基来到梯弗里斯。朱加施维里没有完全参加铁路工人的罢工。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但是他曾同他的伙伴们讨论过此次行动的策略，并印制传单。但是罢工本身是由被放逐来的俄罗斯人加里宁、阿利卢耶夫等这些熟练的铁路工人组织发起并从中指挥的。库尔纳托夫斯基的到来为社会主义运动在梯弗里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库尔纳托夫斯基必定把列宁的一些思想工作上的情况告诉了人们。而且库尔纳托夫斯基这个人是具有吸引力的。后来，他在1905年革命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对朱加施维里的印象很深。库尔纳托夫斯基认为，朱加施维里是可靠的当地领袖人物之一，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

1901年发生了很多事。五一节是对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尝试。比起前一个五一节它的影响更大，当局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一张在梯弗里斯散发的传单说：“全俄国的工人准备在他们城市的主干线上尽情庆祝五一节。他们向政府宣称，哥萨克的军刀和皮鞭，宪兵和警察的酷刑对他们毫不起作用。”梯弗里斯暗探局决定提前镇压。在3月21日，他们逮捕了库尔纳托夫斯基和一些最积极的当地社会主义者。朱加施维里也暴露了身份，警察们终于发现了朱加施维里的所作所为。出门在外的朱加施维里逃脱了逮捕。但是他必须离开天文台，另寻他处。他也不能用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居住在任何地方，因为警察发现后会马上将他逮捕。确实，他必须隐姓埋名地生活下去。即使在以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大多数人都以不同的别名称呼他。从此他将在假护照和假名掩盖下生活；他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使用了十多个别名。以前，他还有合法的身份作掩护，这时却完全要隐蔽起来，直到1917年，他成为第一个苏联内阁成员前不久，他的身份才正式显露出来。他的生活，则完全依靠“麦撒墨达西”这个组织的接济，以及同志们

斯大林政治传记

提供的个人帮助。走这条道路就意味着选择穷困，从某方面来说，就是他从社会主义练习生转为正式成员。朱加施维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不信神的坚定革命者，对他来说，生活的乐趣基本上在于进行礼拜仪式。

这次逮捕以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避开敌人的突袭。五一节的尝试必须坚持下去，还不能让暗探局的镇压得逞。他由于其他领导成员的被捕，而得以有机会表现自己。现在勇气就能使他在地下运动中的位置提高。庆祝五一的活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五一节当天，大约有两千工人（比上一年多四五倍）在索尔达茨基广场举行集会。警察和哥萨克兵也已经来到索尔达茨基。后来两路人马就发生了冲突，冲突造成十四个示威者受伤，十五个被捕。又过了几星期，《火星报》的编辑对这次活动作出了评价，称它预示着重大事情即将来临：“4月22日发生在梯弗里斯的事件，标志着高加索公开革命运动的开始。”

之前，朱加施维里只是在必要时才偶然写一些短的宣言和传单，现在朱加施维里正准备着手写一些革命的报刊文章了。克泽霍越里终于在巴库建立了一个他筹划已久的秘密印刷所。1901年9月克泽霍越里创办了格鲁吉亚文出的报纸《斗争报》，这报纸是非法的。

《编辑部的话》的声明提出了《斗争报》的纲领。而这篇声明的作者正是斯大林，这一事实直到1946年才被揭晓。这篇声明的风格，不大像斯大林以后的著作。这篇声明很可能是由几个人共同创作的，而斯大林最后对它作出了重要的修改。这篇声明语言简洁而流利，他们认为一般社会主义思想不言自明，所以在声明中没有阐述它。声明从一开始就含蓄地反对

斯大林政治传记

“麦撒墨达西”中的多数派。它解释他们为什么进行不合法印刷的原因时说：“如果工人中间有人以为合法报纸代表工人的利益，那么这种想法是极端不对的。政府对待合法报纸的手段是派一大群叫做书报检查员的官吏专门监视这些报纸。大量的训令被传达到书报检查局：‘不得放过任何一点有关工人的消息，不许登载某某事件，不准讨论某某问题’，等等。”

《斗争报》是第一张不被检查员检查的报纸。而且编辑们在政治上都属于温和派。编辑们尤其声明，他们无心制定自己的任何政策，因为格鲁吉亚的工人运动被包括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编辑们的政策要服从沙皇帝国的那些社会主义的领导者。“麦撒墨达西”中的多数派坚决反对这一声明，因为它认为格鲁吉亚党是独立的，同俄国党联合而不合并。

下一期的《斗争报》于1901年12月出版。它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署名。这篇未署名文章的作者就是朱加施维里。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摘自《火星报》的、特别是列宁本人的那些观点，但是后来，斯大林已经十分熟悉这些观点的风格、解释方法、词汇甚至得意的隐喻，并能正确地加以使用，以致在未来的日子里，当需要向全世界报告和进行对当时及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时，斯大林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地重复这些东西。当斯大林强调其中第一点时，也有令人生厌的重复的东西包含其中，而且他喜欢运用隐喻。比如他说：“为了使多数人摆脱少数人的剥削，在西欧进行了大量的斗争，然而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更加糟糕。”当斯大林抛开隐喻后，接着就根据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普列汉诺夫或列宁的著作，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俄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历史。他以新近发生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事件为例，作出结论，俄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大大优于高加索。然后，斯大林驳斥经济主义者，说他们只想使工人自己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而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一武器去反对专制制度。他们在这一点上同西欧温和派一样，比如说，追随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德国人竟然相信微小的改革而放弃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因为他不懂德文，所以斯大林的驳斥是据《火星报》谈到的有关德国的情况而展开的。这表明他非常关注西欧社会主义的潮流和趋势，尽管他的材料是间接的。他还说，社会主义改革派至少能够宣称，他们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但是在专制的沙皇制度下是不可能取得哪怕一点的进步。“伟大的精力产生于伟大的目标”，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完全不关心物质利益。相反，社会主义者应该去为这一物质需求去斗争，因为虽然目前目标不远大，工人们却能通过斗争聚集自己的力量，最终要同代表统治阶级的国家进行斗争。

文章在第二部分开始时描述了被压迫的俄国的愤怒和痛苦的图景：

受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其他的社会阶级也同样受压迫。呻吟叫苦的有饥饿的俄国农民，……叫苦连天的有小市民……小官吏，小职员，总之，全都是城市平民，城市平民的生活也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一样地缺乏保障，他们有资格埋怨自己的社会地位。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乃至中产阶级也深受沙皇制度的迫害，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俄国境内的各民族和异教徒也深受沙皇专制压迫，其中包括那些流亡国外而其自尊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专制制度蛮横地践踏了历史

斯大林政治传记

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犹太人也同样受压制，他们甚至连其他俄国庶民所享有的微不足道的权利都没有。这些微不足道的权利包括随处居住的权利、读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等等。格鲁吉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被剥夺了创建自己民族学校的权利、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权利，他们必须接受专制政权推行的疯狂的、可耻的、压迫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政策。俄国境内各种教派的千百万信徒也处在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下，他们想按照自己的内心需求来信奉宗教。

这幅图景，深刻反映了被压迫的俄国的状况，目的是用革命的巨大可能性来打动读者，并说明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性超过了其他阶级，并拥有广泛的社会阶层作为同盟军。

但是，作者仍然沉着地作出了警告：“然而俄国农民还处于数百年来奴役、贫穷和愚昧所造成的自我封闭中，他们刚刚醒悟，还搞不清敌人是谁。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不仅政府压迫它们，甚至尚未认清专制制度本质的俄罗斯人民同样也反对它们，它们当时简直不敢想象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但作者更强调的是，要警惕资产阶级伪心地反沙皇制度：“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极善于篡夺别人的胜利成果，都极善于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想在与强敌斗争中，在没把握获胜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比较优势的权利去冒险。虽然不满意，但他们的生活也不至于太糟，因此他们情愿让工人阶级和平民去受哥萨克鞭打、被士兵枪杀、在街垒中搏斗。”所以产业工人阶级应该站出来领导人民。任何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的反对专制主义的胜利，结果都是虚假的，因为工农被资产阶

斯大林政治传记

级利用后，他们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再一次剥夺。如果人民在社会主义者领导下推翻了专制主义，“一个广泛的给工人、闭塞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的民主宪法会随之而来。”

近 50 多年以后再读这篇文章，必定会发现部分同意资本主义的结论和作者对资产阶级猛烈的攻击是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存在于当时每一个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中。他们都认为，俄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时机还未到。可以看到，将来一切能够进行的革命，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的专制制度。当前有些社会主义者也同样是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在为本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进行斗争。几年以后，关于这种矛盾，他们的队伍中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分裂。孟什维克也就是社会主义温和派争辩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必定会发挥首要作用；又说，社会主义者在帮助自由主义者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在实行代议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充当普通社会主义者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则反驳道，自由主义者本身是不可能去打败专制制度的；另外，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反封建的革命中成为领导者，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在为实现经济中的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努力而已。1905 年革命前，这个政治上的辩论变得激烈。从 1905 年革命前夕一直到 1917 年，布尔什维克一直坚持他们的论点。

所以，朱加施维里根据温和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农民和资本家可以享有平等权利，这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想法。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还在朱加施维里 22 岁的时候，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前几年，他的观点就已经属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了。直到 1917 年列宁主义才使用他所使用的习语。他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在后来的十年或十五年间

斯大林政治传记

基本没变化。而且那时候，列宁对他已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尽管当时列宁才仅仅发表了一些早期的著作，而且名气不大，名声不大的原因在于他的大多数文章和论文是用各种笔名或干脆没有署名发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多样的性格已经给朱加施维里以深刻的印象。列宁的某些预见和思想，甚至他思想的发展趋向，是斯大林无法理解的，而且情况也是这样。但是斯大林可以明白列宁思想的特征，他在起初就对此佩服有加。

朱加施维里不但是宣传家，而且还是一个革命的熟练工作者，致力于能使党达到预期目的的各种特殊手段。他分析了各种行动方法的长处和不足，对罢工、秘密报刊和街头示威的不同作用进行了比较。秘密报刊读者层是狭窄的，其作用也不大。罢工比较有效，但容易使罢工者遭到报复。街头示威是目前看来最有效的方法。朱加施维里仍然记得高加索第一次五一节示威的成功，这次成功的示威是在他帮助下组织起来的。他对这次成功的意义估计过高。但是，他却敏锐地觉察到了群众心理和沙皇自杀性的笨拙行为。他说，由一小群革命者组织的示威却引起了麻木群众的关注；“人民的这种好奇心潜在威胁着政府当局。街头示威使中立的旁观者不能长久地中立下去。当警察对游行者进行野蛮镇压时，有些旁观者就会对被镇压的牺牲者表现出同情的态度。警察的愚蠢使他们毫无原因地对旁观者和示威者一起镇压，结果就使中立的旁观者参加到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来。朱加施维里对此评说，甚至鞭子也助我们一臂之力。他预测，当这过程完结后，“人民革命会随之而来”。他对此充满了信心，以致肯定地说，两三年后，人民革命就会到来。这一预言真的应验了。正好过了三年，1905年的革命

爆发。

尽管这篇文章在政治质量上很高，但文学技巧一般，它毫无文饰。在朱加施维里二十二岁时，列宁已经写了一些关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论文，这些论文使很多经济学的讲师甚至教授都佩服不已。托洛茨基出生在朱加施维里出生的那年，他是《火星报》的重要撰稿者，并很快出名了。像朱加施维里的这篇文章是没有资格登到《火星报》上去的，更不可能登到《曙光报》上去了，《曙光报》是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创办的。所以，他的文章只是一个入门的作品；他论证的社会学方面是粗糙的；他的风格尽管有某些个性的东西，但仍不突出。《火星报》的编辑们，尤其是列宁，能够轻而易举地指出来朱加施维里细读了他们的哪些文章，并且指出他摘抄了哪几段内容。然而，从如此高标准来衡量朱加施维里的处女作，是不公平的，特别是《斗争报》已经向读者声明，它不过是像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这样的杰出作家在格鲁吉亚的代言人。依照高加索当地的标准，朱加施维里的文章的技巧还是很高的。它把这篇文章同朱加施维里后来作品加以比较，这篇文章的风格已经接近成熟了。发表于《斗争报》上的这篇文章，是朱加施维里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作品，而他其后很多作品却在内容与风格上更加不如这一篇。

对朱加施维里随后几周乃至几年的活动详细说起来是过于烦琐的。他现在的生活是一个被追捕的组织家和鼓动家的典型生活；这种生活被罢工、街头示威、秘密集会、代表大会以及其他事情所充斥着。他的活动基本类似于他那一类人的活动，所以无需详细记录。在三四十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才开始。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的朋友和敌人都在搜寻他早期活动的详细材料。他的朋友们指出，这位伟大领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表现出崇高的品质；而敌人们则同样想在他年轻的经历中发现他的不好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写出的赞扬他或反对他的书籍非常多，但这些无助于了解斯大林的真实情况。在一堆材料中，只能找到少数确定的事实。

1901年11月，朱加施维里正式成为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委员。这个组织由九人组成，领导梯弗里斯的各社会主义小组，而且目前还是全高加索的实际发挥作用的机构。朱加施维里因此身份被抬高了，对整个地区的运动统筹安排。然而，他加入这个组织才两个星期，就到巴统去了。巴统是一个新的石油工业中心，靠近土耳其，刚刚通过油管同巴库建立了联系。西尔维斯特·吉布拉泽是梯弗里斯委员会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个曾经袭击正教中学校长和后来成为朱加施维里的社会主义导师的人。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太好，吉布拉泽高高在上的态度伤害了朱加施维里的自尊心。此外，吉布拉泽还和“麦撒墨达西”中的温和派关系密切。政治和私人上的不和，使他们关系不好。朱加施维里的离开，对他本人，对吉布拉泽，对梯弗里斯委员会来说，都是有利的。巴统需要朱加施维里这样的人；而且由于朱加施维里的经历比吉布拉泽浅，所以到巴统去更能发挥他的作用。而且朱加施维里呆在巴统时，他开始使用柯巴的别名，“柯巴”土耳其语言中的意思是“不屈不挠的人”。根据格鲁吉亚诗人卡茨贝格的诗中所说，柯巴是一个英雄的名字。小时候朱加施维里就很喜欢卡茨贝格的诗。在斯大林这一我们更熟悉的别名出现前，柯巴是他的同事一直叫的名字，一些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前辈甚至一直叫他柯巴。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巴统的面积小于梯弗里斯，它仅有二万五千人口，而梯弗里斯的人口有十五万人。但是主要由于国外投资的增多，它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罗斯柴尔德康采恩下属的石油工厂是较重要的；高加索的产业工人有大约四分之一居住在巴统。社会主义在巴统已经宣传开来，但还缺少一个紧密的秘密组织。柯巴决心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在他到巴统的几个星期后，他就以新年舞会为掩护召开了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巴统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产生。他下一步准备成立一个类似克泽霍越在巴库建的印刷所一样的秘密印刷所。印刷所设在他的宿舍。印刷工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印刷工人中的一员回忆道：“铅字都放在香烟盒和火柴里，另外一些被置于纸条上。”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回忆说，柯巴书写传单，然后由工人排字。柯巴还不时到梯弗里斯旅行，同委员会的人们接触，一起对事情进行评议，并介绍他在巴统取得的成就。这些传单被散发到了石油工厂、货运车站和其他别的工厂里，传单的散发很快就引起了劳工纠纷和政治骚动。一个由秘密警察书写的机密报告说：“1901年秋，梯弗里斯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派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到巴统来，他是这个组织的一名成员，目的是在工厂工人中宣传社会主义。朱加施维里的活动使巴统的所有工厂中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组织。这种宣传的效果已经在1902年里看到，长期的罢工在罗斯柴尔德工厂发生了，出现了街头示威游行。”在一次类似的示威游行中，发生了枪击事件，十五个工人被杀害，另外还有许多工人受伤。暗探局这时对秘密印刷所和社会主义鼓动者的搜捕更积极。1902年4月5日，在巴统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柯巴被捕，印刷所幸免于难。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在巴统的四个半月是紧张活动的几个月。但是其中有一件事对未来的事件带来负面影响。柯巴在巴统的活动，受到由尼古拉·齐赫泽领导的当地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严厉谴责。齐赫泽也是一个正教中学的肄业生，他小心谨慎地在黑海岸一带进行社会主义的首次宣传，因为他知识丰富、口才好，所以威望很高。但是，齐赫泽后来却很坚决地反对建立一个有效的秘密组织。齐赫泽认为，在巴统，因为城市小，所以不容易保守秘密，秘密活动会在开始时就被暗探局镇压，所以这样的一个组织不可能存在下去。他对柯巴的计划不以为然，因此亲自并通过朋友们规劝柯巴不要建立秘密组织，让当地的社会主义者自发活动。但是柯巴并没有放弃他的计划。他因此被对手蔑称为“瓦解组织者”和“疯子”，但他仍要坚定地执行计划，并斥责齐赫泽是本质胆小的。后来他们在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上也发生矛盾。1912年，齐赫泽成为孟什维克在圣彼得堡的辩护人和国家杜马中社会主义党团的主席，而柯巴则正式领导地下布尔什维克，在幕后指挥着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们。1917年，孟什维克的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正是齐赫泽，而斯大林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十月革命中，齐赫泽和斯大林都参加了在沙皇首都的战斗，他们依然维持着他们在巴统交锋时的主张。

第三章 总演习的进行

在巴统监狱中的斯大林——革命的教育中心是沙皇的监狱——布尔什维主义的产地——列宁及党章的第一条——1903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斯大林——1904年返回梯弗里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在1904年后期斯大林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方——1905年革命——彼得堡苏维埃——发生在高加索的农民暴动和士兵暴动——斯大林成为列宁的追随者——从地下走向公开——斯大林参加在塔墨尔福斯举行的全俄党代表会议（1905年）并首次与列宁会面——1906年斯大林第一次到国外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土地改革上同列宁意见产生分歧——“战斗小队”——党代表大会不赞同“没收财物”——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指控

1902年4月初，柯巴 - 朱加施维里在巴统被捕入狱，他不需要异常才能来抗争命运。沙皇的监狱虽然声名狼藉，但对希姆莱或叶热夫的残酷以及比尔森和奥斯威辛死亡营非常了解的一代人来说，它似乎是温和，而又有一丝的人道。沙皇监狱和流放地的政府既残忍又无效率。它们对于那些憎恨现存制度的囚犯是残酷的，但同时沙皇监狱和流放地政府的腐败和无效率也使得革命工作在监狱中还能有效地进行。许多年轻的社会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主义者把监狱当作是他们的“大学”，在那儿他们往往在有经验的导师的指导下，受到真正的革命教育。政治犯通常能够享受一些“特权”，这些“特权”是刑事犯所无法享有的，通过团结互助的合作，政治犯组织他们的公共生活。监狱通常就是充满辩论的场所。难怪有些前囚犯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们被释放时，感到一丝难过。

柯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努力工作多读书使他成为监狱生活中的主要的辩论者。多年后，同监狱的人还记得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者和“火星派”的其他反对者的雄辩。他在辩论中持一种合乎逻辑又视轻一切的态度。除了讨论外，柯巴就独立一个从不说话。今天，所有回忆录作者对他的看法除个别不同外，其它基本上是相同的。朋友们回忆他是这样一个人：耐心、敏感、有益，而批评家却把柯巴形容为邪恶的阴谋家，喜欢进行自我批评的人，并鼓动自己的支持者反对他们。柯巴从巴统的监狱转移到库塔依斯的另一座监狱，然后又转回巴统监狱。他在高加索的监狱里前后加起来一共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1903年11月底才被流放。检查当局手头除了一些秘密警察的报告，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来反对他，而这些东西不会被一个正常的法官作为判罪的正当理由的。柯巴也同样作为无法定罪的嫌疑犯被“行政”判处流放三年。他被流放到新乌达村，这个村子位于西伯利亚东部依尔库茨克州。囚犯不享有人身保护权；也没有任何法律来规定这种人身保护权。

在柯巴被囚禁之时，有两件事发生了：一件在地下工作使柯巴大露头角，但这件事是区域性的；另一件对于俄罗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柯巴的一生事业都产生巨大影响。1903年3月，一个全高加索联盟成立，它是由高加索民主党组织创立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柯巴当时不在场但仍被选进它的执委会。我们平时很少看到一个代表大会把被监禁中的人员选为领导成员，可以从中看出柯巴在地下工作中的作用十分突出，所以高加索社会民主组织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到监狱里去同他商量重大问题。许多人为为了贬低或者夸大柯巴在那些日子中的作用已经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这一事实却表明，他在年轻时，就已经是他本地地下工作中的幕后行使权力者了。托洛茨基形容柯巴是一个平凡的、无足轻重的普通成员，但事实并非如此。但他也不像他的传记作者所夸大吹嘘的那样。他的性格是出众而又阴郁的。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开始于7月间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厦”一间里屋，结束于8月下半月晚一些时候的伦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开幕了，这次大会是由“火星派”筹备的。实际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之所以被称为第一次真正的代表大会，原因在于历史学家们尊重1898年在明斯克召开的那次失败的会议。会议开始的几天后，代表们的行踪被沙皇暗探发现并监视着，于是代表大会的召开地从布鲁塞尔转移到伦敦。代表们想将“火星派”的工作完成，以便组成一个全俄罗斯的党。但事与愿违，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派两派，这两派也被称为革命派和温和派，或者“强硬派”和“软弱派”。这次代表大会是由二十三岁的托洛茨基主持的，因为较老的领袖们在谁担任主席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次分裂在十四五年以后对欧洲和世界产生了巨大震撼，其猛烈程度可与四百年以前由马丁·路德发动的另一次分裂相媲美。但是分裂的起因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宗教改革运动的起源地维登堡教堂的背景要优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于产生布尔什维主义的布鲁塞尔的“人民大厦”。路德向罗马教廷挑战是在教堂门上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列宁只是用一个小段落中的一句话向孟什维克提出挑战，但是反对路德的主张的力量很小，而反对列宁主张的力量却相对强大，以致列宁在大会之后不久就被弄得精神崩溃了。据说，整个德国都知道了路德的论纲是在论纲公布后两星期，而列宁关于党章的第一条却一直很少被人了解。然而，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却一直进行了下去。

什么人可以当党员是党章的第一条规定。表面上，这条规定无关于什么策略或原则。实际上在策略决议和纲领被通过之后，这一点就被作为纯组织问题来讨论。有两个草案展现在代表面前。根据列宁的草案：“只要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加入党的一个组织的同志，都可以加入党组织。”另一个草案是由马尔托夫提出的，草案中说到“并且加入党的一个组织的”改成“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表面看来，这两个说法大体类似，而对极为细微处的争论是无益的。但是，隐藏在争论后面的，却是两种互相区别的、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关于党的观点和结构的主张。列宁坚持说，只有为党的地下组织长期工作的人才能是党员，并对党的政策有正式的影响权。他不允许那些日益增加的外国同情者和同路人成为党员，不管这些外国同情者和同路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秘密组织的成员将要成为自愿遵守党纪并准备依据中央领导机构的命令行事的革命的战士。不能对同路人成为坚定而可靠的革命战士抱有希望，他们只是党的民间后备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无形和不确定的。照列宁看来，党是一个具有无穷无尽的打击力量，高度集中的组织。那些不坚定的同情者参加，就会削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弱组织的力量。列宁认为，马尔托夫只要求党员在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下工作，而不在组织纪律的规范下工作，这是存在潜在危险性的。

革命的工具是党。关于这一工具的形状问题仍是目前争论的问题。双方都自以为他们对革命本身的性质的认识是相同的。但是，《火星报》的编辑们在代表大会以前就隐约认识到他们在观点上有分歧。他们彼此戏称对方为“软弱派”或“强硬派”。列宁肯定是“强硬派”。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是“这是一个用罗伯斯庇尔材料做成的人”，列宁此时已抛开普列汉诺夫而努力争取充当领导人物。马尔托夫也肯定是“软弱派”。但是当时，这种被看作是个人性情和气质上的分歧，还没有来得及转变成为明确的政治敌对，并被认为是为了共同目标斗争的一群人中不可避免的事。在这次会议上，参加者的感情太冲动，以致超过了理智能控制的范围。他们对这种激烈的争论感到惊讶、沮丧，但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这个为了共同团结而产生的小小裂痕能够容易地弥补起来。列宁在这个直接引起争论的问题上失败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得到多数通过。列宁对这次败北欣然地接受了。列宁说：“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没有决定全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我们的存在与否不是党章中的一条条文能决定的。”所有这些演员错误地把戏剧的序幕当成了尾声，他们好像都不想继续表现了。

一次新的风暴在代表大会临近结束时选举党的领导机构和《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时又爆发了。强硬派的候选人出人意料地胜出，软弱派的候选人则失败了。这样的结果不具有必然性。由于“软弱派”的一些代表离开了代表大会，所以只有三分之二的代表参加了投票选举。强硬派的候选人以十九票对十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七票当选。列宁坚持认为这次投票是合法的，他有正式的权利坚持这一行为。但是“少数派”却不承认投票的合法性。因为这一缘故，人们就称列宁的追随者们为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不同于俄文原意而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不合理的词，从此具有了特定的政治涵义。孟什维克则用来称呼马尔托夫的追随者。这两个新的“主义”只反映一次投票中的偶然性的算术计算，并不反映原则上的分歧。它们仿佛是故意设计了来表明一次突如其来的分裂。但事实证明，它们的确标志了一次大分裂，这次大分裂从运动开始持续了下去。

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的合法性不予承认，并对它进行抵制。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列宁坚决支持。他说，中央委员会是党合法的最高权威，因此在代表大会上多数票选出的候选人是有效的，孟什维克对它的抵制是一种个人主义行为，这种个人主义的不容许性使它对无政府主义不能加以容忍。由此关于党的性质和结构的争论又更加激烈了。对列宁在党内实行的“戒严状态”以及他的建党思想，孟什维克是持一种反对态度的。他们指责列宁把军队的纪律强加给社会主义，列宁在多年之后才理解了争论的全部含义，原因就在于这一争论的范围过大了。

但是，很快就清楚了一点：对革命重大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通过对组织问题的分歧反映了出来。孟什维克把党看作是一个比较广泛而又松散的组织，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应被包括在其中，并在最后和他们打成一片。这种观点是根据认为无产阶级因社会主义志趣相投，以致可以把整个无产阶级看作是潜在的社会民主党这样的信念而来的。这种认识被列宁认为是不成熟的。列宁认为工人阶级是极为杂乱的群体，它由于

斯大林政治传记

出身和观点的差异而被区分开来，另外宗派的利益的不同也使他们分裂。列宁认为，只有部分无产阶级成员能接受高度的社会主义启蒙。因为无产阶级的其中一部分人是极端无知和迷信的。如果党企图将整个或大部分无产阶级包容进来，结果党本身也会变成参差不齐的东西，涵盖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弱点；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和它的愚昧无知；无产阶级的雄心和它的落后。它将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袖，而只是一个消沉的偶然。列宁认为指望工人自发倾向社会主义的想法是愚蠢的，因为工人阶级只是希望实现到纯粹的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的工联主义，列宁引证了考茨基的话——考茨基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重复提及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入工人运动中，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带入工人运动中。这个论点即是说，是不能指望群众中“天生的”社会主义。党必须只包罗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和勇气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真正的先锋队，能够进行坚决而有纪律的行动。孟什维克认为，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模仿布朗基主义，这种模仿是令人不安的。巴黎公社时占主导地位的布朗基主义理论认为，由一小群密谋的不顾多数人的意愿的人采取直接行动是革命运动的惟一方法。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都强烈谴责布朗基主义。列宁认为，革命胜利的条件是人民中的大多数人需要并加以支持——他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布朗基主义的不同之处。但是，必须由积极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少数人领导大多数人——这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像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那样的西欧的社会主义者，是同意孟什维克的观点的。

孟什维克前期最好的代言人托洛茨基以及其他组织成员，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从更早的历史中找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理由，批评列宁的激进主义思想。列宁对此不以为然。他还骄傲地接受孟什维克给予他的“雅各宾主义”这个称号，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雅各宾下层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党。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创造者就是雅各宾，所以，一个革命者把雅各宾主义这个词看成贬义的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他最后提到，他只批评今日的那些胆怯的调和主义者的模仿者吉伦特派，吉伦特派被革命赶下台是为了使雅各宾派执政。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证明比那些微不足道的“宗派”期刊和小册子所进行的辩论更加有力。托洛茨基对列宁说，革命成功后雅各宾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以其领导人的相互残害结束。1903年托洛茨基写道，雅各宾使用暴力——而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来教育人民。“在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法庭上，雅各宾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最终将被控以调和的罪名。马克思将会被处以死刑。”列宁以为，这些话是不切实际的。列宁并不关心这种过分遥远的事情。此时，列宁全部的精力完全集中在为革命和革命手段作准备的更为直接的任务上。托洛茨基和其他孟什维克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将一事无成，但他们却又无力用新计划来代替列宁的建党计划。

在1904年的过程中，政治地震的头几次震动震撼了整个俄国。日俄战争在2月爆发，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使沙皇制度遭到首次的失败。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大胆起来，开始公开地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社会民主党应该如何做？孟什维克说，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专制制度是他们的义务，因为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注定了要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是列宁坚决反对的事，接受它的领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导更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是不能让人相信他们现在表现出的勇气是可靠的。列宁预言，因为他们害怕革命，所以，他们不会成功地坚持反对沙皇专制。工人阶级，应该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此时，所有关于策略和原则的事情都不起作用了，分裂日益深化并且剧烈。

列宁赢得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第一个回合，却输了第二个回合。他对自己观点的坚持和对敌人的坚决反击，使他的盟友甚至追随者没有能够跟上他的步伐。孟什维克的反叛者继续抵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他们没有向布尔什维克低头。在代表大会上曾支持列宁的普列汉诺夫，这时也转而站在了孟什维克一边。中央委员会由于受到众多反对，所以对自己形式上的权威没有把握，并不愿意将权威强加给成员。列宁辞去了《火星报》编辑部的工作，并同意孟什维克主持报纸的事务。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状态中，因为俄国地下活动的大多数线索都由《火星报》控制，所以列宁就失去初步的胜利成果。列宁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失去了他的机会，但孤立并没有打倒他。恰恰相反，在被对手所嘲笑和被朋友所抛弃的情况下，他更表现出他的勇气和才华，奋力抗争着。他致力于俄国的地下活动。他呼吁地方委员会反对孟什维克和那些急速转到孟什维克一边的布尔什维克成员。

当激烈的新辩论在西欧的俄国流亡者聚居地进行时，柯巴——朱加施维里却在两座监狱之间调动。在1903年11月，他才被监狱释放并流放到新乌达村去。由宪兵护送的装载流放者的船队，从黑海海岸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这次行动的目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地是西伯利亚。在这以前，柯巴对于分裂的初步传闻是没有明确认识的。又过了一个多月，柯巴到达新乌达村。在路上，船队经常停下来，目的是为了装载更多的流放者。在行进过程中，这些流放者日益感到日俄战争的迫近。柯巴在这种激动又狂热气氛的鼓动下，对同政治隔断三年之久的前途无法忍受。他到达目的地后，立刻准备实施逃跑计划。由于战争前夕的混乱，地下运动在满洲边界当局防范削弱的情况下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逃跑。1904年1月5日，柯巴开始了逃亡，他经过一片不毛的荒原，就是今天的库兹涅茨克大工业区。他坐在一辆农民的大车上前往乌拉尔。途中的冻伤并没有阻止他在1904年1月或2月初重新出现在梯弗里斯。

这时，高加索组织已经知道了代表大会的情况。三个高加索代表从伦敦返回，他们曾在代表大会上支持列宁。他们对大会的叙述自然是利于布尔什维克的。列昂尼德·克拉辛，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也曾经追随过列宁。他是一个在工业中任高级管理职务的著名的技术人员，因而在高加索很有影响。他给地下活动提供了宝贵而谨慎的帮助。在柯巴返回梯弗里斯前不久，列昂·加米涅夫访问了梯弗里斯，他的访问也起到了游说的作用。但是布尔什维主义在高加索的初期胜利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反对列宁的主张和解的布尔什维克正是由克拉辛亲自领导的。他为了保持组织的完整性，就仿佛没有发生过分裂似的照常领导这个组织的日常活动。他把巴库一家大而有效率秘密印刷所交给了现在负责《火星报》的孟什维克。这家印刷所曾经印刷《火星报》，这件事使列宁异常气愤。在孟什维克的队伍中，存在和解者同不可和解者，他们也在争吵不休。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因此，在柯巴回来之时，社会状况是混乱而变化不定的派别斗争。争论的内容就更加混乱。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初反应是模糊的。过了几年，斯大林的官方传记者宣称，柯巴锐敏的洞察力使他还在流放西伯利亚以前，就同列宁属于同一行列了。但是，托洛茨基反驳道，柯巴最初是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实际上，对于斯大林曾经是一个孟什维克以及他自己宣称的在分裂以后他立即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情况大概是这样，起初他企图在互相矛盾的报告中寻出一个头绪来，所以他没有参加任何集团。但是没过多久，也就是他从西伯利亚逃出后几个月，他就坚定地站在了列宁一边。到1904年底，他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了。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是斯大林刊登在报纸上的第一篇谈论分裂的文章，1904年底用格鲁吉亚文写成，1905年元旦，这篇文章发表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无产阶级斗争报》的前身是他三年前发表处女作的《斗争报》，《无产阶级斗争报》的出版是在《斗争报》停刊三个多月后而出来代替它的。这篇文章是对列宁著名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的节选。斯大林说，政党是领导战争的组织。因此它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在人数上少于无产阶级；（二）在觉悟和经验上要高于无产阶级；（三）团结程度要高于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政党的目的是领导战斗的无产阶级，所以就应当是团结而集中的组织而不是松散的个人组合。”“我们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引领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的一致……如果这个基础被破坏了，党也就要终结了。”简单地认同党的观点是不够的。大多数空谈家的特征是很乐意承认任何纲领。但是只依靠松散的个体无产阶级的战斗是不能成功的。“以前我们党愿意接纳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切同情者，这就像一个好客的宗法家庭。”但是，现在“我们党只接受够资格的人”。孟什维克对这座堡垒究竟如何同社会主义者的宴会厅加以区别很感兴趣。列宁的全部论据，甚至他的一些比喻也被柯巴运用。只有关于党内必须在观点上保持一致这一点是他独到的见解，这一见解我们在他早期文章中已经熟悉。在这一点上，他意识到，他比列宁还更加直截了当和更加强调。但是他相信，他同列宁的意图是绝对相同的。他说道：

众所周知，马尔托夫的条文对于纲领是承认的，却只是未提策略和组织，其实为了使党内的一致得到保证，纲领观点的一致和组织观点和策略观点的一致同样重要。有人认为，对于这一点列宁同志的条文也没有讲到。是的，但是列宁同志的条文是无需讲到这一点的！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个体，和党在一起进行斗争，服从党的纪律，这一切是必然的，所以他只能遵循党的策略和党的组织原则，对于其他的策略和其他的组织原则是肯定还能遵循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斯大林从未想过，有些人接受党的纲领和纪律，但却不同意一些次要的组织方法和策略问题，但是这些人是有成为党员的可能的。布尔什维主义在取得胜利以后，正是主要在斯大林的有着“铁板一块”的正统气味的观点指导之下，变成了同样性质的正统主义的。但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我们这里先不说。甚至列宁也认为分裂是可以克服的。他仍然希望各个派别最终应该会统一在一起；而且他坚信，如果诸如共同原则、集中和

斯大林政治传记

自觉的纪律，这些团结的因素强大到足以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话，胸怀宽广的党是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

1904年夏，列宁的年轻助手加米涅夫回到了梯弗里斯。他是刚刚被莫斯科的监狱释放的，比柯巴小三岁的加米涅夫比柯巴见多识广。他到过日内瓦、巴黎和伦敦，并在莫斯科大学进行过革命活动，在列宁亲自领导下，加米涅夫在国外工作，并同《火星报》中的其他一些领导成员展开过论辩。他必然会对柯巴施加某些影响。准备召开一次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地區代表会议是加米涅夫目前的主要工作。像这样的代表会议在俄国南部和北部都已召开过。11月间举行的高加索代表会议柯巴缺席，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一个全俄布尔什维克常务局由三个地区性的代表会议选出，由亚历克赛·李可夫和马克辛·李维诺夫领导。前者后来成为未来苏联的总理，后者成为未来的外交人民委员，列宁用这个常务局同那个动摇的中央委员会相抗衡。现在他可以宣称，俄国工人地下力量支持他对于孟什维克的不可调和的态度。为了结束到目前仍然广泛存在的不明朗的情况，他建议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中的调和者也认为应该召开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从这一年年底一直到第二年年初，柯巴投入了为召开代表大会的斗争中去。

我们很容易找到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对柯巴具有吸引力。柯巴的气质是属于革命者中的“强硬派”的，他的性格中没有任何形式的软弱。列宁鲜明而锐利的思想十分合乎他的心意，并以其固有的优点吸引了他。另外，列宁主义对于他精神和情绪上的紧张情况，即使在早期也起到了安抚的作用。对于像柯巴这样人的作用孟什维主义似乎是轻视或者甚至贬低的，而布尔什维主义对此却好像是重视的。列宁认为，被追捕的和

斯大林政治传记

生活长期贫困的鼓动者和组织者，职业革命家，是“社会中坚”。正是职业革命家在不断地向自发的工人运动传输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将像柯巴这一类型的委员会的人精选出来。可以想象的是，柯巴很大的自信和骄傲必定来自于列宁的理论，因为在正式的社会中柯巴是没有地位的，甚至在地下工作中也难以有所成就。他对某种精神安慰非常的向往。由此可以看出，反对普遍混乱的高度组织原则的典型正是柯巴。在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他看到自己好像是肩负着人类未来的使命的阿特拉斯。核心组织、等级制度和官僚机构已经在地下党中产生。不论是孟什维克或布尔什维克都会产生类似的组织制度。这种等级制度类似于西欧任何正规而高尚的政党官僚机构，但在理想主义、对事业的忠诚甚至教育这些方面要比它们优越。本来，在孟什维克党这个组织中，个人是没有任何地位和作用的。从理论上讲，人人平等，即“每一个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罢工者”都是平等的。马尔托夫不是任何等级制度的头子，而只是一个文人和理论家。列宁也不能称为等级制度的头子。列宁作为一个宣传者和理论家，是无人能及的，但他在早期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了。他坚决又直接地去这样认识和行动。他对那个行政机关的结构作了明确规定，并使这个机构的活动上升到理想的高度。柯巴对列宁的说法积极响应，正是因为他对列宁主义给予的精神补偿发自内心地感激。

当争论弄得地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四分五裂，而各个派别争吵不休时，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爆发几乎没有引起它们的关注。1905年4月布尔什维克准备在伦敦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此时，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列宁退出《火星报》后，终于在日内瓦出版了《前进报》。孟什维克宣布，他们将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并举行孟什维克自己的会议。同时，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旧历 1905 年 1 月 9 日，在加邦神父的带领下的很多工人群众，向彼得堡的冬宫进军，将请愿书递给沙皇。游行队伍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它的参加者认为是坏的大臣对沙皇蒙蔽了人民痛苦的真相，而沙皇本身是值得信任的。请愿书的调子是胆怯而悲哀的。很多教堂的旗幡和沙皇的画像被游行高举起，有力地证明了这次游行的性质是忠于皇家。沙皇卫队向游行工人群众开了火，打向群众的排枪引发了革命的开始。罢工蔓延至整个国家。朝廷心腹顾问之一的塞尔盖大公爵被革命者暗杀。

在头一批罢工的浪潮结束前，农民的暴动又在全国爆发了。帝国的边缘地区也出现了农民暴动。波兰城市罗兹的罢工引发了武装斗争，并且武装斗争持续了近一个星期。街垒在华沙和敖德萨的街道和广场上筑起。参加起义的还有停泊在敖德萨港的“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在某些城市，罢工者选举了工人代表委员会也即是第一批苏维埃。这些动摇了沙皇的信心，沙皇作出了让步，答应召开杜马，但杜马中没有工人代表。从自由派到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反对党都抗议沙皇的敕令。10 月间，全国总罢工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爆发了。所有的铁路都瘫痪了。彼得堡的罢工者选举了彼得堡苏维埃，彼得堡苏维埃很快就成为革命突出的中心。彼得堡苏维埃真正与官方行政机构对抗起来，彼得堡苏维埃的命令和指示得到普遍的遵守。苏维埃号召全国停止向沙皇付税。结果，沙皇政府逮捕了它的成员，还有他们年轻的主席列昂·托洛茨基。于是新的罢工爆发了，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是罢工的高潮，并且是第一次革命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真正高潮。后来起义的失败使革命也开始退潮。虽然革命可以重新再来，但已经趋向衰弱，最后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1906年全年以及1907年前半年，政治领袖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运动实际在退潮中，这是因为人们的情绪仍然很高亢。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对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满怀期待。但是沙皇撤销了他当初在恐慌中采取的的部分的自由性的让步。1907年6月3日政变的爆发，是这次革命结束的标志。那一天，第二届杜马被新任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解散，他还逮捕了55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后来1905年的革命被列宁描述为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但是问题在于，在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1917年的那些领导人是怎么行动的？回答让人惊讶：大多数的1917年革命的领导人根本没有出现在这次总演习中。列宁就只满足于在远处起鼓动者的作用，以致1905年革命的领导人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革命高潮时，他仍然在日内瓦流亡。只是到了彼得堡游行后差不多十个月的时候，也即是1905年10月底他才离开日内瓦。当他到达彼得堡时，总罢工已经结束，革命发展到了它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莫斯科起义，这是革命最后的高潮。此时，列宁已经无能为力了。

列宁为什么在那一年的关键时刻不能回到俄国呢？理由是他回国后，他肯定会受到沙皇警察的严密监视；确实，当他11月到达彼得堡时，果然有警察在追踪他。但是，对于为何他迟迟不离开瑞士的原因，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他知道他对革命的重要性，无疑也明白他离革命地点近一些是重要的。当他最后返回时，在一个秘密的隐藏地点，他对他的追随者们进行指导；他应该早就这样做。他当时是否还没有理解那个事件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充分意义呢？那个事件是他长期渴望和预言的。对于革命时机的重要性，他还没有清醒地认识。他确信，高潮来临前这个革命的过程还要拖长一些，革命的到来和结束不会像后来事实证明的那样突然。就算形势的发展已表明了这样的趋势，列宁仍没有认识到他的错误。

此时，他忙于制订他的革命策略，让他的追随者注意形势的发展，并教给他们如何更好的起义，等等。当革命提前到来的时候，他仍在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对于革命的实践家和科学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看到在俄国发生的所有运动都是自发的，是由各种不确定的力量推动的，是不协调的而又没人领导的运动。他对自发性运动缺乏信心。他要求党做好领导运动的准备。列宁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劝党放弃孟什维克的思想。即便如此，如果他在这一年能够尽早从瑞士回到俄国，他对整个事件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在流亡的领导人中，只有年轻的托洛茨基，一听到消息就冲上战场，在第一次革命中起到主要领导作用。在列宁快回到俄国时，托洛茨基马上就要当选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了。列宁在1905年以后肯定多次回想到他失去的机会。所以列宁在第二次革命时就积极地参与进去。1917年，他毫不犹豫地经过德帝国——它当时在与俄国交战，往俄国赶回，为了在第二次革命的早期赶到俄国的首都。

在这次“总演习”中不仅列宁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也出现在孟什维克的重要领导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次要人物中。在1905年革命的汹涌浪潮中，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其他人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1905年的领导者除了托洛茨基都是一些不出名的人。他们在群众高涨的热情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影响下加入革命，但却不具有革命的技术和训练。托洛茨基在这次革命中也充当了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的角色。但是，假若与1917年革命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相比较，就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在1905年的革命中是“不成熟的”。在1905年的革命中，他几乎是独自在行动。在1917年，他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的巨大的个人才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有力支持下，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在1905年，进行热情洋溢的演说和表现出颇富戏剧性的革命挑战姿态是他的主要活动，虽然实际效果并没有马上看到，但却将群众的想象力唤醒，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个事业的发展。当宪兵和哥萨克兵将正在开会的彼得堡苏维埃包围时，托洛茨基命令它的武装成员放下武器投降，因为继续的抵抗已没有用了。在沙皇法庭上托洛茨基进行了鼓舞人心的演说，对这次革命大加称赞，并称它有进行武装起义的可能性。这些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工人的心的话，为下一次革命埋下伏笔。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有许多话语和行为是外行的。在1917年时他没有这些外行的言行，当时他是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绝没有要放下武器的表示，而是带领人们去为十月起义的胜利而斗争。

柯巴—朱加施维里在那“干革命蠢事的一年”里的表演如何呢？在这一年中，他在全国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他仍然是高加索这个地区的领导人。但是，在这次革命中，高加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作为一个地区，高加索多次成为帝国其余部分效仿的目标；在反革命势力强于革命势力使得俄国其他地区革命失败的情况下，高加索是最后一个宣告投降的地方。1904年12月，巴库的石油工人在彼得堡工人向冬宫进军前几个星期，发动了一场长期而顽强的罢工，罢工以工人和雇主之

斯大林政治传记

间签订了一项集体协定而宣布结束。在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签订的集体协定就是这项集体协定。工业家们被迫同实际上是被宣告为不合法的委员会也就是罢工的秘密领导者进行谈判。从某方面来看，革命的真正前奏是在巴库发生的事件。当爆发罢工时，柯巴恰恰在进行巡回演说，演说的目的是反对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亚美尼亚半民族主义半社会主义者等等。他没有将旅行进行到底而是立即返回巴库。由于柯巴仅在巴库呆了几天，所以他不可能亲自领导这次罢工。但是对于罢工领导人而言柯巴的建议是发挥了作用的。他了解巴库的情况，又看到了应征制下高加索士兵拒绝参军，因而他强烈地预感到了未来的事件。

对本地情况的关注使他能预感到革命的到来。1905年1月8日，早于首都“流血星期日”，社会民主党高加索联盟就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题为《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柯巴就是这个宣言的作者。柯巴肯定地说，“沙皇专制制度就要失去它的主要靠山——军队”，这些军队将成为反政府的力量。他高估了运动的力量。可靠的军队使沙皇制度能经受住第一次革命的冲击。从整体而言，军队仍是反对革命群众而效忠于沙皇的。农民是军队士兵的主力，由他们的态度可以看出，农民对革命的支持是全身心的。柯巴的估计是错误的，用高加索的特殊情况可以很容易地解释柯巴的错误估计。格鲁吉亚的农民们的生活要远远不如俄国的其他地方。格鲁吉亚的土地问题十分尖锐，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要多于其余地方。

柯巴在其他方面也对沙皇制度所面临的困境高估了。他预言，因为政府已在西欧面前丧失了信用，所以它很快要灭亡。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其实，法兰西共和国正慷慨解囊，帮助沙皇多少改善一下财政情况。柯巴警告说，沙皇政府正处于破产的边缘，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准备改变专权形式，并向人民作出不合实际的承诺。但是，“推翻沙皇政府的时候到了！……俄国已准备好了一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让我们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应时刻牢记：只有党委员会才有能力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能使我们认清敌人，才能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一支勇猛的大军，并率领我们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和我们保持一致，但又能起到领导作用！”柯巴已经从教会学校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委员会成员。柯巴认为，人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徘徊不前，像圣经的火光一样，党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只有党委员会的牧师们能够同人民“同甘共苦”。在这篇宣言结束时柯巴高呼：“打倒沙皇专制！全民立宪会议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沙皇政府的内务部为了应付革命的威胁将黑帮匪徒放出来对付各色社会主义者，这些社会主义者包括自由派和犹太人。在巴库，黑帮在石油工人罢工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在俄国的其他地方，沙皇为了转移群众不满将犹太人当作替罪羊；亚美尼亚人在高加索起了同样的作用。因为高加索，存在于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民族和宗教世仇一直较尖锐，这种世仇一直延续下去的原因是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边界上进行屠杀而导致的骚乱，以及仇视当地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因此穆斯林暴民在黑帮煽动下很容易去屠杀亚美尼亚人，这样民族复仇使高加索陷于血泊之中。根据斯大林的岳父塞尔哥·阿利卢耶夫的回忆，那时的情况十分可怕：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各个部门和各个级别的官吏积极支持各级行政当局，城镇警察也保护各级行政当局，并将“俄罗斯人民联盟”的恶棍们武装了起来。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孩子之间的冲突首先被这些匪徒们挑起。然后由于孩子受伤的原因大人之间也发生了猛烈争吵。黑帮偷袭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并把他们的房子放火烧掉。当局运用各种方法来挑动世仇，以此为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服务。8月间，野蛮地屠杀发生在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枪声在城镇周围响起。亚美尼亚人的店铺遭到抢劫，住家也在劫难逃。尸体布满大街小巷，受伤的人到处可见。士兵和警察对各地的屠杀都视而不见。然后黑帮以罢工者为替罪羊纵火焚烧油井和工厂，他们以“反对纵火”为借口，追捕我们党的工作者。……我们好像生活在地狱中一般。石油工厂中工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我们周围充满了暴乱的因素，都是令人畏惧的、难以扑灭的和猛烈的火焰；死亡与破坏充斥四处。

在数个月期间，在多民族的高加索，革命或者接近于失败，或者止步不前。柯巴写了大量的传单，警告工人阶级不要自相残杀，并号召世界各国的团结。在少数情况中，他赞扬道，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俄罗斯人共同从教堂出发游行到公墓和清真寺，并立下誓言要相亲相爱。他认为党应该鼓励这类的示威，并宣扬同任何党派达成协议，为了反对大屠杀而准备采取共同的行动。

同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仍在继续发展。

斯大林政治传记

5月间，柯巴发表了一本名为《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再次阐述列宁的论点，小册中写满了关于社会主义乐园的老一套隐喻。他在小册子和其他文章中的论述，使人对柯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列宁主义者这一问题深信不疑。在高加索秘密组织中，布尔什维克属于少数派。格鲁吉亚就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据点。他的观点在少数派中还是少数，因为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准备与孟什维克达到某种协议。在这方面列宁注意到了柯巴。列宁原来预料在高加索不会有很多声音支持他的辩论，他感到惊讶的是，从马克辛·李维诺夫那儿列宁得悉了柯巴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发表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也就是列宁的妻子兼助手，要求得到一本小册子和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是柯巴用格鲁吉亚文阐述列宁观点的单子。这是列宁和柯巴之间第一次间接却确定的接触。因为这个地区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不曾全心全意地支持列宁，所以柯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引起列宁的注意。列宁的特点是：当他感到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可被依靠时，他就去直接联系那些居于次要地位的一般的成员。由此这些人更加坚定地支持他，而列宁在信任、鼓励他们的同时，也在他自己的派系中提高这些人的地位。柯巴由于列宁第一次友好的表示而补偿了自己在当地不能成功的失望情绪。他猛烈攻击孟什维克要人，这既反映了他同当地同志的不合，也反映了他由于和列宁走在一起而产生了自信。他的两个朋友和导师——祖鲁启泽和克泽霍越里的死去使他倍感孤立无助。这两个“麦撒墨达西”的少数派领袖如果还活着，他们很可能也同样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但是克泽霍越里在位于梯弗里斯的麦特希堡监狱中被枪毙了；而肺病也夺去了祖鲁启泽的生命。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这时，他的导师在发展各种不同的革命新方法时受到柯巴的密切关注。在伦敦召开的四月会议上，就武装起义的问题列宁已经向他的追随者提出了。他返回日内瓦以后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他说，沙皇制度是不会自动灭亡的，因而必须通过武装革命促进它的灭亡。这是确定的事，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很多社会主义者把起义看成是人民自发的暴动，认为起义是革命的基本现象；它是必然发生的，但又是不能事前计划和准备的，这就类似于太阳的升落。这些社会主义者被列宁轻蔑地称为革命中的罗曼蒂克的米考伯。列宁认为，武装起义是要加以实践和学习的艺术。他认为全党应注意这样的基本准则：如果起义只防御不进攻，那么它最终会失败。他极力促使他的支持者设立党的特别军事机构。

柯巴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又重新阐述了这一论点。

这个问题已经被我们许多组织在实践中解决了，为了武装无产阶级他们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人力和物力。大家都认为现在我们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必须武装起来。然而仅仅意识到武装的必要性还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实践任务必须直接明确地向党提出。因此我们的委员会的任务是立刻着手就地武装人民，成立专门小组去办理这件事，成立小组去各地收集武器，设立小工厂制造各种炸药，制定一个计划来夺取国家和私人的军械库和兵工厂。……不能让派别的计较妨碍一切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这个基础上的团结。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列宁的指示不仅被柯巴翻译成了格鲁吉亚文，而且柯巴还把列宁的指示付诸于实践。他参加领导和建立地区军事组织的工作，在这个军事组织中，克拉辛还建立了炸药试验室，这个实验室是高效而又秘密的。当然，列宁在第一次革命中还没有形成关于指导起义和集中计划的思想。但是，同年，在许多不相协调的暴动中战斗小队还是发挥了作用。战斗小队在高加索抵抗了黑帮，保卫了工人阶级使他们免遭部族复仇之害，并联系农民游击队。柯巴在这个战斗小队中不只是一个指挥战斗的官员，而是起到了一个组织者、行政领导者和鼓舞者的作用。

战斗小队必须根据非常秘密的原则进行组织。同党的其他机构相比，在人员和组织机构上更加神秘。的确，党的这个技术部门尽量减少同其他部门的接触。

在革命达到高潮时，党的队伍中许多新的和未经训练的成员大量出现。当沙皇减少恐怖行为时，党的规则和秘密习惯就不受重视。1905年以前，按惯例，委员会、执委会和党的官员是由更高一级委员会任意指任的，意思就是组织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一般的党员对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是不清楚的。在第一次革命进行时，组织的原则被更改了，一般成员对委员会进行民主监督。下面选举委员会代替了上面任命的委员会。但是，选举原则在技术部门不实行。在整个第一次革命中、特别是在第一次革命处于低谷中的时候，柯巴在战斗小队中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他不受一般成员的监督。

一个临时革命政府会在武装起义成功后建立起来。柯巴要研究的下一个题目就是临时政府的观念和作用。在这方面他同列宁的观点保持一致：在俄国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的条件下，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不会是“无产阶级专

政”。在一次革命当中临时政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代议制政府。根据列宁的观点临时政府是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从1905年直到1917年一切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基础就是这个自我矛盾的论点，但是它从未被它的作者或作者的信徒们清楚地解释过；而由于这个原因，在1917年时本来充满了争论和危机的布尔什维主义又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柯巴认为，解除反革命反动势力的武装；武装人民；召开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这些是临时政府的任务。在革命政府出现和召开立宪会议之前，一系列激烈的改革需要由临时政府执行，没有一项改革措施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这些改革包括：宣布集会和出版自由，间接税的废除，实行累进的遗产税和利润税，土地改革由新设立的革命农民委员会来负责，国家和教会分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社会服务，成立劳动介绍所，等等。这整个纲领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温和程度大大超过四十年后温和的工党政府在英国采取的纲领。但是，在俄国，这个纲领在这个世纪之初，在废除农奴制不过四十年之后，彻底的发生了大改变。

柯巴像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也认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个体农民联合，这个纲领才能在实践中运行，原因是城市的自由资产阶级不支持这次革命。柯巴还指出，从长期来看，工人阶级所追求的目标不同于农民所追求的目标，而且最后他们的利益和政策可能产生对立。然而，这种对立可能发生的条件是社会主义者企图推翻资本主义，而推翻资本主义并不是俄国这次革命的任务。因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性质是绝对民主的，它的纲领完全没有严格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之所以说它是专政，是因为即使它的目标只是要建立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个代议制政府，而这个代议制政府的性质是非社会主义的，旧制度也将使用专政的暴力方法来进行镇压。它建立的基础是两个阶级的联合，而这就意味着在政府中各党派都有自己的代表。由此，社会民主党必定要进入政府，并在政府中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保证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统治”。换言之，社会主义者将领导农民的党，因为农民的党缺乏远见和决心，远远落后于无产阶级的党。

孟什维克坚信，这次革命将由自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从这一点看出，临时革命政府中不应包括社会民主党，因为管理一个非社会主义政府的事务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当时，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任何联合政府都是一种不能容许的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甚至是温和派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任何联合政府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当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职务以后，他就自动地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一员了。孟什维克认为列宁犯了米勒兰主义的错误。他们认为，列宁鼓吹社会民主党参加非社会主义政府是一种类似机会主义的作法。柯巴反驳说，孟什维克把不同形式的政府混淆了。临时政府由革命产生并进行激烈改革，所以不同于以保持现存制度为标志的一般政府。他说：“内阁是正式政府存在的结果。而临时革命政府是正式政府被消灭的结果。正式政府依靠常备军来执行现行的法律。临时政府则依靠人民起义废除现行的法律，把革命的意志变成法律。……奇怪的是孟什维克竟忘记了这种起码的革命道理。”他对认为列宁是一个沾沾自喜的支持内阁者、一个卑鄙的米勒兰这种荒谬说法进行了解释。

孟什维克的另一个更真实地反映了批评者的真正忧虑的批

斯大林政治传记

评是，列宁的纲领是在嘲讽宪法规定。因为列宁认为，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就要发布一系列有关彻底改革的命令。因此批评者预言，立宪会议要么容忍那些改革的既成事实，要么被独裁政府瓦解。柯巴则认为这种宪法上的顾虑是让人莫名其妙的。他看不出立宪会议为什么反对临时革命政府在它空位期间所颁布的一些改革法令，因为这些具有一定民主性质的改革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极大多数人民全力支持这些改革。立宪会议的选举将会因为必然发生的内战而拖后召开，同时临时政府在国内情绪的压力下要给农民以土地，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法令，等等。这个时候没有必要辩论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革命政府是否应该推迟改革。出于自卫的本能，革命肯定是会采取行动的。柯巴问道：“难道孟什维克的议论不具有庸俗自由主义的意味吗？革命者对此事的议论是令人惊异的。这就好像一个囚犯，被判了死刑并且脑袋将被砍掉，但这时候却恳求不要动他脖子上的疙瘩。”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于这次革命的总目标是有某些相同看法的——认为革命的总目标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他们在策略问题上有异议。孟什维克为适应有限的战略目标而制定策略，而列宁为了想达到自相矛盾的目的而采取开放的革命策略。布尔什维克可以轻易举出例子，他们认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则意味着放弃革命。但孟什维克更容易举出例子，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在词语上前后矛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批评都同样有力，在逻辑上都十分严密。孟什维克的论辩虽然更前后一致些，但这种一致性中却有一种清静无为的低调，如果一旦应用于革命激流中，对党是不利的。列宁的论辩在前后一致性上差一些；柯巴对列宁论辩的粗俗的总结，扩大了前

斯大林政治传记

后的一致。但是夺权的革命意志却反映在了这种论辩的调子中。一些列宁的批评者预言道，最终列宁将必须使他的战略和策略前后保持一致。他或者放弃他的极端策略，或者尝试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而不顾民主的限制。但列宁曾一再说，在俄国实施这种试验将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冒险。在1905年，只有托洛茨基这一个社会主义者认为，革命胜利了也不能走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认为他在胡说，在这次革命中，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主要的领袖人物没有在最重要的几幕中出现，而且他们的表演也大大不同于那些实际登台表演的人。柯巴也同样如此。

10月，沙皇发布了宣言，这个宣言答应了立宪要求。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自由派的胜利。他们希望能够利用杜马这一工具把沙皇专制制度转变为君主立宪。大多数孟什维克和一些布尔什维克也同样感到有参加这次选举的必要。对选举权的限制确实较多，杜马中只有很少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因此温和的自由派必定会控制杜马。孟什维克对此争辩说，这无关紧要。温和的立法会议在法国大革命中曾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交权给更激进的国民公会。用某个国民公会代替杜马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俄国。这个意见柯巴不同意。他大肆宣扬反对这次选举，原因在于“在整个俄国全民起义的前夜”进行任何选举，都会转移人民对直接革命行动的注意。在为梯弗里斯委员会写的呼吁书中，柯巴说：“无产阶级向政府要求小让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它不会向政府提出取消某些城市和乡村中的‘戒严’和‘鞭笞制度’的要求。……向政府要求让步就意味着不相信政府会灭亡，但无产阶级却认为政府必将灭亡。”“人民的自由是建立在推翻压迫者的基础上，人民专制制度是通过与压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迫者作坚决斗争而实现的。”对这种表示愤怒的粗俗方式列宁虽然不喜欢却也部分地同意。柯巴对这类话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另一篇宣言中柯巴号召“对人民公敌自由派我们应坚决抵抗，原因是自由派正在同沙皇搞交易。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是同一个党的党员，但柯巴的宣言仍然有诋毁孟什维克的意思。柯巴还认为：“只存在一种情况：或者自由资产阶级已经在观点上趋于孟什维克的观点，或者是存在于高加索的少数分子已经自由主义化了。”

抗议的风暴源于沙皇的宣言。沙皇的宣言既没有诚意也不能满足反对派的要求；而且宣言的软弱性也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要求。总罢工和地方起义在抗议之后随之发生。高加索的警察局长在沙皇作出半自由的姿态后两个月向沙皇在彼得堡的负责人报告说：“库泰依斯告急。……起义者在打败宪兵后，控制了铁路西线，售票和维持秩序已成为起义者的权利。……库泰依斯已无法向我汇报情况；宪兵队已经无法控制铁路线，所以宪兵队也无法集中到梯弗里斯。革命者对送报告的信使进行搜查，并将文件没收；情况已经无法控制。……副总督已神智不清；但情况还没有陷入绝望的境地。伯爵是极重要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但他个人的势力是单薄的。我将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通过邮政送上详细报告，如果情况不允许，将由信使送去。”

各个党派都转入地上。公开印刷和出售社会主义者的报纸。李维诺夫和克拉辛在彼得堡编辑了《新生活报》。另外托洛茨基主编《起点报》，这件事是第一次革命中最具冒险性的新闻事业，《起点报》发行约五十万份。柯巴 - 朱加施维里和邵武勉在梯弗里斯联合编辑了布尔什维克报纸《高加索工人小报》，这个报纸的名字带有很少的象征意义。起义一失败，这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家报纸就被警察查封了。这时，柯巴在合法出版的报纸编辑部、半秘密的梯弗里斯和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以及地下党的技术部门之间耗费了大量精力。当柯巴进行上述活动时，筹备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也是由他在操作，在这次大会上柯巴当选为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这是列宁第一次在俄国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实际上，这次大会的举行地点是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因为与帝国的其余部分比较芬兰享有自治和更大的自由，代表们认为身在芬兰使他们更有安全感。

这是柯巴首次从高加索去俄国的欧洲部分，从死气沉沉的梯弗里斯来出席全国代表会议这种真正的全国集会。这是柯巴第一次在塔墨尔福斯同列宁会见。多年后，柯巴对列宁的描述是带有他特有的粗俗的风格的：

列宁在我心中本来是我们党的山鹰，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体格上都是伟大的，因为当时我认为列宁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但是让我感到失望的是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通常，“伟大人物”的特点是开会迟到，会场上的人焦急地盼望他出现；会场上的人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能令人肃然起敬，因而是不多余的。但我失望地得知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在角落里朴实地同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这是违背常规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的这些话充分证明他当时眼界还十分狭小。柯巴作为一个农奴的后代，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习语能够自如应用，能辩论革命的技巧问题，但这次革命的那位领袖缺乏庄园主的风度，这一事实仍出乎柯巴的意料。柯巴很久之前已经背离了教会，但对于列宁是社会主义的高级教士或大官员这种状况仍然充满幻想。

他密切关注列宁，包括他的演说，他的一举一动。而柯巴也确实被列宁的一些优秀品质所感染：他的极富于逻辑性的演说，他的无畏的政治态度，他的眼界广阔的观点，他既敏锐又简明的结论，另外是他严肃认真的求实精神。代表们满腔热情地来到塔墨尔福斯，在莫斯科起义头几次浪潮的刺激下，他们希望能够迅速推翻沙皇制度。甚至列宁也被这种普遍乐观所感染，例如在会议中发生了一件颇富戏剧色彩的事：在休会期中，列宁曾带领一些代表到树林里练习用手枪打靶。但是，清醒而谨慎仍是列宁的特性。在开幕式上列宁提议说，尽管“自由日子”是令人感到无比自由的，但代表们还是应该用假名来行事。他说，在沙皇暗探局还没有遭到失败的条件下，不能完全公开。伊凡诺维奇是柯巴的假名。他同列宁之间关系还不很密切，友谊更谈不上。但是他同一些日后成为重要人物的人进行了会面：未来红色工会国际的负责人罗佐夫斯基，他也是1941—1945年苏德战争中的主要官方发言人；未来的无神论协会负责人雅罗斯拉夫斯基；二十年之后成为斯大林的特使和蒋介石的顾问的鲍罗庭；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柯巴获悉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合并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时，对此颇感意外。这两派由于形势的发展日益接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近。在高加索，团结的趋势不如俄国中部。由于布尔什维克在高加索的影响不大，所以这两派的分裂的意义不大。两个派别都急于结束这种分裂状态，原因是两派都认为分裂削弱了他们。在大会上罗佐夫斯基建议，在领导人之间达成正式协议之前，地方组织应该直接合并。大会接受了他的提议。孟什维克在此时也举行了代表会议，并通过了平行决议，这项决议同意两派联合。这两个代表会议结束以后，双方领导人在彼得堡进行了谈判。

杜马的选举是在塔墨尔福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这次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应不应该参加？柯巴在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上曾主张社会民主党不应参加选举，说工人阶级属于街垒而不是投票站。但是，柯巴没有想到，列宁在塔墨尔福斯却出面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参加选举，或者至少参加部分选举，原因在于这次选举是间接的。列宁认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这次选举是消极的和无效的；对于不是街垒就是投票站，这种意见太缺乏成熟性，根据这种意见是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的。孟什维克认为迫于群众压力，一个激进的国民公会代替一个温和的杜马的可能性是有些道理的；而且认为“缺席者总是错误的”这一谚语是正确的。他们对一般的议会主义，连同它的互相妥协与讨价还价的习惯与演讲术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列宁认为从议会的讲坛上来促进革命事业是有原因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经说过，既然在猪圈里和粪堆上也能鼓吹革命，为什么革命宣传不能在沙皇杜马的猪圈里进行呢？对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大多数人以及还未从罢工和起义中清醒过来的实际工作者而言，列宁的论据听起来就好像是具有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性质。对于列宁的建议，柯巴同其他地区的代表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道强烈地反对。他们肯定是认为，由于长久流亡国外，列宁同许多侨居外国的人一样，低估了近来一些罢工和起义的影响。他们这些实际工作者对最近事件了解比较透彻是因为他们不是在日内瓦、伦敦或巴黎的图书馆里搞理论研究，而是在莫斯科、喀山或巴库进行革命实践研究。出乎意料的反对力量使列宁惊讶不已。他说，搞实际工作的人在这方面也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他对此感到高兴并宣称，他可以准备退休了。柯巴—伊凡诺维奇被选入负责这一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这次全国性会议上的首次成功，也就是他能够对列宁的意见提出异议，大大提高了他的自信。

在1917年最后一天，这次代表会议结束了。秘密警察汇报说，在会议结束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为了讨论团结问题，一些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彼得堡城郊大街九号集会”。秘密警察在报告中提到，伊凡诺维奇，即梯弗里斯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柯巴对一个景象非常惊讶：列宁和马尔托夫以平和的态度讨论当前的形势，马尔托夫甚至接受了列宁的著名的党章第一条，而以前的分裂正是因为这一条条文。胜方很可能是列宁。从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最后又重新团结起来，并且以列宁的观点为行动准则。

1906年元旦，革命的浪潮在柯巴返回梯弗里斯时已经退去。莫斯科的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格鲁吉亚的起义也处于失败的边缘。已经恢复了信心的副总督，下命令对《高加索工人小报》采取封闭措施。但是人们没有立即感觉到这种变化。一些领袖认为，革命的倒退只不过是暂时现象。柯巴在他的《两次搏斗》中对这一年的事件进行了分析，时间跨度从彼得堡的游

斯大林政治传记

行到莫斯科的起义。他认为起义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在需要采取进攻措施时却代之以防御措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裂使起义缺乏领导。这些事件表明团结起来的重要性，而这种团结很快会胜利实现。

但是，认识到团结问题的时间有些晚了，而且对团结起来的成员与要求也还是有疑问的。这一年最后几个月的激烈情绪冲昏了孟什维克的头脑，现在孟什维克又恢复了比它原先更为温和或胆怯的态度。布尔什维克为了使自己不致于被合并，于是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布尔什维克高加索局，成为党中之党。各派做好准备之后，就派出各自的代表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举行，批准两派的合并是这次大会的目的。有十一个高加索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孟什维克十人，布尔什维克一人。柯巴正是这个布尔什维克。

柯巴在第一次出国旅行中，没有时间去对国外的生活进行观察。由于一系列没完没了的辩论与争吵和冗长的会议，代表大会开了很长时间。他在会上为了捍卫列宁的观点而几次发表演说。但是，在辩论土地改革这个关键问题时，他却没有采取列宁的观点。孟什维克宣扬剥夺土地，由市政当局接手其土地。列宁的主张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孟什维克像往常一样看到自由资产阶级将统治未来的俄罗斯共和国，所以急于增强地方政府，反对中央的行政机构，因为地方政府更得人心。列宁希望所有的土地都归中央政府所有，这是因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问题”。柯巴—伊凡诺维奇对土地国有和土地市有都持反对态度。把大庄园在农民中进行分配是他认为应该进行的土地改革原则。在代表大会以前，在格鲁吉亚的《闪电报》上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巴就已经谈了自己的土地改革观点。为了驳斥列宁的国有政策，他提出了两个论点。其中的一个类似于孟什维克的观点，另一个则是他自己的观点。他说，资产阶级的政府将代表未来的政府，因此在土地交予资产阶级政府的前提下，却不增强这一政府的权力，是错误的。对于主张怎样能够符合他一直在宣传的“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柯巴未作解释。但是，国有和市有都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是他反对两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者，柯巴深知农民对于土地的极端渴望。对此他写道：“农民想把自己夺得的土地进行分配，他们极为希望这些土地成为自己所有。”这种观点后来被冠以“分配主义”之名，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分配主义”是对农民个人主义的一种反动让步。列宁对这些“党的实际工作者”进行猛烈驳斥，说这些党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社会主义原则，支持落后的农民，对农民对财产的渴望情绪妄加利用。伊凡诺维奇对此回答道，根据共同协议，土地改革在农村中助长资本主义正是革命的要求。封建主义远远落后于小农庄和农业资本主义。由于孟什维克是多数派，为了打败它，这列宁最后就同他这一派中亲农民的集团一起投票。但是对柯巴一类思想狭隘的“现实主义者”他仍然气愤不已。

这一事件无论对 1917 年土改还是 1945 年东欧和东德依靠红军保护所实行的土改，都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序曲。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在国有化名义下将土地分给农民。1945 年，普鲁士容克和波兰与匈牙利地主的土地不是在国有化名义下而是直接分给农民的。因此早在 1906 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伊凡诺维奇就提出了“分配主义”的观点，比列宁的观点鲜明而且清晰，而且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在 1930 年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集体农庄代替了“农村资本主义”。伊凡诺维奇—斯大林在四十年之后，即1946年他的《全集》的序言中，曾企图对他同列宁在斯德哥尔摩的争论进行解释。他自我批评，并说由于像他这样的“实际工作者”的缺乏理论远见和思想狭隘，所以产生了争论。他承认，他们这些“实际工作者”当时不明白列宁已展望到的俄国革命的前景，这种革命前景也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斯大林却认为，一个很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将分隔这两个阶段，因为他不能想象社会主义革命会发生在工人阶级成为国内的多数以前，这个说法让人感到奇怪，俄国如果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直到今天都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这一自供反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的一些复杂情况，也反映了它的领袖们暗中摸索的态度，在革命征途中，这些领袖在形势的压力下转变了自己的方向。

从斯德哥尔摩回来后，伊凡诺维奇以“科同志”为笔名，在一篇特别的小册子里报告了这次“统一代表大会”情况。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它的决议代表了孟什维克多数派的机会主义精神，所以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代表大会的结果感到异常高兴。

在代表大会通过的众多决议中，有一项决议同柯巴在技术部的审慎工作关系紧密又直接。由孟什维克提议，代表大会对战斗小队对银行、运金车和政府部队的袭击进行了谴责。列宁坚决反对这个决议，原因在于他认为革命仍在进行之中，游击队的袭击为未来全国性起义训练战斗小队。孟什维克对暴动和起义的持续大乱束手无策。但是他们比布尔什维克更快地认识到革命此时处于下坡状态，虽然很少有人敢于更多地谈到这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点。在对十二月起义重新思考后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说：“本来就用不着使用武力。”这一言论对于列宁来说纯粹是亵渎神明，因为他坚信 1905 年革命是正确的。许多对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感同身受的孟什维克还是不敢赞同普列汉诺夫的结论。

起初，对于更为广阔的争论来说，有关战斗小队的争论还是次要性的。如果十二月起义是错误的，那么战斗小队的袭击就更是错误的。但是，在革命继续前进的条件下，战斗小队的作用是重要的。对于“游击战争”，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原则上是不赞同的，但它却不能下决心完全否定它。除了夺取武器和兵工厂，它禁止一切形式的袭击。技术部门马上利用这个例外，继续不断地对沙皇高级官吏、银行、运金车以及兵工厂进行袭击。这在第一次革命中是即不确定又充满浪漫意味的。戏剧性的事件和闻所未闻的丰功伟绩充斥其中。一些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圣徒和引人注目的冒险家成为它的英雄。但是暗探和歹徒也打着革命的旗帜从事不正当行为。把他们区别出来并弄清他们的个人动机是困难的。西欧一贯认为俄国历史上的这种插曲是俄国的特色，是斯拉夫灵魂的神秘的反映，西欧人的兴趣在于有人称赞也有人讨厌这种恐怖主义，虽然西欧的自由派同情“不屈不挠的反对沙皇暴政的战士”。然而，不论是赞美或谴责这种恐怖主义的人都认为，在文明的西欧环境中是绝对不能发生这种遥远又具有异国情调的事情。不幸的是，在纳粹时期，西欧也遭受了这种“异国情调的”经历。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挪威的马基和游击队的各种抵抗运动类似于俄国人差不多四十年前所做的事，但是与俄国相比，西欧的抵抗运动经费更足，规模更大，行为更极端，死的人也更多。俄国革命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道义的，因为他们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同自己本国的专制制度作战。同样，在沙皇俄国，很多人也怀疑这个运动的英勇和具有理想的核心这一性质。在两个运动中，战士、冒险家、理想主义者、歹徒和英雄是其基本组成人员。很少有不相同的，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丹麦的灵魂中“俄罗斯灵魂”中的著名的神秘性也有惊人的表现。

很多布尔什维克感到不安，虽然革命者认为他们这种特殊的反对方法在道义上是可靠的。游击战在革命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四十年后由正规部队从事的主要战争也同样是辅助性的。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战斗小队必须服从“正规军”，“正规军”代表的是全俄国人民。游击战如果得不到广泛支持，其结果只能是自行其是而被孤立起来，最终会变成无望的和混乱的冒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退潮是具有长期性的，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下一次高潮。这时人们认为列宁解散战斗小队和取消游击战是理所当然的。起初，1906年全年，列宁对革命的力量还没有耗尽这一情况仍充满信心。这就是他为何顽固地捍卫他的战斗小队的原因，虽然由孟什维克控制的统一党的中央委员会对解散它们的问题态度很坚决。

但是事情还有更多。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各派在经济上的困难重重。1905年，党的收入来自迅速增多的党员的党费。富足的同情者给予他们大量经济援助。1907到1908年期间，由于反动势力增强，党员人数急剧减少，同路人脱离已经失败的革命，于是当时的财力不够支持机构庞大的党进行工作。革命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列宁没有看出党的机构由于这一情况而削弱。列宁认为，即使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也必须为下次革命进行准备工作；他决心通过筹资来进行这一任务。但是只有战斗小队向党提供必要的资金来对付残酷的反革命和使第二次革命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大获全胜。列宁说，革命者应该在需要时向自己的目标匍匐前进——他现在就命令他的战斗小队为了革命的需要匍匐前进。对于道义上的风险他已经觉察到，并建议党对战斗小队进行严格监督，以便防止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的破坏活动。

战斗小队活动的主要区域是高加索。起初它们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这与当地英勇土匪的传统相似。1905到1908年，总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件恐怖行为在高加索发生。1907年6月23日在梯弗里斯的一个广场上夺取财政资金是最著名的一次。在巴库港掠取“尼古拉一世”号轮船是另外一次著名的事件。通过梯弗里斯的那次袭击搞到了二十五万卢布，这批资金及时地转移到国外的布尔什维克金库去了。这些巨额的钱不容易在一些外国银行中兑换，因为这些外国银行已经知道钱的来源。包括未来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几个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在西欧由于想把这笔钱兑换掉所以被捕了。这一事件在俄国和欧洲的报纸上引起广泛关注。孟什维克大声地反对列宁，并要求由一个党的审判机构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个机构是由契切林主持的，契切林后来成为外交人民委员及李维诺夫的上司，当时他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上对列宁进行责难，并要求社会党国际对他所说的俄国社会主义道德败坏和蜕变的危险加以充分关注。

柯巴在这一切事情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从未被认真确定。在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局和战斗小队之间柯巴是某种意义上的联络员。他从未以这种身份直接参加袭击活动。由战斗小队计划的行动柯巴有权批准或否定，向战斗小队提出建议，主要行动的“后勤工作”同样由他负责，并从远处对执行情况监督。沙皇警察追捕犯罪者，但从未怀疑柯巴会是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们要捕捉的罪犯之一。他的这种作用完全不为全党所知是因为他伪装地很成功。战斗小队的两个传奇性的指挥员——特尔·彼得罗相（“卡莫”）和柯特·金察泽既是他的心腹又是他的学生，身材魁伟、热情洋溢、罗曼蒂克、足智多谋和不知疲倦是他们两个共有的特征，当暗探局抓到他们后，虽然他们受到了非人的苦刑，但没有泄露任何机密。由于他的同志们的这种性格，柯巴知道他可以信赖这两个人，而且他认为同他们的密切关系是可靠的。但是，显然，高加索的孟什维克也知道了一点点他的真正身份，因为他们企图向党的检察机关以他违反了上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袭击的命令而控告他。但是，他设法从梯弗里斯搬到巴库去了，从而躲开了这次审判。

布尔什维克在这座石油城的力量要强于在高加索首府的力量。作为巴库委员会的领导者，柯巴可以对谴责他的人进行公开抗议。由于他负责战斗小队后方工作，就更削弱了他在政治对手中本来就不太高的声名。他常常被他的政治对手称做“疯子”和“瓦解者”。柯巴对于他在政治对手中的声名如何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列宁已批准了他的所作所为。当地的孟什维克以把他开除出“统一的”党对他进行威胁，这无所谓。在他看来，那种统一也是不纯粹的。他也不关心游击战在高加索政治气氛中所引起的可悲后果。很多人认为，革命已经同一般的抢劫发生了关联。当局的野蛮报复源于袭击产生的后果，结果是人们对沙皇制度普遍仇恨的同时也感到恐惧，并使他们更加冷漠，这也使反革命猖獗一时。S. 阿利卢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暗含了对战斗小队政治领导的无心的控告。在早期，俄国社会主义者就处于游击战这个极端麻烦的困境中，在二战中，全欧洲的地下运动也对此头痛不已。无论四年或四十年之后，想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从这一困境中开辟道路的人都难于作出判断：是赞扬那些领袖还是对他们加以谴责，因为那些领袖在当时形势的压力下，而且一切又无法确定，所以才制定出那些甘冒风险的决定。

实行游击战和“没收财物”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利。在高加索，更为温和的亚美尼亚联邦主义集团也实行过游击战和没收财物；甚至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也乐于搞自己的袭击活动，或者瓜分布尔什维克的掠夺品。即使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袭击活动也曾表示极力反对。在波兰，是社会主义的右翼专门从事革命恐怖活动。波兰未来的元帅和独裁者皮尔苏茨基是其中最出名的恐怖主义者。波兰工人阿尔西塞夫斯基是他组织袭击的一个主要助手，波兰 1945 年在伦敦的反苏流亡政府的总理就是皮尔苏茨基。柯巴和皮尔苏茨基当时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动机的支配下都干着同样的事情。皮尔苏茨基具有很少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更多的是具有罗曼蒂克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后来回顾十八和十九世纪中波兰贵族的那些带英雄主义色彩的起义，认为自己像科秀斯科、米罗斯拉夫斯基等波兰民族英雄的直系后裔。他对任何人民的革命不抱希望，而是真正地希望波兰通过游击战摆脱俄国的统治。柯巴却对人民寄予厚望。他的战斗小队只是起到一场伟大人民斗争中的工具的作用，而且肯定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这一点也说明，他们在成为各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对早先游击队的功绩评价不同。在波兰，对战斗小队的功绩具有一种官方的崇拜。好大肆庆贺每一次主要袭击的周年纪念；仔细挖掘有关皮尔苏茨基业绩的每一历史细节，并据此写出无数的书籍和文章，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很多细节都是由成人之美的历史学家们在事后制造出来的。在俄国，对斯大林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游击战中的作用官方很少提及。所有他的官方传记作者都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而斯大林本人对于他那一段生活的评价，也从未确切地提及。他的《全集》逐月和逐周地回溯了他在第一次革命中的活动，但却没有提到游击运动。是他的敌手说出了这方面所有已被人们所知的情况，或者就是他在高加索的下属在他成为俄国统治者以前很长时间部分地说出来的。根据列宁主义的传统，他同战斗小队的关系可能是不宜公开的，所以不能对外宣传。同时也说明似乎有一种错误或偏向曾经出现在斯大林或者甚至出现在列宁的事业中。可以证明的是，在头一次准军事活动中，柯巴表现出一种十分爱好浪费的、野蛮的战争方法，柯巴的这种爱好在日后表现得更为强烈。

在1907年5月，以伊凡诺维奇的假名，柯巴又一次前往伦敦出席党的新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怀疑他的代表资格，最后他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孟什维克的一个“堡垒”现在建在他的家乡，所以他很难获得任何公认的高加索组织的代表委托书。他自我安慰，认为反正布尔什维克对彼得堡、莫斯科和俄国其他地方的组织已经控制起来了。在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获得优势不大的多数，并设法加重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中的作用。游击战的问题必然会被提出来讨论。对列宁，马尔托夫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而这一次列宁忍住了没有还击。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战斗小队的意见也传播开来。大多数的列宁追随者要求对战斗小队的活动采取禁止措施。在这一点上，孟什维克轻易地就使大会通过禁止“没收财物”和一切武装袭击的决定。在整个大会期间，柯巴—伊凡诺维奇没有引起注意，也许这是因为列宁警告过让他保持低调。在通过禁止武装袭击的决定时列宁没有表示意见，但许多代表愤慨地要求他表明观点。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无疑地准备再搞几次“没收财物”的活动。否则，这个辩论就是虚假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还在预言，说“新的革命爆发”即将到来，为了适合于反革命年代的情况，孟什维克已调整了政策。

在柯巴 - 伊凡诺维奇返回巴库之后，他在《巴库无产者》这份新办的地下报纸上描述了代表大会的情况。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俄罗斯中部先进工人的愿望的代表，他们大多数都是为重工业工作的。孟什维克在本地占优势是由地方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对布尔什维克的官僚机构孟什维克是极力反对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他们与列宁派相比有更少的工人和更多的党官员。而且，只有少数几个温和社会主义者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大多数是格鲁吉亚人或犹太人；而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是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戏称，孟什维克是代表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代表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在党内对犹太人采取一次暴力行为。”在这句沉重的玩笑话中不存在什么反犹太主义的问题，因为柯巴比任何人都反对种族歧视。但是这句不明确的玩笑话使多数社会主义者听来很不舒服。

柯巴的报告还有一句独特的话语。他说，有两派明显地存在于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两派都没有参加，是“漂亮的废物”。柯巴正是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头一次见到了他未来的大敌，即托洛茨基。这位被判处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前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成功地逃出流放地，正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他大声地谴责列宁游击战。这样，柯巴和托洛茨基在初次见面以后，就在尖锐的争论中准备好了同对方进行斗争，虽然，他们在伦敦兄弟教堂举行的三周会议中甚至没有直接交谈过几句话。在这次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争论中，柯巴站在党的一边。他对于托洛茨基谈及“没收财物”的话感到十分刺耳。“漂亮的废物”这一对托洛茨基的称呼，反映了对托洛茨基善于雄辩的深刻印象，也许还反映了柯巴已经不能忍耐这些雄辩，这从柯巴似乎总是重复列宁的话这一事上可以看出。在那些日子里，柯巴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当时谁也想不到，将来他们会在俄国的整个历史中如此深刻地敌视对方。托洛茨基当时已经闻名于国内和欧洲，而柯巴还只在狭窄的高加索小有名气。然而，柯巴从他们在伦敦教堂的第一次见面开始，就在心中怨恨那位前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了。

第四章 柯巴演变为斯大林

反革命取得胜利——“取消派”和“抵制派”的出现——在巴库斯大林的工作——斯大林被监禁和放逐到索里维切果茨克——斯大林逃跑和返回巴库——斯大林对侨居国外的领导人进行了指责，让他们“远离俄国现实”——藏身于鞑靼石油工人之中的斯大林——他给俄国社会主义报纸投稿——斯大林第二次被流放到索里维切果茨克，他在高加索停止活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最后分裂——斯大林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真理报》的创刊——斯大林影响第四届杜马选举——他到克拉科夫和维也纳进行旅行——《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斯大林会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返回俄国时由于暗探出卖而被捕——斯大林被流放到近北极的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理论——斯大林在战争中没有起什么作用

列宁在 1907 年 12 月决心返回日内瓦，他在同一个朋友告别时说道：“一个反革命的时代已到来了；除非沙皇制度被一次大战所动摇，否则它将持续二十年。斯托雷平政府的恐怖正盛行全国；列宁甚至在他的芬兰藏身处也没有安全感。又过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九年，对于第二次革命已经迫近这一事实他仍有所怀疑。在沙皇垮台前几周和他自己掌权前几月，也就是1917年1月的时候，为了对第一次革命表示纪念，他对年轻的瑞士社会主义者发表演说，在结束时向他们保证，虽然对于第二次革命他这一代活着看不到了，但他们这些青年肯定能够亲眼看到它的到来和胜利。两次革命之间隔了不到十年；而这十年中反革命时代只出现在头五年。到1912年，革命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然而，在1907年底，列宁的悲观论调是有一定根据的。沙皇制度又卷土重来。由于疲惫和失望把工人阶级压倒，有二百多万工人在这次革命高潮时参加了罢工，其中大多数都想达到政治目的。1908年参加罢工人数只有十七万四千，1909年只有六万四千人参加罢工，1910年只有四万六千人参加罢工。言论、结社和新闻的有限自由同时被取消了。地下的各党派已经士气涣散和精疲力尽。在党员和追随者中由于失败情绪的蔓延引起了怀疑主义和玩世不恭。知识分子中有的人士公开抛弃了激进主义，力图到上流社会重新寻找门路。曾生活在地下运动边缘的幻想中的那些放荡不羁的文人，现在都被神秘主义、性欲描写或为艺术而艺术这些消沉的思想所笼罩。各种秘密组织也都士气低落。剩下的人们则与暗探联在了一起，而这些暗探都在第一时间向暗探局报告各派人事和活动。钻入各团体的领导中心的暗探们，尽力挑拨离间，使地下运动陷入了一个背叛、阴谋、恐惧和怀疑的大泥沼难以自拔。

这种情况的一个典型的反应就是厌恶秘密工作。孟什维克的作家把这一典型反应提高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他们要求党停止地下活动，与旧的习惯诀别，使党成为一个普通的反对党，公开地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为自己的目的而工作，这就类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似于欧洲的社会党。对那些鼓吹“重新评价”的人们，列宁将他们贬为“取消派”，或者是党的掘墓人。列宁认为，革命的鼯鼠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必须继续在地下掘洞。当时，怀着敬佩之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注视着西欧、特别是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关注它的强大的工会和政治机器，关注它向上的和大众化的报纸，关注它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议会代表制和选举运动。他们对俄国地下运动的瓦解深恶痛绝，同时对国内的运动欧化的希望非常强烈。

但是俄国社会的整个结构不具有欧式特点。沙皇制度还是具有半亚细亚性质的专制制度。确实，第一次革命的成果在六三政权下也没有完全消失。一些不可靠的自由孤岛在最激烈的恐怖活动结束后仍在四处留下了。在严厉的审查下各反对党又公开地出版报刊，他们只能以冲淡的形式，用暗示和引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这些报刊一般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暗探局往往可以任意找借口取缔它们。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少数合法存在的工会和左翼俱乐部与协会。杜马的地位同样糟糕。沙皇专断地解散或封闭了在两次革命中间选举的四届杜马。社会主义代表无论在哪届杜马中都没有豁免权，所以许多代表仍然在西伯利亚流放。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那些企图把欧洲的工党移植到俄国来的人，仿佛在做着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有几个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同意保持秘密组织的存在，但把党的主要工作转为合法形式的活动仍是他们的主要希望。除了普列汉诺夫，很少有人像以前一样地认为地下工作是重要的。这就为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结成了最后一个政治联盟打下了基础，这个联盟直到一战的爆发时才破裂。

列宁多年以后在回顾这一时期时写道：“革命政党应当继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续学习。不但学习进攻。……还应该学会正确地退却。……如果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退却，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政党中间退却得最有秩序。……”列宁的一些同事和追随者不赞同“有秩序地退却”。列宁的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不同专制制度作无望的冲突，以此保存革命力量。他不赞同“取消派”，维护秘密组织，但是他要求党以合法形式采取秘密行动。甚至在反革命重新猖狂前，他就停止对议会选举的抵制；而在看到他的追随者仍坚持对议会选举的抵制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投票反对他自己的一派，目的在于派出社会主义者到投票站去。他还坚持他的追随者们应该在审查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出版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在合法存在的工会和教育协会中的工作是他们应该做的。惟有如此，党才能把它的思想和观点传达给更为广大的群众。当然，公开的宣传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无所忌讳的秘密宣传可以对其进行补充。秘密的委员会应该指挥和控制一切形式的无论合法与否的活动。

当孟什维克中厌恶地下工作的人占多数时，布尔什维克却仍愿意从事地下工作。1907年全年中，甚至到1908年，他们的思想主体是“召回主义”。一些出色的作家、宣传家和组织家，比如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克拉辛、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极左派”进行了领导。

争论的问题又回到了社会主义行动的内容和形式上。那些赞成公开活动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得鼓吹在某方面同现存的制度实行和解。举个例子，为了通过沙皇的新闻审查，就必须在出版物上放弃推翻沙皇制度的主张。因此列宁争辩说，有些人想用当局的种种规定限制党的行动方式，他们实际上是把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共和国的原则放弃掉了。资产阶级自由派被孟什维克视为是反对派的法定领袖，现在他们也同这些自由派一样希望沙皇制度逐渐转变为君主立宪。列宁认为，这种虚假的希望是同社会民主党不相称的。另一方面，召回派则不是革命的实践家而只是革命的宗派分子。他们对地下工作崇拜有加，但却害怕更广阔的行动机会，他们的这种心态势必使革命陷于无能。他们是取消派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柯巴成为斯大林的朋友是在两次革命之间，柯巴是一个比较不为人所知的格鲁吉亚地下工作者，而斯大林则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个全国领袖。人们对他为何被提升有些困惑，原因在于1907年到1917年的十年期间，他在监狱里、在前往西伯利亚的路上、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和从流放地逃跑之中总用了七年的时间。在他的著作中这一段经历的作品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卷。从这一卷里，即使最宽容的读者也几乎找不到说明他在政治和才智上有什么明显的成就的证据。在列宁从瑞士返回以前，斯大林就在1917年初匆匆从西伯利亚回到彼得堡领导布尔什维克，此时的他同那个在《斗争报》上发表文章的青年作者比较起来，进步并不显著。他上升不是因为任何文学或新闻工作上的才能，而是由于他的实际活动。

当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再次驻扎西欧的时候，他一直在巴库坚持工作。有一类领袖党需要到国外以避开暗探局的迫害，而斯大林不属于这种领袖。他也不属于那一类党把他们送到国外各类党校去完成革命的教育的前途的工人。列宁认为他属于自己教育自己一类的人。除了到克拉科夫和维也纳进行了两次短途旅行以外，他那些年里都在俄国，在地下组织中从事单调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日常工作，而这种日常工作大大不同于波折又令人激动的节日气氛。这些日常工作是他的重大弱点和重大力量的根源。比起侨居国外而具有广阔的国际远见的领袖们，他缺乏的正是这种远见。当然，与其他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相比，他的国际主义会有更多教条的性质，缺乏活生生的经历。在地方范围内活动，使他只知道高加索民族和贵族之间的血腥世仇，这种血腥世仇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蠢行。缺乏对欧洲生活总趋势的深切理解，缺乏对被称作欧洲文明的那个五彩斑斓的彩虹的敏感是他的国际主义的不足之处。另外，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故乡。最初的出身和教养，现在的政治上的命运使他扎根于本土。

1907年10月25日，他当选为巴库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回忆道：“经过在石油工人中间的三年革命工作的锻炼，我成为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者。在和巴库先进工人……的交往中，以及在石油业主和工人最激烈的斗争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何为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由此，在巴库，我受到了第二次革命的洗礼。”在巴库，欧洲和亚洲更密切地汇合和互相渗透，这一汇合渗透的程度远远高于在梯弗里斯的情形。迅速扩大的石油工作成为欧洲的技术方法和经济组织的代表。东方的性质体现在同波斯的边境贸易中。那时，巴库的雇佣工人中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占48%。波斯人、列金人和鞑靼人占42%——大多数的波斯工人不是长期作雇佣工人。土耳其人占10%。一个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要包括所有这些种族、民族宗教以及它的不同风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俄罗斯工人工作熟练又代表现代生活方式。穆斯林人是不熟练的工人，是类似乞丐的无产者。在鞑靼的“沙黑西·瓦黑

斯大林政治传记

西”节日期间，他们的习俗是自我鞭鞑。传统的血亲复仇制不比阿拉伯沙漠地带好多少。在城市的穆斯林人之中，每个家庭都过着懒散的生活，不与外界联系，对于激励着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居住地的那个世界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所以，搞秘密工作适于在穆斯林聚集地进行。布尔什维克在穆斯林居住区设置了秘密的印刷所。在那儿柯巴用假名加约兹·尼沙拉泽躲避警察的追逐。

然而，把分散的穆斯林工人宣传和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工人阶级的构成和石油公司的政策都具有亚细亚的特点，虽然欧洲人占公司的股东们的全部。就像柯巴说的，实物工资加奖金等于工资制度。只是在产业革命初期，那些剥削花样以及只有狡猾的东方人才能发明的各种欺骗行为才逐渐被西欧所熟知并把它们经常运用在石油工人身上。机械工厂雇佣的全部是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它们实行的工资制度与欧洲的制度类似。但是这样一来工会难以协调这些不同工人的不同要求。俄罗斯工人对实物工资制的依赖到了这种程度：在1909年里海石油公司不允许工人在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结婚。所以，在工业人口不纯和落后的情况下，这儿的劳工冲突是具有突发性和尖锐性的。

在1904年底，人们记得，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发生在巴库革命骚乱之后。后来，这儿的政治生活被血腥的部族仇恨所淹没。1907年底，当俄国其他地区的骚动结束之后，巴库的革命仍在进行当中。这儿的地下运动也没有马上就被粉碎。在9月底这一届杜马的初选中，各个等级分别选举，布尔什维克当选为工人自己的代表。柯巴在《给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委托书》中说，作为党的代表，必须按党中央

斯大林政治传记

委员会的指示和命令行事。直接立法不是他们的工作。代表们应该在杜马中坦率地声明，在沙皇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任何进步的立法或和平改革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他们应该继续鼓动革命。布尔什维克议会策略范本就是这一指示。

柯巴在选举之后开始对石油工业中的劳工冲突很感兴趣。石油工人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它是一个工会，而孟什维克则分别组织和领导机械工人。柯巴这时的主张与美国产联的原则——产业工会而不是行业工会非常类似。他坚信，石油公司的谈判对象必须是整个产业的代表。不允许收买某个行业而牺牲别的行业。必须改革工资制度，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才是工人所需要的。工人们反对亚洲的惯例，赞成欧洲的方法。在布尔什维克工会的合法报纸《汽笛报》上，柯巴以科·卡托为名发表了一系列短文，这些短文中阐述了这些观点。他号召“五万巴库工人”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代表谈判的前提下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将豁免权授予会议代表。这对于布尔什维克是一次胜利，因为孟什维克曾主张无条件地同石油公司开始谈判，而无条件地抵制这次协商则是社会革命党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的主张。

这次协商会议持续了几个月，集体合同、管理罢工和发表政见等问题是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的问题。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后来写道：“一个真正的工人议会只有在黑帮反动统治了全俄罗斯的条件下才会在巴库举行。”奥尔忠尼启则作为柯巴的一个好友是未来的重工业人民委员。巴库大胆而公然的挑战六三政权。列宁怀着忧郁的心情对此事赞扬道：“群众政治罢工的最后的莫希干人也不过如此！”他知道，如果使俄国其余部分行动起来，只靠巴库的力量是不行的。革命只是在高加索备

斯大林政治传记

战。但是，作为战斗的指挥者巴库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却引起了列宁的注意。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在无望又沉闷的环境中坚持住？是伊凡诺维奇·柯巴。在塔墨尔福斯、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他曾经看见过他，他同战斗小队之间还存在联系，但是他的大名还没有列入列宁的私人档案。而且，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叶努基泽兄弟、斯潘达梁、贾帕里泽和邵武勉他们也是同柯巴一样的人。巴库的“汽笛”声由于其他俄罗斯地区的沉寂而显得震耳欲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使柯巴这个假名逐渐为列宁所了解。这就是他的书面语已不是他本地的格鲁吉亚语了。巴库的格鲁吉亚人人数不多，俄语成为当地通用的语言是由于俄语是不同语言的统一因素。秘密的《巴库无产者报》和由柯巴主编或助编的《汽笛报》都是用俄语出版的。国外的布尔什维克总部定期收到这两份报纸，列宁对他的追随者们所印出来的每一篇文章和评论进行了严格审查。柯巴的文章虽然数量少也不突出，但对布尔什维克派的狂热般的忠诚，以及务实精神正是列宁所欣赏的方面。所以，柯巴从梯弗里斯到了巴库，就如同从本地的一潭死水中走到全国政治的急流中去了。

在巴库委员会工作和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罢工，在这些罢工后的八九个月内，暗探局逮捕了柯巴—尼沙拉泽和其友人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并将他们关进位于拜洛夫的监狱。在被关的日子里，他们还从事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与不同观点的监友辩论，与一般同志交换印刷物和秘密消息，把秘密写的传单和其他东西偷送出监狱去，等等。由于革命的失败，使不同派别之间的辩论更趋剧烈。狱中柯巴和奥尔忠尼启则是布尔什维克的两个发言人，其中柯巴是冷静、无情和镇定自若的，而奥尔忠尼启则却动辄激动不已，喜欢与人争吵。怀疑破坏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狱中的讨论，这是因为暗探局甚至把暗探安置在牢房中。于是因为狂热的怀疑，同监的人就经常想追踪他们。有时，还会把受怀疑的人杀死，因为地下工作的信条里包括出于自卫可以杀死暗探。一些无辜者有时因受怀疑而遭到这种命运。这使有些人的病态恐惧心理得到发泄的机会，甚至为有些不良分子提供了公报私仇的机会。每一派都急于向对方下手。一些关在拜洛夫监狱中与柯巴关系不友好的回忆录作者曾谈到一些故事，说柯巴狡猾地煽动别人以引起怀疑情绪，并趁机把那些偶然开罪他的无辜者迫害致死。很难判断这些故事的真假如何，因为很多地下工作者被牵涉在内，而且它们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怀疑情绪的反映。

柯巴曾被关在巴统的监狱几年，巴统监狱的生活还是比较轻松和安静的，但巴库的监狱却不然。将被处死的犯人常常和其他人混居在一起，而就在院子里执行处决。可能是刚刚同你辩论过的人就被带到刑场去，这使得人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但是柯巴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可以继续睡觉，他的同志都吃惊于他的坚强的神经。如果不睡，他就继续学习复杂的德语语法。他在这样污秽和堕落的环境中仍对石油工业中的冲突予以密切关注，并不断地为《巴库无产者报》和《汽笛报》撰稿发表评论。但他的评论的语气已经不那么自信了，他认为他的同志们不要对总罢工抱有希望。“合乎时宜的适当的退却形式就是各公司分别进行罢工”。他要求工人们注意防止一种绝望的行动，也就是“经济恐怖”，即个别工人对厂主或经理进行袭击，当时这种行动变得越来越经常化——因为这种行动的结果是使有组织的工人遭到报复。但是，当“石油大王的喉舌”——这家地方“自由派”报纸向社会主义工会工作者鼓吹

斯大林政治传记

道德并谴责他们不关心经济恐怖的时候，柯巴有力地进行反击，说因为石油工人的悲惨景况，所以他们陷于绝望和采取暴力。他嘲笑孟什维克说社会主义者在防止经济恐怖时应该同当局合作这样一个建议。最后柯巴说，依靠自己的手段和按照自己的利益而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必须制止暴力行为和绝望情绪，但是让他们把犯罪者交给当局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乞求石油大王自以为公正的“自由主义”。

11月，有命令传来说他被放逐到一个叫做索里维切果茨克的地方，在警察的监督下他将在那里被流放两年。索里维切果茨克是十四世纪俄国商人建立的一个小小的居留地，目的是为了交易盐和皮毛，它位于俄国欧洲部分沃洛格达州的北部。它的气候优于西伯利亚北部放逐地。所以，柯巴的放逐条件比较起来还是可以的。他仍然没有引起暗探局的特别注意，而且在行动的时候没有被当场抓住。从沃洛格达出发，然后向北行进以到达索里维切果茨克，在途中他染上斑疹伤寒，但是，他还是最终于1909年2月到达。四个月之后，他又逃跑了。他经过彼得堡前往高加索，在彼得堡时他拜访了阿利卢耶夫，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并通过阿利卢耶夫同秘密的党总部进行了联系。利用一张新的假护照，7月间他就重新出现在巴库，此时他的名字是扎哈尔·格利哥里·迈里基扬茨。他必定受到了彼得堡总部的热烈的欢迎，因为党的工作者们对巴库这个“不屈不挠的堡垒”仍是很重视的。他还被非正式地任命为国外出版的党“中央”刊物的高加索通讯员。由于他担任这个职务，所以列宁更加注意他。

他在从彼得堡返回巴库的途中很不愉快地回想起他在首都看到听到的一切。彼得堡的组织，1907年时党员有八千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但是这时已经不足三百人。对于党总部的低效率，他似乎是不满的。他曾经对于高加索的情况详细进行了询问，但总部也缺少情报。彼得堡同侨居外国的领袖们缺乏联系，秘密刊物的发行数量也不多。对参加彼得堡总部的工作他渴望已久。

在被监禁一年半之后，他发现“巴库堡垒”的情况趋于恶化。这儿的组织也只有几百人，其中布尔什维克 200 至 300 人，孟什维克 100 人。工会的会员也很少。教育俱乐部的情况也不好。在油田里，石油工人的劳动时间又从八小时增加到十二小时；工人在石油工业繁荣时却未得到什么好处。党的组织已经没有能力领导拮据的无产者，不再向他们散发小册子和传单。党已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秘密的俄语《巴库无产者报》从他放逐的那年以后，连一份也没有出版。比起其他地方，这儿的事情看起来还算好一点，但它已不再是俯视一切的巴库了。

柯巴—迈里基扬茨在巴拉哈拉纳油田的一个秘密住所居住了下来，之后首先就是恢复《巴库无产者报》。在他返回后 20 天左右，就发行了第一期报纸，其中一篇未署名的社论《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正是他的作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危机；他不仅针对国内的读者，还针对党的国外总部，他是这样分析他们的。根据从首都得到的一些消息他说道：“和群众脱节，而且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是党目前的麻烦所在，统一的党的生活不存在了，而是各个组织间彼此隔离。比如说，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么，高加索不知道乌拉尔在做什么，每个地方自我封闭。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大家在 1905、1906、1907 年引以自豪的那个统一的党，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国外的中心的情况一样，都受到了指

斯大林政治传记

责，因为它们的刊物“都对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无能为力，不能使它们统一起来。国外机关报已经脱离俄国现实，所以是不可能依靠他们把名誉小组的活动统一起来的”这段话的最后部分是不确切的。作者认为，现在的地下党弱于老的《火星报》时期的地下党。那时《火星报》利用一小群宣传家就组成为一个党。但柯巴是在表达俄国的革命者不满“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领袖，而且他也同样对列宁抱有怨言。他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例如把党组织公开化或把地下党的一切职责交给工人。前面一个办法就意味着把党取消，后一个办法同样无效却仍然在“保存旧的组织系统，使用老一套的党的工作方法，从国外进行‘领导’的情况下”他将领导两字加上引号是表示对它的轻蔑。

然而，在结论部分他的言词就不那么激烈了，原因在于他并不要求把领导权转交俄国国内。用俄文出版一家全国性的报纸，才是他的要求。这份报纸能够促进同国内的生活保持接触，并把党的分散的部分统一起来。中央委员会负责创办和领导这一报纸。“领导党的工作本来就是中央委员会的任务与责任。但中央委员会没有把这一任务执行好……”这时两派之间仍然不是全身心地进行合并。在中央委员会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长期对峙。柯巴根本不了解这件事。他谴责整个中央委员会与俄国实际脱离。他关于出版全国性报纸的主意可以看做是一个实际的建议，但是三年之后，《真理报》才得以在彼得堡创建，柯巴就是《真理报》的一个编辑。同时，作为《巴库无产者报》的编辑，他也有机会成为到彼得堡总部工作的一个候选人，他的一句旁白说到，与其他多数组织不同，巴库的党组织如今仍然密切联系群众。

斯大林政治传记

柯巴在同一期《巴库无产者报》上，发表了一个论及国外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不和的巴库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到因为柯巴的一些小的意见分歧而被列宁指责为搞派别分裂，列宁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对的。在那个时候，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奠基人已不与那些激进派和抵制派交往，这些激进派和抵制派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作家卢那察尔斯基、小品文作者曼努依斯基，另外还有一些人。这些激进派对列宁进行谴责，指责他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这时列宁的观点趋向于规劝他的追随者们把地下工作同合法活动结合起来，他辩证地鼓励他的追随者灵活地运用原则，进行一种类似孟什维克主张的宣传。

哲学上的争论使策略上的分歧更趋复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观点激进派提出了疑问，企图以新康德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为标准来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列宁曾经彻底与日常的政治活动脱离，而且把自己关在巴黎的图书馆里，这使他的学生十分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写出他的哲学巨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在这本书中对新康德主义者、造神派和所有其他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敌对的双方都自己设立了学校，设立学校的目的在于训练被吸引进争论的党的工作者。列宁的学校坐落在巴黎附近的朗居曼，而造神派和激进派的学校则设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庇护下鼓吹他们的观点。在学生和资金上这两所学校互相竞争。那些冒着很大危险从俄国赶来的工作者，却在此需要学习深入细致的哲学课程，并被号召选择互相冲突的纯理论中的一种或几种，以及赞同或反对开除异端分子，而这些异端分子在政治策略上的观点是与他们相同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巴拉哈拉纳油田的鞑靼人之中，藏着这位巴库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厌恶朗居曼和卡普里之间的争论。他坚信那些远离俄国现实的侨民的精神已接近崩溃。巴库委员会应该谴责这些侨民，并使他们失常的精神复位。他实际上赞成列宁的策略和政治观点而反对激进派的，但他对列宁把波格丹诺夫开除和波格丹诺夫忽视党的纪律这些事件也持不赞同态度。由于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各派别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它们应该共同工作；而列宁则不应该践踏少数派的权利。对于朗居曼和卡普里的争论，因为它没有充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巴库处于中立地位。列宁对这一谴责予以关注。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向高加索的批评者进行婉转地解释说，他对政治迫害并不赞成，但因为激进派不遵守纪律，所以他不得不开除他们。

柯巴一方面对国外的总部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却小心地不使自己卷入同列宁的论争中。1909年11月和12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了他写的一系列《高加索来信》，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这一报纸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马尔托夫和唐恩都是其编辑人员。这些“来信”详细考察了高加索的情况。作者对石油工业、当地政府和工会的情况进行了讨论，还对高加索的民族关系、地下工作、社会主义者的合法活动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比梯弗里斯和巴库的情况——所有这些虽然在形式上是平淡的，但都是一本正经和具体的。在一些“来信”中他对高加索的孟什维克及其首领挪亚·饶尔丹尼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马尔托夫和唐恩对此是反对的，因而只在通常供进行争论用的辩论专页上发表了这些信，有一封信甚至没有被刊登出来。这位高加索通讯员的表现是一个顽强的列宁主义

斯大林政治传记

者的表现。他丝毫不对列宁进行批评，而他过去曾以匿名通过巴库委员会和《巴库无产者报》批评过列宁的。列宁对于得到柯巴的一臂之力是感到高兴的。列宁在俄国的追随者的心情很快被列宁觉察，对在俄国设置进行工作的全国总部的问题提出了要求，并使不大愿意的孟什维克在压力下也不得不同意此事。同时巴库也为此大肆宣传。柯巴于1910年初写了另一决议，在决议中巴库委员会要求“俄国现在应成为实践的中心”。这个要求是有因可寻的，因为在决议的开始就预言：“一个时候存在于革命动力中的沮丧和麻痹状态开始消失了。”对此，柯巴同前几次一样，比大多数侨居国外的作者们更早地看出了问题的，虽然当时在维也纳托洛茨基也作出了类似的预言。巴库委员会这时更为支持列宁的观点，对“取消派”他也要求予以开除，并合并布尔什维克和那些赞成地下工作的孟什维克。

3月，柯巴—迈里基扬茨在准备石油工业总罢工期间再次被捕。同一天，他写的一张传单被秘密印刷所发表，传单的主旨是为了纪念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七十寿辰，其中说，“受到他的批评……‘戴皇冠的人物’、第一流的学者都多次实行退却”。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工作，这时他又回到监狱里等待“行政”判决，这一等待大约要用六个月的时间。这次也并不很苛刻。他将被遣送回到索里维切果茨克去完成他的流放期。流放结束后的五年内禁止他居住在高加索和俄国其他大城市。于是他又向北行进。这一次的流放持续了大约九个月，直到1911年6月27日流放期满，他始终没有逃亡。这一次，他也就同高加索永远告别了。后来他还代表中央委员会去视察地方组织，到他的本地去作过短期旅行。但他在高加索的经历已经完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很快实现了关于革命运动重起的预言。标志性事件是1910年列·托尔斯泰葬仪时发生的街头示威。1912年时运动开始趋于激烈，当时工人为了抗议西伯利亚连纳金矿枪杀数百名罢工者而纷纷举行罢工。同时，社会民主党的虚假的团结也最终消失了。1912年1月，列宁在布拉格召开了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少数孟什维克参加了这次大会，目的是为了宣布他的派别组成另一个党，意思即是使它的派别成为现在的这个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他同孟什维克主要部分的最后决裂。就像1903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人民大厦举行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那儿举行。捷克社会主义者是俄国革命者的主要组织者。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加入了柯巴的名字。但是柯巴落选，这是因为大多数从各个居地来的彼此认识的代表，不了解柯巴这一名字。柯巴以前的助手和奥尔忠尼启则当选了，这很可能因为他只是列宁在朗居曼的学校的一个学生。但是列宁并没有放弃。党章规定，被选的中央委员会对增补别的委员这一事件享有权力，于是在列宁的提议下，中央委员会使柯巴具有了一定的权力。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和俄罗斯化的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是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马林诺夫斯基是暗探局的一名暗探。

列宁支持柯巴的原因何在？列宁急于在政治运动复兴的开头使自己的活动范围尽可能增大。他保留同孟什维克的有意义的联系，以便不会在妥协或团结的考虑的压力下使他“削减”他的口号和宣传。这时他正开始组建自己的组织。由于过去的分裂，他同一些能干的同事分了手，最近他身边的朋友又少了，这是因为他最近孤注一掷的决定。此时，一个五花八门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联合体处于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孟什维克右翼、布尔什维克激进派、反孟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者、取消派、抵制派、造神派以及干脆的托洛茨基派是其中主要派别，他们在报纸上对列宁主义进行疯狂的抨击。列宁的亲密助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甚至加米涅夫，他是托洛茨基的姻兄弟也开始不那么坚持了。对于那些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列宁已很少关注。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上他选择了一些地下党的实际工作者加入。中央委员会在其自身选举完不长时间就设置了一个俄罗斯局，这个俄罗斯局指导党在俄国内部的活动。柯巴、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和某个叫做果洛什切金的人是这个局的组成人员。柯巴、奥尔忠尼启则、斯潘达梁都曾经是巴库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台柱就是高加索集团，与他们地区重要性相比，它的作用是不足一提的。这是由于在 1908 年罢工和示威中巴库的名声仍然很高，也许列宁认为还把这种名声过分夸大了。列宁坚信，前头的任务需要一些人来完成，这些人必须具有坚毅、顽强和敏锐的性格。在克鲁普斯卡娅的档案记录中，“马”是巴库集团的代号，列宁现在就在他的马上套上挽具了。

柯巴的提升并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从国外的高加索工作者那里，列宁肯定听到许多对他赞美的话。奥尔忠尼启则也曾在朗居曼学校吹嘘巴库委员会中最坚强的人是柯巴。同时柯巴也注意去做一些考虑周到而谨慎的姿态，以使他的提升较快地得以实现。他在流亡中一直联系着有影响的党工作者，他们也可能在总部称赞过他；他尽可能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得和蔼可亲。他从索里维切果茨克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委员会委员谢明·施华兹，在信中他再次建议组成一个俄国中心，从而含蓄地作

斯大林政治传记

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封信中柯巴表现得对侨居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极度尊敬，对列宁无比忠诚，并对列宁的对手们嘲讽不已。列宁肯定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他充分认识到，柯巴将忠实地执行他的思想。

1911年6月，柯巴结束了流放。由于他被禁止居住在任何大城市，他就选择了沃洛果达，这个小城市比较接近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个月后，他突然到了彼得堡，再一次去拜访阿利卢耶夫。此时，暗探局的特务正密切监视阿利卢耶夫的房子，虽然事前得到警告，但柯巴已经厌恶了过分小心和怀疑。同一天，一个悔恨的暗探巴格罗夫在基辅把总理斯托雷平暗杀了，原因是他想在地下党眼中有所表现。陷于一片慌乱的暗探局，逮捕了所有的可疑分子。改名为契柯夫的柯巴又被捕了。在监狱中呆了几个月之后，他被放逐回沃洛果达，这次流放期是三年。

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在他返回沃洛果达途中的时候，正在国外集中。1912年2月，新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特使的奥尔忠尼启则到沃洛果达来看他的时候，他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结果有所了解。奥尔忠尼启则对列宁说：“在见到了伊凡诺维奇之后，我已经同他安排了一切事情。听到事情的结果他很高兴地。那些消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最后决裂，柯巴是赞同的。除了考虑到原则问题外，这一决裂也促进了他的提升，也使得他对列宁的政策要坚定地遵循。另外就是如何躲避沃洛果达警察的监督，返回首都。在他即将逃跑之前，他写了一篇向俄国社会主义者解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定传单。在这份文件的后面他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他是第一次代表布尔什维主义全国领导发

斯大林政治传记

言。这张印了六千份的传单在主要一些工业城市中散发。这件事没有引起当时一些体面的俄国报纸的注意。但是柯巴这时在他当权的道路上已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五年后，沙皇退位，他从西伯利亚返回首都，就是凭这个传单，在列宁到来之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然而，他的官方传记作者错误地宣称，柯巴在一生的这一阶段中在布尔什维克中的位置仅次于列宁。情况并非如此，布尔什维主义领导人员的调整是不断变化的。除了作为中心人物的列宁，这个等级制度是不确定的；列宁有权威的原因，是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强干的政治才能，而不是由于其追随者忠诚和服从的结果所造成的。列宁周围的人员变动是不确定的，老的同志去了，新的同志又来了。在布尔什维克等级制度中类似于柯巴的一些人，已经被人逐渐遗忘了。从他随后的事业来看，他在1912年的擢升对他是多么重要。但是不同于其他人，他的基础已经很牢固了。当时，他升入中央委员会，好像只是党的一项普通的人事变动，而且特别的是这位新人没有创立或制定新思想和政策。所以，他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或头脑，而只是中央委员会的股肱。

从柯巴擢升到第二次革命期间，其时间跨度为五年，他几乎没有活动，这一事实更足以说明他的擢升是偶然的。在这五年中，因为后四年他在近北极圈的西伯利亚进行流放，所以他只在第一年行使了他的职权。即使在第一年中，他的工作时间也差不多只有5个月，之后就又被捕和流放，然后准备逃跑。所以，他只有七个月进行他有效的政治工作，而这七个月中只有五个月是完整的一段。这段时间他只能小范围地活动一下，熟悉党内领袖们，对自己的地位或许可以巩固一下，但是却没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更多的时间使他获得很多新的经验或剧烈地改变他的地位。

他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顽强地工作着。他从沃洛果达出发，然后直接到南方去，并了解了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对布拉格会议决议的反映。之后，他又从高加索返回莫斯科，在关于各地方组织对列宁新“路线”的看法这一问题上同奥尔忠尼启则交换意见。在4月的时候，他返回彼得堡，及时地为庆祝五一节做准备。他照例写了一张署名中央委员会的传单，但带有正教中学学生的腔调：“工人运动日益强大，使欧洲和美洲到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新的地域和国家陷入其中……无产阶级的激烈抗争，日益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自己的胜利很有信心，他们坚强而镇定，他们骄傲地走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之上……今天他们应当告诉大家，他们和自由国家的同志们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永远都不会崇拜金偶像了。”

在他呆在彼得堡的十二天后就被捕了——他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因为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有权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督。他充满激情地编辑了三期《明星报》，在其中有他的许多文章。他还为《真理报》的创刊作准备工作。《真理报》终于在1912年4月22日创刊，柯巴写的一篇编辑部文章在上面发表了出来。由于工人们反对列宁最后同孟什维克决裂，在文章中柯巴的语气十分和缓，论证比较充分。他说对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真理报》不会去掩饰。“我们以为强大而充满生命力的运动，不可能没有意见分歧，——‘观点的完全相同’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工人运动中分歧少于一致。因此，《真理报》号召在阶级斗争中社会主义者应该统一起来，“必须统一起来”。既然我们对敌人极力反对，我们就得互相忍让。要反对工人运动的敌人，在运动内部应该团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结，要团结一致进行工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代表性论说。当刊载这篇文章的报纸出版的那一天，柯巴已经蹲在彼得堡的监狱中了。三个月之后，和通常一样下达了流放三年的命令，此次流放地是东西伯利亚的纳赖姆州。恰恰过了两个月后，柯巴从纳赖姆逃出，重新出现在首都，他的党正在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这刚好可以让他展示他的领导才能。

工人区的选举运动被分成这样几个部分：在车间和工厂选举代表，代表选举产生选举人，最后选举人再选举产生杜马代表。经过第一个阶段，若干大工厂的选举被当局认为是没有效力的。为了抗议当局的宣布，柯巴召集了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执行委员会会议，准备进行抗议性罢工。结果政府在这种压力下退让了。在选举运动的各阶段中，为了争取工人选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公开地竞争，首都工人选举人的会议通过了柯巴写的在多方面类似于在巴库选举时所写的委托书的《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委托书提出对工人的要求，代表应公开提出，成为革命的代言人的代表们不应在士绅的杜马中无谓地玩弄立法的把戏。列宁对这次选举运动是支持的，并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时候关注选举的进程。列宁对《委托书》的简明扼要和柯巴的成功感到高兴。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区处于优势地位。最后，十三名社会民主党代表选举产生，布尔什维克占了六个，其余是孟什维克。但工人区选出了所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而大多数的孟什维克代表却由资产阶级选举产生。因此列宁认为，在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地与孟什维克竞争中，布尔什维克得到工人阶级支持。柯巴在他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通讯和给《真理报》写的文章中，对列宁的乐观看法，提出了含蓄的异议，社会主义各派的公开分裂不会由于布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尔什维克向工人提出的激进口号而发生。

选举之后，柯巴立即于 1912 年 11 月到克拉科夫，在那里呆了几天，参加关于中央委员会估计形势的会议。列宁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这届杜马中的孟什维克代表同布尔什维克代表必须实行公开分裂。他坚信工人最后会理解为什么要分裂，但他也准备严格区分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即使这种划分是不得人心的。柯巴返回彼得堡后没有按列宁的要求去做。由于极右分子在这届杜马中占优势，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不愿暴露社会主义者内部的分裂。对于《真理报》在分裂问题上退缩不前，列宁发现了并感到很愤怒。他会怀疑，这个由他带进党内核心的高加索人也就是柯巴是不是已经不支持他了。在托洛茨基写的有关斯大林评传中，托洛茨基称此事是柯巴反对其导师的一次恶毒的阴谋。列宁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此事虽然令人不快但很快会过去，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特有的老练而精明的方式去克服这个困难。他召集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和克拉科夫六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准备对《真理报》的编辑部进行详细考察，其方式又不会使柯巴感到自尊心受挫。

1912 年 12 月底的时候，柯巴去国外已六个星期，这是他一生中离开俄国最长的时期。他在这一段时期做的事情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妥贴地解决了当前的矛盾，在列宁和柯巴之间没有留下什么芥蒂。列宁想法劝使六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同孟什维克分开。他对《真理报》的和解调子进行了谴责，暗地里派了一个叫雅可布·斯维尔德洛夫的人去彼得堡负责《真理报》的工作。编辑部由斯维尔德洛夫负责——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斯克尼亚宾—莫洛托夫在编辑部工作——并使《真理

斯大林政治传记

报》开始了另一种风格。列宁让柯巴到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完成一些重要的任务，目的是为了安抚柯巴。

在这段时期，列宁无疑想深入了解一下柯巴，了解他的思想特点，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的重大缺点和优点。列宁看人比较准，而且会用苏格拉底的方法与人接触。起初，他肯定问了柯巴很多不同的问题：彼得堡选举，秘密工作的情况，高加索的民族和种族，等等。人们可以预测到，这种考察是很随和的。列宁必然已经知道了柯巴的限度。但是他对考察结果还是感到满意的。年轻的柯巴虽不是一个有独力思考能力的人，但却具有坦率、精明的特性，通晓实际事务。例如，他对高加索民族的复杂事务非常了解。两个人的谈话很快就集中到高加索民族的复杂事务上来。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见解独到，而柯巴根据他的经验，却能将列宁的理论变成现实。在一次讨论中，列宁建议柯巴写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在党的稳健的社会学刊物《启蒙》上予以发表。

这个建议令柯巴非常欣喜，因为此前柯巴还不敢涉及复杂的理论领域。但是比起高加索的种族纠纷，这一民族问题要广阔得多。在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就不能忽视波兰人的民族愿望。隔着列宁住处非常近的地方，皮尔苏茨基正在为他的军团的干部作准备，目的在于举行反对俄国的起义。列宁说：“波兰人憎恨俄国是有道理的。对他们民族感情的力量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革命必须以温和的方式对待他们，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同意他们同俄国分离。”然后还有奥匈帝国民族和各种族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包括马扎尔人、德意志人、捷克人、南部斯拉夫人。为了这些民族，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制订了一个计划。应该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奥地利人的政策加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以比较。列宁小心翼翼地以防止伤害他的门徒的自尊心，所以很可能向他的门徒提示了文章的概要、结论和主要论点。完成这篇文章需要几星期的时间，写作的最适宜的地点是维也纳，因为它是哈布斯堡帝国的首都，而哈布斯堡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另外，中央委员会还必须派一个特使到维也纳去，目的是为了安排一些技术问题，如安排党从巴黎到克拉科夫的邮递，印刷党的决议，因此，柯巴到维也纳去就可以在写作的同时操办这些事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写作的原因，它发表时以科·斯大林为作者之名。由于这篇文章，所以柯巴就被称为民族事务的专家，在五年以后的列宁政府中，他担任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柯巴在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代表们离开克拉科夫之后，还在克拉科夫呆了几个星期。同列宁在一起时，他必定回想起他曾经嘲笑过侨居国外的人“远离俄国现实”。列宁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个门徒肯定观察过他的导师。列宁看来非常贴近现实。他精通并了解国内每一个情况的事实和本质。在地下工作方面他的洞悉力大大超过许多生活在国内的顽强的布尔什维克。他还具有高超的掌握人的本事。他这时刚过 40 岁，但由于经历丰富而磨练出来的意志力和判断力，却使他具有成熟的和明智的性格。列宁作为革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远远强于一些领导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优秀人士。比起其他人，列宁的这种性格对柯巴—斯大林更具有吸引力。那么这位活动家却把自己的精力经常浪费在宗派性的争吵和无聊的理论争论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促使列宁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像他同卡普里的哲学家们之间进行的那种无益而尖刻的争论中呢？

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实际工作者一样，马克思主义的思维

斯大林政治传记

习惯也深深影响了柯巴—斯大林，他们明白蕴含在一场哲学争论中的政治含义。一元论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观点。根据这种一元论，一个单一的思想体系是由科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和策略紧密地组成。但是像斯大林这样的实际工作者，对于哲学和理论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只是为了方便在知识和政治上的运用，从通俗理论工作者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基本原理予以接受。这些基本原理似乎为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提供了巧妙的线索——对于那些教育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掌握这种线索比任何事情都更令人安心。社会主义运动的中级干部大多是没有受过充分教育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省力的思想工具，非常有效，容易驾驭。只要运用它，一切问题会得到解决；或是把它灵活运用，又会把另一个思想处理好。这种省力装置的使用者可能想不到，要经过艰苦的工作才能发明这一装置。他们也很少想到这种无聊而表面，且看来又不切实际的研究，有朝一日会淘汰那种省力装置。使用这种装置的人自然以同样的功利方法来对待他们的一切问题。与列宁的许多追随者不同，列宁本人是一个批判思想学者。最后他总是把他发现的东西加以应用，放到某些政治问题上去；而在那段时间里，他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从未因他的发现而动摇。但是他从事于研究工作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和虚心的。有时当他感到自己的知识需要拓展时，他会立即离开实际政治一年，到巴黎国立图书馆或大英博物馆中，吸取新知识，然后对某个辩论中的问题发表独到见解。这时，那些包括斯大林在内图方便的人，会不耐烦这位严肃认真的思想家。作为学者列宁可以不管他们的烦躁，但作为党的首脑列宁却又不能不管。另一方面，他的门徒由于深切信赖他们的首脑也会克制住对于理论家的愤怒。当列宁和

斯大林政治传记

柯巴—斯大林在克拉科夫会见时，他们之间在精神上肯定存在分歧。为了鼓励柯巴—斯大林去解决政治理论上的主要问题，列宁就设法来消除他与其门徒之间的精神分歧。作为一位党的首脑和思想家，他还具有精明又关心人的性格，他充分明白关于形成他的学生思想的那些艰苦条件。列宁对于他在思想上的粗野并不在意，并帮助他发现自己的优秀品质。

1913年1月下旬，柯巴前往维也纳。他在维也纳呆了约一个月。在那段时间，他写了一些文章和传单、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并对各布尔什维克中心之间的技术联络工作进行了安排。他还会见了当时在维也纳的一些重要流亡人物：这些人物包括未来的共产国际领袖尼古拉·布哈林，未来的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特洛扬诺夫斯基，以及列昂·托洛茨基。才二十岁出头的布哈林，已经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了。当时他正在批判边际效用的维也纳经济学派，写一些这方面的书。维也纳经济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就是伯姆—巴维尔克教授。这位年轻人必定在引导那个粗鲁的高加索人，因为他才刚刚开始学德语，在奥地利首都感到十分不方便。可能布哈林还帮助他找寻所需要的引语和书籍。在民族问题上，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布哈林同列宁的观点不一致。对于民族自决权列宁大加宣扬，并认为根据民族自决权，波兰人、乌克兰人、列特人等有权与俄罗斯帝国分离并组成自己的独立国家。布哈林对这个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一观点是对波兰人、乌克兰人等民族作了不必要的让步。他认为，革命自动地解决现存的民族独立问题。在文章中斯大林没有提及布哈林的论点，它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但是，斯大林与布哈林好像是以友好的态度分手的。他们在维也纳的重逢，开始了他们随后十年中亲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密的政治伙伴关系，最终以斯大林消灭布哈林而宣告这种伙伴关系的结束。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他们在维也纳的会见都不曾提到。托洛茨基只回忆起“闪现的敌意”出现在斯大林“猜疑的眼光”中。有“敌意”是正常的。几年前，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小队进行过谴责，曾无意之中把斯大林得罪了。旧恨未平，新仇又来。托洛茨基非常不赞同列宁同孟什维克最后决裂的运动正在此时达到了高潮。根据托洛茨基对革命任务的观点，他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布尔什维克。他不赞同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也不同意对列宁关于革命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种观点。他鼓吹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预言革命从反封建转变到反资本主义阶段这一过程是很快的，或者还不如说在实际的事件过程中两者交织在一起。然而，由于俄国国内的情况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它只有通过全欧洲的大变动才能实现目标。欧洲其余部分的革命将被俄国革命激起，到那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时机和条件就成熟了。这就是他的“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使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都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左面。但是，关于党内争论问题，托洛茨基又居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中间，甚至主张所有社会主义者的统一。这时，他的主要目标是在反对列宁，因为坦率地抛弃了统一的思想而蓄意使党分裂的人正是列宁。托洛茨基对布拉格会议是“欺骗和篡权”进行了强烈反对。不过斯大林正因为这次“篡权”才在布尔什维克的等级制度中擢升了。

不仅仅在原则问题上两人之间互相冲突，这时，托洛茨基还第二次在无意之中对柯巴在地下工作中的地位提出了反对意

斯大林政治传记

见。类似于希腊悲剧、偶然事件和环境中的某种宿命的东西，使得第一次冲突的因素发生在正剧开始之前。这时负责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的《真理报》的人正是斯大林。而托洛茨基却在他自己的维也纳《真理报》上针对列宁主义者的“分裂行为”进行着猛烈抨击。在最近一次的杜马选举中，托洛茨基还在彼得堡的报纸上为孟什维克“取消派”写了一些文章。斯大林在到维也纳前不久对这次选举进行了总结，在《真理报》上写道：“实践活动粉碎了托洛茨基的关于联合不能联合的东西的幼稚计划……空想的统一的说教者托洛茨基正在变成取消派的伙计……托洛茨基曾用一切办法使我们的两份报纸互相竞争，两套纲领互相竞争，两个会议互相否定——现在这个假装的大力士托洛茨基自己却向我们唱起统一的高调来了！”同样，在头一次署名斯大林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封信中，斯大林写道：“有人说，托洛茨基的‘统一’运动把‘新血液’注入了取消派的旧‘事业’。

“这是错误的。虽然‘英勇的’努力和‘来势汹汹的威胁’正是托洛茨基的行为，但他从根本上只是一个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罢了，因为他五年来的‘工作’，除了团结了取消派，就没有能够团结别的其他人。”又过了五年，布尔什维克宣称托洛茨基为仅次于列宁的革命领袖、内战的胜利者和红军的创建人。但是，斯大林仍在心中想起了“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的嘲笑。这句话虽然粗俗，但斯大林显然是了解托洛茨基的弱点的——他对政治花招和策略把戏无能为力，而对于托洛茨基的弱点，斯大林证明自己是一个高手。另一方面，托洛茨基也必定好奇地注视着列宁新中央委员会的这位默默无闻的成员。这个粗俗的人在这位傲慢的思想家和审美家心中几乎没有

斯大林政治传记

留下什么印象，说着带格鲁吉亚口音的蹩脚俄语的这个人，在讨论中没有提出任何新鲜的思想。对于斯大林，他肯定对他身上具有的精明、实际感和固执精神毫无觉察。他可能自说自道：“列宁现在竟然同这些呆滞和阴暗的人在一起。”过了不久，他给孟什维克的杜马领袖齐赫泽写信说：“列宁这位争吵高手所蓄意挑起的令人讨厌的争吵，是毫无意义的……列宁在利用俄国工人运动落后性方面是一个高手。……”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必定代表着这种“落后性”。

2月中旬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回到俄国。他的情绪高昂，因为列宁高度称赞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几乎可以确定地说，这篇原来必定是很粗糙的东西，这位“老头子”删改了它的文体和逻辑性。但是，他非常惊讶这位门徒能够熟练地考察东欧民族问题的万花筒，对事实材料的掌握，并能利用布尔什维克纲领中的明晰而精辟的说法来分析问题。列宁写信给高尔基，自豪地提到了这个“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的著作。于是最近期间他也把因意见不和而产生的烦恼抛之脑后了，看到他的门徒成为一个理论家，列宁十分高兴。柯巴长时期以来就希望成为一个理论家。由于缺少机会，他有时就希望通过一种思想狭隘的活动家姿态来对这种失败进行掩饰。现在他不需要了。他在党内的正式地位由于才智突出也上升了。

在他返回彼得堡之后，又过了一周，2月23日，政治警察打断了他的活动。这次被捕的结果是整整四年被流放在外。人们惊讶于他这次失踪的情况。由于他的中央委员会同事、莫斯科布尔什维克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把他出卖给暗探局所以他被捕了。这个暗探曾经向秘密警察头子贝列茨基详细汇报了克拉科夫会议的情况，然后贝列茨基又把这些情报向内务大臣马卡

斯大林政治传记

洛夫汇报了。于是就先布好了局来逮捕返回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被捕当天，他参加了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无害的音乐日场演出，警察已经批准了这次演出。这种活动是合法的，党借以联系它的同情者。毫无戒心的斯大林问马林诺夫斯基他参加音乐会是否会有危险。马林诺夫斯基利用花言巧语让斯大林放心，同时却立即向暗探局告密。斯大林的同志们已经对危险有所觉察，设法使他脱离险境，让他穿上女人的大衣希望能够欺骗暗探局的特务。但此计没能成功。

列宁得到消息后非常苦恼，希望能够安排斯大林使他能够尽快地逃跑。但却是马林诺夫斯基被派来准备这件事，因为他既是中央委员，又是负责组织重要人物逃跑和消灭暗探的小机构的成员。秘密行动的详细计划和代号由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马林诺夫斯基共同制定等等。于是，列宁就号召通过“第三号”去把“瓦西里”解救出来。但是“第三号”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却尽力使西伯利亚北部土鲁汉斯克边区的宪兵对“瓦西里”也就是斯大林进行更加严密地监视，并把他流放到更远的近北极的冻土地带去。此时列宁已不抱希望，因为他的包括《真理报》的主编雅可布·斯维尔德洛夫所有重要特使，都同样神秘失踪了。不过他仍然愿意相信马林诺夫斯基，尽管孟什维克已经一再表示对马林诺夫斯基的不信任。后来，因为新上任的暗探局长害怕会引起议会丑闻，所以马林诺夫斯基辞去了在杜马中的议席。罗将柯，也就是杜马中自由派的发言人知道这件事，但他没有向杜马汇报。列宁甚至在马林诺夫斯基辞职以后，仍相信他的忠诚，后来只是因为他违犯纪律把他开除出党。到了1917年，由于暗探局的档案被公开，这件稀奇古怪的事才得以真相大白。

斯大林政治传记

被捕后一年多的时间中，于 1914 年 3 月斯大林被转解到叶尼塞河下游的库莱卡村。这片土地比苏格兰还大，但是只居住着一万俄罗斯人和本地人。住在小村子里，他们彼此相离几十到几百英里的雪原。那儿有长达八个月甚至九个月的冬天，夏天短暂而且又热又干。夏季，当地居民居住在帐篷里，帐篷是用驯鹿皮做的，冬季则住在半是棚子半是窑洞的屋子里。冻土地带粮食长不出来，当地居民靠渔猎维持生计，用伏特加和毛皮保暖。只是过了第一个三年计划，汽油引擎和现代的农业方法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那儿在斯大林被流放的期间是一片荒凉的原野。

斯大林一直生长在属于亚热带的高加索，所以气候对他的健康是个考验。就靠书报来排遣孤寂的生活。朋友们寄来的书报，每隔几个月由邮差来送一次。起初，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这两个《真理报》的前任编辑共居一屋。斯维尔德洛夫对他们的共同生活进行了如下描写：

我同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两个人合住一屋。他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义的东西太多，但仍是一个好人，而我希望起码在表面上要有一点秩序。因此我往往受他感染而激动不安。……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同房东的家隔开。他们的间壁就是我们的房间，而且由一道门出进：他们那些小家伙自然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这里度过。有些时候他们给我们带来不便。除此以外，当地的居民也经常光临我们的小屋。他们来后就坐下，一声不响地呆了半个钟头，然后突然站起来说道：“好了，我要走了，再见。”一个人接着另一个人，没完没了。他们仿佛不理睬任何事情，在晚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上最后的学习时间光临我们小屋。……由于这儿没有煤油，我们只好在烛光下学习。

显然这两个人相处不是很融洽。斯维尔德洛夫很快就被转到另一个地方，而斯大林一个人继续留了下来，用钓鱼、打猎和阅读来消磨余下的时间。起初，他还一门心思地想逃跑，后来就逐渐淡忘了，因为密探越发严格地执行对他的监视。这件事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算结束了。但是，流放者由于俄国的戒严令宁愿呆在流放地。起初，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又写了一篇新的文章，通过阿利卢耶夫转交列宁，阿利卢耶夫此时住在彼得堡并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篇文章也许是在路上丢了，或者就是水平低于他以前的那篇，所以从未被发表，因而列宁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在库莱卡村的其余时间中斯大林几乎没有写什么。在他的《全集》中，从1913年2月到1917年3月没有记录，对此出版者企图予以解释，至今仍未找到斯大林在那段时期的著作。由于革命的爆发，斯大林逃出了流放地，并使暗探局无法再销毁他的著作，因此上述解释没有说清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由于他同实际工作脱离，所以他没有再写文章了。他是一个革命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革命的理论家。

在库莱卡的孤寂生活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事件并不是突发事件，但却使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感到惊慌无比。几年前，几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都为了反对军国主义曾强烈地呼吁世界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但是很多领袖人物对战争迫在眉睫这一说法不以为然。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由于列宁忙于派别的事情，很少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写文章，写的文章也没暗示他对战争面临的危险的关注。所以当战争爆发时，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行为让他感到非常吃惊。在瑞士的报纸上列宁谈到，他简直不能相信德国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的代表支持德皇的战争，起初他以为这一报道是德国总参谋部放出的烟幕弹，是为了欺骗工人阶级，使他们对这一战争持赞同态度。他对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力量的信念既单纯又强烈。正是由于他对这个信念过于相信，以致在思想中从未考虑政治了。但是后来他抛弃了那种思想，并决定“用战争来反对战争”。他对战争的答复就是革命。他不属于和平主义者，他把托拉斯、卡特尔和大银行指责为是真正的罪犯，并对交战各国中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阶级之间的爱国休战这一思想予以谴责，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并大力宣扬。对于别人谴责他，他并不惧怕，谴责他的人说，本国革命的失败或许由于他在本国促进革命。他率直地称自己为革命的失败主义者。他说，沙皇的失败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人民有利；如果革命的到来由于失败而加快了速度，那就更好了。俄国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所有反对党，在十年以前的日俄战争中就使用过失败主义的策略了。而且他还拒绝同不赞成他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会面。那些工党领袖已经变成欧洲各国武装力量的同谋，不能和他们团结。他认为，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同他们进行任何联系也许意味着背叛。第二国际已经死亡——只剩下什么东西，只有重新建立一个第三国际。

同过去有些时候一样，这时列宁也远远超过了他的信徒和追随者。这并不是说战争沙文主义已经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仍然有反军国主义的信念，对这场战争持反对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列宁似乎把事情过于夸大。他们困惑地看到，列宁和

斯大林政治传记

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写的东西中对他们的失败主义观点尤其强调。大约同时，托洛茨基在巴黎却鼓吹“既不胜利又不失败”的观点，而要进行革命。许多布尔什维克认为托洛茨基的主张更合乎道理。他们惊恐于列宁号召同第二国际决裂的观点，因为他们曾习惯于认为所有社会主义者梦想和希望的体现正是第二国际。在对战争支持的社会主义者和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他们拿不定主意，他们既不满“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行为，但对于不可调合的分裂行动又不愿采纳。

大多数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担心，如果他们坚持列宁的政策，他们就会同那动摇的但为数很大的一部分人相脱离。战争一爆发，沙皇政府就逮捕了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指控他们犯了叛国罪。加米涅夫在其中，从斯大林被流放后加米涅夫就在宣传他们的政策和编辑《真理报》。这些代表出庭受审，列宁关于失败主义的宣传成为检查官控告他们的证据。加米涅夫和一些代表于是就声明不再与列宁交往，他们这样做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列宁的失败主义的不满，一部分是由于他们急于逃避检查官的打击。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代表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叶尼塞州。他们在到达西伯利亚的尼塞州之后，引起了流放者愤怒的辩论。列宁的追随者指责他们没有政治原则和屈从于法庭而丧失了自尊心。坐着狗或驯鹿拉的雪橇旅行几百英里，流放者才能够到某个居民点去参加辩论。这样的集会斯大林也参加了几次，人们至今不知道他在会上谈了些什么和他站在哪一边。他的官方传记作者说，他是革命失败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斯大林主义正统派的原则是不管怎样也不承认斯大林与列宁之间存在意见上的分歧。情况很可能是，斯大林采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取了中庸的态度，因为他返回彼得堡后在 1917 年还仍然抱着这样的态度。

总而言之，他对这一争论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当时在与政治行动脱离；费尽心思地制订出各项行动原则，但却没有机会来实施这些原则，这样的事情是他们厌恶的。那些年轻气盛的流亡者，或者那些更爱思索的人们对此感到非常激动。在两三个北极的长长的冬季里，他们都致力于辩论和写文章。斯大林越来越冷淡，最后完全与其他人隔离开来。

斯大林虽然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关于他的私生活的事情却不多。他自己也不愿意多谈他的私生活的问题。另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也很少涉及“私生活”问题。在青年时代，他曾同叶卡特林娜·斯瓦尼泽，即他梯弗里斯中学的一个同学的妹妹结婚，但她在第一次革命期间就死去了。她为斯大林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由他在高加索的外祖父抚养。斯大林在 1918 年以前没有再结婚。但是，他同他未来的岳丈塞尔哥·阿利卢耶夫一家往来密切，而且阿利卢耶夫一家对他很照顾。正是他们在他流放时给他寄去食物、书籍和衣服的。

他在叶尼塞的孤寂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正在受到挫折。当想起多年的地下工作时，他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安慰。缺乏温暖的和累遭挫折是他个人生活的特点。他在给奥尔加·叶夫根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即他未来的岳母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孤寂的心情。而且，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斯大林唯一的一封不带政治色彩的个人信件。他在信中对他们寄去的包裹表示感谢，并要求他们不要花更多的钱再为他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的经济也不宽裕。风景明信片是他惟一想要的，因为在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叶尼塞，自然界毫无生色，只有一望无垠的冰天雪地，看不到任何有色彩的东西。“在这个阴暗的地方……我渴望能够看到即使是在纸上的一些风景。”

第五章 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

斯大林免于服兵役——二月革命的爆发——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召开——于3月12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返回彼得堡并对由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科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左派进行约束——列宁4月3日的返回及提出《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危机——斯大林返回来支持列宁——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立志要整顿党——革命的高潮与低潮——斯大林在“七月事变所发挥的作用——斯大林劝说列宁进行隐藏及其对党的第六代表大会的领导——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兵变——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赢得多数的支持。列宁关于起义计划——中央委员会产生分裂——10月10日第一个政治局的产生——在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争论中斯大林的态度——十月革命的爆发——托洛茨基领导起义。斯大林离开起义总部——他在《真理报》进行编辑工作——他攻击马克西姆·高尔基：“革命既不能怜悯也不会安葬那些抛弃革命的死人。”

1916年，战争把沙皇制度弄得精疲力尽了。几乎所有的俄国的成年男子在无数条战线上作战，这时征兵制甚至扩展到了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者之中。1916年底，离开了库莱卡朱

斯大林政治传记

加施维里——斯大林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新兵体检委员会去。这位未来的大元帅由于他童年时代招致的左臂残废被免除了兵役。2月，他被转解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近郊，一直到流放结束。但是，这时沙皇制度已处在崩溃的边缘了。

又过了一星期，俄国旧制度灭亡。在1905年“流血的星期日”纪念日时，首都开始了游行示威和罢工，最后转变成了自发性的起义，卫戍部队也站在了人民一边。人民的革命开始了，但这一人民革命也是由一场宫廷政变所刺激和助长起来的。宫廷枢密顾问、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和英国外交代表共同策划了这场政变，他们希望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国的政策将会摆脱宫廷中亲德集团的影响，以便促进俄国能够更加努力地作战。3月2日，沙皇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爵继位。一天以后，米哈依尔就退位了。革命者逮捕了沙皇的大臣们。临时政府由自由的保皇派李沃夫亲王组成，外交部长是自由派的米留可夫教授，司法部长是左翼的前杜马代表克伦斯基。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因为上届杜马少数成员组建了这个临时政府，而且沙皇早已解散这个丧失了声誉的准议会。即使如此，人民开始时还是拥护临时政府的，甚至在沙皇退位前几天组成的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也表示愿意支持临时政府。

由工厂、车间、后来也由驻守首都的部队中选出来了苏维埃的代表。以同样的方式俄国的所有大城市和农村也先后选出苏维埃。这种选举方式使它们当然不代表贵族和无数散漫的资产阶级。这些选出来的苏维埃是最好的“人民议会”，从原则上就把上层阶级排除了。由于不具有任何议会的陈规陋习，俄国在1917年所拥有的最广泛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就是这些苏维埃。苏维埃的代表的任期不固定，选民们有权随时撤换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们。它们对人民情绪的变化有非常敏感的反映，因为通过经常的中期选举可以更新苏维埃的组织成份。这是为什么它们具有无可匹敌的道义权威的根源。除了赋予下层阶级以准议会的代表权以外，它们还是事实上的执行机构，比起那个不受信任的正规行政机构，他们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工厂、铁路仓库、邮局和军队中通行着苏维埃的命令。除非得到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的批准，临时政府从它存在的时候起就无权对任何重大决定予以执行，因此临时政府实际上是苏维埃的傀儡，虽然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对这件事都没觉察到。两者时隐时现的冲突一直贯穿于整个革命。同时，因为未来所发生的那些冲突仍在潜藏着，所以，人民仍在享受革命的成果而且兴奋的心情仍存在于人民心中。即使自由是在战争的恐怖中出现的，但人民已获得了解。

成群的政治犯和流放者从西伯利亚返回俄国，一路上受到了款待和欢迎。三个流放者从西伯利亚一个城镇回来，他们打电报向在瑞士的列宁致以“兄弟般的问候”。这三个流放者是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前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他们已经淡忘了过去意见不和的记忆，三个人在获得自由的当时都急于向他们的导师致敬。3月12日，斯大林及其同伴们回到彼得堡，作为老资格的领袖他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这时侨居国外的领袖们仍在海外。在彼得堡二月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是由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临时局指导的。三个年轻人组成了这个中央委员会：维亚切斯拉夫·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他是战前《真理报》的撰稿者；彼得·扎鲁茨基和亚历山大·施略普尼科夫，两个都是工人，他们精力旺盛并自学成才。这三个人都缺乏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经验来制定明确的适合于革命中

斯大林政治传记

预料不到的情况的政策，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和左翼的不断争吵使个党处于混乱状态，没有人有足够的权威来统治全党。这三个人是布尔什维克的左翼的代表。他们不满李沃夫亲王的政府，因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其中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也不满苏维埃的温和政策，因为苏维埃中占优势的是孟什维克和农民社会主义者。三人都敌视临时政府公开宣布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及孟什维克的爱国态度。莫洛托夫主编的《真理报》号召群众立即将李沃夫亲王的政府推翻，并使苏维埃掌握一切权力。以沃依庭斯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右翼则鼓吹对李沃夫亲王采取支持态度，“保卫祖国”，并使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重新统一到一个党内。右翼集团的力量由于加米涅夫的返回大大加强了。斯大林谨慎地探索，企图在敌对集团之间保持等距离，并企图弥补敌对集团之间的裂缝。

因为斯大林具有 1912 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正式资历，就能够将彼得堡的三人小组予以解散，同加米涅夫一道把《真理报》的编辑部接收了过来。在列宁 4 月 3 日从瑞士返回之前，他行使了党的实际领导权，这段时间持续了三周。两翼由于他的中庸态度而大体接受了他。他的名字在广大工人群众中，还是不见经传的；但是地下运动的被迫隐姓埋名的大多数领袖，人们也不太了解他们的名字。甚至这种隐姓埋名也是一种个人的政治资本的代表，因为它是忠诚而无私的服务的含蓄的记录。当斯大林回来几天之后，作为彼得堡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他就出现在它的执委会会议上，少数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老相识对他表示欢迎，这些人此时在彼得堡已经非常著名。但其他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革命战士。

很多人还是注意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种变化。布尔什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维克的调子不论是在苏维埃中还是在《真理报》上，都是比较和解的。这种温和政策的主要阐述者正是加米涅夫。斯大林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左翼而不是加米涅夫的性质，但是它们也丝毫不像莫洛托夫那样激进。他回来后两天，一篇论苏维埃作用的短文就发表了。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的联盟在苏维埃中被体现了出来；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老观点，他认为这个联盟是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但两个阶级的联盟还具有脆弱性。因此任务就是“加强这种苏维埃……使它们统一于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革命政权机关领导下”。在这儿斯大林清楚地预见到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国后提出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看起来意味着对李沃夫亲王的政府的反对将更激烈。但是斯大林只乐于陈述自己的积极原则，而对它的消极含意则采取回避态度。他对这次革命的纲领进行了概括地说明：“给农民土地，保护工人劳动，给俄国全体公民民主共和国。”意思也就是，这次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所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论战争》是他的下一篇文章，同样结合了一般原则上的激进主义和实际结论上的模棱两可。这次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甚至在推翻沙皇制度后它也仍然具有帝国主义性质：“我们深信，俄国事变的进程将会暴露出一种虚伪性，这种虚伪性即是‘自由在危急中’狂叫：人们在‘爱国的’烟幕消散后就会亲眼看到俄国帝国主义者的本质——想……占领海峡，侵略波斯……”这是引自列宁的书。但是——“一个单一的‘打倒战争！’的口号……是不可能恰当的……它由始到终都不能发生任何作用。”斯大林对于欢迎彼得堡苏维埃向全世界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民发出的半护国主义和半和平主义的宣言持谨慎地欢迎的态度；但是他怀疑交战各国的工人可能听不到。这时呼吁工人、农民和士兵必须迫使临时政府答应立即开始和平谈判。这听起来似乎是在要求同德国单独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在下一句中，作者又敦促临时政府“公开宣布它试图促使一切交战国……马上进行和平谈判”。文章的论点特别着重在“反帝”方面，这是为了起到平衡的作用，但是它又含蓄的指出孟什维克或自由派的护国主义者是真诚的。列宁嘲笑了这种含蓄的表达。

又过了几天，斯大林对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的一篇关于战争目的的声明作出评论：“从昨天的《真理报》上读者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目的：侵占阿尔明尼亚，侵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奥地利，侵占波斯北部。原来俄国士兵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就像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自由’，而是为了侵占别国的领土。”克伦斯基也即是左翼的司法部长宣称，米留可夫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并不代表临时政府的意见。斯大林评论说：“肯定有一种言论是不真实的：或者是克伦斯基的声明……或者是米留可夫的声明。”

斯大林在从西伯利亚归来刚一周时，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已经对于革命的前景深感无措与不安。此时，对于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潜在的矛盾他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彼得堡苏维埃是革命的主要根据地。临时政府则从各州吸取力量。双重政权是不能长久并存的。代表那些温和的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甚至在革命开始大踏步前进以前，就极端害怕它的“过火行为”。所以，临时政府是可能变成封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保护伞。革命必须争取各州的支持。必须把工人武装起来组成赤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卫队。正规军现在“站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但革命在紧急的时候是不能依靠它的，因为军队经常调转于各地间，已经处于混乱之中。最后，革命还需要一个比临时政府要更激进一些的立宪会议的批准。

3月底，在彼得堡举行布尔什维克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沙皇退位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从沙皇情妇、宫廷女芭蕾舞演员克舍辛斯卡娅那儿征用来的一座豪华宫殿正是会议的召开地点，现在它已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总部。一片令人不安的混乱正是这次代表会议的特点。根据列宁在战前所拟定的计划，代表们企图制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但是，看来这一计划已经受到了历史的破坏。这一计划同实际情况不符。据说，这是一场民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成立工人和农民的民主共和国才是这次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每个人都还坚持认为，以致当一个代表以开玩笑的口气怀疑这一原则时，他的发言权就被主席剥夺了。另外人们还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自由资产阶级都会支持沙皇，民主的大变动将由工人阶级来领导，而临时革命政府将是联合政府，是工人和农民党派的联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联合政府中居于首位。但是情况正相反，沙皇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抛弃了，他们还掌握了共和国的领导权。看来孟什维克的观点还是更现实一些的。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将起的作用又如何呢？他们是否为了维护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仍在自由派的政府中居于反对派的地位呢？但是孟什维克原先的计划也被历史捉弄了，因为孟什维克的主张是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联合。给予李沃夫亲王政府以有限的支持则是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对党的要求。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另外还有一些集团深受党的平民极端主义精神熏陶，对于这些更为激进的集团来说，这些话听起来是不和谐的，以致他们对此都不相信。他们争辩说，沙皇虽然被推翻了，但土地贵族仍然统治着俄国的农村，所以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是不彻底的；李沃夫亲王是不会牺牲本阶级的利益而有利于农民的；土地革命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倡议。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方案，产业工人就要对这次革命负责，而主要的受益者却成了农民。工人对仅仅使工人成为农民的政治保护人的政策不感兴趣。形势的逻辑要求，同农民的利害关系一样，工人在这次大变动中的利害关系也要一样清楚或者一样大；应该把工业的社会主义化同地主农庄的解体联系起来；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才是革命的任务。但这就意味着要抛弃旧原则，即是俄国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信徒中没有人敢于强烈要求修正理论问题。他们继续在严格的反封建革命僵局中摸索，其中激进主义被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认为是无用的，而激进派又认为这样的革命使他们的革命干劲得不到发挥。

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斯大林小心又无奈地主持着这一辩论。斯大林作为残余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对解决这一基本的两难问题不太关心。而更关心提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能够把问题掩盖起来，即暂时不作出决议，并对党内刚刚露头的分裂予以防止。他对李沃夫亲王政府和苏维埃这“两个政府”的评论是：

摩擦和斗争存在于它们两者之间。对于它们的作用已经作了区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任务是执行革命转变的带头人。苏维埃的任务是领导人民起义，它也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构。另一方面，临时政府的作用也包括保护革命人民胜利果实。苏维

斯大林政治传记

埃实行监督和动员各种力量，而畏缩不前和混乱不堪的临时政府，却要承担保护人民胜利果实的任务……这种情况既有不好的一面又有好的一面。它对目前推进事件的发展是不利的，并因此招致资产阶级的怨恨，而资产阶级在将来是必定要抛弃我们的。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分裂出去这一情况予以制止，以便我们赢得准备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时间……

随着压力不断增大，他也不断对论据的重点进行改变，时而建议对临时政府进行有限的支持，时而又不得提供给它任何支持，或者不清楚地说，应不应该给临时政府支持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临时政府对苏维埃的革命主动权会不会给予支持。

在关于是否与孟什维克统一的问题上，一场新的三角战斗开始了。一派的观点是赞成无条件的统一。而另一派也就是激进派反对统一，莫洛托夫代表激进派发言指出，只有接受鲜明的反战纲领的人才能实现统一。斯大林要求谈判应该立即在赞成“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的原则”基础上开始。“齐美瓦尔德和昆塔尔的原则”是在瑞士那两个城市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原则。列宁曾批评这一原则缺乏革命精神。对莫洛托夫的反对，斯大林不置一词，说：“超前跑和事前就提出条件表示不同意，这是毫无用处的。党内生活必然存在争执。微小的意见分歧一直在我们党内存在。”但是他又对左翼安抚说，谈判只是暂时的，它的结果并不会对党产生约束。于是事实上谈判很快就开始了，这次谈判只是在列宁返回之后才被中断。

斯大林在列宁回来后，就退到旁边或隐于幕后去了。他在

斯大林政治传记

自己进行领导的几个星期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是党的人，不是走在党的前面而是生活在党内。他避免走极端，坚持中庸，即使这意味着浪费时间和原地踏步也无所谓。他并不想把党铸造成为别的样子。在一个有秩序的党里，任何正常的党通过这种领导方法都可以对一切事物应付自如。然而，他却不是那种领导，即能够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一次新革命的创造者。

4月3日，列宁在他横过德国的著名旅行之后返回彼得堡，彼得堡的工人、水兵和士兵热烈欢迎他。离开火车站后，在一队装甲车队的簇拥下，列宁顺利地通过了首都的街道。他简直忍受不了那些唠唠叨叨而又温柔敦厚的欢迎词。对于去会见他的同志和追随者们，他反而更心急。他一心想着要在自己的党内搞一次突袭，目的是为了使他党能够在全国进行一次新的革命。当他还没有摆脱这些突如其来的欢迎仪式带给他的不便时，就通过电报匆匆地写出了十点提纲。这些提纲表达了他的信念，革命的新计划，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新宪章，他在抵达的第二天就向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提出来了这个十点提纲。

当列宁的追随者们即将出席一个主题为同孟什维克讨论统一的大会时，列宁通过他的十点提纲使他们明白了一切。他在提出这个提纲之前，讽刺了他在当时发现的那种牧歌似的政治。他说，在回国途中，他预料他一下车就会被监禁政治犯的可怕监狱彼得——保罗要塞所囚禁起来。但是恰恰相反，他的敌人和社会主义叛徒们却对他表示欢迎。这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护国主义”已经成功地遍布在俄国各地。无产阶级正在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欺骗。在俄国还有一点是特别的，就是野蛮的暴力快速地转变成为最微妙的欺骗，使得群众对统治者战争目的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布尔什维克必须断绝同

斯大林政治传记

护国派和半护国派的一切往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任务。在二月革命中，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一切权力，但由于不会使用它，就把这些权力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甚至我们布尔什维克也信任临时政府，这只能理解为革命时容易产生的陶醉情绪。这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同志们，你们曾经信任过临时政府。如果你们如今仍对临时政府表示信任，那么我们就得分手了。我宁愿成为少数派。一个像德国反军国主义者李卜克内西那样的革命者，要远远胜过一大群孟什维克、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护国主义者。如果你们同情李卜克内西而又仍同‘护国派’保持某种联系的话，那就是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

列宁小心地不嘲笑他的信徒，而是让他们自己悄悄地与“护国派”决裂。但是，他却对《真理报》进行无情地抨击说，《真理报》要求临时政府不再要求割地。向资本家的政府去请求他们不要再要求割地，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是公然的愚弄，是纯粹的欺骗。现在承认这一错误的时机到了。应该愉快而坚决地承认错误！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时候到了。孟什维克的革命词藻不过是在奉承革命人民。他并没有鼓吹立即夺取政权，因为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仍占少数。在他们成为多数派以前，他们就应该向仍信赖孟什维克的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直到他们说服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使他们相信应该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时候为止。同时，他们还必须对人民说，他们所努力的目标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不是一个代议制的共和国。在苏维埃共和国中废除警察、〔常备〕军队和官吏。农民们要求土地，他们将不需要获得你们的赞同，直接占有土地，而且土地将永远属于农民所有。但这不是全部的要求。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所有的银行应该统一为一个国家银行，由苏维埃对这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个国家银行进行监督。工业还不能够立即实现社会化，但工人必须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已经过时的党纲甚至党的名称都应该被修改；在大多数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背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我们应改名为共产党。你们是否敢于背叛老的纪念物。但是为了换内衣，我们就得换一件干净的衬衫。他的最后一点提纲预示着很快就要建立起新的第三国际。他最后提出警告说，如果他的同志准备脱离他，他也决不动摇。他宁愿像德国李卜克内西那样独自一人，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进行反抗。

一个刚好参加那次会议的非布尔什维克作者后来对列宁讲话的那种力量进行了描述：“我永远难忘那次雷鸣电闪似的演说，它不仅震惊了我这个偶然在场的异端分子，而且也大大出于对所有那些忠实于他的人的意料之外。我敢断言，出席会议的人谁都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它的声音在克舍辛斯卡娅的宴会大厅中回荡，回旋在像着了魔力一样的信徒的耳际。”

随后的几天，列宁继续为他的杰作工作。加米涅夫、加里宁和其他一些人对他的原则和计划坚持反对，对于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这一问题，他曾经断然声明过。他以激烈的言辞反驳说，“在党的历史中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多次地扮演可悲的角色”，因为他们顽固地坚持那些记熟了的老原则，而不是根据新的经验对它们进行批判地审查。他承认，如果把俄国置于欧洲之外，那么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但是如果把俄国置于欧洲整体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要号召俄国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先河。那些列宁主义者抱怨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它将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经过几天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紧张辩论之后，党内大部分人赞同列宁的主张。布尔什维克的极右派全体脱离了党，斥责列宁是一个新的巴枯宁，一个无政府主义阴谋家，但是，莫洛托夫和施略普尼科夫作为激进派的不称职的发言人，完全赞同列宁的意见。列宁的提纲与他们的心意完全一致。过去党的理论所批准的这种纯民主革命的格局，使他们还不敢冒然地打破它，但却隐约地感觉到对于他们的革命理想它过分地限制了，现在终于这种理论的作者本人打破了它。列宁的这次突袭满足了他的党的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所以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它给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指明了方向和带来了勇气。而他的反对者则认为，这个变化似乎太突然和太荒唐了，以致他们认为，它本身就是虚幻的。加米涅夫、加里宁和其他一些人坚持己见，暗示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列宁已经丧失了同俄国现实的接触。他们希望全党尽快从这种新列宁主义的迷恋中醒悟过来，转回到较少冒险与较为温和的政策上来。在革命的全年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存在于新老列宁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拉锯战，一直考验着领袖们的团结。这个问题在列宁逝世以后的继承权斗争中重新引发出来。但是从4月以后，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开足马力去为第二次革命作准备了。

列宁像冰雹一样的论辩和谴责，使得斯大林为了自保而采取沉默的态度。他小心谨慎地在他的导师进行危险行动时，持异议态度，这已非偶然了。但是他并不赞同认为列宁轻率或者在进行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种说法，因为对于列宁他太了解了。对他来说，很难能跟上导师大胆的政治想象力，但是他绝对相信列宁的现实主义。对于列宁在《真理报》上的嘲笑他忍受住了，虽然在他担任党的领袖后，立即遭到如此斥责是令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感到难为情的。然而，列宁对他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的，所以他决定不反驳列宁。他毕竟不同于加米涅夫那样的公开“调和者”。他曾经谨慎地徘徊于激进派和调和派之间，所以，碍于面子，他接受了列宁的提纲。他的犹豫不决是他内心的困惑不解的反映，现在终于从这种困境中得以解脱。对于那些在列宁不在时对党进行领导的人，他们偶然犯了放弃斗争的错误，列宁也不会过分责备他们而使他们没有面子。于是斯大林继续担任《真理报》的主编，而且列宁还帮助他习惯这种事情。在列宁回国和提出提纲后才十天，在《真理报》上斯大林就急急忙忙地表示他同列宁是同一战线的。

他署名的社论《给农民土地》是为了反驳他刚刚鼓吹的东西。由于害怕农民起义，地主们纷纷放弃财产，逃往城市。但农业部长盛加略夫对农民耕种这些被遗弃的土地一事却予以禁止，要农民耐心地等待直到立宪会议制定一个土地改革法。对此斯大林评论说：“因为不知立宪会议什么时候召开，因为临时政府延误了立宪会议的召开时间，所以实际上土地仍然继续要荒废下去，农民仍然没有土地，地主仍然占有土地，而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仍然缺乏足够的粮食以糊口。”他号召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组织到革命的农民委员会里……对土地进行有组织地自行耕种”，对“阻碍革命前进的”反动部长们不要理睬。仅在几天以前，他还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推进这一事情，因为它会使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对他们产生敌对。现在他却以“反动的空想”称呼这一观点。“俄国革命的胜利进军，一定会把资产阶级进步分子当作多余的废物扫开，因为他们只同革命敌人的心意一致并利于他们。”几天前，他还对西欧工人会不会听反战的宣传持怀疑态度，现在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却代表中央委员会写五一宣言。宣言中坚定地认为，“西方工人在俄国革命的霹雳声中也从沉睡中惊醒。……资本家强盗脚下的土地又不稳定了，因为在欧洲的上空国际的红旗又飘扬起来了。”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统一的希望不可能实现了，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现在“对革命已经厌倦”。“只要在革命时期不前进的人都必然要落后，而凡是落后的人都会受到谴责：他们一定会被革命推到反革命阵营里去。”

4月底，另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召开了，会议选出了新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几人组成，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也在其中。在一次直接和公开的选举中斯大林以很大数量的票当选为领导，这在斯大林来说还是首次获此殊荣。党的干部已经很熟悉他了，虽然外界对他还不了解。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报告的主题是民族问题。临时政府同芬兰人刚刚发生过冲突，原因在于芬兰要退出俄国。斯大林说：“不能想像对把任何一个民族强留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这一说法予以认同。”如果我们执行这一说法，“那我们就会继续沙皇制度的政策”。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他并不想使高加索脱离俄国；但是如果高加索人民希望高加索从俄国分离出去，那么其他人都无权加以阻止。波兰人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是未来的布尔什维克政治警察创建者。他反对这种分离说，各民族分离的愿望是具有反动性的。斯大林反驳说：“爱尔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运动正是一种打击帝国主义的民主运动。”他说，这个问题涉及范围极广，因为对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它都有所涉及。给予那些人民的民族愿望以支持，就是将西方和东方之间联系起来，目的在于使广大的亚洲人民支持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位《真理报》的编

斯大林政治传记

辑作为党的民族问题专家的地位因此巩固下来。

此时，布尔什维主义开始复苏。有 133 人出席这次代表会议，这 133 人代表了约七万六千名党员。这在正规的议会选举中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力量。但是在革命时期，不能像这样来衡量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一小撮”布尔什维克是受到良好的组织和训练的“中心人物”，他们在工业、运输、军队和苏维埃的重要岗位任职。他们大多数人是工长和工厂及团队的代表，深刻影响着工人和士兵群众。他们是“革命先锋”、“积极分子”，有一大批真正坚决的群众在他们的后面进行战斗。在每一个苏维埃中，都是作为紧密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在行动；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随后的几次选举中不断增加，实际的力量还要超过他们总体人数的力量。他们之中有的人还必须对大量的鼓动员、工厂代表和苏维埃委员进行照顾。有的人还必须同这些人保持日常的接触，把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传达给他们，指示他们在苏维埃中怎样行使投票权和如何同其他党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来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由于交通运输的混乱和彼得堡革命中心的地位，所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定期地到地方党组织去观察是不可能的。现在在首都召开的苏维埃全国大会，军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以及工会或农民的会议经常有各种代表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这两个主要组织者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在党的总部克舍辛斯卡娅宫，或者在彼得堡苏维埃原来的地址塔夫利达宫，把这些代表召集起来并给予他们指示。当列宁、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在会议上发言和为实现口号和决议而进行抗争时，作为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不疲倦的和无形的指导者的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忙于促成一般成员随领袖投票和一致行动。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列宁曾在他的革命计划中对斯大林这个熟练又坚决的组织者赋予重要的作用，现在结果证明斯大林是可以被委以重任的，他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地下工作者，而是领导不断发展和公开的人民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性格因素使他的作用是不为人所知的和朴实无华的，这和从前是相同的。革命对于一些重要的人民领袖和演说大师是慷慨而迅速地给予声望和名誉的，但对于斯大林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那些日子里，列昂·托洛茨基成为布尔什维主义一个新的人民领袖。他的勇气、政治热忱和雄辩口才，很快远远超越了那些天天在彼得堡苏维埃讲台上向全国讲话的有才能的领袖们。托洛茨基在列宁返回后一个月，直接从加拿大的拘留营中返回俄国。他不想再与布尔什维主义奠基者争论下去了，并想与他进行合作。他的部分观点已被这次战争所改变。他不再希望能够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在革命的冲击之下，他曾经希望，孟什维克会激进一些，而布尔什维克会把他认为的那种特有的宗派主义狭隘性摆脱掉。他现在看到了，孟什维克由于战争的压力不是左倾而是右倾了，已经变成“护国派”。另外，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公开组织后，托洛茨基认为它好像也比以前更虚心了。他愿意承认，关于革命政党的性质、结构和纪律的争论，事实证明是列宁对了而他是错的。他自我安慰，在列宁的四月提纲中，包含有他很早以前就阐述过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俄国革命的目标——一些布尔什维克惊讶于列宁出乎意料的“偏向托洛茨基主义”，这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彼得堡，托洛茨基领导着一个名为“区联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小团体，这个团体颇具才能和影响力，7月这个团体加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入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小团体的人有未来的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重要的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马克思传记的作者梁赞诺夫；以及未来的外交家诸如曼努伊尔斯基、越飞、加拉罕、尤里尼耶夫等。甚至在这些有影响的人物正式参加以前，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同事就同列宁一起工作了，并经常代表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内外发言。出现了一个伟大而热情的革命领袖团体，这是自从丹东、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而斯大林则继续从事不出名的幕后工作。

在5月和6月中，彼得堡的革命继续趋于热烈。首都的市政选举把临时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的许多弱点暴露了出来。投给了社会主义温和派半数票，而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党这两个极端派被投票成为少数派。政府中立宪民主党占优势，于是这个政府就让位给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三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当这个新政府企图对这场风暴进行控制时，它却显得力不从心。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彼得堡郊区工人阶级。军队越发激烈地要求和平，而俄国的西方盟国却不断敦促俄国当局对德军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布尔什维克十分敌视这个新的联合政府；但在反对它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得体的，目的是为了收到巨大而迅速的效果。他们不单是宣传打倒整个政府，因为他们知道，工人阶级对于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是有好印象的。但是工人阶级也怀疑在联合政府中居首位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于是，列宁就对社会主义温和派施加压力以使它同联合政府决裂，并促进社会主义温和派在苏维埃的基础上组成自己的政府。布尔什维克聚集在首都红色郊区并鼓动性地提出了两个简单明了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打倒十个资本家

斯大林政治传记

部长！”“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使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普遍怀疑立宪民主党。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意味着要求社会主义温和派单独执政，因为社会主义温和派在苏维埃中是多数派；而且这一口号也吸引了普通的孟什维克工人。在5月和6月中，大批的孟什维克工人开始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边。6月18日，五十万工人和士兵在彼得堡街头游行示威，名义上是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领袖发起了这次运动。广大的示威者举着差不多全是布尔什维克提出来的口号标语牌和旗帜，这时，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各地的代表对于这次反映布尔什维克在首都影响巨大的示威，有着深刻的印象。

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发生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一个社会主义者部长辩护说，需要把政府的基础予以扩大，没有哪个党对于因战争引起来的崩溃和混乱能够单独应付，列宁站起来用一个简短的声明打断了那个发言者的话。他说，他的党已经为执掌整个政权作好了准备。与会代表大声嘲笑列宁的话，但是首都街头的群众示威却告诉他们不能轻视列宁的发言。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作好夺权的准备。他们继续视苏维埃为革命权威的合法根据；而且只要他的党在苏维埃中还属于少数派，列宁就不考虑单独夺权的问题。但是他通过艰苦的工作，来约束工人、士兵和水兵中急于夺权的半无政府主义集团，他们已经厌烦了他的谨慎策略。他看到，革命节奏和冲动的不协调，已经对他的行动计划构成了威胁。当外地的工人阶级视他的政策为极端时，首都的大部分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却对布尔什维克的过于温和产生了怀疑，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缺乏革命的勇气。斯大林不得不在《真理报》上对红色郊区提出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了警告，认为红色郊区应该反对半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鼓动者，因为他们力促工人在时机成熟时发动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布尔什维主义一直徘徊在延迟革命的危险和过早行动的危险之间。

这两种危险的可能性由于反革命也在准备摊牌而大大增加了。保皇派的将军、爱国军官联盟、退伍军人协会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对六月示威的意义十分关注，并决心通过突袭一次暴力运动，压下布尔什维主义正在上升的势头。社会主义心神不宁的温和派领袖们暗地里在打这样的主意：这样一次摊牌会使左翼的反对者不再反对他们，因为光靠他们自己，是更加无力反对左翼了。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决心不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不成熟的起义。他们相当自信地认为，依靠首都的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党就能够立即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也认为，他们不能够利用现有政权以对付国家其他地方的反对。他们还认为，现在彼得堡街头的每一次重大示威都有变成巷战的可能。这是因为工人都已经被武装起来了。士兵们也不愿不带武器的参加任何游行。由于每一次非暴力的游行只会给反革命匪帮提供射击的目标，因此，一切游行都被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禁止。但是，这禁令却无法得到它的执行，因为它已经无法控制郊区和兵营中的革命情绪。这就是爆发“七月事变”严重危机的背景。斯大林在“七月事变”中所起的作用是奇特的。这次事变使布尔什维主义遭到严重的挫折。

党在“七月事变”后几个星期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一次报告，报告对这一事件的经过进行了生动而真实的叙述。7月3日下午，某团的一个代表团未经允许而进入了党的市代表会议，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该团和其他团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已经决定当晚举行“发动”，并说他们的代表已经被派往别的工厂和团队，并号召所有的人参加这次行动。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沃洛达夫斯基对士兵们做了一个严肃的提醒，他们作为党员，党期望他们不要参与这次“发动”。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局也相继召开会议，重新声明了这一禁令，并派出鼓动员到工厂和兵营去贯彻执行这一禁令。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作为代表，把最近事态的发展通知苏维埃执委会，现今由孟什维克控制。这些事件发生后才两小时，斯大林就开始了他的任务。但是行动已经开始了。当晚，一些团队和大队工人，全副武装，举着旗帜，在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办公处前聚集起来。布尔什维克讲话者规劝群众不要采取武力，和平解散，但遭到奚落和嘲笑。愤怒的革命人民不理解原因何在。于是他们提议进军苏维埃的所在地塔夫利达宫，把他们的要求告之苏维埃执委会。队伍高唱着《马赛曲》前往塔夫利达宫。实际上群众整夜将塔夫利达宫包围，毫无结果地等待着答复他们的主要要求，苏维埃的领袖们同临时政府脱离关系，自己执掌政权正是这一要求的内容。

这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想方设法的消磨时间，期望“忠于”政府的军队迅速前来援救他们。之前，集会和游行都还是非暴力的，但是群众情绪激昂，形势一触即发。群众认出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切尔诺夫被一群暴民“加以拘留”。幸好托洛茨基镇静又勇敢地进行了干涉，暴民才释放了这位老革命部长。早已过了午夜，季诺维也夫仍然站在塔夫利达宫的阳台上，毫不疲倦地尖着嗓子同群众辩论，但目的很难达到：既说服群众回家，又不能过于打击群众的热情，相反地还要保持住这一热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了一整夜的会，努力

斯大林政治传记

要解决这个难题。最后的决定是，党应该参加游行，目的在于把它引向和平的方向发展。这样做是冒险的，他们成功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一场战斗不可避免，而且最后可能招致的失败会使反革命的力量大增。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犹豫不决，不肯全力出击，那在这次运动中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他们还有另一个行动方针，那就是同示威者断绝关系，让事态自然发展下去。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是不能这样对群众运动漠不关心的。群众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光凭自己的渴望和热情行事，极有可能陷入内战的圈套中。到了那时，群众就永远不会原谅布尔什维克，因为这就等于布尔什维克在危机的关头背叛了他们。布尔什维克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依靠这些人的信任和支持的，因此他们不能丧失这些人对他们的信任。

接下来的几天，示威者的规模和激情不断增强，因而不时地有一些流血事件和冲突发生。但是却没有出现布尔什维克最担心的事情——这些小的冲突并没有导致一场正规的内战的发生。整个运动的冲劲已差不多耗完，并逐渐平息下来。几乎同一时间，反革命的势力却处在上升期。右派的武装集团采取行动使中上层的资产阶级松了一口气。反革命势力捣毁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和《真理报》编辑部。在这一片骚乱声中，战场上传来了俄国前线攻势崩溃的消息。人们谴责布尔什维克，复仇的呼声日高。列宁及其追随者被右派的鼓动家说成是德国的间谍。一些有声望的报纸为了证实这一谎言，发表了伪造的文件。政府的军队对红色郊区进行远征以讨伐他们。

在整个“七月事变”过程中，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同苏维埃执委会进行谈判，并尽力控制住桀骜不驯的分子。开头他通知执委会说布尔什维克决定反对游行示威，后来才获知这个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决定是已经被推翻了的事实。于是他又不得不向苏维埃领导人报告变动情况，并解释其理由。斯大林在苏维埃统治集团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因此后来当政府要逮捕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袖时，斯大林虽然是一个中央委员，却幸免于难。斯大林的任务还包括采取最后措施来结束这场部分的起义，这就是说使彼得-保罗要塞的起义者放下武器。在苏维埃执委会的一个孟什维克成员的陪同下斯大林到了这个要塞。这个要塞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对面的一个岛上，而当时，政府军队已经占领了布尔什维克的总部。暴躁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一些赤卫队、发动这次起义的机枪手组成了要塞驻军，这些驻军全都拒绝放下武器，并为进行长期而血腥的围攻作准备。人们可以轻易想象到，斯大林的任务是既困难又复杂的。他说，官方保证起义者免遭惩罚，但起义者仍然不同意放下武器。最后斯大林采用精明的方法说服了他们，使他们投降于苏维埃执委会，这比向政府投降要好听一些。于是，一场血战避免了。

后来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的挫折只是表面上的。然而，在“七月事变”后不久，所有的党派都夸大了这次挫折。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都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彻底的，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季诺维也夫和列宁被指控为德国的间谍。社会主义者温和派知道这种指控不是真的，但由于他们十分怨恨布尔什维克，所以就不愿意出来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辩护。他们中的许多人怀疑在“七月事变”中列宁曾经认真地进行了夺权的策划。

中央委员会这时讨论了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应不应该自动向当局投案，或者应不应该躲藏起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此也拿不定主意，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躲藏起来，会使那些不明真

斯大林政治传记

相的人相信他们真是德国间谍。卢那察尔斯基和加米涅夫最初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相反地，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逃避审讯。他说，信赖临时政府的司法是愚笨的行动。外界正在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歇斯底里，以致任何一个年轻的军官和军士押解“德国间谍”进监狱去，或者他们从监狱押解到法庭去，在路上就可能会把他们干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桩爱国的英雄行为。对斯大林的建议列宁仍是犹豫不决。于是斯大林就到苏维埃执委会对执委们说，如果执委会对列宁的生命安全作出保证，使他不遭非法暴力的危害，列宁就会出庭受审。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作出这样的保证，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最后就下决心躲避审讯。

列宁在7月8日隐藏了起来。这同罗伯斯比尔一样，罗伯斯比尔在掌权前不久，也受到追捕，并隐藏在一个雅各宾木匠家中。工人阿利卢耶夫即是列宁的“木匠”，他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列宁在阿利卢耶夫家里呆了几天。7月11日，在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夫的护送下列宁穿过黑暗的道路到达海洋车站，离开海洋车站后，最初在首都附近的农村里隐藏着，后来到了芬兰。从那时到十月革命，他一直处于隐藏状态，通过把大量小册子、文章和信件传给中央委员会，向他的党传授党的战略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列宁一起隐藏起来。几天之后，加米涅夫被逮捕了。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也被监禁起来。一些重要的中坚人物和领袖都分散行动了。在这个危急的关头，斯大林再次成为党的领导先锋。他相对来说不是太有名，这对他十分有利，他的名字也还没有引起别人的不满。

在列宁离开后不久，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科·斯大林为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为《更紧密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地团结起来》，呼吁已经遭到失败但还没有溃散的党团结起来，他一再地强调，在“七月事变”中，形势对布尔什维克形成了压力，反革命的进攻已开始，那些“妥协者”应负主要责任。反革命的进攻仍在继续——“他们不仅进攻布尔什维克而且进攻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和苏维埃本身”。他预见到新的政治危机即将到来：“作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第一个训条就是拒绝反革命分子的挑衅，要具有镇定又不屈不挠的精神，养精蓄锐……第二个训条就是要与我们的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对不坚强的人进行鼓励，带动落后的人。”他不断地以同样的形式指示布尔什维克城市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在“七月事变”以前就已经建立，现在则处于半地下状态地继续工作着。斯大林写的宣言被这个代表会议通过了，它的风格混合了革命的和东方僧侣术语的东西：

这些先生们显然打算将我们的队伍瓦解，在我们中间进行怀疑和惶惑的种子的散布，使我们不信任我们领袖。可恶的东西！他们不知道，我们领袖们的名字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受人尊敬，尽管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流氓们辱骂他们，下贱的东西！他们甚至想不到，资产阶级庸仆们对我们的领袖越是诽谤，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无耻的诬蔑者这一耻辱烙印——正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请接受这个烙印，这是选举我们的那三万二千名有组织的彼得格勒工人送给你们的并把它带进棺材去吧。……关于你们这些银行家和投机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神甫和特务先生们……你们不要过早地庆祝胜利，你们未免太早地开始埋葬伟大的俄国革命。掘墓的先生们，革命继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续存在着，它还将继续展示自己的威力。

很快地，布尔什维克的确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7月底的时候，他们就能半公开地举行一次代表了二十四万党员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时的党员人数是4月间的三倍。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发言人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斯大林、布哈林和普利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关于即将来临的革命性质的辩论是这次大会的高潮。这场辩论一部分是回应了列宁四月提纲的争论，一部分是预示着未来岁月中更为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提出一项决议说，俄国革命的胜利将“联合各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将政权引向和平，走向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作为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普利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一项修正说，革命政府应该“促进政权向和平方向发展，并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带领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两人都认为，俄国革命同西欧无产阶级的“联合”具有必然性。但是，普利奥布拉任斯基认为，除非西欧也革命化，否则俄国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那个前提不存在，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和平。布哈林也类似地规定了革命的目标。斯大林看不出俄国不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何在，不管西方是否发生革命。

他反驳普利奥布拉任斯基说：“俄国很有可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我国革命的基础比西欧革命的基础广阔，在西欧，无产阶级是孤立地同资产阶级面对面作战的，我国贫苦农民阶层是支持革命的……德国的国家权利机关好得多……必须抛弃那种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马克思主义既有教条式的，又有创造性的。我是主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一阶段中，斯大林的观点看起来类似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因为托洛茨基也说过，在欧洲之前俄国将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这时还没有阐述这样的思想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这种思想认为，俄国在与世界其余地方隔绝时，光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只是又过了7、8年，他才同布哈林一起形成了这一观点，用来对托洛茨基的主张进行驳斥。但是现在比起托洛茨基或列宁，他的话语中更强调俄国社会主义的特殊使命了。在托洛茨基和列宁那时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这种思想的隐约表达，但这不是主要的说法，他们坚信，俄国最终还是要依靠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说，俄国必将在其他更先进的国家之前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不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斯大林强调的是这一论点的前半部分而非后半部分。他的话事实上暗示了俄国革命自力更生的信仰。在1917年7月和8月时，还没有人对这些争论意味深长地暗示着未来的分裂有所觉察。

这是一种命运所开的玩笑：托洛茨基集团正是在斯大林主持的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并入布尔什维克党，而且托洛茨基虽当时仍处于监禁中，但还被选为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李可夫、布哈林、诺根、乌里茨基、米留亭、柯仑泰、阿尔特姆、克里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索柯里尼科夫、斯密尔加、勃布诺夫、穆拉洛夫、邵武勉、伯尔辛是其他的委员。代表大会对遭受政治迫害的领袖们表示敬意，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柯仑泰被选入“名誉主席团”。

当时，斯大林在一些重要人物不在时领导了党，却没有提出什么重要的观点。他的演说没有包含独创的观点。他的表达

斯大林政治传记

枯燥无味，缺乏激情。但他却有一种要在战斗中独挽狂澜的自信。他表现出来的可靠和坚定，就足以给队伍中早期的惊慌失措以平息的作用。当他作报告时，消息传来，各城市已经开始讨伐布尔什维克，全国各地实际上已处于戒严状态。代表大会镇定自若，仍照旧召开。就像在第一次革命低潮时的表现一样，现在的斯大林同样镇定地去应付这场暴风雨。

代表大会结束后，被监禁的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人都先后被释放，于是斯大林发挥的作用又不那么明显了。

8月底，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举行叛乱以反对临时政府，这次叛乱使首都陷入一片惊惶。这次叛乱使布尔什维克关于反革命即将来临的不断警告被证实是正确的。这次政变的起因是不明朗的。克伦斯基曾经打算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最后的交涉，要求科尔尼洛夫将军派可靠的部队来首都彼得堡。但是对于镇压布尔什维主义的计划这位将军并不满足——他想一举而使国家同苏维埃、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和克伦斯基本人脱离。他充满了“社会救星”的使命感和自信，对自己的打算毫无顾忌，不再忠于临时政府，在里加向德军投降，然后命令他的部队进攻彼得堡。

临时政府、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各委员会及执委会对叛乱都惊恐万状。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进行援助，不武装起追随列宁的工人，不将苏维埃和在“七月事变”中被镇压下去的赤卫队恢复起来，他们想要击败科尔尼洛夫的这次政变是不可能的。克伦斯基亲自请求布尔什维克对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进行规劝使他们行动起来“保卫革命”。布尔什维克暂时忍下不满和怨恨，响应了这一呼吁，同科尔尼洛夫“在第一线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上”作战。反革命驱使所有社会主义派别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注定了它的灭亡。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也小心地以避免再犯相似的错误。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到监狱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并问他应不应该一锤定音地消灭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时，托洛茨基给他们的建议是一个一个地解决他们的敌手。几天之后，科尔尼洛夫的政变就以失败而告终。

这次失败的反革命事变推动了布尔什维主义，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作最后的一跃。在危机中布尔什维克党脱颖而出，被赞为最坚决的革命捍卫者。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结束后，列宁公开号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断绝与科尔尼洛夫的同谋者立宪民主党的关系，自己掌握政权，并以苏维埃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他答应，如果批准他的建议，布尔什维克将在苏维埃的体制内扮演合法反对派的角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赞同这个建议，结果就使他们丧失了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信任。由于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强烈地主张和平和给农民以土地就提高了它在军队中的声望。在这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进行鼓动的风格是简单明了的。例如斯大林在《工人日报》上的一篇不署名社论，因为斯大林的作品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是大体相同的：

我们已经打垮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他们。

我们已击溃了科尔尼洛夫的将军们，但是还没有完全确保住革命的胜利。

原因何在？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因为妥协派没有同敌人作无情的斗争，反而同他们进行谈判。

因为护国派没有同地主资本家决裂，反而同他们达成协定。

因为政府没有宣布他们为非法，反而请他们入阁。

在俄国南部卡列金将军掀起暴动来反对革命，而却任命他的朋友阿列克谢也夫将军为总参谋长。

在俄国首都米留可夫党公开支持反革命，而该党的代表人物类似于马克拉柯夫和基什金却被邀请入阁。

结束这种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到了！

坚定不移地宣布对敌人要搏斗而不是妥协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口号是反对资本家和地主，反对银行家和将军，保卫俄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争取和平、自由、土地。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同地主资产阶级决裂。

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成立工农政府。

在科尔尼洛夫将军被逮捕后几天，一个重要事件在彼得堡苏维埃发生了。最近几次的补缺选举使布尔什维克已经居于多数派的位置。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苏维埃也成为多数派。托洛茨基被保释后不久就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他曾在1905年当选过。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温和派的控制下，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使它掌握一切权力。从逻辑上来说，这个决议预示着起义的到来。只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不可能产生实际作

斯大林政治传记

用。因为这个口号就等同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将掌握全部权力。而且由多数派决定遵不遵循这一行动方针。但是现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意味着政权归布尔什维克因为它现在成为了多数派。一个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临时政府对这个要求持反对态度并根本反对苏维埃，那又会怎么样呢？那么苏维埃就在政治上有坚持这一主张的义务，反对并推翻临时政府，以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得以完结。但是这一点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做到。

到了9月中，列宁已经得出了通过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的结论，并决定敦促中央委员会为起义作准备。由于无法亲自前往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他就同他的同事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进行联系。这些信件表现了列宁超凡的洞察力无论是对于起义的预备工作，还是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之间事前的剧烈争论。由信使把这些信件送到塞尔哥·阿利卢耶夫家里，在“七月事变”后列宁曾隐藏在那里一段时间，在他离去以后不久，斯大林就搬进去了。在列宁和中央委员会中间斯大林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9月15日，带着列宁的两件备忘录，斯大林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两份备忘录是《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写道：“既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又要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同时我们就应当利用一分钟，立即把起义队伍的司令部组织起来，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保罗要塞，把总参谋部和政府的官员监禁起来……占领电话局和电报局，在中央电话局旁边设立我们的起义司令部，使它能用电话联系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

斯大林政治传记

起义的最初计划不同于它的实际过程。对起义的政治基础列宁并不考虑，或者说他并不关心由谁来宣布这次起义。他远离行动的舞台，不可能制定出任何行动计划。实际起义的情况反映出来，他最初的计划看起来就像一个幼稚的冒险试验。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对此都不以为然。列宁自己也只把它看成是一次尝试。使他的同事们认识到事情的迫切性还是他的意图，列宁警告他们要反对关于自发的“人民起义”的外行打算，提醒他们对待起义必须像对待艺术一样，以及鼓励他们使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因为这个原因中央委员会分裂了。对于列宁强调事物的迫切性这一问题，托洛茨基是赞同的，但提出他自己的另一计划供讨论，这个计划更为艺术地考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政治和军事。他反对由党单独领导起义，要求同苏维埃联合起来，因为在工人眼中这个“工人议会”的道义权威比党无疑要高一些。起义的时间表由这种政治和心理上的考虑所决定了。10月下旬，在首都将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因此起义要同这次代表大会保持一致性。

从战略上讲，托洛茨基是赞同列宁的观点的；从战术上讲，他同列宁是不一致的。从战略原则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不赞成列宁。当列宁在9月15日的会上宣读头几封关于起义的信件时，加米涅夫十分害怕列宁提出的行动方针使党受到损害，而提议烧掉这些信。对于加米涅夫的提议有六个中央委员赞成。斯大林建议由一些主要的组织讨论这些信件，这好像在含蓄地表达他是支持列宁的，因为对这件事的更广泛的讨论会引起党有义务地把争论变成行动。但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希望由地方组织来讨论这件事，从而使它被搁置，因为各地方组织不如中央委员会勇猛。不管情况是否如此，反正没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有通过斯大林的建议。

接下来几个星期，赞成起义和反对起义的人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核心组织的较低层圈子里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很快他们就有试验一下自己的力量的机会，因为临时政府决定召开所谓的临时会议。这是克伦斯基的一种企图，但这种企图来的太迟又无力，克伦斯基是想利用某种反苏维埃的代议机构来支持自己的政权。临时议会的性质是一种咨询机构，而且由政府指定它的组织成员。布尔什维克对临时议会应该参加还是抵制？这个问题虽然不能等同于另一个关于起义的问题，但两者是有联系的。一些坚决赞成起义的人认为，他们毫不期望这个假议会，它的日子无论如何是不多了。那些对列宁计划感到惧怕的人则主张参加临时议会。这个问题最后由党的一次全国代表会议进行表决，在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主张抵制临时议会。很少看到这两个未来的对手持同一观点。但是，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却主张参加临时议会，并使会议的多数代表赞同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在起义刚好一个月前，这个领导起义的党却表现出一种列宁愤怒地斥责它是“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表现”的情绪。

这时全国的情况越发显得混乱又失败。临时政府和总参谋部曾经一度打算撤离彼得堡，并把政府各部从彼得堡迁移到莫斯科。这个谣传非常不利于布尔什维克，他们把这个计划视为一种反革命的阴谋。据说，临时政府放弃红色首都的原因，是希望砍掉革命的脑袋。这种威胁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并迫使它负责保卫彼得堡。由于布尔什维克逐渐掌握了政权，他们的态度就逐渐从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转变成一种准护国主义。他们现在的口号是保卫彼得堡，这是把它看成革命的而不是帝国的首

斯大林政治传记

都。社会主义温和派一般传统的护国主义，暂时同布尔什维克新的护国主义实现了统一。因此，由苏维埃来负责保卫首都的决定，参加苏维埃的各党派是给予支持的。

由于采取了这种主动行为，苏维埃获得了新的声望和权威，最后就能够和临时政府决裂。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的主席，对它的一切活动进行控制，成功地提出了共和国全国需要的措施正是革命的重大准备工作。于是苏维埃坚决主张，先是原则方面，后是事实方面，它有权对首都及其附近各州的部队行动进行监督；这也就意味着，它有权对各军事司令部和参谋部进行监督。自从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人民就十分不信任军官团，因而有利于苏维埃的力量的增强，使它对可能发生的冲突有能力对付。10月13日由执委会任命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代表苏维埃来负责这些事。苏维埃的主席和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同一人；委员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指挥起义的总参谋部。

这一发展的特点是，负责起义的机构不是秘密的、自我任命的集团或密谋者的派别，而是由像苏维埃这样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通过公开的方法选举产生的。可以说，合法的苏维埃掩护了这一密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温和派的反对几乎不起作用。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自己的失败无可奈何而又十分尴尬甚至还要参与共谋。掌握所有起义的托洛茨基成功地用合法的外衣把起义保护起来了，以便防止反革命的行动或者勿宁说为了阻挡住反革命的行动。这个计谋很有策略，它把工人阶级和卫戍部队中那一部分犹豫不决的人争取了过来，使他们同起义者保持一致。但这并不是说起义的防御性质是极不真实的。临时政府以及在它后面的保皇党将军和右翼政客的确在进行反革命的准备：在起义之前，革命军事委员会

斯大林政治传记

被克伦斯基取消了，发布了一个新命令，即逮捕布尔什维克领袖，企图把效忠于他们的军队动员起来和封闭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但是，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革命方面的确占优势；而且由于起义的领导者一直声称他们的运动是防御性的，甚至扩大了这种有利的条件。

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获得连续的优势时，处于隐藏处的列宁努力去克服在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他设法说服他的追随者，遵循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建议，退出克伦斯基的临时议会。10月7日，临时议会预见到了革命即将来临。在议会上托洛茨基发表了热烈而响亮的声明，宣布布尔什维克脱离临时议会，而且他还高呼：“彼得堡危急！革命危急！人民危急！”在这些口号声中，布尔什维克离开了会议厅。10月8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地转回彼得堡。又过了两天，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在会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们无权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把整个的未来的希望放在武力之上。”他们坚决要求中央委员会等待立宪会议，临时政府现在已同意召集立宪会议而且他们希望一个激进的多数派来统治这个立宪会议。他们想象中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议会民主制联合组成了这个新国家。他们警告列宁的政策将会摧毁革命：“历史上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与其不战而降，勿宁战至失败。俄国工人阶级现在绝对不是处于这种情况中。”他们反对起义的理由有两个，其中的一个很快就被事实所推翻，而另一个却为未来的事变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说，起义的鼓吹者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临时政府的力量。过于乐观地看待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

性。

列宁不耐烦地对一切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都不予考虑。临时政府已经搁置它很久了，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它将实施它呢？把起义拖后，就意味着给科尔尼洛夫将军们以时间，这样他们就能够发动政变，并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列宁把他的对手悲观地看待力量对比的看法视为懦夫的忠告。大多数的俄国工人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后盾；全体“欧洲无产阶级”也肯定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有十二名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十人赞成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在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下，选举产生了一个政治局，“目的是在最近的将来进行政治指导”。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科里尼科夫和布勃诺夫是这个政治局的成员。于是这个政治局后来成为凌驾于国家、党和革命之上的机构。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起义在10月20日举行。

政治局对于分配给它的任务没能完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同意起义的决定，并想方设法来取消它。化了装、头戴假发的列宁，出现在10月10日的会上，接着马上又返回隐藏地，放弃了日常的准备工作。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希望能够劝说他那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和信徒克服“可耻的动摇”，“令人吃惊的混乱和胆怯”，但成功的希望几乎不存在。托洛茨基为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疲于奔命，以致没有更多的时间管中央委员会的事务。另外，他对列宁的起义计划也不怎么感兴趣。列宁决定起义的发动不在彼得堡开始，而是首先在莫斯科发动突袭。后来他又建议，应该从赫尔辛基开始起义，然后再进攻彼得堡。对这些“局外人的意见”托洛茨基继续不置可否。斯大林也同样不置一词，他后来用带有讽刺的语调谈到列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宁变易不定的起义时说：“我们觉得我们实际工作者应看清我们道路上的一切小沟、泥坑和坎坷。但是伟大的伊里奇，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深沟或坎坷，他不怕危险，他说：‘站起来，一直向目标走去。’而我们实际工作者认为，当时这种做法对我们是不利的，应当避开阻碍，直击要害，果敢地行动。于是，我们放弃了伊里奇的观点，没有听他的话……”除了军事上存在的缺点，列宁的各项计划还有一个主要的通病：它们缩小了起义的政治基础，剥夺了苏维埃对起义的批准权，并使托洛茨基筹划的人民行动缩小为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事情。它们还使起义脱掉了防御的外衣，使它的进攻性质暴露无遗，甚至使那些对革命怀有好感的人也感到起义的鼓动性。

10月16日举行了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有一些非中央委员的著名党员也参加了会议，它通过了上次作出的赞成起义的决定。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宣称他们反对列宁的斗争。在高尔基主办的报纸《新生活报》上，对公众作出了反对起义的警示。列宁十分气愤这种轻率的行动，把它称为“叛变活动”、“工贼行为”，要求立即开除他们出党。其他中央委员认为，这是个近似严厉的惩罚。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斯大林发表了列宁的谴责言论，但在一篇和解的社论中对它的效果予以淡化了，意思是想缓和对立观点。在10月16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发言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反对，并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客观上是为反革命进行准备和组织起来提供时机。我们将无止境地退却，摧毁革命。……现在应该信心更足。这里有两条路线：坚持争取革命胜利的方针和回头看看欧洲是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是对革命不信任，不打算做为政党。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选择了第一条路

斯大林政治传记

线……”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当中央委员会正在无所作为时，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维埃的行动已经开始了。那么斯大林为什么现在要保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两个一心想阻止起义的轻率的同事呢？他是不是急于要加强党内团结？或者他受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惊慌失措的警告和喊叫的影响也拿不定主意？或者也许如托洛茨基所判断的，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想公开反对起义，而又不使自己对起义的失败负责？在下一次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加米涅夫宣称要辞职时，斯大林再次维护了他。但会议接受了加米涅夫的辞职，于是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在社论中所表现的态度，为此斯大林也提出了辞职的要求。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个要求，它惟恐把这个党报的编辑推到反对起义的人当中去。斯大林为了补救他在社论中的失误，现在急于表示他是真的赞成起义。他建议，两个起义派中最坚定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作主要发言。

这时，孟什维克占优势的执委会决定延期五天到10月25日召开大会。就是在这几天中，完成了起义的一些重大准备工作。10月21日，彼得堡军队委员会的一次代表会议对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卫戍部队的真正首脑予以认同——除非有该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连署，否则，任何人的命令都不服从，意思就是要有托洛茨基或他的助手安东诺夫—奥伏申科、彼德沃依斯基，或适当授权的委员连署才能起到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样的作用。10月23日，驻扎在首都及其周围的几乎所有团队的军事委员被革命军事委员会予以任命，因而保证了可以联络实际在它指挥下的所有部队。官方司令部没有能够执行改编卫戍部

斯大林政治传记

队的命令，预定调离首都的部队拒绝离开首都。于是撤掉了不服从苏维埃权威的所有军官，还逮捕了其中一些人。

最后，在10月24日，临时政府的决定反击为起义提供了借口。政府的部队把斯大林所主编的报纸编辑部占领了，封闭了这家报纸的印刷厂。报纸工人的一个代表团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派部队到编辑部来保证报纸的出版。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这个要求了。起义的领袖后来写道：“封在布尔什维克报纸编辑部的门上的一块官方火漆，作为一种军事措施，它虽然不够有力，但它却是一个极好的战斗信号。”战斗的范围迅速扩大到桥梁、火车站、邮局和其他战略要点；在托洛茨基指挥下的部队，毫不费力就占领了这些地方。唯一的真正战斗发生在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安东诺夫—奥伏申科领导了这次起义，他后来成为驻波兰和内战时期驻西班牙的大使。但是这次行动，同样也不具有“阿芙乐尔”巡洋舰用哑弹对冬宫进行攻击那样的喜剧风格。在政治上临时政府很孤立，绝大多数人是支持起义者的，以致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就打倒了临时政府。当10月25日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起义马上就要成功了；这次代表大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对这一事变立刻予以了确认。

斯大林在这次大变动的日子里，并没有起到主要作用。他甚至比往常更加不引人注目。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对此也有些尴尬，而这也许正好印证了托洛茨基说的：“事件越是猛烈发展，斯大林在其中起的作用就越微不足道。”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用不大，而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影响要大于他在外面的影响。在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上，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勃布诺夫、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被派往苏

斯大林政治传记

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代表党进行工作。但是，正如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所说的，斯大林在这个起义机构中几乎毫无贡献。如果在无序的起义文件中可以找到很少的几个同斯大林直接有关的记录，那么就可以证明托洛茨基的上述证词具有派别性而加以驳倒。但是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记录。

自从斯大林升到国家最高领袖的位置以后，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一切官方的革命史当中。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只是把他说成是实际起义的“破坏者”和“叛徒”。对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所有的官方历史和教科书都谈到，或是把无法略去的托洛茨基的事绩和讲话的功绩都归给默默无闻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但是，尽管苏联官方历史学家尽力地去做，他们却无法把因托洛茨基受到控告后留下来的空白补以斯大林的名字。即使由斯大林本人、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高尔基和基洛夫编纂的最虚伪的《苏联内战史》中，也没有涉及到一个具体事实或文件，能够对斯大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的说法起到支持的作用，除非把某个斯瓦洛加或符拉季米尔斯基在事件多年以后所创作的无聊又虚伪的画也算作历史文件。这些画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极英勇又英俊的人，他正在指挥起义者。斯大林自己的详尽年表也丝毫未提到这一点。令人十分奇怪的是，对于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那天早上所举行的会议他也没有参加。托洛茨基评论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胆小鬼。对于斯大林胆怯我们没有理由责难。他只不过是在政治上中庸。在关键时刻这个谨慎的阴谋家宁愿双方都不顾。他在等待观看起义结果，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如果起义没有成功，他就会告诉列宁和我以及我们的追随者：‘这是你们的过错！’人们必须对那些日子里的火热情绪进行清

斯大林政治传记

晰的回忆，才能按照它的功过来对这个冷静刚毅的人进行评价，或者你如果愿意说的话，也可以对他的阴险狡诈进行评价。”

托洛茨基的这种说法似乎是不相统一的：他把他的敌手说成阴险狡诈，也就意味着还是说他有一点胆怯。人们不能同意托洛茨基的说法还是另有原因的：事实上，的确早在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表决起义时斯大林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来在列宁和托洛茨基表决时他也同他们一起赞成起义。10月16日，他再次投票赞成起义，还为起义辩解。而且这次表决的范围超过了中央委员会这一狭窄的秘密会议，而是一次范围大得多的有彼得堡的组织、党的军事部门、工会、彼得堡苏维埃以及来自工厂委员会和铁路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如果斯大林是这样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宁愿置身事外的谨慎的阴谋家”，他是不会在那种完全公开的场合完全站在列宁一边的。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解释斯大林在起义中为什么没有在总部出现或活动。但是这一事实始终是奇怪而不容否认的。

斯大林在那段重要时期中，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岗位上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那个岗位就是《工人之路报》的编辑部。《工人之路报》是由《真理报》改编而来的。他在这家报纸上进行党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撰写一些不署名的社论来进行宣传。当然，他并没有进行公开地号召。就像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一样，斯大林在他的报纸上用防御的姿态把一种在本质上是进攻的政策掩盖了起来——这是在小心掩护起义。10月10日，甚至中央委员会此时还没有首次通过决议，他就写道：“已经击溃了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第一次阴谋。但是反革命仍然存在……出于长久地保障革命免遭危险的考虑，应该将现在正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酝酿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第二次阴谋予以彻底扑灭……苏维埃和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通过革命的巨大力量来消灭反革命的第二次发动。”三天以后，他的态度更明确地表达出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最终实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在起义的那天早上，他对革命过程进行了总结，然后说：“二月革命胜利之后，地主和资本家、银行家和投机分子、包买主和奸商掌握了政权——这严重的错误是由工人和士兵造成的。……必须立即对这个错误进行纠正。仿佛是对列宁的话可以重复并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进行暗示，他继续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了：再拖延下去就会毁灭整个革命事业。……目前这个非民选产生并对人民可负责的伪政府应立即被以人民承认的，由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代表选出并对这些代表负责的政府来代替。”过了十四年，托洛茨基因此对起义者的情况进行描写说：“所有那些从上到下参加起义的人，都绝对地相信，将获取胜利而又不受伤害。这次起义的力量就在于此，有时这也是它的弱点。”斯大林的这一自信表现在起义前几小时写的文章中：“如果大家都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行动起来，那么对于人民的意志任何人也不敢违抗。随着你们发动的愈发有力、有组织和强大，旧政府就会更加和平地把政权交予新政府。”

在这一伟大事件的前夕，这个人的情绪和心境在一篇文章中大体的反映了。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来自各方面的关于布尔什维克计划和意图的许多似是而非的或仅仅是使人担忧的言论。斯大林用一篇含糊其词的谩骂杰作答复这些问题：

我们的回答如下：我们再另论资产阶级及其“机关”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关于资产阶级的佣仆和走狗：我们将把他们派往特务机构，他们可以在那里“打听到”何时进行“发动”，同时“报告”给有关人，而《日报》中的挑拨分子已经拟好了发动的行进路线。……我们不把情况汇报给这伙站到……政府方面反对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英雄们”。可是，我们要竭力使他们这些工贼英雄们把情况报告给苏维埃代表大会。

他对高尔基的谩骂是最恶毒的。著名的作家和革命者高尔基，他是列宁多年的同路人，斯大林在后来把这个人尊为新文明的预言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文章反对起义，这些文章曾在高尔基主办的报纸上刊登过，这家报纸还要求列宁及其同事公开自己的观点；借用托尔斯泰反对沙皇的一篇作品的题目《我不能默不作声》，高尔基撰文攻击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对高尔基也进行了驳斥，用猛烈的言语对之发泄强烈的怨恨：

至于《新生活报》的那些不知所云的人，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想向我们要什么。如果他们想知道起义的“日期”的目的在于预先动员张惶失措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以便及时……逃跑，他们可以跑到芬兰去，那我们只能……赞扬他们，因为对于动员力量这一事我们一直是持赞同态度的。如果为了镇静他们“钢铁般的”神经，他们才打听起义何时举行，那么我们要告诉他们，即使已经确定了起义的“日期”，即使布尔什维克悄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那也不会使我们的神经衰弱者放松紧张的心情，因为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发生歇斯底里等等。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也很对高尔基表示愤慨。但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这样怀着一种个人的恶毒情绪对他和他的同事进行攻击，说他们胆小、背叛等等。下面一段甚至是斯大林对他们更不公正和更为粗暴的谩骂：

高尔基说“不能默不作声”也同样只缘于这个因素。这虽然出人意外，然而事实。当地主……把农民压迫到饥饿和绝望的边缘的时候，他们坐在一旁，对此不说任何话。当资本家及其走狗压迫工人使全俄同盟歇业和失业的时候，他们对此漠不关心。……但是，当受骗的工人和农民被革命先锋彼得格勒苏维埃堡护起来的时候，这些人却不再保持沉默了！并且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对反革命进行批评，而是责难那个他们在平时极为推崇但在最紧要关头却拼命地躲避开的革命！

他的攻击从下面一段深刻的话中达到了顶点：

很多权威人士被俄国革命淘汰了。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推崇“名人”，而要“名人”为它战斗，如果他们拒绝学习它，那革命就会抛弃他们。这些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数量很多：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查苏利奇以及一切仅仅凭资历而出名的老革命家。我们担心这些“泰斗们”的桂冠会使高尔基失眠。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迫加入他们当中，成为档案所记录的人物。那也没什么，自由人的行动是自由的……对于那些

斯大林政治传记

离开革命的死人革命既不可怜他们也不安慰他们……

这些话的作者、格鲁吉亚农奴的后继者和布尔什维克核心组织的成员认为，维护被压迫阶级不是革命的惟一任务。同样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委员会人战胜了俄罗斯社会主义“名人”。任何传统、甚至社会主义传统对他而言都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领袖极不相同，特别是与列宁不同。甚至在最狂热的争论中，列宁对他以前的导师普列汉诺夫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的出名由于资历老。人们从斯大林这种毫无节制的咒骂后面可以看到这个人被抑制住的失意。他的特殊才能都不能使他名声大震，这种情况在他正跨进权力的门槛时还是这样。但是，革命虽然抛弃了一些“名人”，它也的确使一些新人脱颖而出，他们甚至更加光辉，更加深深地为人民所铭记。

斯大林的那些话被后来的事赋以这样的意义，这就是下意识地向那些新人进行挑战。这场革命暂时只向世界展示了它焕发着崇高希望和热情的一面。它的吞食自己子女的怪物的那一面，却还不为人们所知。但斯大林在那时已经崇拜它吞食自己子女的怪物的那一面了。“对那些离开革命的死人革命既不可怜他们也不安慰他们”——这就是大约二十年后他所实行的大清洗的主题。

第六章 内战中的斯大林

革命陷入困境——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列宁的首次政府——布尔什维克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到赫尔辛基斯大林宣布芬兰独立——他是怎样看待弱小民族“自决”——他起草的苏维埃第一个宪法——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斯大林和列宁都对和约持赞成态度和反对“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对德从事“革命战争”的主张——反恐怖和恐怖——1918年5月斯大林在库尔斯克谈判与乌克兰中央拉达——内战的扩大化——1918年6月斯大林到察里津（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他支持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对托洛茨基的反对——为何会产生深仇大恨——斯大林要求给予南方战线全部权利——列宁企图调解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叙述保卫察里津的互相矛盾——1918年10月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对1918年欧洲革命感想：《光明来自东方》——1918年5月斯大林对彼得堡进行保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同膺红旗勋章——斯大林作为行政工作者——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斯大林的作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党制和禁止布尔什维克内反对派——斯大林获益于布尔什维克核心组织不断增加的影响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流血的、温和的事变即十月革命之后，一场残酷的内战和外国干涉爆发了，它进行了将近三年。在形成这个新的革命国家的过程中，内战给予它的影响要大于它所受到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所鼓吹的思想影响。这个革命的政党受形势逼迫而放弃了某些抱负、幻想和愿望，以便从根本上挽救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党自身的领袖和追随者，都在精神和政治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一切革命都具有这种变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每一次伟大的革命的开始，总是以人民群众的力量、焦急、愤怒和希望的惊人爆发为标志。而革命人民被弄得精疲力尽和幻想破灭则标志着革命的结束。在革命开始后的一段时间，能够最充分表达人民情绪的党将自己的对手击败，所以群众信任他们，而他们掌握了权力。最极端的那部分人民认为，即使是最革命的政党有时革命性也不够强。革命在不断发展的形势的迫使下，必须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克服，并挑战一切保守的力量。然后就受到必然发生的内战的考验。革命的政党仍同民族中的大多数一起往前进。它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它应该同人民团结一致，它的目标要同人民的愿望保持一致。它对全国的群众的号召是不断地作出牺牲和努力；而对它的响应也随之而来。在这个盛行英雄主义的阶段中，真正能够理解民主原则的是革命政党，即使它用敌人专政的无情手段，并且对宪法的严格规定不予遵守。领袖们对广大的平民追随者是绝对相信的；而且他们的政策也建立在这种互相信赖的基础之上。他们愿意、甚至急于要公开讨论他们的政策，并接受人民的裁决。虽然他们热望去对群众进行领导，但他们也容许别人指导自己。

斯大林政治传记

革命的政党不能长久地维持同人民群众的愉快关系。对内战的考验它没有能够经受住。许多新制度的忠诚的和有力的支持者在内战中的势力逐渐衰弱了。一些人则从卑微的地位上升到较高的地位，而且往往享有特权。胜利的革命政党对此得意洋洋，充满着骄傲和自信，但也感到衰弱和疲惫。人民的疲惫情况更为不堪。受到内战和战争蹂躏的整个国家，已经陷入悲惨的境地，其情况可能要恶劣于当初人民起义来反对的那种情况。1920年俄国遭到的饥饿和匮乏，甚至比1917年的情况更糟。人民对新统治者对环境所迫和为了自保所采取的无情手段表示强烈反对。而反对最激烈的人，正是那些人，他们在先前坚决要求党实行那种方针，从而使这种无情手段必然发生。

于是，革命只有开头没有结尾。领袖们对自己早期许下的诺言不能兑现。他们已经把旧制度摧毁了，但却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诚然，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和不太遥远的未来的进步源于革命的发生。这一点后代子孙以为是有道理的。但是革命的果实成熟也不快；在革命结束后的前几年，情况是悲惨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新的国家形成了，它将革命政党和人民之间的裂痕暴露了出来。革命政党对此感到目瞪口呆。如果人民情绪主导革命政党的行动，那么它现在就必须隐退，或者至少放弃自己的权力。但是没有一个革命政府在内战获胜之后会放弃自己的权力，因为遭到失败的反革命的大量残余分子对这个政权还念念不忘。自动放弃权力就意味着自杀。而且它还使大量的革命工作失去成效；而正是这些工作的基础作用，社会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这一转变不是稳定的。如果一个政权的政治机构使革命和反革命的激情都能释放出来，那么它就大大不同于稳定的代议制所提供的政治旋转门；在代议制之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下，政府可以通过那道旋转门执掌政权或失去政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温和的，而且不需要砍掉敌方的脑袋。但是革命的政党不会退缩。它走上目前的道路的原因在于，它对现在已经被抛弃的那些人民的意志予以遵从。它将几乎是无视人民的呼声而继续按照它认为的职责去做。最后就会使人民无法呼叫。

起初，革命的政党并不太清楚这个新阶段的所有含义。它管理的是一个民有、民享和民治的政府。现在它至少丧失了民治政府这一特性。全党可能仍然希望这种不赞同人民情绪的情况只是暂时性的；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人民的想象力将会重新激发，并使刚刚逝去的英雄业绩重新出现。然而这种分裂的趋势却在加深。统治者对专断的统治已习以为常，而反过来这种习惯又统治了他们。当初让人充满希望的群众运动，一场伟大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如今已经被一种狭隘而冷酷的专制制度所取代。在这个过渡期中，革命政党里那些提倡新观点或不反对这种新观点的人，就同那些坚持旧观点的人产生了分歧。它的某些领袖惊恐地指出革命已脱离了人民；而另一些人却捍卫党的行动，说这种脱离是无法挽救的。还有一些实际的统治者，他们对这种离异的本身根本不予承认，因为如果承认它，就会加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有些人惊恐地叫道，革命已经变质了，因为他们认为，革命的本质是民治的政府；没有民治的政府，民享的政府也就不存在了。统治者为自己辩解说，无论他们如何做，最终总是服务于国家更广大的群众。总的来说，他们也的确通过执政来巩固革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许多胜利成果。革命领袖们在这一片指责和反指责声中头脑发热了，革命后国家的权力位于社会之上。

简单又混乱是革命发展的这种主要方面的特征。历史的真

斯大林政治传记

理在复杂的事件顺序中的出现要多于出现在最一般的概括中，它在每一次革命中都表现不同。某一次革命的不清楚的一些特征，在另一次革命中却显得十分清晰可辨。比如，在几个月中雅各宾主义萎缩和消亡的速度很快，在布尔什维主义中却发展得很缓慢，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十年的时间；而且它们的结果在很多方面都是很不一样的。但在这一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事件的一般趋势，迄今为止这在所有伟大革命中都被证明了。只有根据这种广阔的前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已获胜利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什么会变质，以及斯大林个人的命运。

在贫穷和受迫害的境况下，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获得名声和权力，统治了俄国，这是一个突变的过程，是很少人了解的。列宁在恢复真面目后不久，就在起义的当晚，在斯莫尔尼宫与他的朋友们见面了，他曾开玩笑地承认这种由转变所带来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感觉。1917年10月26日，加米涅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一份人民委员会的名单，当斯大林听到这一宣读时，也必定有这种类似的感觉。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这一名字，被包含在这个名单中，他被任命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在这届政府中他成为其中一员，但是这届政府受到所有非布尔什维克党派的抵制。这届政府由十五名成员组成，知识分子占11名，只有四名是工人。主席是列宁，外交人民委员是托洛茨基，李可夫负责内务，农业由米柳亭负责，劳动由施略普尼科夫负责。以下三人负责陆军和海军：革命者和前军官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前海军少尉和律师克里连科；水兵德班科，这人身材魁伟、识字不多、虽然粗鲁却又性情温和，作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波罗的海舰队的革命领导人而闻名。负责教育的是“寻神派”学者卢那察尔斯基。一些传统的陈规陋习被新政府废除了。它的革新之处甚至也通过它的名称表现了出来，它把内阁各部的名称改为人民委员会。一个委员会管辖一个人民委员部，这个部的人民委员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民主激进主义在政府的组织中被反映了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头一批人民委员赞同日后布尔什维主义的“无情决定”或“狂热情绪”。相反，许多人民委员态度过于温和，很快就使一系列悲喜剧出现在政府当中。这儿以两三个典型的事例予以证明。

当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还没有结束时，社会上就盛行着克里姆林宫已经在战斗中遭到毁灭这样一种传言。于是卢那察尔斯基也即是教育人民委员宣布辞职，以此对赤卫队破坏文化艺术的行动进行抗议。他在一篇声明中大声疾呼说：“同志们，正在莫斯科发生一场无法弥补、可怕的灾祸……我们光荣的首都已经被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所毁坏……在这些猛烈的惨重的斗争进行的过程中，作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我对此深感恐惧……即使最愚昧无知的人也将会明白过来，快乐、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是艺术。”结果证明上述关于克里姆林宫的谣传与事实极为不符。通过列宁极力规劝，才使这位多愁善感的人民委员复职。

从政府成立之日起，公务员就开始抵制它。他们对新主人的命令不予服从。一个目击者说：“政府当局任命亚历山大娜·柯仑泰为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原来部里的人，只有40人没有用罢工的形式来反对这一任命。各大城市的贫民立即陷入悲惨之中。这个部的大厦被饥饿的残废者、面有菜色的孤儿的代表们包围了。柯仑泰万般无奈地下令对罢工者予以逮捕，除非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们把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革命才万般无奈地把敌人的破坏行为击溃。

废除死刑是人民委员会颁布的第一个法令，不过对这一法令列宁一再表示反对。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率军进入彼得堡，目的在于推翻布尔什维克和解散苏维埃。赤卫队抓获了他，但旋即被释放，因为他庄严地保证不再使用武力。但是后来克拉斯诺夫却没有遵守承诺而是在南俄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持久的内战过程中，革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下定决心对敌人的保证不予理睬，并学会坚定地去行动。革命因此而具有某种新的但令人厌恶的特点，但革命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特点才得以生存下去。人们迅速了解到，许多人之中不只有一个“钢铁的人”，他们使革命摆脱了敏感的理想主义。

在他的部里斯大林没有遇到公务员的抵制，因为以前一个专门来处理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事务的部门是不存在的。他必须从头开始来建立他的人民委员部。开始，斯莫尔尼宫中的一张桌子就是他的部的整个“机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卡片柜，那个部的夸张的名字被钉在了柜子上。后来，在一场各人民委员为设备的争夺而进行的可笑的斗争中，通过高压手段，斯大林才为他的部争得一个比较像样的部址。后来他又在周围集合了一群格鲁吉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作为他的助手，足以处理他的人民委员部的事务。

当这第一个人民委员会消失的时候，他的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在政府中那些以前反对起义的右翼力量是强大而不可小视的。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和解是他们暗地里酝酿的事情，他们主张他们的党同社会主义温和派共同执政。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工商人民委员诺根，以及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对这个要求是赞成的并予以支持。这些人民委员都辞了职，迫使列宁开始同其他党派进行谈判。但是，和解的企图没有成功，因为孟什维克坚持认为，联合政府不应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起义的鼓动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于这个条件还拿不定主意，但大多数人看出要“使布尔什维克党群龙无首”才是这个条件要达到的目的所在，因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它。对于联合政府中不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斯大林投票予以反对，赞成把同孟什维克的谈判进行到底。接着，又有一些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辞职。开除出党的威胁威胁到这些不服从的人时，辞职之风才没有继续下去。提出开除出党这种威胁的声明，首先是由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签名通过的。无论如何，新政府由于这个危机而得以成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也包括在内。惟一愿意同列宁和托洛茨基合作的集团正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实现他们的土地革命。

如果没有适当地考虑到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软弱性”对于列宁的影响，那么对斯大林从苏维埃政府一开始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问题就无法作出解释。列宁由于那些领导人的犹豫不决而充满了忧虑和惊恐。他看到他的政府受到一些几乎是无可挽救的灾难的挑战：国内的混乱，经济的瘫痪，不可避免的反革命，以及战争的创伤都是这些灾难的表现。他环顾左右，看看他能依靠在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同事中的哪一位来组成一个紧密的核心。组成这个紧密核心的目的在于在紧急情况到来时能够采取坚决又迅速的行动。一个核心内阁是他真正想设立的机构，而不是任何独裁的三人执政。在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曾任命了一个执委会，这个执委会

斯大林政治传记

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四人组成。在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政府以后，政府把一些重要而紧急的事务委托给核心内阁来处理，这一核心内阁由五个人民委员组成，其中布尔什维克有三人，两个是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正是这三个布尔什维克成员。

我们已经说过斯大林是通过何种方法在 1912 年成为一个中央委员。当时，列宁同他的大多数著名同事在观点上存在分歧。于是挑选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集团的问题，就决定了这些人的自我消灭；地下工作的实际工作者、主要是巴库委员会的人们代替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现在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正是由于许多中央委员执不同政见，斯大林才得以升职。诚然，这次没有开除这些执不同政见者，他们也没有离开党，甚至后来还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会议中势力得到恢复。但是他们继续存在具有暂时性。这并不是说那些更为温和的领导人所具有的对斯大林的怀疑和动摇可以完全消失；在十月起义的前夕，斯大林就曾经有一个动摇的时期。但是他基本上是忠于列宁的，对于列宁的主张坚定地给予支持。他自己的判断和政治本能，不时地诱使他与列宁分离；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他比列宁判断得还更合理。但是，至少在革命后的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列宁还是紧紧吸引了他，使他坚定地支持列宁。列宁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认识，而且他也赞同充分地利用这个情况。在原则问题和意识形态上，比起斯大林的意见，他更多地考虑的是其他中央委员的意见。但是在政府的日常事务方面，在他的广泛的行政工作方面，他对于斯大林的帮助也许要大于对任何别的人的帮助。虽然列宁自己并不像堂吉诃德，但他却喜欢有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仆人。斯大林跟随列宁左右，10月27日到

斯大林政治传记

28日的夜晚是在彼得堡军事总部度过的，为击退克拉斯诺夫将军向首都进军所采取的措施一直是 he 关注的目标。几天之后，列宁告诉总司令杜鹤宁将军停止与德军的交战。杜鹤宁将军对这一命令不予执行，列宁于是免了他的职，任命克里连科为总司令。这一次，斯大林对列宁的作法也是表示赞同的。这是斯大林军事活动的开始，随着内战的发展，斯大林军事活动的规模和重要性也随之增加。

在布尔什维克起义后三个星期，斯大林以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身份，第一次公开出席了芬兰社会民主党的赫尔辛基代表大会。芬兰人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和不平常的日子，因为新的俄国政府的代表宣布了芬兰脱离俄国而获得了独立。在拿破仑战争后，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开始了沙皇帝国对芬兰的逐步吞并之战。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认为自己可以合法地继承帝国，因此对它对芬兰的主权予以坚持，即使它对俄国的主权都没有实现。现在终于纠正了这个老的错误。受到沙皇压迫的另一个小民族的成员来代表俄国政府执行这个庄严的历史正义行动，这个人本身不是一个俄罗斯人，赫尔辛基代表大会因此更加显得不平常。他措辞生动的演讲，同冷淡而无感染力的腔调形成了奇异的对照。这位演说者讲着含糊的俄语，而且明显带有外国口音。但是由于他把一切浮夸之词都抛掉了，致使真诚的气氛增加了。“芬兰人民和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有充分自由来安排自己生活！俄罗斯人民和芬兰人民应该结成自愿的真诚的联盟！不应该把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施加于芬兰人民！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和指导原则就在于此。”这是由南方格鲁吉亚的一个儿子带给北方芬兰的自由公民的关于新俄罗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的消息。1917年12月18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芬兰独立。列宁和斯大林签署了宣告的命令。

这个高尚的行动几乎等同于斯大林1913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所提出的纲领。他在这篇论文中对被沙皇帝国压迫的民族获得自决权一事表示赞同。他对这个原则的意义进行解释说，每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都应该能够自由地脱离俄国并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国家。诚然，对于民族分离主义，社会主义是不同意的，而且组成的无数小国家也没有生存的能力。建成国际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要求把民族隔离的屏障废除掉。但是斯大林说，只有在组成它的各民族自愿同意下国际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建立；而自愿同意必须在每个民族首先要获得完全的自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列宁为这种观点辩护，他把这种自由同社会主义者鼓吹的离婚自由进行了有趣的比较，我们的意思不是鼓励应该有离婚自由的妇女同她们的丈夫离婚。同样地，布尔什维克捍卫非俄罗斯民族脱离俄国的权利，也不是意味着赞同它们的分离主义愿望。革命后七天的时间，在11月2日，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中体现了这些原则。列宁和斯大林正是这个宣言的作者，它是打算向全世界宣布这次革命原则的众多文件中的一个。它说：“……人民委员会决定把下列原则作为其活动的基础：1. 俄国各民族一律享有主权和平等；2. 俄国各民族享有决定自由的权利，甚至可以分离和组成别的独立的国家；3. 把一切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特权和歧视予以废除；4. 凡居住在俄国领土上的种族集团和少数民族，都有自由发展的权利。”

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希望，非俄罗斯民族能够以俄国为榜

斯大林政治传记

样，自己开展革命运动；而在分离权属于它们之后，将重新同俄国结合为一个国家联盟，这个联盟的性质是自由的社会主义。但是芬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等并不是由于他们国家已建起的政权而具有脱离俄国的权利。1917年12月22日，斯大林在把有关芬兰独立的法令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时曾辩护说：“如果我们把芬兰获得独立的情形予以更仔细审视，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实际上人民委员会把自由交给了芬兰资产阶级是与自己的意愿不符的，而它不是把自由交给芬兰人民，不是把自由交给芬兰无产阶级的代表。……芬兰资产阶级控制了政权，并独立于俄国社会主义者。”由于“优柔寡断和令人不解的怯懦”，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应负责这件事；但是“世界上能够迫使人民委员会背弃自己的诺言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虽然人民委员会的政策没有被广泛地接受，它却十分公正地对待芬兰资产阶级的独立要求。

的确各方面对这一政策提出了批评。反布尔什维克的各党派激动地说这是“出卖”俄国的行为。对于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布尔什维克而言，斯大林的政策对于小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让步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把牺牲俄国革命作为这种让步的代价。但是列宁支持斯大林，所以斯大林仍然坚持他的信条。

然而，这个信条同现实发生冲突这一事实很快就明晰了。在俄国所有的边疆地区，新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它们都站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一方，都坚持完全脱离俄国。这些新政府十分相信列宁和斯大林的话。最严重的是乌克兰的问题。它新建立起来的政府，即所谓的“拉达”，同苏维埃之间出现了战事。“乌克兰军队总司令”阿塔曼·佩特留拉下令所有乌克兰部队离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开前线并返回乌克兰。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决是荒谬的。斯大林在一篇官方声明中对这一新冲突的背景进行了解释。布尔什维克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拥有自己的军队的权利，但是他们还无力为符合乌克兰人的要求来对军队进行改组。他们急于结束战争，同德国签订和解条约。短暂的停战已出现在他们之间，并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谈。但是他们不能在和约缔结以前解散军队，把战线打乱，瓦解交通体系。在沙皇的旧军队里，民族划分不是士兵分界的标准，如果现在士兵按民族被隔离开来，就意味着在仍忠于德皇的德军面前不再保留俄国革命的武装。于是乌克兰民族愿望同俄国革命利益之间的两难问题又出现在了这里。

这种两难问题不断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俄国南部，一支反革命军队被哥萨克将军卡列金集合起来，内战开始了。苏维埃政府急于给南方派部队，因为顿涅茨克的红色煤矿区受到卡列金的进攻的威胁。乌克兰把俄国的南北两部分分开。但乌克兰拉达却拒绝红军通过乌克兰境内。难道为了尊重乌克兰的自决权苏维埃国家要向拉达的决定屈服，甚至这可能使白卫军占领南俄吗？问题还有许多。苏维埃革命事实上也在乌克兰上演着，乌克兰苏维埃正与拉达奋力抗争。拉达已经被苏维埃用武力解散了。红色的彼得堡又能对红色基辅和哈尔科夫被当地革命淹没这一事实袖手旁观了。

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很快做出了决定。他在 1918 年 1 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难题进行了描述，鼓吹修正这一政策：小民族的自决原则应该理解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这一自决权不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自决原则，应当与社会主义的原则保持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致。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对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进行了批评。他问道，布尔什维克为何把独立权交给芬兰资产阶级而不是乌克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时只是要求公民投票在波兰和其他德国占领区中实行，斯大林当时要求支持乌克兰苏维埃的原因何在？斯大林的答复是，他的观点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在波兰和其他边疆地区中苏维埃并不存在，布尔什维克也无意在那些地区建立苏维埃。而苏维埃已经在乌克兰存在了，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从苏维埃倒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去。这次代表大会对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观点予以通过。

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关于苏维埃国家宪法一般原则的动议，其中包括了修改另一个原则。这项动议规定联邦制仍在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在斯大林论及民族问题的著作中，同列宁一样，他对联邦制也不赞同。当时他争辩说被压迫民族有退出俄国的自由，但是如果它们留在俄国，它们就必须服从这个新国家的中央集权机构，因为高度的权力集中是现代经济的要求，也因为在政治上是不允许在同一国家中各民族存在屏障。这是斯大林在 1913 年的观点。到了 1918 年初，情况已经明了，苏维埃国家实行了联邦制，因为它经受不住所有小民族的分离，联邦制似乎就能最方便地平衡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需要和各小民族的要求。

但是，时机还不适合制定真正宪法。苏维埃政府还没有充分控制住国内局势。它刚刚被迫又进行了一次政变，目的在于巩固政权。1918 年 1 月初，立宪会议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会议对以下一些革命措施不予批准：建立工人对工业的监督，使

斯大林政治传记

银行实现国有化，把地主财产没收，呼吁立即执行曾由托洛茨基向所有交战国提出的和平谈判。根据克伦斯基所制定的法律选出了立宪会议，对十月革命前夕国家情绪的转变它可能反映不出来。解散它是容易的，因为它已无力集合任何部分的人民来对它进行保护。由于解散了它，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把俄国第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嫩芽消灭于萌芽状态。于是惟一的代议制机构和惟一的权力来源就只是苏维埃。

更为严重的危机发生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布尔什维克本来希望，整个欧洲燃起革命的烈火将结束这次战争，但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布尔什维克鼓励俄国和德国士兵进行战地联欢，希望以此来使德军受一些革命的影响，尽管如此，德皇的军队迄今几乎仍保持较好的战斗力。美国参战调动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以这三国也毫无意思去进行和谈。但是俄国的战斗已进行不下去了。它的伤亡惨重；它的军队的装备和武器极为低劣。新政府曾经发誓马上停战，它是否遵守马上停战的诺言，将成为对它评价的标准。农村中的革命又致命地打击了战场上的军队。农民们离开前线，涌回家去参加平分地主的庄园。列宁认为，他们用实际行动拥护和平。苏维埃国家只好请求单方和解。

只有根据德国的条件和平才能实现。以各种形式把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是条件的内容之一，反正德军占领了这些地区。但是，布尔什维克曾对缔结“不割地和不赔款”的和约作出了承诺。这曾经是他们的鼓动员经常谈论的问题。他们甚至更加激进一些，经常地说他们只同一个革命的德国政府和解而不同德皇的奴仆们媾和。理想和现实之间难解的分歧再一次发生。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列宁尽心竭力地要使他的同事们对绝对没有希望的局势予以理解，并劝说他们对和约予以支持。他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德帝国主义的勒索的目的在于挽救年轻的共和国。德国和欧洲其余部分的革命已经推后举行；如果这时德国武力又粉碎了俄国革命，那么它们的革命真的会还没长成就已夭折。只要苏维埃国家能够生存下去，即使代价是屈辱和表面上对原则的否定，最终也会对欧洲无产阶级起来造反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现在放弃的阵地还会再夺回来，因为他们将利用这个以高昂代价赢得反攻的时间，准备好再来一次一决胜负的战斗。

起初，列宁的同事们没有赞同列宁的观点。“以革命战争反对德帝国主义”是他绝大多数同事和追随者的主张。布哈林领导了主战的一派，后来左派共产主义者是对主战派的称呼。布哈林争辩说，缔和会暂时摆脱德国，使它能够去应付即将来临的内战。如果为了一己私利，就背叛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并对霍亨索伦帝国兼并外国的领土不置一词，那么俄国革命就毫无面子可言。即使苏维埃国家去从事很可能失败而招致毁灭的战斗，这也要强于在羞耻和背叛中生存。它的榜样将对别的国家恢复或继续战斗起到激励作用，这就类似于半个世纪以前巴黎公社的英雄范例。他们说，列宁为了生存要求布尔什维克牺牲生活的唯一目的。

当时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领导和平谈判，居于两派之上。他同意列宁的意见，从事一场革命战争对苏维埃国家而言是不可能的；但他也不反对布哈林的意见，认为他们如果接受和平条款，就会丢了面子。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对谈判进行拖延，希望此时德国革命会发生。他在惊愕和恼怒的德奥将军和外交家面前巧妙地进行了革命性的辩论，意在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使德国的颐指气使暴露出来，并把德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激发出来。但是他的革命宣传的收效不大，同时又必须解决那个生死存亡的两难问题。托洛茨基成功地说服中央委员会不再同意革命，同意他的“不战不和”的方案也随即出台。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证明这个公式是不切实际的。苏维埃国家必须在战争和平中选择。“脚踏两只船”，是对宣传者或新闻工作者的形象描述，但不适合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

斯大林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赞同哪一方呢？他不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告诫和革命道义的说教所动。他也不赞成为了欧洲革命就必须牺牲俄国革命的想法。然而，即使高度现实主义的列宁对这一想法也不敢轻易否定。但是，对于一个在巴库和梯弗里斯度过了大多数时间的人而言，欧洲革命是个模糊又遥远的观念，因而不会在苏维埃共和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发挥作用。他亲身帮助建立了这个共和国，它是一个明确又脆弱的实体。他对托洛茨基的立场也不赞同。有人认为，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向德国无产阶级的呼吁，将会影响前线力量的对比，斯大林对这种想法不置一词，或者只是表示嘲笑。他随同列宁及其小派别投票对缔和持赞同态度。列宁嘲笑左派共产主义者为了依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惜做尽蠢事。他把布哈林及其追随者比喻是波兰贵族说：“这位小贵族临死的时候手里拿着尖刀，摆出美妙的姿态，说耻辱的是媾和，光荣的是战争。他们用小贵族的观点讨论问题，而我却是用农民的观点。”没有人比这位格鲁吉亚农民的儿子更能理解这番话。

随后两个月中，辩论陆续发生在中央委员会、政府、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这些辩论中作用不大。但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所说的话

斯大林政治传记

已充分表明了他的思想：“如果遵循革命战争的口号，那我们就对帝国主义产生了帮助的作用。托洛茨基的立场站不住脚。现在西方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依靠可能性是不可取的。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那就会对我国的反动势力起到促进作用。……十月间我们谈论过反帝战争，因为当时有人向我们说，西方的革命会轻易地被“和平”两字掀起。……”他虽然同列宁一道投票赞成缔和，但他们两人论点的着重点却具有细小的不同。列宁像往常一样，对事实和情况的可能性一直予以关注，谈到西方革命运动缓慢的发展。斯大林虽然也理解事实，但对可能性却几乎不加思考——“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诚然，他还补充说，如果接受了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政策，“那我们就会把最坏的条件附给西方革命运动”，因而这就意味着他对问题的这一方面也是关心的。但是上下文反映出，这不过是布尔什维克一次不规范的用语。他否认西方革命运动的现实性是他的论点的关键所在，并尖锐批评了十月间破灭了幻想。

这场时时危及党统一的大争论经过多次起伏，在没有实现停战目的和德军迅速推进到彼得堡之后，乌克兰拉达军事上的软弱在苏维埃国家可悲地暴露之后，单方面同德军媾以及在列宁多次发出呼吁和警告之后，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人和一般党员才开始支持和谈。3月3日，索柯里尼柯夫代替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代表团首脑签署了和约。列宁并没有掩饰这个行动的意图。他比任何人都更直言不讳地谴责这一行动是“耻辱的”。他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同提尔西特和约加以比较，提尔西特和约是1807年拿破仑强加给普鲁士的屈辱条约，当时进步的普鲁士政治家曾经利用提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尔西特和约在国内作了彻底的改革，为普鲁士的胜利做了准备。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会发生革命战争。就在这一年底，德奥君主专制及其一切军事力量都毁灭了，从乌克兰一支革命化的德国军队撤退。因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也就随之不起任何作用了。

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争论，遗留下来许多复杂问题，带来了多方面的政治后果。左派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和解。虽然在当前的问题上没有成功，但他们却是党内的一种重要的情绪的反映，即一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不一致，一种不满于妥协和机会主义，而胜利的革命一直以来不止一次地被赶进这种妥协和机会主义之中。他们还代表了忠于最初原则一种天真无邪的堂吉诃德式或乌托邦式的原则，而对革命信仰的难以让人理解的纯洁性。这种情绪在一个阶段遭到了失败或被镇压下去，在下一个阶段又重现出来；而且形式、表达方法甚至代言人都不断变化。它将为布尔什维克思想带来长期麻烦。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所引起的一个更为特殊的后果是：宣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的终结。左派社会党人在3月中退出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动机是同左派共产主义者一致的，一部分也是因一般的民族主义思想所造成的。从此以后，政权就掌握在一党手中，一党执政的条款在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中消失了。但事件的进程就是如此：由于他们的合作者不对缔和的责任进行承担，布尔什维克就必须单独执政。他们虽然单独执政，但只对极右的内战发动者进行了镇压，并没有对他们的敌手进行镇压。只是1918年6月的时候，当内战已经全方位爆发的时候，才暂时查禁了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之中的某些成员同白卫军站在一边是此次

斯大林政治传记

查封的原因。同年 11 月，在孟什维克保证将在苏维埃政权体制内做一个忠诚的反对派的条件下，他们被允许恢复进行公开活动。

但早在 7 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由于左派社会党人的缘故就爆发了第一次真正的恐怖。出于阻碍和约的缔结和迫使布尔什维克继续对德作战的目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各布·勃柳姆金把德国大使冯·米尔巴赫伯爵刺杀了。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在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8 月 30 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列宁因此而受伤，另外两个布尔什维克领袖乌里茨基和沃罗达夫斯基则被刺身亡。托洛茨基也险些丧命。布尔什维克针对此正式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他们的自卫等同或强于他们遭受的攻击。可以从斯大林由察里津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一封信电报中看出当时的那种情绪，斯大林当时是察里津的人民委员。电文说：“得悉资产阶级的佣仆恶毒地对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领袖和导师列宁同志行刺，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决定对资产阶级及其走狗进行公开的、经常的、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予以镇压，以对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进行报复。”斯大林和察里津部队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共同签署了这份电报。契卡处于波兰籍的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之下，开始了不惜杀死人质的疯狂的活动。取缔了那个应对暗杀企图和暗杀行为负责的党。这就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所带来的情绪激动，这就是它的阴郁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斯大林对他在察里津说的话进行了实践。这个城市的红色恐怖以斯大林的名字为名，很快就成为流行于人民中间的一句俗语，类似于一百三十年前年轻的雅各宾党人富歇在法国里昂的暴行形成的当时的一句俗语。于是恐怖和反恐怖形成了不断的恶性循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争论还有一个次要的后果，它引起布尔什维克各个领导人的地位问题的争议。在道义上列宁获得了巨大声望。他所表现出来的与实践结合的逻辑和信念上的勇气，使他对党内流行的情绪能进行公开不赞同；而他说服人的惊人力量，使他制止了党内思想的摇摆。在十月革命中，他的作用还不大被全党和全国所看到，现在却能够看出他巨大的能力，即在精神和性格上他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优点。在危机期间，十月革命的“逃兵和工贼”季诺维也夫也支持列宁；而列宁对季诺维也夫就像当初无情反对他一样很快就忘掉了他们以前的纷争。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暂时显得影响力不大。他身上有一个缺乏某种平易的现实主义的重大弱点，而有一种夸夸其谈和矫揉造作的不好的习惯，这在某些情况下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在道义上的权威仍仅居于列宁之后。他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军事人民委员，由契切林接替担任这一职务。在他任军事人民委员时，他作为红军的创建者，又名声大振。但是其他领导人对于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危机中的立场一直难以忘怀。多年以后在列宁继承人的尖锐斗争中，他还因此而遭到他们的反对。

斯大林的地位也相应地有所提高，虽然自从联合政府不存在以后，布尔什维克核心内阁的三人执政也垮掉了。由于斯大林没有登上讲坛在公众面前对和约进行支持，所以他没有赢得公众的广泛认同。但是在同列宁一起反对“夸口的骑士”和超革命的梦想家的斗争中，他甚至成了列宁身边不可或缺的人。“利用这个喘息时间”，“加强自己的力量”——列宁是这样对他的追随者进行教导。在这种平凡的尝试中，他相信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是值得信赖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还没有完全付完喘息时间的代价。共和国对德军可能重新发动战争仍表示不安。和约必须一条一条地屈辱地履行。有一条规定乌克兰脱离俄国。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在和约签订后不久的1918年4月2日，斯大林就敦促苏维埃政府立即同乌克兰拉达开始和谈，因为乌克兰拉达同苏维埃国家仍交战。人民委员会对此犹豫了长达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它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因为刚刚在签订和约前，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发动了一次政变，组成了一个政府反对拉达。斯大林亲自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甚至指示它派自己的代表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来进行商谈。他现在的动议就等于对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不予承认而赞同乌克兰拉达。人民委员会必定认为这个权术超出了某种应有的限度，因而在一个月中都将它搁置起来。与此同时，德军司令部命令部队对乌克兰全境实行占领。4月27日，人民委员会终于通过了同拉达谈判的决议，并指定斯大林为苏维埃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在库尔斯克同乌克兰的特使进行会谈。还没开始谈判，消息传来，德军司令部把温和的社会主义拉达赶下了台，由以保皇派海特曼·斯柯罗帕茨基为首的傀儡政府取代了它。除乌克兰之外，德军这时把黑海周围俄国的纯工业区占领了，这些纯工业区包括塔甘罗格和顿河上的罗斯托夫，以及克里米亚。

于5月5日列宁和斯大林命令乌克兰前线停止战争，但为时已晚，不能对形势发展产生挽救作用。斯大林从库尔斯克返回莫斯科，同政府协商这一问题。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应不应该同斯柯罗帕茨基傀儡政府谈判，这一傀儡政府目前在乌克兰不得人心。斯大林对此感到无所谓。他在同《消息报》记者的谈话中说，“一般说来，暂时乌克兰的政变没有不利于和平

斯大林政治传记

谈判。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和乌克兰政府之间缔结和约的可能并没有因乌克兰政变而消失。”他继续谈到，拉达企图在德帝国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采取中间立场被事实是无效的。斯大林含蓄地表达了这个公开的反革命和德国傀儡斯柯罗帕茨基，甚至可能证明是一个更好的和谈伙伴。他很快就从这种权术中受到惩罚。

由于德军占领了俄国的所有西部边疆，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的工作范围大幅度地缩小到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甚至在高加索，他的作用也不大。格鲁吉亚被德军占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对此并没有抗议。土耳其人占领巴统。高加索的事件使斯大林坚信，弱小民族处在德国军国主义铁锤和布尔什维主义铁砧之间，连保持名义上的独立都不能达成。当布尔什维克授予它们自决权时，它们就相继成了德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斯大林暂时性地关注居住在俄国东部的欧亚边境之间那些落后的、未开化的部族。要使苏维埃体制渗入那些种族和部族内，这种渗入要易于使俄国东部更为进步的民族苏维埃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更加困难。鞑靼人、土库曼人或巴什基里亚人的政治愿望是不具有复杂性的。在他们之中分离倾向还不是很强烈。然而，要把中央政府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政策带入他们前资本主义、前封建主义、甚至是游牧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1918年5月中，斯大林首次企图操办这件事，他主持成立了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一部分。

他刚刚开始工作，就被迫停了下来，因为苏维埃政权陷入了新的危险。1918年春夏，白卫军的巨大的胜利一时之间使

斯大林政治传记

苏维埃政权的势力范围只能达于原来莫斯科大公国的区域内。在东边，由前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联合白卫军，在几个星期中，就迅速地把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游的一些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中心占领了。新组成的鞑靼—巴什基里亚共和国也处于叛军的占领之下。8月间，白卫军占领喀山，对莫斯科产生了直接的威胁。在南面，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兵企图向北推进，以便联合在喀山的白卫军。在推进中，他们把察里津和莫斯科的铁路联系切断了。苏维埃首都同北高加索失去了联系，而在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丢失后，苏维埃政权的惟一粮仓只剩下北高加索。于是莫斯科和彼得堡工人的面包下降到每天约一盎斯的配给量。同时，在西线作战的协约国军队也开始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行动。在西伯利亚美军登陆。英军占领了北面阿尔汉格尔，在南面占领巴库了。正当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力量极端削弱时，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并企图谋杀列宁。

在这极为危急的时刻，很少有政府成员仍留在莫斯科，他们大都赶往前线最重要的地段去。列宁同少数技术助理在克里姆林宫对整个斗争进行指挥，同现场的人们经常保持联系。派出两个人去解救形势最危急的地方。为了保住首都，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乘坐装甲列车——它已成为内战中的传奇，到喀山附近的斯维亚斯克。斯大林则在近一营的武装警卫的陪同下前往伏尔加河上游的察里津，以为解除首都的饥荒作努力。他将安排谷物从北高加索运至莫斯科。他的任务实质上是不具有军事性质的，原先打算时间不会很长，然后他就更往南到巴库去。但是预想不到的情况使他在察里津的时间拖长了；而且他呆的时间越长，就越深深地陷入指挥南线作战和同托洛茨基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争论中。最后，他到察里津的旅行对他一生的事业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在他到达后的6月7日那天，他向列宁报告了他的第一个行动。他发现在伏尔加地区盛行投机，于是在察里津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是他第一个行动。负责贸易的一个苏维埃官员处于被通缉中。“请转告施米特不要让坏蛋再来了。”一个爱好管制和镇压的专员这样说。不过由于这一切情况，也许管制和镇压有它的合理性。对于革命遗留下来的极端民主的混乱状态他是十分厌恶的。“许多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热心过问破坏了铁路运输。”在布尔什维克罢黜了工业中的行政人员和旧经理人员之后，起初企图由委员会来监督工业生产。他们现在又要把那种极端民主而又运转不灵的制度废除掉，重新建立一个制度进行个人管理和个人负责。左派共产主义者激昂地对这种改变进行反对。无疑斯大林不再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他派专员去想办法消除运输中的混乱状态。

在察里津一个月之后，他请求把南线的特别军事权力授予他。这是因为克拉斯诺夫哥萨克兵的军事行动使得向莫斯科供应粮食已成为一种主要军事行动。斯大林在答复列宁关于社会革命党爆发叛乱的通知时，他向莫斯科保证说：“将做好准备来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进行预防。请放心，我们将坚定地执行。”察里津和北高加索农业地区的铁路“还没有修好。尽可放心，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我们对任何人也不会宽恕，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有可能运到。……”在他的这封信里，混合了实际工作的严肃性和一种奇怪的含意，目的是用来表达无情的决心。

同样在这封信中他要求授予他军事权力，第一次含蓄地表

斯大林政治传记

达了他同托洛茨基的冲突。信里有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机敏灵活，准备充分，线路肯定仍旧畅通；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军事专家的作用，而是由于他们的意见被抛弃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了著名的察里津争吵。

又过了几个月，在旧军队彻底被消灭之后，托洛茨基开始了红军的建立，起初是志愿兵，后来工人和农民也加入红军。由于这支新军队缺少军官，托洛茨基就让一些沙皇的旧军官对新编的师和团负责；但是，由于这些前军官的政治不可靠性，他又派去一些共产党员作为他们的政治委员。“军事专家”的任务是训练军队并领导他们作战，而政治委员则对这些军官的行动进行监督，如果需要的话，就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他们的叛变，并在士兵中间开展“政治教育”。每一个军事命令都必须由指挥员和政委两人都同意了方可执行；指挥员和政委都要执行军事纪律。起初党的领袖们忧心忡忡地怀疑这惊奇而大胆的试验，对此左派共产主义者给予最猛烈的反对。列宁原来也是怀疑这个试验的可行性，只是在听到托洛茨基说，四万名“专家”已经受雇于红军，如果取消他们，共和国的整个军事机器面临着瓦解的威胁，他才打消了怀疑。他深刻地记得这个试验的精明之处，所以通过自己的影响来对托洛茨基进行支持，用已经崩溃的旧制度的残砖剩瓦来建造社会主义是对他的这个行动的形象描述，而这种建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试验虽然必须进行，但进行得非常曲折。经常听见关于前军官叛变的事例；而这些经常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些军官对于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胜利的机会越发不抱希望。在内战的尖峰时刻，团、师甚至军的一些指挥员都脱离苏维埃军队投到白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卫军去，有时还把他们的队伍一起带去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列宁者的口实在每一次政变中都得到加强。从连队一直到总司令部的各级指挥机关，都被一片紧张和怀疑的气氛所笼罩。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员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这是因为政治委员经常表现出一种粗鲁的、不灵活的怀疑态度，而这种怀疑态度伤害了军事指挥员的尊严。这个问题还不是大受争论的全部。托洛茨基曾经打算组成一支正规军，其中包括许多松散的赤卫队和游击队，这支正规军具有由中央指挥、管理和供给的有效制度。许多红色游击队领导人阻挠这一改变，这些在内战中成名的人，要他们由保守军官领导他们，这自然是不乐意的。更为老练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在原则上对军事上的中央集权表示不满。他们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提醒说，他们两人在夺取政权前曾作出保证，苏维埃国家将要永远地以人民卫队取代常备军。然而，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的许多保证，这一诺言也没有实现。

这个新军事政策斗争最剧烈的中心是察里津。伏罗希洛夫是司令部设在那儿的第十军指挥员，他以前当过工人，十年前和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中一起工作过，领导过石油工人的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伏罗希洛夫本人是一个军士。布琼尼是当地的另一个指挥员，也曾被任命为正规骑兵中的一个军士长，布琼尼是一个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第十军的政治委员是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一到达后，就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往日战斗的回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第十军的司令部几乎是旧的巴库委员会的翻版。光是这点，对察里津集团斯大林就有同情的意思，即使他也批评他们的行动。

察里津集团对前沙皇军官、现南线司令员西丁的命令不予

斯大林政治传记

服从。参谋部从南线司令部不断地向总参谋部用无线电报告了对伏罗希洛夫不服从命令的怨言，再由总参谋部向托洛茨基报告。托洛茨基于是多次劝说、训令、命令和告诫察里津总部。由于几起背叛事件发生在当地的“军事专家”之中，这使“军士反对派”的顽固性更为增强了。

即使考虑到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的老关系，人们也不理解斯大林为什么对这些反对派予以同情，初看起来也是令人不解的。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对于维护中央权威和纪律他一直是做得很好的。对于混乱和半无政府状况采取严格纪律予以制止，这是人们称赞他的品质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他存心蔑视察里津的权威的原因何在呢？察里津集团不相信出身旧知识分子或“绅士”的前军官，这种心意正好类似于格鲁吉亚农民出身的特派员的心意。不能说争论双方中有绝对对错之分。例如，敦促最高司令部组织一支红色骑兵一直是布琼尼的做法，这支红色骑兵将以大规模的密集队形，甚至单独一个军来进行使用。军事专家对这位前军士长富于想象力的主意持漠然态度，这种情况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另一些专家否定以密集队形使用坦克的建议。托洛茨基起初对布琼尼的主意也持反对态度，因为他担心大量的哥萨克必将加入骑兵当中。作为俄国天生的骑手，他们不太赞同苏维埃政权。只是过了一段时间，托洛茨基才发出命令：“无产阶级骑上马去”，这一命令使布琼尼的这一主意得以具体化，并创造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在内战中最富于浪漫色彩。这个传说的内容是关于红骑兵及其指挥员布琼尼的。这时，在察里津这位前军士长也对总参谋部和军事人民委员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而他发现斯大林很愿听他发泄的不满。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但是，斯大林保护察里津集团主要原因在于他同托洛茨基早期的不友好关系。在接下来几年里，公众丝毫不知道这些，因为这种敌对以激烈的形式发生在政治局大门里。即使在政治局内，这种敌对的表现列在列宁的监视下还是比较谨慎的，以致于新参加的人对于这种敌对的凶猛和剧烈程度都毫无觉察。甚至在同社会革命党的联合破裂以前，关于政府的设立就引起了他们之间的敌对。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内阁。在三人中斯大林资历最浅。列宁和托洛斯基名声很高，并受到人民的爱戴。一般而言，连字符把他们的名字都连结在一起的。列宁 - 托洛茨基的政府是人们对这个政府的通称。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也都称这个党为列宁 - 托洛茨基的党。这个称呼起初在俄国国内使用，后来在全世界都叫开了。在代表大会和其他会议上这两个人一出现时，迎接他们的总是热烈的欢呼。这个刚成立的苏维埃国家的热情都自发地集中在这两位领袖身上，无需官方的捧场。但是三人中斯大林却还名不见经传。他的权力强烈地反衬出他的默默无闻，即使一个不太具有野心和骄傲的人，对此也是会感到愠怒的。这个人尽管经历不寻常，却从未达到自年轻时就设下的理想，即出人头地；这个人即使受到提升因而将前途无量，他那种反常的自卑也会经常显现出来。这种情况的确让人感到难受。对于列宁的优越地位他没有什么看法，因为他视这种情况为理所当然，就像他们两人年纪的区别一样。但他却对托洛茨基的优势感到愤然。仅仅在几年之前，斯大林还在列宁的全力支持下轻蔑又猛烈地对托洛茨基进行攻击，“爱吵爱嚷的假装的大力士”和“取消派的伙计”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蔑称。他绝望地看到他被他托洛茨基压下去了，他不得不看到人们高呼托洛茨基为这

斯大林政治传记

次革命的战士，不得不听到热心的布尔什维克群众大声赞扬托洛茨基，这种情况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破裂、重新调整政府和三人执政结束之后，他必然对此深感不服气。这时，斯大林在政府中的影响突然消失了，就像它兴起时一样的偶然。随着内战的发展，军事人民委员的重要性随着托洛茨基影响扩大而不断增加，他成了政府里的明星。斯大林的怨恨和嫉妒情绪是在察里津开始产生的。

因此，一个微不足道的缘由引起了俄国历史上的这一深仇大恨。轩然大波源于小小的怨恨和嫉妒，从表面上看这几乎是矛盾的，但这一事实却不容否认。诚然，在后来的日子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更为广阔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方面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个人之间的敌对，还达不到这场重大戏剧的那种规模；这场重大戏剧渐进地重新塑造了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国际的整个生活。但是在最初阶段，这种敌对只限于两人之间，因而它是狭窄的。这种敌对在开始时并不特别和过分。这种个人间的敌对在任何国家的同一政党和政府领袖人物中可以经常见到，因而成为一些群众报纸闲话专栏的话题。即使对他们生平进行研究的博学者，也没有看到此时这位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这位军事人民委员之间原则性的矛盾。他们两人都为了共同的理想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心尽力工作。两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地促使革命朝成功的方向发展。但作为普通的人，他们在完成其革命使命时，也或多或少是有个人的野心和激情。

并不仅仅是斯大林一人与托洛茨基关系不好。老的地下工作者，即列宁说的职业组织者和革命家，在内部都十分团结。他们很多人认为，托洛茨基不过是一个刚刚加入的新手。他们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共同感情隐隐地被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触犯了。像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新人一加入了党的组织，就对党的追随者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这对于任何党的核心组织都是一件新鲜事。的确，当托洛茨基于 1917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加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党当时还没有完全掌握政权，而且托洛茨基是在“七月事变”中参加党的，那时党的所有敌人把它逼得走投无路，不晓得接下来是失败，还是成功地夺得政权。托洛茨基的加入就使党暂时恢复了渐渐消退的自信心。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在内战危险的威胁下又重新团结起来，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未来完全可以依靠的对象只能是军事人民委员的成败。事件本身的力量促成了捍卫这个核心组织。但是总有不少委员会的人对那种宿怨久久不能释怀，特别是在新仇加旧恨的条件下，很容易转而反对托洛茨基。

正如斯大林所预想，粮食从北高加索运到了莫斯科。因此人民委员会对于它派到察里津去的那位特使表示由衷的感谢。斯大林第一次不很坚定地要求给予他特别军事权，但没有被批准，于是他在 1918 年 7 月 10 日给列宁的信中以较为坚定的语气又一次提出了这一请求。只是到了 1947 年才第一次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他在信中对托洛茨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也包含着对列宁的不满。他说，托洛茨基得益于把当地人派往北高加索和顿河，如果没有那样做“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化为泡影，我们对这个边区的控制权将会彻底消失……从工作利益着想，军事全权必须授予我。我以前曾提到过这一点，但是没有得到答复。好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主观地，不经手续形式撤掉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职务。……当然，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我也仍然去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这一行动。”

从技术上来说，斯大林对军事的干涉是违法的。他要求总部未经他和伏罗希洛夫同意不能作出任何任命，这同样也不属于他的权限之内的事。但是，现在粮食问题和军事行动已经分不开了，而且从斯大林方面看，作为党的一个高级领导和政府的一个成员，他有权无视自己的军事正职而按照自己的决定去做。托洛茨基则坚信，因为斯大林是隶属察里津总部的，他对最高司令部应采取服从态度，不应该利用自己在政府或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对军事权威进行破坏。托洛茨基的这一主张虽然在技术上成立，但在心理上却不成立。斯大林强烈的等级观念在统治集团中已存在，他是不愿意屈服于他老朋友的立场。列宁小心谨慎地不去激化这场争吵。他高度评价了两人的工作，而且急于把他们两人之间的摩擦消灭掉。他没有把斯大林那些最冒犯人的信件给托洛茨基看，也没有向斯大林转述托洛茨基对他的批评，他企图使两人关系不那么坏。后来在托洛茨基同意的条件下，斯大林得到了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利。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让列宁失望，采取措施来使中央司令部的权威增强了。

详细地来研讨察里津的争吵是无聊的行为。反正两人的摩擦没有在列宁倡导的妥协中消除。命令、威胁、抱怨和训诫的电报继续在莫斯科和察里津之间传发。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份命令的批示是：“不理它。”9月，白卫军被伏罗希洛夫赶过了顿河，斯大林向人民委员会传达了这一好消息说：“敌人被彻底击溃……察里津局势已趋于平稳。进攻在继续进行。”不久以后，在前往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又同列宁联名打电报祝贺察里津前线的英勇部队。但是，这些电报中的自信调子是没有

斯大林政治传记

稳固立场的，因为察里津很快被白卫军所包围。在托洛茨基一再的抱怨之下，斯大林才被召返莫斯科。托洛茨基给列宁打电报说：“我绝对坚持召回斯大林。尽管有极多的部队，察里津前线也越来越糟糕。伏罗希洛夫的能力只可以对一个团进行指挥，而不是一个有五万人的军。然而，如果他能够随时把情况汇报给南线军司令员西丁，我将让他指挥第十军。察里津甚至到现在还不来汇报情况……我曾要求他们一日两次过来汇报侦察和行动情况。如果明天他们还不来汇报，我将把伏罗希洛夫押送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将在军事命令中把这一事实予以公布。”托洛茨基在见到伏罗希洛夫时又重复了这一威胁，伏罗希洛夫最后同意按托洛茨基的要求来做。

托洛茨基不看好那位未来的军事人民委员和总司令的能力，原来的大多数苏联将军也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而且在1941年得到了证实，当时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在指挥对德战争中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时，莫斯科召斯大林速归，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他的态度进行解释。他精明地不与“军士反对派”往来，并至少在表面上同托洛茨基不再对峙。1918年10月11日，在白军刚刚重新占领察里津以前，他被派返察里津。几天之后，白军再次被击退，而且这次白军是彻底地失败了。

随后关于究竟察里津的此次胜利应归功于谁的争论没完没了地展开了。托洛茨基认为，胜利的桂冠应该归诸南线的司令部，因为它的部队从外面突击解除了对察里津的包围圈，在三十年代大清洗前大多数苏联将军都持这一看法。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则认为胜利应归功于他们。这一争论可归为许多无聊的军事争论之一，没有必要去加以解决，而且它的意义被它的政治背景扩大了。克里姆林宫驳回了察里津集团的主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张，因为正是在察里津脱离了白军的包围之后，列宁最后对托洛茨基的要求予以批准，把斯大林从南线召回，让托洛茨基有足够的自由同伏罗希洛夫去打交道。多年之后，这一争论又重新出现在察里津集团内部，他们的主张是斯大林军事传奇的组成部分；在斯大林对最高权力进行追求的更为广泛的要求中，这一部分虽不重要，但意义却很大。这一事件后大约五年，察里津被斯大林格勒取代。1942年，当斯大林决定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和市内进行二战中的一场决定性战斗时，所以他必须对现实形势的战略仔细考虑。另外，他也是受到一种所谓“察里津定影法”的鼓舞，因为在历史面前，他第一次的传奇被他创造的第二次更加接近于事实的胜利所维护。

到1918年夏末，莫斯科东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在东面的威胁存在的时候，总参谋部不看重南线。然而10月的时候，捷克人已被赶回乌拉尔，托洛茨基开始重点关注南线了，他不容许有因素干涉他的战斗命令。于是南线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不能并存，其中的一人必须走，而走的人就是斯大林。列宁尽量从委婉的语气宣布这个事实。他派共和国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去南线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他们乘坐的是礼仪很周到的专车。这一事件是对列宁处理人事问题的特点的反映：他深刻的了解斯大林的弱点，所以非常小心地避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触犯斯大林的虚荣心和敏感部分。托洛茨基却不具有列宁的特点。他看轻他的对手，没有注意到他的野心，几乎每一步都触犯了他的敏感部分和虚荣心。这是他的本性所致，而不是存心的。载着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到莫斯科去的火车在途中遇到了载着托洛茨基到察里津去的火车。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精心安排之下，在托洛茨基的车上这两个敌手见面了。托洛茨基说，斯大

斯大林政治传记

林以温和的语气要求他对“察里津的孩子们”宽松一些。托洛茨基尖刻而傲慢的说：“革命又不能等待，否则会毁掉革命的孩子的成长。”随后，伏罗希洛夫就从察里津返回乌克兰。

恰恰在革命一周年前，斯大林返回莫斯科。他为《真理报》写了一篇简单又乏味的短文：

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始至终鼓舞着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住的地方是彼得格勒维波尔格区的一个秘密住宅里，10月24日傍晚斯莫尔尼方面请他去领导运动。有关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的完成都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导的。确定的是，全党首先和主要应该对托洛茨基同志表示感谢，他使卫戍部队迅速地向苏维埃一方投降，并效率极高地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组织。

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写成三十年之后，斯大林评价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听起来带有一种荒谬的颂扬的意味。作者在1947年出版的《全集》中没有包括这篇文章。在最近二十年来，这篇文章从没有被苏联的历史学家和作家引证过——斯大林写的文章变成极危险的异端邪说。但是在进行文章写作的时候，仿佛真是一种颂扬。阴险地贬低托洛茨基的作用正是它的目的所在，因为它没有完全按照事实，只把托洛茨基描绘为执行列宁思想的人。这是当时斯大林最大程度地所能发泄其怨恨；他只能用隐于花束中的一根刺来伤害一下他的对手。

俄国革命爆发一年之后几天，奥地利和德国国内也发生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经历四年多之后宣告结束。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瓦解。工兵代表委员会在柏林和慕尼黑、华沙和里加产生了。各战败国的政权被社会主义温和派所掌握。布尔什维克坚信，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标志着这个过程的结果；而极左社会主义者很快推翻了社会主义温和派的政府，克伦斯基的政府在俄国被推翻也是同样的情况。只要几星期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几个月，俄国革命就将不再是孤立的；就将奠定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先进的、工业化的和文明的西方国家将领导一个把“落后的、半亚细亚的俄国”推向更高的文明的雄伟的运动，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都沉浸在幻想中，怀着不安的希望，对西方发生的事情予以关注。对于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柯仑泰、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而言，西欧是他们曾居住多年的地方，他们预见到了事情发展的趋势，并对本国的人民进行解释。俄国高度注视着西方。

在十九世纪，欧化和斯拉夫化的分歧是俄国精神和政治生活中一个最大的分歧。也就是说，有些人努力在俄国发展欧洲文明；有些人则努力使俄国发展自己的文明：或者是从西欧独立出来，或者就是明显地对西欧地不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属于西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主义把两种倾向结合起来。早在1913年中国革命的时候，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他认为现代文明最进步的特点是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他描述西方处于帝国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控制下是“落后的”，而东方因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则是“先进的”。由于列宁运用这一标准，他可能被说成是代表“东方”倾向的，虽然他的东方倾向不同于斯拉夫，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是仅仅限于斯拉夫民族或俄罗斯民族，有色人种、觉醒的殖民地民族都被包括其中。但是列宁在多种意义上来说是倾向于“欧化”的。列宁认为，东方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其进步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即是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三者的辩证统一。而且，他认为东方光靠自己不能获得解放。实行工业化和更高度组织的西方，当它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之后，是注定要对东方进行领导的。他思想中的这两种因素，按照情况的不同，交替着起主导作用。现在当欧洲出现革命曙光的时候，列宁主义中的“欧化”因素更为增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匆忙组建了基于布尔什维克和西欧社会主义极左翼之上的共产国际。

斯大林是如何看待这一新形势呢？他对西方的事件很少涉及。因为这不属于他的领域，而是那些曾经侨居国外的领袖的领域，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对西方问题的长期研究是他们谈论西方的基础。斯大林有两篇文章对于这一讨论作出了贡献，这两篇文章的名字为《不要忘记东方》、《光明来自东方》。斯大林曾经生长在俄罗斯、鞑靼、波斯石油工人和格鲁吉亚这些欧亚交界国家的农民之中，自然会倾向于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东方”。由于这两种倾向中谁主导地位还不明显，因而就更值得注意这一事实。当时对于这两者之间的不合谐没有一个领袖人物意识到。在那个阶段，不能确切地说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中已经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东方的因素。他的偏爱源于其个性。他认为：“在西方，应当首先打断帝国主义锁链，这些锁链是欧洲打造出来扼杀全世界的。”但是他只是偶尔发表这种对于西方革命重要性的讲话，它的意思仍在于对他的提醒加以强调：不要把东方忘了。在他的话里存在一种对于这时西方完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的政治上嫉妒的味道：“此时，遥远的东方及其数亿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被不自觉地遗忘了。”他在一次对伊斯兰教民族共产党员代表会议发表评论时说：“必须对这一真理彻底领会：谁忘记东方谁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他的另一篇文章谈论布尔什维主义在乌克兰的又一次蓬勃发展，在结束时说：“东方是光明的来源，蒙昧和奴役来自帝国主义吃人者所盘踞的西方。摧毁这个策源地是任务所在，对此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欣慰欢腾。”这是一个稳定地呆在克里姆林宫的巴库委员会人的大声疾呼。从布尔什维克战略可以看出，他对东方的重要性的强调，肯定是合法的；而他又没有明确地“反西方”，所以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对。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比起革命的社会主义西方形象来说，西方形象更接近于“蒙昧和奴役的策源地”。后来，革命的社会主义西方形象甚至变得更加模糊了。例如在英法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进行干涉的时候，斯大林不公平地把英国国内反对干涉的人说成是在玩弄不正当权术，其本质目的为了进一步反对苏维埃俄国。然而正是这些英国国内反对干涉的人，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对运往波兰的军火实行了禁运。

斯大林的这些说法同托洛茨基的《给红色陆军和海军的命令》相比，是很有趣的。托洛茨基在1919年10月24日发布了他的命令，此时尤登尼奇向彼得堡推进而俄国国内反英情绪最强烈。这个命令的内容是说：

革命战友们，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存在英国敌视我们的阴谋诡计。从英国运来了反革命部队轰击你们的大炮。你们在南线和西线的申库尔斯克和奥涅加兵营中发现的军

斯大林政治传记

火产自英国。你们俘掳了英国装备的敌军。英国的飞行员和高炸弹炸死和炸伤了阿尔汉格尔和阿斯特拉罕的妇女和儿童。英国军舰还对我们的海岸进行炮轰。

但是即使在目前最强烈地反对英国走狗尤登尼奇的关头，我还要号召你们的是：绝对不要忘记有两个英国并存着，一个英国是自私、暴虐、贪婪和嗜血的，而另一个英国却是劳动的、高尚的、伟大理想的和国际团结的。那个证券交易所的英国、寡廉鲜耻的英国对我们是反对的。劳动的英国是支持我们的，它的人民，是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由此可以看到，在那些日子里，多少不同的声音混合进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声音！东方的声调目前要远远弱于西方的声调，但未来东方声调却是占主流的。

在1919年内战达到了高潮。这一年，西方国家对俄国干涉也达到了顶峰。年初，高尔察克的白军再一次由东面推进，占领了皮尔姆。刚刚把高尔察克打败，邓尼金又从南面卷土重来，占领了库尔斯克和基辅，对莫斯科造成了威胁。差不多与此同时，在5月间，尤登尼奇进军彼得堡，希望在城防司令部“第五纵队”的帮助下夺得该城的统治权。斯大林被派往彼得堡，负责对它进行维护。他对阴谋者予以揭露，领导了军事行动，为苏维埃政权保住了这座城市。10月间，尤登尼奇再次进军彼得堡，他率领军队已经进到了城郊。这次是托洛茨基打退了叛军。

10月时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看起来白军马上就要占领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了莫斯科和彼得堡。英国和法国完全支持白军。高尔察克自封为俄国的独裁者，巴黎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正式承认了他，进入黑海的协约国海军大力支持邓尼金。敖德萨被法军占领。尤登尼奇得到了英国海军在芬兰湾的帮助。干涉的两个最坚决的倡导者是英国的邱吉尔和法国的克里蒙梭。但是不论是白军的将军们，还是西方国家，都没有协调好他们的行动；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对敌人个个予以击破。1919年11月，白军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宣告失败。苏维埃政权实际上获得了这次内战的胜利。它的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在南面对弗兰格尔作战。它发生在1920年俄波战争之后，规模较以前几次要小。11月，红色莫斯科举行活动庆祝了它的胜利，并授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红旗勋章。

在整个内战中，而且一直到1925年，红军的负责人都是托洛茨基，人们称他为胜利之父。斯大林虽然也获得最高勋章，但他的名望在内战结束时比起战前也没有很大提高。据许多历史学家和事件参加者的回忆，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如果只根据这一事实就最后判定他的作用，那也是错误的。根据当时的秘密军事通讯，他的作用不只仅是托洛茨基当权时一些文章和著作中所说的那么小，虽然也没有斯大林时代一些官方历史所夸大的那样。

已经出了一系列书来阐释关于当时战略问题的争论，目的都在于使各个要求掌权者的传奇性得到加强。其实，任何一个领袖都会犯错误。他们每个人在一些场合作出正确决策，但在另一些场合又决策错误。托洛茨基过于审慎地反对高尔察克的战略。他拒绝越过乌拉尔去追击由于失败而陷入混乱的高尔察克军。只是在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人的强烈要求下，红军才开始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追击混乱的高尔察克军，并消灭了俄国亚洲部分的大部分白军。另一方面，经后来事实证明，托洛茨基反对南面邓尼金的计划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建议以顿涅茨煤矿区为基地进行攻击，因为这个区域的居民支持红军。但是，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支持的总参谋部，宁愿在反革命哥萨克居住的顿河区进行攻击。就像在十月革命中一样，托洛茨基现在也对内战中社会和军事因素的互相影响有敏锐的观察力。没有同事重视他的计划，他们直到邓尼金推进到了奥勒尔，才同意了托洛茨基的计划。还有，当尤登尼奇第二次进军彼得堡时，列宁对进攻者的力量作出了过高的估计，而且为了加强对莫斯科的防御，他主张不再坚守彼得堡。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坚决不赞成这一建议，而且他们的反对被事件证明是对的。因此，这些争论并不是政治或战略原则的敌对的反映，而只是为了更好发挥军事优势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引起来的。

斯大林从各条战线发出的秘密信件和报告，大大不同于他在公开谈论与报纸文章中所表现的情况，两者有着鲜明的风格上的对比。他的弱点在讲坛和报纸上十分显著。他的语言想象力十分不足，一般以政治为生的人很少像他这样。就像托洛茨基说的——他的语言阴暗、干瘪、无趣，“使人昏昏欲睡”。他的论述缺乏逻辑性，充满了散漫而重复的地方。他的比喻和隐喻照例仍然不准确。幸好他很少使用比喻和隐喻，在差不多二十年的写作中，他用过的比喻和隐喻加起来不到二十个，随后的三十年中也没有再用多少。他往往长时间的使用一个比喻，单调无味地重复它，由此看来他的想象力十分狭窄。在面对听众的时候，他无法使自己感动更无法激起群众的热情。缺乏文学和演说的才能并不是惟一原因。这个人一在公众面前就感到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不自在，甚至连声音也变得极为不自然。他的做作的态度和风格，完全没有什么影响力。

但是，在私人通讯中，他完全不同了。他的风格经常是简洁明了的。他是以一个大官员身份在进行私人通讯，因此在公众面前那种拘谨的表现消失了。令人厌烦的重复、用得不恰当的比喻和稀奇古怪的矛盾，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在这儿他是一个清醒的调查员、视察危险地区的工作者，使用直接了当和有条有理的词句报告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人们几乎没看见他休息过，因为他一到达目的地，就投入到冷静而清醒地观察发生事情的现场这一事情当中，军事机器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司令部、党委和地方苏维埃等的混乱情况也是他观察的目标。他把自己对事件的看法立刻向莫斯科报告。接着他就开始对周围的人批评与指责，继续进行调查，将当地或最高司令部中新的缺点或疏忽发掘出来。最后他把他信赖的一部分人组成一个紧密的小集团，把一部人提升，撤换一些人，把另一些人送上军事法庭进行审查，安排粮食供应，再次向莫斯科报告事态的发展。几乎在每一封信的末尾，他都要批判一下托洛茨基。

他从皮尔姆、彼得堡、斯摩棱斯克、谢尔普霍夫等地发出函电的大致内容就是这些，应该在内战史中而不是在他的传记中总结这些内容。1919年初对皮尔姆的视察也许就是他最著名的一次视察。在新组成的政治警察头子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陪同下他们一块去的，调查新近第三集团军被击溃的原因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7月12日，当他返回南线总部的时候，整个战线向前推进的趋势已十分明朗了。在几个星期中，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的集团军就挺进到华沙的郊区。但是由于交通线拉得过长，士兵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体力已经透支，预备队已经耗尽。法国魏军刚将军对皮尔苏茨基进行帮助，于是皮尔苏茨基开始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南翼发动了反攻。苏维埃国家最高司令部立即下达命令，命令南线部队的司令员布琼尼和叶果罗夫从华沙往北进攻，以便粉碎皮尔苏茨基对图哈切夫斯基南翼的反攻。但是南线部队的司令员自有主张。他们的打算是在图哈切夫斯基进入华沙的同时占领里沃夫。这就类似于过去在察里津的情形，无视中枢发出的命令，斯大林鼓励叶果罗夫和布琼尼突袭里沃夫。于是战局急转直下。波兰人赢得了在维斯杜拉河上的胜利，此时，斯大林、叶果罗夫和布琼尼才派出军队，急速前往对图哈切夫斯基进行救援，但已经为时太晚，红军在华沙失守。

接着，他们开始争论这次失败应该归咎于谁。图哈切夫斯基和托洛茨基对南线司令部进行指责，责备他迟迟不肯把进攻方向从里沃夫转移到华沙。斯大林又老生常谈地说出他的指责，托茨洛基和最高司令部在战线后面没有提供坚强有力的预备队。双方各执一词，其实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深入波兰的那个决定，而不是由于攻势中的错误。

在波兰战争结束和赶走了弗兰格尔里爵的白军之后，和平终于降临俄国。苏维埃政权这时已经固若金汤，同样执政党已掌握政权，领袖们都在对自己的胜利进行夸耀。但是残破不堪、饥馑和瘟疫却流行于全国。

由于紧急情况一再出现，使得执政党的行动与最初的打算不一致，矛盾重重，力不从心。布尔什维克曾经对废除警察和常备军下过保证。但现在像斯大林在皮尔姆的报告中所说的，政治警察在全国很多地方“成了惟一代表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力

斯大林政治传记

量”。起初，布尔什维克企图暂时容忍反对派。在苏维埃和工会的各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发言人都能自由尖锐的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言论自由虽受限但仍旧很广泛。公开的争论仍在执政党内进行着，要充分而认真的讨论各方面意见，而不对任何权威表示屈从。党员有自由地组成集团和派别权利，以便在党内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没有明确划分各个集团和派别，它随着事件和问题的变动而变动。即使在内战高潮时，这种自由精神也还存在，而且这一自由精神一直延续到 1920 年。到了斗争最后的时候，当胜算在握时，这种自由精神才开始消失，执政党也发现它的自由在受限的情形下也缩小了。

这种奇怪状况形成的原因是，只是在内战最后一枪响了之后这个政权最大的危险才来临的。这场革命已经把它的敌人打败了，但也由此失去了它的大多数朋友。为了给饥饿的城市提供保障和保证军队的给养，政府下命令对农民的粮食予以没收。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有秩序地没收渐渐演化为直接的抢掠。农民在 1918 到 1919 年时对保证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到了 1920 年时却转而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反对；而且农民在增强了地主和白匪将军们的政权已经崩溃的信念的同时，就更加坚决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国家到处在发生农民暴动。产业工人也不一定会支持这个政权，而产业工人却曾经最坚定地支持着布尔什维主义。这个专政实行的基础正是产业工人。但是他们的队伍大幅度地削弱了。他们之中最有才华，最有理念的同志已经死去。残存的人已经不堪重负，而且由于饥饿、失业他们绝望了，另外，他们也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卢布贬值而更加绝望。工业生产还不及正常年份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五分之一。钢铁产量只有战前产量的 5%。在那些奇迹般地仍能维持着生产的大小工厂里，实物工资是工人们的工资形式，然后必须大费周折地用这些实物去换取粮食。产业工人阶级已经没有社会地位了——它与有秩序的工业环境完全脱离了，被投入混乱的无秩序的生产环境中。“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巩固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本身已失去了有阶级意识的分子和有组织的因素的性质。

政府逐渐实行军事化劳动，目的在于使工业能够生产。起初是把一些备用的军队用来进行伐木、运输粮食和油料的工作。他们被称为“劳动军”。是托洛茨基想出了这个办法。作为乌克兰战线的政治委员的斯大林，也就同时担任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的主席。后来这个方法又在更大范围和意义上予以使用：不仅应征入伍的士兵，而且产业工人都用来进行工业劳动。1920年，托洛茨基在工会代表大会年会上对劳动军事化进行宣扬。尽管孟什维克对此持反对态度，工会仍同意把它活动的角色转为军事化的代理人。这样，党原先答应不再设常备军，现在劳动人民也被组织成了一支军队了。

在内战期间，政府也别无选择。但是后来统治者却把它视为必要的选择。他们要求人民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不是作为一种紧急措施，而是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标志，作为苏维埃社会的高度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这就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谬误所在。当列宁和托洛茨基辩解说社会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正是劳动军时，布哈林对疯狂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赞美有加，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预示着没有货币的真正共产主义经济的到来。革命以后，对俄国从半封建状况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复杂性，布尔什维克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在对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大工业进行国有化的进程中，有意地放慢速度和采取谨慎步骤。现在的这些想法强烈反衬着这种谨慎态度。但是内战使执政党似乎已经把它原来的现实主义抛弃了，为了实现它远大的理想，改而采取一种顽固的和堂吉诃德似的热情。正如卡尔·拉狄克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希望手持武器，走捷径快速实现完全无阶级的社会。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军事命令的习惯从此形成了。而且对于不适用军事命令的经济和社会混乱，他们也采用军事命令进行处理。

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叛乱突然间点燃了全国的不安定情绪，它的发生与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同步。列宁说，这一叛乱的发生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照亮了现实。发生暴乱的喀琅施塔得恰恰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坚强堡垒。这无疑是个极悲剧性的讽刺，白卫军的同情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还有布尔什维克，都联合抗争红军部队；这支处于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的红军部队，跨过冻结的芬兰湾，前来对叛乱进行镇压。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这次叛乱在执政党中引起的惊惶：代表大会在接到叛乱爆发的消息后，中断了辩论，并派出大多数的代表去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这次叛乱引起的惊恐要大于内战中任何一次危急的关头所引起的惊惶。

喀琅施塔得叛乱者提出结束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的要求，并恢复布尔什维克过去所许诺的由苏维埃产生的真正的政府。结束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也是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领导人有些是左派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有些口号转借自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早期所提出来的那些口号。尽管这次叛乱的性质是极左的，但它却激起了已失败的反革命队伍中的希望。这个专政也陷入了同其他革命一样的境地，即当革命把旧制度的拥

斯大林政治传记

护者打败之后，它却驱使右派和左派、保守派和革命派联合成一个共同的顽强的反对派。一时之间，这样的阴影必会显现于列宁眼前：在欢乐的巴黎平民中死囚车隆隆地滚过，车上坐的是罗伯斯比尔。

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从这以后，列宁认识到：我们已经前进得太远了……我们已失去了原有的基础……对于我们还没有自觉地阐述过的东西群众都已觉察到了……这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形式，纯社会主义分配，而且如果我们不实行有效地退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我们就将有毁灭的危险。于是废除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它。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一种混合的经济。大规模的工业和运输业仍属于国家。在中小工业和商业中允许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外国的康采恩被邀请来俄国重新营业，甚至在大规模的工业中也采用康采恩。在农村中停止没收粮食的做法，开始实行农业税，起初是实物，后来改为货币。随后，卢布也稳定了。这些彻底改革是为了重建几乎消失了的工业，重新用工业品与粮食和原料相交换，一句话，依靠私人资本，重建一个能起作用的经济。国家除了拥有大规模的工业外，还从客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

在这种体制中，国民经济中的私营“部分”和社会主义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竞争。人们希望，通过竞争，社会主义成分会逐渐战胜私营部分。按照列宁的观点，由于大工业优于小企业，由于对社会主义部分政府实行更多的温和的保护政策，是存在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可能性的，虽然还不是肯定的。然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私营经济成分的竞争实质上将是和平的和真正商业性的。社会主义必须证明它将赢得这场经济竞争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胜利。这一规划中的若干关键地方还是不明朗的，因而在这些关键地方的争论就成为列宁逝世后权力争夺的一个缘由。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原先的规划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新经济政策全部是列宁的创造。他对这种政策的通过也没有异议。喀琅施塔得叛乱刺激了这一改革的实行，事先并没有对此进行过辩论。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另一个比较不惹人注目的行动在政治领域中进行着，而当事人对这一行动的内涵，也还是不清楚的。当放松了对经济的专政时，政治上的专政却加强了。在内战的最后阶段，查封了反对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再允许在执政党中组成任何反对集团是第二个步骤。布尔什维主义这时已下意识地、逐渐地走向了集权国家之路。我们需要暂停一停，再一次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进行思索，并对它的领袖们的要求和动机进行分析，以便获得理解苏维埃国家今后的发展和斯大林随后高升的线索。

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工会在苏维埃制度中的作用进行了激烈辩论，在此之后，通过了在执政党内禁止组织反对集团的决议。这一场出现了三四种观点的大争论发生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前夕。由前劳动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娜·柯仑泰和施略普尼柯夫领导的工人反对派要求把一切经济权力转交工会，这也即是实行国家工团主义化。然而让人惊异的是，工人反对派的领袖不是工会的领导人托姆斯基和鲁祖塔克；这是因为国家的工团主义化并不表达工会领导人的愿望，而是许多布尔什维克一般成员对党的经济专政的不满的一种反映。这个反对派对不断发展的经济官僚体制以及它粗暴地对待工人权利和利益进行了批评。柯仑泰和施略普尼柯夫争辩说，作为工人阶级的直接代表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工会，应该负责国民经济的领导和计划，而且工会作为同政治局和政府相抗衡的力量应该得到加强。“民主集中派”是另一个对政治不满的集团，它也指责党的领导对“官僚集中主义”进行鼓励。在苏维埃内和党内的自由是这个集团的主要要求，它在许多方面来说都为后来更有影响的反对派起了引导作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代表极端的“官僚集中主义”，他们要求工会融入政府机构中。托洛茨基指出，工会已经过于陈腐因而失去了原先的作用。这个国家代表的是工人。按照定义来说，政府是无产阶级的一般的和共同的利益的忠实代表，以与工会一贯维护的各种工人集团的部分利益区别开来。工人的部分要求与他们共同的和一般的利益不应该发生抵触。工会现在应该联合政府为实现政府的经济计划而共同努力，而不是捍卫个别工人或工人集团的利益以反对工人国家的整体利益。当柯仑泰和施略普尼柯夫希望工会而不是国家和党掌握经济权力时，托洛茨基却要求工会完全融入国家和党。

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十二名中央委员都支持列宁，企图维持住平衡。对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关于由国家吸收工会的要求列宁予以反对。他说，苏维埃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还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它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此外，“带有官僚主义弊病”也是它的一个缺陷。他技巧地运用他的辩证法说道，工人必须捍卫这个国家，但是他们也必须利用工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防止国家对工人权利的伤害。因此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而且，工人对工会也拥有某种独立性，他们有参加或不参加工会的权利。

但是，发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主要斗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争。他们两人都是反对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的，因为他们才真正形成了对党和政府最直接的威胁。列宁攻击的严厉性源于这种威胁的严重性，“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他对反对派的称谓，把他们的话语和行动称为“是一种现存的直接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政治危险”。这就是禁止党内反对集团的原因所在。列宁认为，工人反对派的危险性不是因为它对工会的特别看法，而它暗中要使党的作用比以前更加温和才是工人反对派的危险性所在。列宁并非全心地企图使这种禁令缓和一点：在“讨论专页”上党员还能够发表异议；中央委员会中还入选了有些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但是当他说服代表大会提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是有背于俄共党员的称号的”时候，他又亲自加强了这一禁令的作用。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把那些在代表大会上当选的领导人予以开除，因而那些刚刚重新获选的工人反对派发言人又受到了责难与监控。由于对这个反对派持温和态度，三个能干的、有教养的和有独立精神的党的书记克里斯廷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被撤了职，取而代之的是像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那样“忠诚的”人。像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都是斯大林的密友。托洛茨基同意这个禁令，他没有料到这个禁令有一天会对他的反对派产生不利影响。

苏维埃一党专政的国家的思想根本不是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所固有的，更不用说不允许其他党存在的思想了。托洛茨基写道：禁止其他党派，“显然是违背了苏维埃民主的精神”，而且“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没有认同它，而只把它当作为了自卫的一时之计”。党一向不禁止内部争论，现在却不允许内部的反对派集团的存在，这与它由来已久的习惯是非常不相符的。党

斯大林政治传记

现在与它本身的性质相偏离。当它企图去表白自己的时候，它已经无法表白清楚。

在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曾经支持过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些阶级已对它非常不满，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把农民和工人的不满情绪表达出来；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这时产生了影响，而这种批评在 1917 到 1919 年是毫无效果的。如果曾经有苏维埃民主的机制，如果苏维埃能够自由地选举和选择政府，那么布尔什维克肯定会下台，而它曾经抛弃的那些党派将再一次掌握政权。对这样的事情布尔什维克是肯定不允许它发生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在革命的党执政的条件下才是安全的。他们近来的一切经验更证实了他们坚信的这一观点的正确性。革命获得胜利的原因，正是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怀疑、动摇的阻挠不予理睬并加以驳斥，社会主义温和派是没有进行一场内战的勇气和力量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温和派重新执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后就是旧制度的复辟和白卫军的重返。诚然，群众现在由于精疲力尽，所以对孟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回来是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容许群众危害整个革命工作。当苏维埃几乎必然要用手中的权力恢复旧制度的时候，难道能够对它放任自流吗？但丁称这种情形是：“人民大声呼喊：‘让生者死，让死者生！’”对此种看法，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是不愿意接受的。

但是，当代表人民发泄不满情绪的人被取缔和窒息时，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对他们代言人进行镇压不能使各个阶级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同农民利益的冲突消失。这时执政党作为政治战场上的胜利者是缺乏支持的，挫折和不满情绪也开始侵袭执政党本身的思想。党内不同部分开始发出类似的不满和抱怨。

斯大林政治传记

国内存在着的分裂威胁着要使执政党发生分裂，虽然现在执政党仍被严格的纪律维系在一起。对这些讨厌的影响的逃避，使党的感觉迟钝了，看不清形势的发展，听不到群众的呼声。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更加突出了形势的紧迫性。在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集团和利益在新的范围内既然被允许存在，但它们在政治领域中却没有代表的力量。它们自然就要在惟一存在的党内寻求表达它们意愿的渠道。如果不进行绝对的隔离，党必然会被分裂成为无数敌对的派别。

但是，党这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异常艰难的。为了挽救革命的战果，它不得不对国家政治生活中自发的暴动采取镇压的手法。但是党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它的身心遭到损害。从这时起，党员都不敢表达那种所谓的“异己阶级压力”的意见。什么意见是布尔什维克的和无产阶级的，什么意见则不是，这种决定权属于最高当局。意识形态的事不可言说；而政治局代表革命的惟一智慧。大多数领袖都逐渐不再与他们的追随者进行感情的接触，因为即使进行接触也不会得到反馈信息。党也就逐渐被一个官僚主义的机器所取代。的确，对革命关心迫使布尔什维主义对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道路予以采纳；但布尔什维主义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时候，也确实渐渐与它的本性相分离。为了挽救革命，党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批判的和勇敢的革命者的自由联合的性质。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对权力越来越大的党机器俯首称臣。这是必然的。那些对这个机器的杠杆熟悉的人和同它密切相关的人，那些在教养和气质上符合这个新机器的观点的人，就必然会成为这个新时代的领袖。理论家开始受到行政官员的排挤，思想主义者被官僚主义者和委员会人消灭了。在这种演变中，没有人比斯大林这个委员会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中的佼佼者更赞美这个演变并从这个演变中获益更多。

事情的这种发展趋势是逐渐显现的。它在矛盾的之字形中逐渐发展，总是和早期习惯的惰性相违背。行政官员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在变化中的。在行政官员中有不少理想主义分子；理论家最初是支持官僚主义者的，甚至还提倡在新纪律中同他们竞争。因此，在争论工会问题时，理论家托洛茨基甚至因与官僚主义者的愿望不一致，而使最坚定的官僚主义者都对此惊愕不已，并且使他自己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对于列宁而言，不同的性格是差不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善于统率他的党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他在道义上的权威，使他能够暂时缓解各种冲突倾向，而这种暂时性的缓解在他逝世以后注定是要消失的。但是，官僚核心的力量在他生前已在不被觉察间不断增大，而在此过程中斯大林在这个核心中的作用也在同样地增长着。

第七章 斯大林成为总书记

斯大林权力的增加——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时，斯大林的作用——在政治局中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总书记的职务——斯大林对第一次“清洗”进行领导——列宁生病了——斯大林同格鲁吉亚对莫斯科命令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予以反对——重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撰写 1924 年宪法——斯大林同列宁产生分歧——列宁的临终遗言——列宁对斯大林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工作的攻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成果——三人联合执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1923 年引起的争论——三巨头和托洛茨基展开斗争——列宁主义崇拜的深层原因——列宁与世长辞——斯大林宣誓效忠列宁——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列宁关于解除斯大林职务的遗嘱——季诺维也夫解救了斯大林——在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侧面像——他对伙伴和敌手不同策略——1924 年秋的关于著作的辩论——斯大林为了反对托洛茨基保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进行反对——斯大林思想的转变——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不断革命论”——“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这一理论的心理背景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列宁过世之前，斯大林就在暗中扩大了惊人的权力，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内战结束后两年，俄国社会已经实际上处于斯大林——这个名字还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的统治之下，除此之外更为奇怪的是，是他的敌手们选举和任命他来担任所有这些职务的。在他后来与他的敌手们的斗争中，许多阴暗的戏剧将陆续上演。然而，这种斗争发生的背景是在他紧握了一切权力和他的对手警觉到他的作用而企图将他打倒，但是到了那时，他们发觉他已经牢固地掌握了政权。

内战之后，他立即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三个最重要的职务。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职责是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近一半人口的事务进行处理。在一亿四千万居民中，非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占六千五百万。他们处于不同的文明时期，有先进的乌克兰的半欧洲生活方式，甚至还存在二千五百万土库曼牧羊人的原始部落生活。处于现代社会与部落村庄之间的是白俄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塔吉克人、布利安人和雅库特人，以及英语中叫不出名称的其他人群。布尔什维主义急于形成对这些民族的吸引力，并消除他们对沙皇压迫的记忆，因而把自治权授给所有这些民族，很少有任何程度的“民族”觉悟存在于这些集团里，甚至很多民族不具有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教育程度，他们依靠外来的帮助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就是依靠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他们大多数认为，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遥不可及，类似于爱因斯坦的理论对于布哈拉

斯大林政治传记

汗的情形。在他们的土地上，从埃米尔、汗和毛拉统治的原始公社中解放出来，达到一定程度的欧化就是革命的涵义所在。

只有乌克兰是在由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领导的独立运作的政府治理下，除此之处，俄罗斯广袤的、懒散的东方边缘地区才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主要工作范围。大多数领袖的成年阶段都是在西欧度过的，他们当中只有斯大林适宜于做这个部的领导。他对他的臣民的风俗习惯有直接的经验，他具有无人能及的处理这种复杂的“政治”的能力。这种“政治”是混合了血亲复仇和东方阴谋同一种走向现代文明的真正要求的東西，而斯大林本身也正是耐心、家长式的坚定和必要的狡诈的结合体。政治局对他的这种态度是信任的，所以不去对他进行干涉。

于是他的第一个确定的领域正是亚洲和半亚洲的边缘地区。紧接革命之后，属于全国领导地位的是骚乱而激烈的欧俄城市，那些边缘地区的作用不足为道。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那些原始的地区就又恢复了本来的状态。它们重新坚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全国的观点取决于它们的思潮。这种思潮大部分具有东方性的特点，而这一点意义重大。斯大林是最适合代表俄国共产主义向东方边缘地区民族发言的人，他也是适合于使他的党东方化的最佳人选。在他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日子里，他广泛地联络边疆地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得到他们的衷心支持还是有希望的，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就跟随他进入了克里姆林宫。

由于季诺维也夫的建议，他于1919年任职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这个部门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对从高层到低层的政

斯大林政治传记

府各部门进行监督，以把苏维埃文职官员从沙皇前任那儿继承下来的两个重大缺点：无能和腐败。工农检察院的作用是严格监督整个摇摇欲坠和嘎嘎作响的政府机器；对于滥用职权和文牍主义进行无情地揭发；为政府各部门训练可靠的中坚人才。通过工人和农民的小组这个部门进行活动，这些小组原有随时自由地进出任何人民委员部的权利，并对那里的工作进行监督。到了后来，定期参加各部的秘密会议，甚至参加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也成了工农检察院小组的职责。为了训练公职人员的骨干才设立了这个制度，但其结果是，政府机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处在了工农检察院的监视之下。

这个稀奇古怪的检察制度是列宁创立的。他不满足于公职人员中的不忠和干预，企图通过严厉又冷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办法对它们予以根治，而工农检察院的设立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列宁出于对斯大林的极为信任，所以才选择斯大林来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工农检察院将是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机构，它本身是必须纯洁无瑕疵的。

列宁的这个治疗办法虽然没起什么作用。正如列宁所经常指出的，由于整个国家惊人地缺乏教育，极度缺少物质和精神生活，所以文职人员才具有这些缺点，它的消除至少要通过一代人的努力。为了使自己超然于俄国官僚主义之上，工农检察院必须是一个极为纯正的部门。出于对工人阶级所固有的美德的深信，所以列宁呼吁工人们起来对自己的官僚机构进行反对。但是，工人自己也深陷官僚主义之中不能自拔。正如列宁后来发现的，混乱、腐败和官场阴谋的又一个来源地正是工农检察院自身。到头来它变成了所有行政机构的非正式的而包揽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切的警察。但是对这些情况的叙述不必太详细，只消说一说这点就足矣：作为工农检察院的负责人，斯大林比其他人民委员有更多的机会对整个政府机器进行更密切的控制，即控制它的工作和人事。

身处政治局也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在整个内战进行的过程中，政治局只有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五名成员。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联合破裂，使得政治局成为国家的实际管理者。政府和党公认的领袖是列宁。指挥内战是托洛茨基的主要职责。加米涅夫在各方面都是协助列宁的。出版和宣传是布哈林负责的领域。斯大林则负责党的日常管理工作。政治局的职责是讨论重大政策。另外一个机构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组织局，它的工作是负责党的人事工作。按照内战的需要，在整个军队和行政机构中召集人员、指导工作和分配工作正是组织局的职责所在。从1919年初起，斯大林就是唯一的，固定的联络在政治局和组织局之间的人。他对政策和组织之间的团结一致起到了保证作用；也就是说，他在政治局的指示下，对党的各种力量进行调配。不同于他的任何同事；他完全致力于党日常的枯燥工作和它的一切内部阴谋中。

在这一阶段，他的权力已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1922年4月3日，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就使他的权力更加增长了。一个扩大了的新中央委员会刚刚在党的十一大上产生出来，并重新修改了党章。这时党的领导机构极为庞杂，设立总书记一职，就能协调不断膨胀又交错纵横的部门工作。据托洛茨基说，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列宁曾经在内部圈子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中表示担忧斯大林的候选资格：“这个厨子只会做带辣椒的菜。”但他的怀疑只是一闪而过，而且正是他自己最后敲定了斯大林的候选资格。斯大林的助手被指定为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莫洛托夫早已经是党的书记之一了。这个任命在俄国报纸上简单报道了一下，因为没有把它看作全国的事件。

不久以后，一种潜伏着的双重权威在党的最高层开始滋长了。现在的政治局是七个人组成，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智慧和精神的代表。但是管理和指挥的更多的物质权力却属于总书记一人。从名义上说，那个辉煌而崇高的政治局是属于总书记之上的机构。但是政治局却严重依赖总书记：如果没有这个靠山，政治局就被架空了。总书记准备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的议程，提供文件给每一个辩论的问题。他把政治局的决议向下级机构传达。他紧密联络首都和地方的千千万万机构，它们的任命、提升和黜退都是他的职责。他甚至能够在任何问题提交辩论之前就对政治局的观点产生影响；总书记的口味能够歪曲政治局决议的实际执行。类似的一些机构存在于所有的政府中，但这种独立的权威却是它们大多所不具有的。通常在整个管理制度中实行一定的权力分散来防止它们超越自己的权限，另外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及有时要求行政官员表现忠诚老实也是预防的措施。但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面，权力因缺少有效的控制而过于集中。最后重要的是，总书记个人充满野心。而所有这些都促成他才担任了几个月的总书记，就开始具有异常大的势力。

如果不提一下另一个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那么对那时情形的描述还是不全面的。在布尔什维克的事务中中央监察委员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会是一枝独秀。它对党的作用，类似于工农检察院对政府机器的作用，也即是，它的职责在于审查党内道德。它的组成是1921年十大上应工人反对派的要求而为，而这次代表大会在其他方面却十分苛刻地对待工人反对派。所谓的清洗工作由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这也是对十大工人反对派要求的响应。他们原打算定期对为数甚多的见风使舵的党内冒险家进行清洗，对那些习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共产党员进行整顿，那些权迷心窍的人民委员也是被整顿的对象。列宁同意这一主意，并打算利用它来使他的追随者重新遵循党的清教徒标准。但是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动摇者、怀疑者和执不同政见者，即对那些新实践的发起者他也打算对他们进行清洗。

清洗的程序起初不同于后来所变成的那种样子。清洗完全与司法无关。在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公开的公民法庭上举行的清洗活动，不论布尔什维克或非布尔什维克都有参加的自由。公众的严厉审查的范围包括从最有势力到最卑微的党员的所有行动。男女听众都有权作证供。凡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被发现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或者受到谴责，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被开除出党将是他的命运。监察委员会只能对他们采取这些规定的惩罚。

清洗的原来动机几乎只充满理想色彩。它想使人民能够系统地监督他们的统治者。但是由于执政党认为群众监督并不能解决政策的一切实质问题，所以这些恢复群众监督的新办法就注定了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它们只是对党内那个早已熟知的两难问题的又一次证明：党在不断地与人民脱离，却又渴望保持人民的性质。在列宁政治活动的最后两

斯大林政治传记

年中，他在党内进行可悲实验的基础正是这一两难问题。真正的选举将被清洗取代，它使一些腐化的成员在无损于党的条件下可以脱离政权。

全国清洗牺牲者很快视在莫斯科的中央监督委员会为他们的最高上诉法院。开始时，它是不属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后来它的地位几乎和中央委员会持平，两个机构经常举行联席会议。它们之间的协调人是总书记。因此，清洗的主要领导者就逐渐地落在了斯大林身上。

列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都对斯大林担任此职务持赞同态度。政治局中那些聪明伶俐的知识分子认为，他的这些职务缺乏吸引力；在理论问题方面他们的才华可以得到表现，他们的政治分析力与工农检察院或总书记这些岗位很少有关联。巨大的工作能力是这些岗位所必备的，能够进行耐心而持久的组织工作和艰苦而平凡的劳动是这种巨大工作能力的体现。斯大林的同事中没有一个人羡慕他的职务。只要列宁仍在管理政府，他们就认为斯大林只是在协助列宁工作；而他们所有的人都欣然接受列宁的领导。他们或列宁对这种微妙的变化没有及时地觉察到。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到两个月，列宁就因患病而不能再管理政府了。1922年5月底，列宁的动脉硬化症首次发作，马上被从克里姆林宫送到莫斯科郊外。直到这年仲秋，他才重新有办公的能力；但此后他的活动时间也不长了。这一年秋末，他由于第二次发病而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到了冬末，即1923年3月，第三次发作使他永远不能再回到政治舞台，但

斯大林政治传记

是在 1924 年 1 月 21 日以前，他还一直与病魔的侵袭抗争。

列宁患病极大地影响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列宁的生病使整个领导层黯然失色并失去了日常井然的秩序。列宁的信徒和仆从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逐渐地抛弃了他们模仿而来的第二种较好的天性。列宁对他的追随者产生的影响压倒一切而又经常不断，现在其消极的一面显露出来。可以从托洛茨基证实的这一情况看出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模仿列宁的程度，甚至到了他们学会了列宁的笔迹。他们现在继续在模仿他的笔迹，但列宁的光辉思想是模仿不来的。

比起其他同事对列宁的依赖，斯大林的独立性要较强一些，因为他在知识上对列宁的需要要小于其他人。实际利用列宁主义的一些小装置，而不是模仿列宁主义的整个思想试验室是他的兴趣所在。现在他已经控制的这一庞大政治机器的情绪、要求和压力对他的行为起了决定作用。通过最灵活和最方便的办法来保证对这一机器的控制是他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原则。在极权政体中，一种最灵活和最方便的行动办法恰恰正是镇压。由于列宁的去世，政治局可能会发生混乱，但总书记处却能保持镇静。恰恰相反，由于列宁的意见不再能够左右它的行动，它的行动就更加充满坚定和自信了。这就类似于工农检察院的情形。托洛茨基曾经批评过总书记处和工农检察院，他还提议完全解散工农检察院。但是政治局委员们对这个建议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这个机构毕竟是列宁认可的。托洛茨基对总书记处的批评也没有发挥作用。对于镇压不满的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行动斯大林懂得如何利用党章进行辩护，而正是由列宁建议和托洛茨基支持这个党章才得以出台并在十大和十一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大修改过的。他小心谨慎地解释他所采取的每个步骤并把它们说成由于执行以前共同决议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把巴库和察里津那一班人，也就是他的朋友、心腹和追随者安排去从事各个职务。托洛茨基受理了一些被贬黜的不满分子向政治局申诉的案子。斯大林对此回答说，按照事先约定的分工，通过重大政策决议是政治局的职责，负责党的人事工作则是总书记和组织局的责任。对于托洛茨基吹毛求疵的批评政治局最后也感到厌烦了。

格鲁吉亚对于斯大林行为进行了最严重的指控。我们在这里必须对这一冲突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一下。在 1921 年 2 月以前，一个孟什维克的政府统治着格鲁吉亚，虽然苏维埃逐渐统治了高加索的其余地区。莫斯科多少对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政权予以认同，但由于斯大林恼火于在“麦撒墨达西”时的老对手约尔丹尼亚和拉米什维里统治着梯弗里斯。政治局在等待时机，它坚信处于苏维埃化的高加索地区的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不会存在太久，因为它要依靠高加索为它提供粮食和燃料。孟什维克政府的威望也在实际的削减当中。但是斯大林的耐心已接近崩溃的边缘。1921 年 2 月，红军的一支部队从北高加索向格鲁吉亚进攻，迫使孟什维克放弃了对政府的统治。

的确，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民族主义也是不纯粹的。不论是沙皇还是克伦斯基统治他们，他们大多数人都提出了独立要求，但这种独立的要求实质上是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在克伦斯基统治时，他们对任何边疆地区同俄罗斯分离都持坚定的反对态度，不管是芬兰还是格鲁吉亚都是如此。他们的爱国主义新花样本质上仍然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但是，格鲁吉亚高地居民对红军的入侵表示强烈不满。斯大林三年前曾向芬兰人作出承诺说：“不应该把任何托管和任何来自上面的监督应用到芬兰人民身上！”现在他却发出入侵格鲁吉亚的命令。入侵部队的政治委员是他的老友塞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直到最后一刻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向军事人民委员会透露过，但是到了最后时刻，列宁和政治局对这一动议表示支持。政治局被通知，共产党人的起义在梯弗里斯爆发，红军只消给起义者一点帮助，起义就会胜利；如果让起义者孤立无援，为了获取胜利就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梯弗里斯的确发生了共产党人的起义，但是广大人民对此不支持，所以它胜利的可能性不大。

斯大林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对他的孟什维克同胞的复仇，就开始同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进行争吵了。在入侵后几个月，他到梯弗里斯对党的高加索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1921年秋，列宁对他的行动予以支持，主张成立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但是这个主张没有引起梯弗里斯的兴趣。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宁愿他们的国家继续充当一个真正的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角色，同一个广泛的全俄罗斯联邦进行松散的联络；他们不愿放弃主权而去赞成一个没有主权的区域性的高加索组织。

很难判断这场争论的是非。在高加索，血亲复仇情绪充斥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而反对俄罗斯人是他们所有的人不同程度的想法。相互间的残杀发生在哥萨克人、车臣人、沃舍梯人和其他一些较小的高地民族之间，为了制止这样的残杀行为斯大林企图把他们转移和定居下来。二十多年之后，他大规模地对乌克兰人、波兰人、德意志人和其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民族实施这个办法。情况很可能是，正如斯大林所认为的反对高加索联邦的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布都·穆迪瓦尼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习染了“地方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感到，高加索联邦是无法在血亲复仇的炽烈气氛中存在的。他们也可能是要求高于表面上的独立的东西，特别是在孟什维克统治三年期间，他们已经认同了国家的独立性，在此之后格鲁吉亚人已经半熄灭的旧怀乡病又重新兴起成为一种实在的思潮。入侵以及莫斯科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和政治警察中俄罗斯特务的活动都对这种情绪造成了损害。派到梯弗里斯的政治警察的职责是“肃清”当地孟什维克。有些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曾经对孟什维克的迫害进行过抗议活动，他们仍把孟什维克看成是前辈，尽管在孟什维克统治下，他们同孟什维克发生过矛盾并遭受过孟什维克的迫害。

所有这些新的政策，使老格鲁吉亚回想起了俄国统治的恐惧。原本是一个格鲁吉亚人来宣扬这些政策，他用方言向梯弗里斯的群众讲话，这倒无所谓，问题在于他是莫斯科的代言人。由于那个老的朱加施维里还活着，而且克里姆林宫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使事情趋于复杂化。中央政府其他特使，都会以一种超然和保留的态度对待地方争端。斯大林却很快就被地方感情和他青年时代的回忆所淹没。他再一次差点重演历史，成为几乎是被“麦撒墨达西”中的小资产阶级多数派赶出梯弗里斯的那个不得志的激进派了。当他以朱加施维里的身份在离那所老正教中学几百码远的地方来翻旧账的时候，他却要求得到属于斯大林的敬意。他当然是得不到的。

1921年7月6日，他在梯弗里斯党员大会上发言，对他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对手进行攻击。对于格鲁吉亚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将会遇到经济困境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如果同高加索其余地区合作将会受益无穷。他说，巴库的石油将无偿地运往格鲁吉亚。俄罗斯数百万金卢布的贷款将贷给高加索共和国。在提出这些好处时，他继续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攻击。他说，他感到惊奇的是，高加索极其盛行地方民族主义；这鲜明地反衬着他在高加索时工人阶级“一片兄弟般团结的景象”。“同民族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就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员的下一项任务。他们的任务是必须“肃清民族主义残余”和“消灭民族主义”。党必须对队伍中的地方爱国主义者进行清洗，不应该害怕。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总部只有七十万党员，如果它只追求数量而无视质量，增加到七百万党员还是较容易做到的。正是由于党员的高质量，俄国党才有能力进行革命和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攻击，因此它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格鲁吉亚纯地方的观点认为，斯大林谴责“民族主义分子”，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和有道理的。如果这些话是一个地方领袖所说的，听起来就顺耳了。但是，斯大林的莫斯科代言人的身份，使他所说的话中必然带有一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色彩。在沙皇统治的时代，俄国中央政府决定边疆民族的一切重大事务。人们怀疑这次革命是否会给这方面带来任何真正的变化。如果说不是讽刺的话，格鲁吉亚人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表示怀疑，斯大林目前谴责格鲁吉亚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但这一谴责反而使他们更加玩世不恭了。这就仿佛是柏林的群众在听英国的一个阁员讲话，尽管英国长期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他却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进行斥责并称之为“九头

斯大林政治传记

蛇”。即使这位大臣是爱尔兰人的后裔，即使他在代表消灭大英帝国的一个英国革命政府讲话，人们仍然因他的讲话而感到不愉快，特别是假如在英国刚刚进行新的入侵之后他来讲这一番话。斯大林在梯弗里斯讲话的效果就类似于此。

斯大林在没有支持者的情况下仍然泰然自若，命令奥尔忠尼启则对党内反对联邦的人和对孟什维克表示同情的人进行清洗。野蛮的镇压不需要进行，把某些“地方爱国主义者”开除出党就可以了，并接纳那些愿意接受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人进入大会。当那些动摇不定或仅仅有些怀疑的人听说政治局也主张成立高加索联邦，他们就都屈服了。政治局确实一致批准了。但是，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领袖穆迪瓦尼和马哈拉泽发现，他们在各次大会和会议中，得票数一直高于别人。因此，他们就继续对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反抗。

这位以前的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者竟然有趋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这是值得让人关注的。如果联想到法兰西帝国创建者科西嘉的波拿巴或德意志民族主义最富侵略性的领袖奥地利的希特勒，这种复变过程就更值得人们注意了。科西嘉人并不是十分怨恨法国；拿破仑的父亲甚至曾经追随过科西嘉“法兰西党”。奥地利一直深受泛德意志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只是在哈布斯堡王朝利益衰微之后才开始减弱。但是泛俄罗斯主义绝对不可能存在于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对俄国的怨恨不如波兰对俄国的怨恨那样强烈。因此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使斯大林带有了俄罗斯情绪；吸引斯大林这类人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敏感态

斯大林政治传记

度，虽然自此以后斯大林多次被人们控为犯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错误，实际上民族主义的一般情绪和偏见一直都没有对斯大林产生过驱使作用。他的主张只是中央集权的原则，这是所有当代革命共同的主张。他只不过是夸张的和残忍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主张。但是，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从他所作所为所造成的结果来看，仿佛俄罗斯沙文主义就是他行动的准则。

有证据表明，他经常受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影响而产生一种奇怪的但并非不愉快的感觉。每个人都碰到过那些归化的英国人。他们竟然充满了自信地说“我们英国人”，“我们大英帝国……”这样的话。在对穆斯林共产党员的一次讲话中斯大林就有这样的口气。他说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以来就是不严重的：所有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员的俄罗斯人，过去是属于统治民族，民族压迫从未降临到他们身上，除了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倾向从未发生在他们中间，因此他们几乎无须去克服这种倾向。”这个断言听起来多么令人惊异。当它发表在《真理报》上时，必定震惊了许多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也只说过这么一次。俄国人确实不知道当代异族压迫引起的那种棘手的民族主义。压迫者的民族主义是他们民族主义的性质，冷酷，野蛮，而且危险性最大。列宁警告过他的追随者要小心防范这种危险性，要求他们以耐心和宽容的态度对待以前被压迫民族的夸大要求，因为对沙皇统治的记忆将保存较长的时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罗斯共产党员要反对的主要罪恶，而抵制喧嚣的地方爱国主义的各种表现是边疆同志的职责。列宁豁达大度的命令同他也主张的中央集权是很难统一起来的。他的政策势必会自相矛盾，保持两者之间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平衡需要一个非常精明而审慎的行政官员。斯大林显然是倾向于过分集中了。

斯大林的错误是俄国行政机构经过革命重新铸造之后思想、情绪和愿望的发展趋势的反映，在管理上越加集中，甚至于重建一个“伟大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正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共产党人支持中央集权的理由，是因为它在经济和行政管理上的优势。但是，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只是众多人民中的一员。他们比其他国家要更为大胆地进行一场伟大的、普遍的农民革命；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能联想到对官场例行公事制定一个基本的改革。只有对沙皇时代的官僚重新启用才能使革命摆脱全面的混乱状况；这些没有能力的官僚在行政管理的日常工作上还是比那些前革命派要强一些。在新经济政策公布之后，为新统治者服务扩大到了自由职业阶级中的保守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人们欢迎他们。甚至在白俄之中，也是很希望俄罗斯母亲重新站起来。高尔察克前政府成员乌斯特里雅洛夫教授甚至用一种政治纲领把这种希望合理化。他敦促自己的追随者同苏维埃政权保持友好关系，并在其中工作，目的在于利用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效果逐步演变到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二十年代初期，在新的行政机构中旧的文职人员已经是一个单一的群体特别是在对专家急需的高层机构中，这些旧的文职人员的力量更为强大。这些前沙皇官员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不是自然的。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同路人”的态度是疏远的；这些“同路人”以一种恐惧或轻蔑与尽忠职守相混合的感情对待布尔什维克。尽管有冲突，甚至是残忍的冲突却在他们之间发生，但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仍在连续的有机地进行着。

斯大林政治传记

那些旧的公务人员认为，在新的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伟大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思想是非常自然的事。这样，他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保守的良知屈服于革命。他们竟然声称使俄罗斯边缘省份重新合并和入侵格鲁吉亚这类的事情是他们思想上的胜利。另外，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对这些行为是持赞同态度的。是因为他们把这看成不是俄国的而恰恰是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们认为，俄国只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堡垒，战斗的社会主义的超国家战略要大于它的利益。但是，俄国的边界目前等同于胜利的社会主义的边界。列宁主义者仍然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但在他们看来，把沙皇的大多数领地统一在苏维埃的旗帜下，这是与社会主义利益相符的。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和乌斯特里雅洛夫主义之间的差别不大。党的政治思想中加入了这种不纯粹的新民族主义，这与斯大林不久以后刚承认的相类似。比起其他领导人来，他本身只与那个混合的行政机构相契和。他几乎可以极端敏锐地对它的矛盾情绪进行表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他个人的偏向和喜爱是类似于那个国家所感觉到的更为广阔和非人力能够影响的压力的。

1922年夏，一次新冲突又涉及到了他的人民委员会，这次的冲突发生在同乌克兰之间。乌克兰政府也抗议它的干涉。一个保加利亚 - 罗马尼亚贵族革命家族的有影响的后裔正是乌克兰政府的领袖拉柯夫斯基，斯克里普尼克则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老同志。他们对党对于边远共和国独立保证的文字和精神予以坚持，要求尊重这种文字和精神的保证，尽管斯大林对基辅或哈尔科夫的干涉的程度要轻于对梯弗里斯的干涉。乌克兰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人和格鲁吉亚人决定联合起来在未来的修改宪法讨论中挑战斯大林。

但是，不能过分的夸大这些冲突的重要性。斯大林也有光明的活动的一面。他努力为革命继承下来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工作。人们记得，1918年巴什基里亚自治共和国是在他的组织下成立的。鞑靼自治共和国在1920年春成立。同年10月，成立了柯尔克兹自治政府。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在内战结束后成立了，由讲三十六种语言和方言的许多民族组成。卡列里亚人、雅库特人和其他民族也组建了新的国家。这些共和国中不存在真正独立的国家，但他们都享有高度的内部自由和自治；而且在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部指导下，对现代文明的某些好处已体验到了。这个人民委员部在当时物质极端贫困的情形下，帮助这些共和国建立了几千座学校，而以前只有几十座学校存在于这些区域。在干旱地区开始实行灌溉计划和水力发电计划。鞑靼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包括鞑靼语言和俄语两种。在柯尔克兹草原上不允許俄国人定居，目的在于使阿尔克兹草原成为当地游牧民族的居留地。实行了一些进步的法律，使亚洲妇女从父权和族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必要的工作都是以一种温和的方法在执行，为未来的努力起到了模范作用；但即使开始是温和的，但发展下来也出现了一种激进的态势，这一点引起了许多布尔什维主义者的反对。

1922年夏，政治局在列宁的病第一次发作后不久，就开始对宪法的修改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对俄国和边远地区共和国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斯大林大力支持这次修改。整个1922年下半年，他都对新宪法的原则进行不断地阐述。简单说来，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认为：一个共和国联盟将取代苏维埃共和国联邦。这个联盟将由俄罗斯、南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四个地区组成。他对由各共和国直接组成联盟的想法持反对态度；他坚持在各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中间的联系环节。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四个主要渠道进行中央控制的效率要高于莫斯科同许多分散的地方政府进行直接联系。人民委员部由三类组成：（一）莫斯科政府单独负责军事、外交、外贸、交通和邮电，各共和国政府不设同样的部门来处理这些事情；（二）财政、经济、粮食、劳动和工农检察院属于第二类，它们虽不隶属中央政府，但要和莫斯科协调关系；（三）第三类有内务、司法、教育和农业，各共和国政府完全独立地对这一类进行管理。最高权力机关是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最高会议和民族会议两院。所有民族集团在民族会议中都有同样多的代表。人民委员会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

在列宁第一次康复期间，对这个计划进行了商量并批准了。对于格鲁吉亚参加南高加索联邦一事政治局不断敦促。乌克兰人对由莫斯科来代表他们领导外交表示不赞成，并拒绝把他们自己的外交人民委员部解散掉。但是在名义上，各共和国由于这个计划而享有很广泛的自治权。它允许他们对自己内务、安全和警察进行独立管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非常重要。但政府的实际操作，却已公然与这一改革的规定相背离。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冲突正是源于此，而且这次冲突是他们长期友谊过程中的第一次真正的严重不和，但也是最后一次。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列宁在乡间慢慢康复，此时，斯大林几次去探望他，把一些当前的形势告诉他。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次访问记中，对这位患病领袖的尊敬之词布满整篇文章，而且还让全党知道，列宁很快可以重新进行工作。他们谈话涉及到政治局的讨论情况，托洛茨基攻击工农检察院，新宪法的设想，以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反对。列宁显然对斯大林对这些事件的看法表示支持，因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斯大林。甚至在10月间他恢复工作以后，他仍坚决地支持这位总书记，并竭力来将总书记的威望提高。他对格鲁吉亚人的不顺从进行愤怒的训诫；他反驳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他还准备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的宪法改革采取维护的态度。他对他的副手有着几乎不可动摇的绝对信任。

后来到了11月，或者说到了12月初，某件事情的发生，无可挽回地动摇了列宁对斯大林的信任。情况很可能是，并不是由于单独一件事而是由于许多事巧合在一起引发了这一变化。为了回应列宁的指责格鲁吉亚反对派领袖们写了一个长篇的声明，这给列宁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材料。大约就在此时，一个由政治警察头子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调查委员会从格鲁吉亚归来，这个警察头子向列宁报告了调查经过。从报告中列宁得知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某些暴行。在盛怒之下，他要求暂停奥尔忠尼启则的党籍和职务，奥尔忠尼启则是列宁在朗居曼学校的学生。但是，他也没有完全相信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捷尔任斯基虽然富于理想和为人十分正直，但有时会头脑发热，他曾因为多疑而干预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

斯大林政治传记

对他进行了公开谴责。他曾经对斯大林在梯弗里斯的政策予以支持。因此列宁要求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准备一份详细报告，这篇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格鲁吉亚的。

列宁不仅对格鲁吉亚事件感到烦心。他重返工作之后，有一种模糊的但却是明白无疑的变化发生在他周围。在他离职期间，那个本已不稳固的政府机器更加不稳定。对一些询问要想得到直接而迅速的答复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人民对某些机关的粗暴、滥用职权和文牍主义抱怨不停。他的一些指示和命令常常被搁置，没有下达到目的地。他已经模糊地感觉到有一种背着他发生的事件正在进行。列宁还在生病之前就曾向党谈到他觉得整个政府机器已经沿着不同的方向转动，这是令他始料不及的。现在他的这种感觉更为明显了。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结果发现根源就在总书记这一职务上。于是，格鲁吉亚问题、政治局中的矛盾，对于斯大林的抱怨，都开始浮出水面。

12月中旬，列宁第二次患病。一星期后，他又康复到有能力口授了，但也有死亡临近的感觉了。1922年12月24日，他向秘书口授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来代替遗嘱。他一开始就担忧布尔什维主义分裂的问题。“我们党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出现了裂缝……它必将垮台……任何措施都不能对分裂进行预防。”但是这种危险是遥远又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因此列宁暗示，目前政治局中的不和，并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的反映。即使如此，他仍认真对待不久的将来的分裂危险。在这一点上，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推理突然失去了效用，他甚至推理不出，照他看

斯大林政治传记

来，造成政治局中的不和的社会背景。相反，他继续用简短而极端小心地态度谈到了他对那几个继承人的看法，似乎暗示仅仅是私人恩怨引起了他们的不和，只是到将来这一更广泛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主要敌对者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列宁的差不多所有同事和学生对这个意见的最初反应是大吃一惊。托洛茨基看不起斯大林，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阴暗而平庸的人”。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对列宁的看法持不赞同的态度，他们每个人都认为那位总书记的才智不及自己。列宁心中明白这两个敌手中谁最能干：“也许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是托洛茨基。”不过，列宁也绝没有理所当然地认为托洛茨基的巨大才干能使他确定地处于优势地位。整个遗嘱都不能确定斗争的结果，并急于想及时制止这种斗争。

“斯大林同志任总书记一职，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小心谨慎地说出上述一段话。还在他的病复发以前列宁所表示的担忧和怀疑就已经产生了；但是他感到对于作出最后的判断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同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比较起来，他对托洛茨基批评得更多些，尽管他也赞扬了他的巨大才能。列宁回忆起托洛茨基最近反抗中央的一个例子，在这次事件中，“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是托茨基的表现所在。如果党只是根据这些话来选择“两位卓越领袖”中的其中一人，那么优势在斯大林一边。列宁不仅对托洛茨基的缺点特别强调，而且对于托洛茨基有反中央委员会的倾向进行了暗示；而对于一个在纪律、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主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

斯大林政治传记

领导人来说，这一缺点是严重的。列宁谨慎地在两人间寻求和解——“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两个人不经意间造成的分裂，那分裂会突然来临的。”

他对其他领导人谈的不多。他提醒追随者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 1917 年 10 月中反对革命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列宁认为，他们二人不具备革命的胆略和性格。但是，“他们个人对这种事也不应负主要责任，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可以全归咎于托洛茨基一样。”换句话说，党对于他们过去干的坏事应有所记忆，但不应重提这些旧事来对他们进行责难。重提托洛茨基过去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显示出，这件事还是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遗嘱在结尾处简略地对两个年轻的领袖进行了评价：布哈林和皮达可夫。

作为一个最后的遗嘱，令人失望的是，列宁的这些话没有下定论。他预示到党的分裂，却没有办法提出任何指导，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五十人到一百人”是他惟一的建议，这个建议被证明是毫无效应的。同列宁的期望完全相反，在扩大了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局和总书记的权力正在逐渐增大。

当列宁在斟酌他的遗嘱时，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斯大林指导下开始了，宪法改革的原则在这次大会上被通过。他赞颂“在把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到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去的过程中，宪法改革将成为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12月30日，在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会上，他歌颂在其成就和重要性上这一改革可以和内战中建立红军相媲美。当然，这种说法是有些夸张的意味，意思就是：“我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成就是可以大于托洛茨基的。”他在成立大会上还说：“这是旧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俄国，作为亚洲刽子手的俄国败于新俄国的日子……一切还没有丧失理解力的人们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将看到：共产党人在破坏旧制度的同时，也善于建设新制度。”

列宁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了几篇有力的文章，但却没有提到这一庆祝事件。12月30日，即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当天，他口述了一篇评论格鲁吉亚的冲突的短文：

我想，对于格鲁吉亚冲突，斯大林的急躁和善于通过行政措施行事以及他恼火于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起了决定作用。在政治上发脾气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我还担心……捷尔任斯基同志也只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的反映……必须区分开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应当负责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

在列宁口授遗嘱后的五天内，他已确定了对斯大林的怀疑，认为斯大林是有罪的。因此，这时他的谨慎的批评转而成为直接的控告。当时的情形可能是，在这五天期间，各地来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前往拜访他；或者是他的秘书把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报告提供给了他；或者是在他本人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冲突；或者是所有这些事结合到一起。反正这时他已经确信下来，并考虑修改他的遗嘱。1923年1月4日，他口述了对遗嘱的一段补充，充分表达了由于被自己最喜欢的助手所欺骗而产生的极大的愤慨。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太粗暴的缺点……是绝对不适合总书记的职位。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另外指定一个人取代他，这个人应具备……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更少任性等等优良品质。这种情况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对于防止分裂，对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

只有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和他的秘书们知道这个遗嘱。列宁出于对自己完全瘫痪或突然死亡的担心，所以匆匆忙忙地记录了他对斯大林的指责和他对党的忠告。不久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又有好转，所以他就亲自出来攻击那位总书记。起初这一攻击还是不明显的，后来就变成了激烈的攻击。是托洛茨基后来透露了这一事件的经过的一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质疑它的真实性。但是主要是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显示了这一事件经过的主要部分，它们已入选他的著作的所有版本；而且它们不仅符合托洛茨基的透露，而且还有力验证了托洛茨基的说法。斯大林或他的辩护者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驳斥这一事件。

1923年1月25日，在《真理报》上列宁对工农检察院的第一次批评发表了，口气还是缓和的，实际结论也不确定。2月的第一个星期，列宁口授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这是在彻底性地攻击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斯大林。《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在它写成四周以后，才在3月4日登在了《真理报》上。在未发表期间，斯大林和他的朋友对于列宁不进行这次攻

击的劝告是毫无作用的。

列宁的文章说：“说实话，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现在已威信扫地。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机关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了，在目前情况下，也不再对这个人民委员部要求什么了。”这里虽然对于斯大林的名字没有涉及，而且他最近已经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了，但是显然暗含着在攻击斯大林，因为这是斯大林创建并领导了三年多的部。列宁继续说道：“如果一个人民委员部工作马马虎虎，并且人们不信任它，说话毫无威信，就没有组建的必要……避免这种现象是我们的主要职责。”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真正模范的、不只是由于职衔大家才尊敬的机关，这是我们的任务所在。”列宁谈到改组后的工农检察院应有的优点正是它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缺点的反映：“我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察院会把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摆空架子这些缺点克服掉，这些缺点是与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官僚主义的胃口相符合的。附带说一句，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一切麻烦的根源在于缺乏文明的习惯。“我们对那些过分唠叨又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应满足于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满足于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官僚的、农奴制等等的文化。在文化问题上，千万不可急躁冒进，这是最有坏处的。”那个负责审查整个行政机构工作的人民委员部，显然具有“官僚和农奴制文化”的性质。

这次攻击是列宁首次公开进行的攻击。在幕后，他为在4月召开的第十二大上发动最后的攻击积极作准备；而且他同意联合托洛茨基采取行动。3月5日，也就是他批评斯大林的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民委员部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第二天，他同斯大林之间爆发了一次尖锐的冲突。后来他就口授给斯大林一封短信，要把同他的一切私人关系统统断绝。第二天，3月6日，他给格鲁吉亚反对派领袖们发电报说，答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他们的情况予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支持你们。我十分气愤于奥尔忠尼启则的跋扈和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纵容。”他再次联络托洛茨基，商谈在格鲁吉亚事件上联合行动的方法；他还对加米涅夫进行了指示，此时加米涅夫正同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一起前往梯弗里斯。恰恰在这些行动中间，他的病于3月9日第三次发作，从此就没有再康复。

斯大林还不明了列宁的行动，但他对危险已有所觉察。他知道，他的可怕的敌手们很了解他的事业还没有完全稳固。因此，至少说来，他听到列宁旧病复发的消息时心情是复杂的。列宁已经不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控告了，这使得他放心不少。他仍然有理由怀疑托洛茨基会在这次大会上攻击他，而且托洛茨基还可能是一个带有威胁性的批评者，但一个“伪装的大力士”的可能性也存在。于是他采取措施使托洛茨基放松警惕，使他放弃行动。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党史上第一次将不由列宁指导的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斯大林建议，由托洛茨基以中央委员会名义来指导大会的召开并进行主要发言。正如托洛茨基说的，当时的情况很滑稽，很难说这两个敌手中的哪一个扮演了更不诚实的角色。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唯恐人们误解他在列宁逝世前就开始争夺权力。他的这种考虑肯定是真诚的。但是后来他却建议，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理所当然地应代替列宁来指导大会。斯大林也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十分小心谨慎地拒绝了他的建议。结果就由季诺维也夫来对代表大会进行指导。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列宁表现了谦恭和忠诚的姿态。这种姿态在相当程度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使他避免了许多对他的责难。在列宁的病复发几天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其中充满了对病中的列宁的恭敬之情。大多数人此时仍不相信他们之间已由克里姆林宫传出的尖锐冲突。他继续作出模模糊糊的姿态以期与托洛茨基和解。在政治局的一些会议上，他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欣然同意修改他准备向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向他的批评者作出口头上的让步。实际上，他对一些小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托洛茨基风格的展示而不是他自己的风格。“中央和地方很大一部分苏维埃官僚”是这些政策谴责的关键之处，沙文主义认为“成立所谓‘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的开端”正是共和国联盟。还有一个修正案很可能对他著名的宪法改革起到抵消的作用，并让各自独立的共和国的政府拥有充分的主权，如果有一天苏维埃官僚“能够用真正无产阶级和真正兄弟般的精神对小民族和落后民族的需要和要求予以关注，那么目的就达到了”。但斯大林也达到了谴责“地方民族主义”的目的，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护。

根据腓特烈大帝的说法，他曾同他的臣民缔结一项协议，这一协议规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和做事。在这个阶段，斯大林已经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他就不介意托洛茨基的任何说辞了。在他作出一切让步之后，政治局决定对于列宁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口授记录将不通知代表大会，理由是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还不清楚列宁为什么作这一口授记录。这是斯大林赢得的策略上的首次胜利。再一个胜利是，托洛茨基取消了在代表大会上攻击总书记。出于希望列宁康复的目的，并认为联合行动的效果会好于单独行动，所以托洛茨基就没有发动攻击。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却行动起来了。

大约在此时，在政治局内形成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执政。这三个人能够联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决心对托洛茨基继承党的领导一事进行阻止。他们三个人如果单独行动，谁也不是托洛茨基的对手。但是三个人联合起来，却是一种才能和影响力的有力结合的代表。作为政治家、演说家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对群众有吸引力的煽动家。这个小集团的战略家则是加拉米涅夫，他是它的可靠智囊，在权力的竞争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理论问题上有素养。三人执政及其有组织的力量的战术家是斯大林。他们三个人实际上形成了对党的控制，并通过党，形成了对政府的控制。加米涅夫曾经协助过列宁，并主持过莫斯科苏维埃的工作。季诺维也夫曾担任过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斯大林控制了大多省份。此外，季诺维也夫还是共产国际的主席，这个职务在俄国拥有很高的道义权威性，任何觊觎领导职位的人都希望得到这个职务的支持。

最后，这三个人是党的传统的代表。从1903年分裂以后，他们就一直同布尔什维主义保持联系；他们在领导层中拥有较高的资历。除托洛茨基之外，在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中，布哈林是年轻的一代，最近才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托姆斯基是工会领袖。资历是光辉过去的代表，并标志着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效忠。这三个人这时拒绝支持那个“前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因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为他加入布尔什维克仅五年的时间，就已经被公认为继承列宁事业的人。这是他们联合的惟一动机，他们被迫为此进行联合行动。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是独立个体，三人执政就自然获得了多数的支持。通常都在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之前他们的动议和建议就已协调一致，因而总是能够获得多数票。其他政治局委员受政治局中纪律的约束，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企图向外界公布他们的内部争论时，都被视为一种背叛的行动。

由于情况如此，所以斯大林对这次代表大会就不是很担忧。反对他的人都不是一流的高手，他们没有影响广大代表的能力。许多代表在政治立场上已经完全屈从于总书记。代表对斯大林的信赖程度可以从斯大林向代表大会报告总书记处人事部门的情况中看到。他的报告把党对公众生活进行控制的方式方法透露了出来。前一年，党员只占地区工会领袖的 27%，现在已经占到 57%。在消费合作社这个组织中，以前只有 5% 的党员，现在党员人数达到了 50%。在军队的指挥员里的党员从 16% 上升为 24%。在所有其他机构中情况都是这样，斯大林称呼这些机构为党同人民联系的“引带”，任何一个公共机构都不能脱离这个引带体系。

为了能够保持并增强它的力量，总书记处人事部门把党的“关键人物”的极为详尽的档案保存了起来。几次清洗之后，党目前只剩下四十万普通党员和二万官员。人事部门迄今已积累了包括一千三百名工业经理人员的中上层干部的档案。据斯大林透露，这种调查工作将会一直进行下去。在积累档案的时候，对每一个人员的工作熟练程度、特长、政治可靠性和道德表现给予特别的关注。在档案中以适当的方式记录了每一个人员的所有污点。斯大林说：“必须对每个工作人员都进行严格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审查”，“否则，政策就没有意义，就会毫无实质性内容。”人事部门出于满足或帮助工作人员的调配的目的，在全国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它有紧急命令各个人员改变职业和住地的权利；为了执行任何任务，它有权命令各个人员从首都转移到西伯利亚的荒原，或出使外国。分配一项任务，甚至是分配一项荣誉任务，都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来惩罚某个颇不安分的成员。这些人员尽管有许多优点，但他们很多人都不能肯定自己不因过去有失检点的言行而现在遭到总书记的公开反对。但是，目前，这种事情还不具有普遍性。

总书记对于省委员会领导人的任命也负有责任。他以一种貌似悲观的语气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他告诉代表大会，省的组织现在应该拥有自选书记的权利，而不要依靠上面指定。但由于人才的缺乏，以致地方组织总是不断向总书记申请，要由中央派去人员。“培养党的领导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很多年，或许五年到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用布琼尼同志的骑兵去战胜某一个国家是简单的，然而从下层培养两三个将来能够真正领导国家的领导人却困难得多。”他捍卫经常遭到报纸攻击和讽刺的省委会，也对他的由书记们组成的方阵进行了保护，他甚至对于他们的纠纷和摩擦都予以谅解，认为纠纷和摩擦既不利也有利，因为它们有助于形成“一个能够经常进行领导的紧密团结的核心”。换句话说，省委员会就是小型的政治局，有它类似于中央政治局的小三巨头和二巨头以及反对派组织。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对一个批评者的批评进行了回答，也第一次公开对三人执政的存在予以承认，而且宣布了为反对任何反对派它将团结一致。斯大林说：“奥新斯基对斯大林和加

斯大林政治传记

米涅夫都赞同，但他反对季诺维也夫，他认为目前的任务是除掉一个人，以后再依次除掉其他的人。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是他采取措施的目的所在……。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失败，而且我怕他会败得很惨。”对另一个要求在党内拥有争论自由的批评者，斯大林回答说，党不是一个用来辩论的组织。“帝国主义豺狼包围着”俄国，“在两万个支部大会上讨论问题也就是等于全民讨论”。在持久的掌声中，他总结道：“这样团结一致的、受同一思想鼓舞的代表大会终于又重新出现了。很遗憾，列宁同志没有看到。如果他在场，他一定会说：‘我终于在历经二十五年后把党培养成一个伟大有力的党了。’”与以前的多次代表大会相比，斯大林在此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更加充满了自信。

那些没有领导和无助的不满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没有获得成功。三个月后，在1923年8月，政治局惊恐地看到工业中突然爆发了多次罢工。1921年宣布的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但复苏的过程是痛苦而缓慢的。工业产量与国家必需品的要求相比仍然不够。它不能向农村提供充足的物品，以诱使农民把粮食卖掉。工人阶级由于低工资、失业和饥饿陷入绝望的境地。由于工会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引起工人的不满，一些非正式的罢工爆发了。执政党内也存在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一些秘密的反对派集团也在党内出现了。这些集团中有的是半孟什维克的，有的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1921年已被禁止的反对派残余和一些新的分子也被包含其中。拥有党内批评的自由是他们的主要要求。把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除出党，还有一些则被逮捕。这是在共产党内成立秘密反对派的首次事例。但在那个时候以前，秘密集团的行动还具有不协调和缺乏

斯大林政治传记

领导的特点。三人执政对于他们的敌手和一般不满群众结合起来有些担忧。

他们对于危机的反应是不协调的。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一个动议，这个动议指出，必须在党员中重新实施民主和自由讨论。另一方面，他们却动员政治警察来对秘密的反对派予以镇压。政治警察发现，在追踪反对派时，一般布尔什维克常常不与他们合作。于是，捷尔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批准警察对于不合作的布尔什维克也可以采取行动。这时，托洛茨基和三人执政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托洛茨基在还没有明确表明他对捷尔任斯基要求的态度之前，就已经攻击了三人执政。他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党的思想状态的反映，它反映一部分人的失意感，以及不再信任领导人物。即使在内战中，任命的制度也远远少于现在。已经很自然地任命而不是选举省委员会书记。他承认，“鉴于充分发展的工人民主有悖于专政制度”，所以要求实现工人民主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内战中应该用“一种更为活泼和更为广阔的党内负责制”来取代纪律约束。然而相反的是，“党机器的官僚化已经极端严重；压制批评和不满，以及对此的公开表示，这些不同意见被赶入地下，被认为是无法控制的和危险的形式。”

三人执政对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予以回避，反而指责他别有用心，怀有个人野心，玩忽职守，等等。他们谴责他企图继承列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这后一个谴责是确切的。因为关于接班的斗争贯彻于整个形势之中。不过，这一谴责也类似于其他谴责，是偏离主题的，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党内存在着危机这一事实是有根据。

在这场较量中，四十六位著名的共产党人联合发表了一项

斯大林政治传记

声明，其要点类似于托洛茨基提出的批评。在这项声明上签字的有：列宁遗嘱中提到的两个最能干的年轻领袖之一皮达可夫；中央委员会的前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里布利亚科夫；十月革命时的军事领袖安东诺夫—奥夫申科；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布勃诺夫、萨普洛诺夫、穆拉罗夫、德罗布尼斯等。作为内战中的著名领袖，他们都是一些思想和性格很有特色的人。其中一些人曾经是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前反对派的领导人，不满于党对当时的领导，为了一时之计而放弃首要原则。从本质上说，他们这次也是表达同样的不满，因为党仍在继续与自己的初衷相背离。还不能肯定托洛茨基是否是煽动起这次示威行动直接发起人。迄今为止，他一直在同政治局三人执政争论。党内的一般印象是，他总是全心全意地对官方政策进行支持。因此，他就两边都不得利：他一方面要负责他所反对的政策，另一面又无法及时地把可能支持他的那些人聚集起来。

11月，出于危机所引起的恐惧的考察，三人执政提出一项动议，赞成在党内实行民主改革。就像在格鲁吉亚事件中的情形一样，斯大林这时也同意在口头上向托洛茨基妥协。政治局一致通过了这一建议，托洛茨基只好赞成。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六周年之际，季诺维也夫正式宣布，开始公开讨论对布尔什维克感到烦恼的一切问题。这似乎是结束了党内的戒严状态。

但是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反对派所提出的那些事情，并不仅仅源于斯大林或其余两人的野心和敌意，而是有更为深刻的根源。这一革命由于政治机器力量的增强才得以解放自己。群众的冷淡，使党的统治越来越依靠强迫命令而不是说服教

斯大林政治传记

育。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现在就是颠倒一切的时候了，约束或者废弃政治机器而依靠人民健全的舆论的时候到了。谁又能确定地说，这样做不会对革命安全形成危害。工人民主的实行，是不是意味着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重返舞台呢？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批评斯大林的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恢复孟什维克。他们认为，在国家中解除戒严状态还为时过早，他们要做的只是在党内解除戒严。但是这样一来，在一个不管什么情况都要实行专政的社会里，党会不会被孤立呢？除了这些以外，这个巨大的专政机器这时已获得了自我保存下去的既得利益，它可以认为自己的利益是等同于革命更为广大的利益。对这一难题争论的双方都意识到了，但是对于反对派来说，意识到这一点是产生软弱的源由；而对于另一方来说，意识到这一点却成了力量的源泉。

托洛茨基要求的改革只是一次由上面宣布的有限改革，即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自由的实行。他迄今一直小心地不运用公共舆论，甚至共产党的舆论，来反对统治者。不过，他认为这一争论需要公开化。公开的讨论由官方发起，这给他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使他既能够利用公众舆论来反对统治者，又使统治者认同他的做法。他的真实的或表面上的自相矛盾，是有其更深刻的原因的。他认为，在专政和自由之间是存在平衡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限制或者扩大任何一个。他希望，这个政权随着俄国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将能够更少地使用强迫命令，而更多地依赖自愿的支持。革命应该能够永葆年轻。他认为，革命脱离人民只是暂时的。三人执政，特别是斯大林，则认为这不可能实现。

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大多数分歧的根源我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们在这儿已有所触及。双方都坚持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忠实拥护者；而且他们这种表白的真诚性是不容怀疑的。两派都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类似于基督教徒宣誓忠于新教和天主教一样的自然。双方由于相同的信仰，因而就几乎发现不了双方为何会对立。一种小心谨慎的但却是非常真实的革命乐观主义潜藏于托洛茨基的观点中。在他看来，统治者只要遵循的社会主义政策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就会对他们进行支持。这种信念的确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而且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公开地反对它。但是在斯大林的政策路线中隐藏着一种对于社会主义声望的深刻的不信任，甚至加深为一种对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绝望。在最近的这一例子中，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对人民坦率的呼吁上是革命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即使只有一线成功的希望。而当权的悲观主义者却不信任自己的人民。他们的理论被共产主义的悲观论者视为一种深奥的知识，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够真正地接受它，除非是硬性灌输给他们。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深信，根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的目标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前者认为，在适当的启蒙作用下，病人自己迟早会要求治疗；但后者则倾向于不管病人的个人意愿而强行进行治疗。然而，这种题外话也许不是本书讨论的范围了。

在季诺维也夫正式宣布公开辩论几周之后，斯大林向莫斯科工人居住区红色勃列斯尼亚的共产党员发表讲话，对“新方针”的意义进行论述。他坦率地承认，党内有骚动的情况，党没有感觉到全国情绪的变化。他认为地方组织是原因所在，它们不再讨论公共事务，并没有按照选举程序，赞同负责人由上级任命。中央领导的缺点就是没有及时地发现这些不正常的情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况。他继续说，“1917年……我们认为：我们将要有劳动者联合的公社；我们将把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消灭掉……可是实践表明，这对我们来说还不可能实现，要使国家摆脱官僚主义……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提高到一定程度，周围的和平环境必须有完全保障。有了这种环境，大量的常备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它的存在就会对其他一切国家机关产生影响。”这些弊端可以通过新方针而逐步得到纠正。但是党应该对过分地夸大自由的好处予以提防。地方组织应该恢复选举制度，但仍继续坚持对选举的限制性规定。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但也必须继续贯彻以前对它的一些限制。他讲话的重点在后面。斯大林说，某些批评者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支持，但斯大林不知道他们能这样做的原因，因为他知道托洛茨基是这样一个人：他坚持认为党不是用来争论的组织，在行动中必须遵守纪律。因此斯大林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以为托洛茨基对总书记的政策是支持的。从托洛茨基同三人以前交换的信件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暗示的本质是想挑起托洛茨基进行公开争论。

三天之后，在12月5日，托洛茨基给红色勃列斯尼亚区的共产党员一封公开信对斯大林予以反驳。他从政治局最近决议的视角出发，再三警告一般党员说，如果他们毫无节制地对领袖们施加压力，那些决议就是毫无效力的。“某些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易于对这架机器的作用作过高的估计，而对党的自我行动能力则估计过低，因而不支持政治局的决议。他们说，中央委员会承担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工作，这个决议只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产生消极的结果。”这当然不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现在党应该恢复自己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它过去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架党的机器的作用而放弃了这些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东西。“党应该使它的机器对自己绝对服从，永远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组织。”党应该“公正地”发扬批评作用，“首先应该撤换党内那些人，他们纷纷即刻用镇压的方法去对付批评、反对和抗议的声音。新方针应该由此开始运作，使得从上到下生活在这个机器下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在党内实行恐怖政策。”托洛茨基还呼吁青年；他仿佛是把目标指向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老近卫军”三人执政，对全党提出警告说，革命的“老近卫军”在逐步地蜕化为官僚主义者。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欧洲社会主义改良派领导中，也可能出现在布尔什维克中。从他的这封信中，公众看到了政治局内分裂的一些预兆。

三人执政立即迎接这一挑战。感情冲动的季诺维也夫提议立即监禁托洛茨基。斯大林则考虑得更多一点，他意识到托洛茨基的崇高威望，因而对采取这一步骤持反对意见。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一阶段，甚至在以后，他努力使自己表现为三人执政中最温和、最和解和最讲理的人。他对于托洛茨基的批评，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批评要温和一些。他知道党内不满于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就让他的伙伴们猛烈地诽谤托洛茨基，从而大大损害了这些人和托洛茨基的威信。他自己则致力于去完成更为谨慎的任务，也就是控制党的机器。他习惯于把党内生活的技术问题视为重要问题，所以急于通过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正式裁决反对派。把这一争论提交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将是冒险的行为，因此决定召开一次由各地方组织的书记、官员和总书记处所指定的人参加的代表大会。像这样的会议必定是受三人执政指挥的，而它作出的反对托洛茨基的裁决，又肯定会对其他党员产生影响。这次代表会议预计在1924年1月召开。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与此同时，在 12 月底，斯大林被卷入了一场围攻战。矛头主要指向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其次才是指向托洛茨基的。谬误和似是而非的推论充斥于他的论点中，但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它揭露了反对派内心的谨慎与自相矛盾。难道反对派的要求只是废弃列宁关于禁止党内存在派别的规定吗？答案是对还是错？反对派对于这个问题无法给予明确的答复。无论如何，托洛茨基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要求对他曾经赞成过的列宁的规定予以遵守；但他又声称，有人滥用了这些规定。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大林集中地攻击托洛茨基，迫使托洛茨基撤退，把一个一个的阵地放弃掉。到那时，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已经被弄得失去了斗志。企图去夺回自己失去的阵地已经太迟了。

在这场辩论中，当列宁仍在患病当中的时候，崇拜列宁主义的风气实际上就开始了。凡是直接或间接要求对于列宁曾授意过的任何措施予以取消，这时都成为一种违反了列宁主义思想的无可原谅的罪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宣称，恢复 1920 年以前像在布列斯特 - 里托夫斯克和约争论中所享有的自由讨论“列宁主义”的情形是党渴望的事情，斯大林立即反驳道，当时的那些习惯已不适于现在的形势了。他问道，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流的左派共产党人当时的打算不是以自己的政府取代列宁的政府吗？这部分确实是事实。不过，没有任何人在布列斯特 - 里托夫斯克争论中，甚至在此以后，因这种思想而受到任何责备。左派共产党人对于同德国妥协持反对态度，他们有段时间在中央委员会中还是多数派；因此是否由他们自己接管政府是他们本能的考虑，他们还考虑到是否负责指挥这场列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宁所反对的战争。当布列斯特 - 里托夫斯克争论结束后，他们仍然同列宁在一起共事。但是到了 1923 年的现在，1918 年的这个插曲反而成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了。因此，斯大林曾暗示，党应该对那些鼓吹回到这种有害的实践中去的人们进行提防。

列宁主义迷信者认为，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最不稳固的。他曾经警告全党警惕老布尔什维克近卫军“变质”的危险；而且他在文中使用了“我们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这一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由于目前的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直接参加过十月革命，所以他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用讽刺的口吻回答道，“我要保护托洛茨基，以免他自残”，因为托洛茨基必定不属于那种现在被称为蜕化的老近卫军。他继续说，是托洛茨基主观想象出老近卫军的蜕化。瓦解党的成员的确是存在的，但那是一部分孟什维克，他们虽然加入到我们党中，却没有把机会主义的旧习气根除掉。就用不着对这种讽刺多解释了。

这场辩论连同它的暗示与闲扯，只不过是未来代表会议摊牌所作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为了削弱反对派总书记处，分散了其领袖。托洛茨基由于生病和思想上的保守，变得没有斗志。拉柯夫斯基则被匆忙任命为苏联驻伦敦的公使，因为 1924 年 2 月苏英已建立了外交关系。克列斯廷斯基被派到德国担任外交官。越飞则前往中国。反对派只能默认这种分配，因为这些分配都是合理的。这些新任命的的外交人员自然对党内事务不能进行干涉。乌克兰在拉柯夫斯基的领导下曾经是反对派的聚集地之一，总书记处派了拉札尔·卡冈诺维奇去对那个堡垒进行清理。卡冈诺维奇从前是一个皮革工人，后来成为一个作风强硬的行政官员。在莫斯科，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小

斯大林政治传记

册子已被禁止传阅。那些动摇或怀疑的党员几乎没有理解双方的论点的机会，地方官员无疑是忠于三人执政的，因此已经事先安排好了这次代表会议的结果。

在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比以前更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只对一个问题进行论证，就是不存在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人们忘记了“有时候是不可能实行民主的而且民主本身也没有意义的”，即使在党的极有限范围内也没有实行民主的必要。实行工人民主的条件必须是经济上的繁荣，军事上的安全，以及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现在不具备这些条件。虽然党还不是民主的机构，但也不能指责说它是官僚主义的。他的论点是不明确的；他说组织即非民主的又非官僚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混乱的。但是恰恰这个模模糊糊的性质就是他论点的力量所在，它安定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接着，他把托洛茨基所犯的“六个严重的错误”一一列举出来。托洛茨基曾经对政治局关于新方针的决议表示支持，后来又反对——他把自己超然于同事们的之上，采取了高人一等的姿态。他从未明确表明过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的创始人”煽动党反对它的机关，又煽动青年对党进行抗议。他已经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其他的领袖们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人。他把党内出现秘密的派别和集团归咎于体制出现了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者都明白，不同的集团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党必须是统一的完整的组织。党应立刻接受二十万“从工作台来的”工人，使他们将坚强的无产阶级精神注入党内，使他们不致于遭受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这就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的内涵。最后，斯大林制造了一次引起党内纷争的运动，他把列宁在第十次代

斯大林政治传记

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中的一个条款分开了，这个条款指出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进行派别活动的党员。他要求代表会议对这一条款重新审议。大会通过了他的所有建议。这次代表会议对反派进行了谴责，称它们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偏向”。

三天之后，也就是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尽管国家近年来一直处于失望和悲惨的境地，但人们仍然对列宁怀有深切的悼念之情，其程度比历史上的很多领袖都要高。在群众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是革命的宏伟前景的代表，是平等而自由的社会代表。悼念的群众已经开始怀疑他的信徒了：究竟他们之中谁将取代列宁来掌握国家的命运呢？尽管最近一些争论和逐除教门事件相继发生，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支持托洛茨基的。但是当群众在瞻仰列宁的遗容和其他纪念集会上最后向列宁表示敬意时，托洛茨基却不在场。他到高加索治病去了；而且如果他的话属实，他没有赶回莫斯科参加葬礼原因在于，斯大林向他通知了错误的日期。所以说，这一偶然事件在历史的天平上虽然不太重但仍然是有份量的。但事实上，三巨头在那些天拖得很长和精心策划的葬礼上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三巨头象征性地到达这一突破口时，高明的舞台监督使他们处于灰光灯的聚集中，所以他们显得异常高大。斯大林自己的记事手册，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经过：

1月21日：晚六时五十分，列宁在哥尔克村逝世。晚九时三十分，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开始出发前往哥尔克村。

1月22日：斯大林对《告苏联全体劳动者书》进行了修改，电告各地党组织，号召它们对于已逝世的领袖的学说要坚定地信仰。

斯大林政治传记

1月23日：上午九时，列宁的灵柩被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抬出哥尔克村寓所；下午一时三十分列宁的灵柩被斯大林及其友人们从帕维列茨车站抬至莫斯科的工会大厦，人们可以瞻仰四天；下午六时十时，斯大林在列宁灵旁守灵。

1月25日：斯大林号召全党把列宁的遗作收集起来，送交新成立的列宁研究院保存。

1月26日：晚八时二十四分，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誓忠于列宁。

1月27日：上午八时，斯大林在列宁灵旁守灵；上午八时三十分，斯大林站到守灵者的最前面；上午九时列宁的灵柩被斯大林和其他人抬出工会大厦；下午四时，红场葬仪结束了，斯大林和其他人把列宁的灵柩抬入已准备好的陵墓中。

1月28日：斯大林在一次纪念会上进行演讲。

这种精心策划的仪式与列宁的观点和风格是完全不符的，众所周知，列宁是清醒和不喜欢浮夸的。这种仪式是为了煽起原始的、半东方的人民的情绪，煽起新的崇拜列宁的狂热。红场上的陵墓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无视列宁遗孀的抗议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愤怒，在陵墓中还是陈放了列宁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对千百万农民来说，革命曾经压抑了他们的宗教本性，因而这座陵墓很快就变成他们信仰的圣地，一个无神论教义的圣地，一位先知和一些圣徒，一座圣墓和许多圣像是它们需要的。原始基督教也是一样，当在异教徒国家传播它的教义的时候，把异教徒信仰和仪式的成分吸收到自身中，使它成为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西欧思想的产物，它也把俄国根深蒂固的拜占庭传统和东正教风格吸收了过来。这种过程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则在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

些流亡在西欧的人的脑子里是以纯粹的形态出现的。现在，这种学说真地移植到俄国并对一个伟大国家的思想进行了统治。在这之后，它必然会把这个国家的思潮、传统和风俗习惯吸收到自身当中。这种过程已默默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任何人都都不如列宁那样更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而且认为它很棘手。他的逝世消除了他的许多信徒在纯马克思主义上的禁忌，成为了他的许多传统思想的发泄口。这是一种学说和产生它的环境互相同化的程度的反映。

一个在东正教中成长起来的人，自然会具有某种宗教性格从而成为这种变化的首要代理人，而且最充分地表现这一变化。他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誓对外的忠诚，那篇誓词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认为最充分和最有机地表露了他的思想。在这篇誓词中，《共产党宣言》的风格同东正教祈祷书的风格奇异地混为一体，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紧密地结合了老斯拉夫的语言。它的革命的祈祷听起来类似于为教堂唱诗班写的连祷文：

同志们！我们是具有特种性格的共产党人，特殊材料制成了我们。……由列宁同志创立和领导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无比高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加入这个党。并不是任何人对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可以忍受得了。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女，在艰辛和勇猛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应该首先成为这个党的党员。……

列宁同志逝世时嘱咐我们要对党员这个伟大称号无比珍视，并把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保持下去。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遗嘱坚定而光荣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地执行下去……

列宁同志逝世时嘱咐我们要如同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遗嘱坚定而光荣地执行下去！……

列宁同志逝世时嘱咐我们要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保护并不断巩固。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遗嘱坚定而光荣地执行下去！……

列宁同志逝世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对工农联盟进行维护。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遗嘱坚定而光荣地执行下去！……

列宁同志逝世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努力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遗嘱坚定而光荣地执行下去！……

列宁同志逝世时嘱咐我们要对共产国际的原则忠实地执行。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地来巩固并扩大共产国际这一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

根据最近以来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可以认为，这篇半神秘的誓词不带有一丝真实性。也许这个结论过于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这篇大肆吹捧的告别词的确是极为虚伪的。只有一点是确实的，那就是他认为列宁是自己的正统导师。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拥护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他也担任了列宁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十年了。有五年多的时间，即六个困难重重的极为混乱的年头里，他直接受列宁的领导，忠心耿耿而又卖力地工作着。难道他们之间持久而密切的联系不能代替短暂而激烈的冲突？斯大林仍然认为，他同列宁的冲

斯大林政治传记

突只是一个插曲，一次误会，仅此而已。如果列宁康复，他们之间的小误会就可能加以圆满的解决。他肯定认为，他对于列宁遗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他很可能意识不到，对列宁的个人崇拜，特别是他那篇半宗教式的誓词，听起来就像是在嘲讽活着的列宁。

这时，他把自己理解的列宁主义，讲授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共青团员学生，这所大学是用来为党培养新的知识分子骨干的。他对这一题目的阐述既无创意又无聊，因而它不是一种概述。他阐述的形式是他惟一的创意。列宁的学说本质上是社会学的和试验性的，但他却把它说成是可以拯救人类的一系列僵硬的战略策略和原则的金钥匙，而且一一精确地列举出来。他通过一种不合逻辑的明晰而简单的风格编纂和形式化了列宁主义，从而对那些缺乏社会学训练的人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引证列宁的话来对他的每一个论点进行支持，有时是毫不相关的，有时则是牵强附会，就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从圣经中去寻找证明自己想法的根据一样。当然，列宁也经常从马克思的话中寻找自己想法的根据。但是，斯大林过于极端地发展了这种习气，以致用阿基米德的话都可以证明他的做法说：“给我一条列宁的语录，我就能够把地球推动。”

这时，斯大林脚下的地球“会被”列宁的一条引语翻动，这就是他的遗嘱，但全党和斯大林本人都还不知道存在着这样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只是在列宁逝世后四个月才在5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宣布，这次中央全会召开的目的在于决定这个文件是否在下次代表大会上公布。一个目击者对当时的情形这样描述说，“这一可怕的事吓得所有与会人员目瞪口呆。”“坐在讲台上的斯大林，看起来显得弱小而可怜。我近距离地观察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尽管他表现出沉着和镇定，但显然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到来了。”因为当时迷信列宁的风气正盛，如果对列宁的遗嘱不重视，那几乎是亵渎的行为。在这重要时刻，季诺维也夫把斯大林挽救了。季诺维也夫在会议上说：“同志们，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像法律一样，我们必须遵守……我们对列宁在临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曾宣誓去完成。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对那个誓言将一直坚持下去。”“但是，我们很乐于证明，列宁所担心的事情中，有一点是没有根据的。我指的这一点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问题。对于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亲密合作大家都已亲眼目睹了；你们也会像我一样，认为列宁的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同意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一职。但假如加米涅夫的呼吁得到大家同意，那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不应该发表列宁的遗嘱。克鲁普斯卡娅抗议对她丈夫遗嘱的压制，但终归无效。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他太骄傲，以致不愿对这种也将影响到他的地位的局势进行干预。他没有对此发表意见，只是在脸上表现出对这一事情的厌恶。季诺维也夫建议，不公开发表遗嘱，只是向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暗地里通告一声。这一建议以优势票获得通过。斯大林这时才松了一口气。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而且这次的掌权是稳固的和长久的。

三巨头的团结受到了特殊状况的考验，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深信，他们对斯大林的害怕程度要小于对托洛茨基的害怕程度。这时共产国际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三巨头中资历最深和最得人心的人也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则认为自己的才智要高于他的伙伴们。他们两人都视斯大林为自己的助手；而且他们虽然有时有些担心他的刚愎任性，却对他有成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列宁惟一继承人的野心十分确定。在这件事情上，全党也是一致认同的。相反，要引起对托洛茨基的怀疑，却要简单得多。三巨头的代理人诽谤托洛茨基说他是潜在的丹东，或者换句话说，是俄国革命的独裁者。这些流言蜚语发挥了作用，因为党从一开始起就习惯于同先前的法国大革命进行比较。人们总是承认，历史有重复的可能；单独一个篡位者或一个执政府可能再次通过革命手段爬上权力的顶峰。他们确信，俄国的篡位者类似于它的法国原型，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战斗中赢得光辉和声名。那么托洛茨基对于扮演波拿巴这一角色是非常适合的。的确，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只有斯大林可能不适宜扮演这个角色。斯大林的力量一部分也是源于这一点。

在特殊情况下，默默无闻是一个想得到权力的人的最重要的资本。党一直被教导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反对，而为实现集体主义而努力。在党的领袖之中，谁也不如斯大林看起来更符合上述情形。默默无闻恰是这位总书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差不多不具有个人的性格，这一点对于匿名的阶级力量和党来说，似乎是最适合的。看起来他的态度是十分谦逊的。与其他领袖相比，他更像是一个普通官员或党员。他力求同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省委书记、受欢迎的讽刺作家和外国来访者进行接触。他是沉默寡言的，因而非常适合去耐心倾听别人意见。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抽着烟斗站在楼梯口，一动不动地长达一两个小时地听着一个激动的人谈话，只是在提几个问题时才说几句话。他的这一性格使他看起来就像是毫无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和他交谈的人，对能够倾吐积愆而深感欢欣与安慰，对于斯大林在谈话中不推心置腹很少有人责难。其实，他的秘书说，斯大林“从来不向任何人吐露心

斯大林政治传记

声。只是偶尔才同最亲密的伙伴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有能力可以高度保持沉默，在一个人们喋喋不休的国度里，他在这方面是独树一帜的。”

几乎没有人指责过他的私生活。巴然诺夫说：“这位政治家除了性情暴躁外，没有其他恶习。他不贪财，不爱娱乐，只同他自己的妻子打交道。”在内战中，他又一次结婚。他的妻子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是一个工人的女儿，比他小二十岁。1917年七月事变时，列宁就躲在她的家里。她在革命后曾担任列宁的秘书，并于1919年前往察里津。斯大林和这位女共产党员相爱就是从那儿开始的。现在，他们住在一座过去是克里姆林宫仆人的住区的小屋子里。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专心地求学于莫斯科一所技术学院。有清教徒精神的党称赞这位总书记简朴的甚至是严谨的私生活，因为党这时已经越来越担心克里姆林宫中腐化和放荡的最初迹象。

那时斯大林给人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可以容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我们已经看到，他攻击反对派时比其他两个巨头要温和一些。他演说的调子是温厚而安抚的，这同党越来越滋长的自满情绪是相吻合的。在政治局对重大政策进行讨论时，他似乎从不固执己见。他对辩论的过程小心地关注着，见风使舵，总是趋向多数投票，除非他事前就已经能够肯定他已经属于多数派了。因此多数派一直很喜欢他。对于一般党员群众，一个没有私人恩怨的人，一个客观的列宁主义者，一个捍卫学说的人，他只是为了事业的缘故才批评别人，这是他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甚至当他在政治局内部讲话时，他也是这样表现的。因而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斗争的时候，托洛茨基向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来访者描述斯大林是“一位诚挚而勇敢的革命

斯大林政治传记

家”。有人对政治局的情况进行描述时，就生动地谈及斯大林的优点。巴然诺夫写道：

我首次参加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时，三巨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正处在高潮。第一个到会的是托洛茨基，另外一些人没有按时到，因为他们要在会前进行一番策划。……季诺维也夫是第二个进来的，他经过托洛茨基身旁，两人没有互打招呼。当加米涅夫进来时，他向托洛茨基微微地点了点头表示致意。最后进来的是斯大林。他经过托洛茨基的桌子旁，很友好地问候他，并同他隔着桌子热烈握手。

在1923年秋季的另一次会议上，三巨头中的一个人提议，托洛茨基尚在负责的军事人民委员部的监察员一职由斯大林担任。托洛茨基恼火于这一建议，宣称他要辞职，并要求把他在俄国的一切职务和荣誉予以解除，他可以到德国去参加当地的革命，因为当时看起来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非常脆弱。季诺维也夫反对说，也要求让他去参加德国革命。斯大林化解了这场冲突，宣称“这两位如此重要和可敬的领袖的服务是党所不能缺少的”。

他在幕后谋划和等待时机的到来。1924年5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虽然再次谴责了反对派，但反对派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同时也必须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那些无论是德国人、波兰人还是法国人的欧洲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或者抗议托洛茨基丧失信誉的行动，或者企图平息双方的冲突。季诺维也夫在幕后作了很大的努力，才把那些人的“吵闹”平息了。这是因为惟一胜利了的共产党的威信、国际的神话和十月

斯大林政治传记

革命的声望是支持他的。他也支配着国际的财库，这个财库的最大捐献者是俄国，而俄国是一些欧洲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的对象。三巨头用尽了一切高压手段，开除或贬黜了许多共产党领袖，才使 1924 年 6 月至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采取了反对俄国反动派的措施。斯大林在此以前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时也在共产国际的波兰委员在会上发表演说，对波兰人同情托洛茨基的偏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斯大林小心行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三巨头之间的政见分歧。虽然到一年以后，即 1925 年，他们的争吵才真正开始；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个人之间的猜疑已经损害到他们的关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感到，斯大林背着他们正在加紧掌握党的机构。斯大林则妒忌他们在理论问题上的权威。在斯大林谴责托洛茨基之后不久，他就第一次吹毛求疵地公开对加米涅夫在理论问题上不可靠进行了攻击。三巨头中的每一个人都充分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分裂，可能会造成任何一人联合托洛茨基来反对另外两人。但并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缓和和对斯大林的攻击的原因，虽然他们两人最后还是联合了托洛茨基。斯大林在策略上早已对这一切有所考虑。作为一个策略家，他比他的对手们高明。

最后，斯大林仍在等待他的对手因为本身的态度问题而铸成的大错。托洛茨基对列宁迷信是接纳的，即使这一接纳损害了他的理智精神和欧洲情趣。列宁信徒的这件制服对他来说是过于紧小了。但是，列宁的神话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如果有人要想赢得共产党群众的心，就不能忽视它，更不能挑战它，因而托洛茨基在战斗中的状况是软弱的。三巨头大量引用列宁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过去批评托洛茨基分子的话；而使他更加苦恼的是，他对列宁的十二年或十五年以前的责难也被翻了出来。所以一些青年共产党员认为，这些引语加在一起，情景就出来了：从 1903 年的分裂开始，一直到布列斯特和约和工会问题的辩论，在整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在每一事变的关头都对列宁进行恶毒的攻击。列宁主义的教条指出，因此要谴责托洛茨基。

对托洛茨基说来，如果不接受这一教条，那就等于是呼吁非共产党的舆论来对党进行反对。斯大林肯定托洛茨基不会那样做。在党的外面，革命者潜在的灰心情绪混合着明显的反革命倾向。由于托洛茨基是统治集团攻击的目标，反而许多过去恨他的人对他虚伪地同情起来。当他在莫斯科街头出现时，群众以自发的掌声来欢迎他。这些人中有理想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确全都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希望有一次变动。恰恰因为托洛茨基没有把这些混杂的分子集合起来以对自己形成支持力量，所以他就几乎在每一行动中都表现出胆怯和犹豫不决。他继续反对把自己等同于党的三巨头；但是即使在反对的过程中，他也仍然屈于党的威力。他的每一行动都没有形成有力的攻击。斯大林可以耐心地等待他的敌手通过这样一系列的示威而把自己打败。

正是在这一点上陷入了僵局，直到十二年至十三年以后的悲剧性审讯中才重新打开了局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在理解那些审讯时才可以发现最重要的线索。在 1924 年 5 月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面临党书记们对他的责难，几乎使他向他的批评者投降和公开放弃反对立场。克鲁普斯卡娅、拉狄克和其他人企图平息双方的争斗。但是，季诺维也夫却不接受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劝。他要求托洛茨基必须在行动和思想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承认他的批评的错误性。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这是头一次一个党员被模模糊糊地指控“在良心上犯了罪”。这一罪名纯粹是一种神学上的罪名。但他的动机却不是科学上的而是策略上的，因为托洛茨基虽然对党的纪律予以遵从，却不公开承认错误，他似乎仍然形成对三巨头的可怕威胁。季诺维也夫因而增加了一条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投降条件，它将迫使托洛茨基的斗争具有不平等性。这样，首次提出“在良心上犯了罪”这样一条反党罪名的人，在十二年之后被处决的罪名是承认自己“在良心上犯了罪”。斯大林至少在表面上没有被卷入这一做法。他只重复地说，托洛茨基必须停止自己的攻击是唯一的和解条件。他不断地表现出这种姿态，看起来好像是要挽救他的反对者。

这场悲剧孕育在托洛茨基对季诺维也夫的答复中，它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残酷性甚至要大于对托洛茨基的：

最后分析的结果，党总是正确的，因为无产阶级为解决其根本问题而拥有的唯一的历史工具就是党本身。我早已提到，一个人在自己党的面前，最容易的事是承认错误，说这些话是最容易的：所有我的批评、声明、警告、抗议统统是不对的。但是，同志们，我却不能这样说，原因在于我并不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一个人反对党绝对是错误的。只有同党保持一致，并通过党，一个人才能不犯错误，因为历史只提供了这条道路来证实正确的东西。有句英国谚语说：“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反正它是我的国家”。我们有更充分的历史理由来说：无论对还是错，在

个别的具体问题上，它始终是我的党。……

这些反对派领袖所说的话，类似于一个爱国的英国异端分子所可能说的话。那些异端分子在对自己的异端思想进行承认时，虽然悔恨，却又很顽强。他们只把教会看作是救星，但救星又不是教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声明进行讽刺驳斥，他说党从未宣称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所谓的“著作辩论”是斗争的下一个阶段，它始于同年秋季。托洛茨基写了一本书，名为《十月革命的教训》，把一个新题目引入争论，它表面上不涉及迄今所进行的争论。革命的技巧和领导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这本书研究的对象。它的主要论点是，“革命形势”是稍纵即逝的，如果革命的政党无视它或不愿去抓住它，就会失去“革命形势”。革命的确不是能够想发动就发动的；它源于旧制度长期和相对缓慢的崩溃——这是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条件。但是，一旦这种崩溃达到了关键阶段，“主观”因素，即领导的作用就开始呈现出来。革命形势的能动性是其本性，它迅速地起落着。从静止的战斗发展为闪电般的运动和演习的阶级斗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革命参谋部的迅速和主动决策。某种程度的保守惰性甚至在最革命的政党中也存在。革命的右翼的思考和行动不能根据适合于形势的战略条件。它在决定性的地方和时刻犹豫不决，不注重时机，而希望无限延长这种在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托洛茨基用1917年的经验来对他的论点进行说明，特别提醒读者们对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尖锐的不和予以关注。

斯大林政治传记

托洛茨基的书从表面看来只是冷静而几乎是学院式的研究近代历史教训，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十月革命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说，托洛斯基对于 1917 年事件的看法，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托洛茨基把右派的代言人、革命的“工贼”这样的称呼加诸于三巨头中两个老资格的人身上。在书的序言里，他对当前的情况还有所论及，把在 1917 年布尔什维克战略对比于共产党人 1923 年在德国的做法。1923 年德国由于法国占领鲁尔，而发生了骚动。托洛茨基说，1923 年秋，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已经到了；但革命者没有把握住良机，同样地，1917 年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犯了胆怯而无为的毛病。表面看来，他是在对德国共产主义领袖们进行攻击。实际上，他仍然只在攻击三巨头，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因为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对德国支部的政策起了指导作用。

三巨头没有遭受这次打击。他们制造了对革命史的自己的独特看法，其中最大限度地把他们犹豫不决、不知所措以及同列宁不和的情况予以缩小甚至否认了。他们也竭力贬低托洛茨基在 1917 年的作用。这是首次对革命史进行一系列奇特的“修正”和“改正”，到最后，革命史几乎变成了让人读不懂的理论，其中的论述充斥着无数互相矛盾和张冠李戴。此外，从 1917 年以前起，所有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攻击和反驳，都再次从档案中翻出并公布于众。一般党员很厌烦这种情况，因为它看来无关于国家的悲惨情况以及党和政府的建设任务。许多人认为，这些领袖们正在莫明其妙地对他们不负责任的情况进行展示。

斯大林是惟一的保持威信的人。托洛茨基不管其观点对与否，都必须受到已经解决了的旧争论的责备。他过去不断重提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反布尔什维克行为，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尖锐地提醒大家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 1917 年的行为予以关注，这的确极大地损害了两人。托洛茨基只提出模糊的暗示来反对斯大林；这是因为斯大林在 1917 年时的任何言行，照例是不使用真名或采取一贯的难以捉摸的态度。这样，托洛茨基其实无意中地帮助了斯大林，使他的威望高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迫切需要斯大林给他们提出有力的证明，因为似乎只有他说的话具有公正性。果然，1924 年 11 月，斯大林就公开为他的伙伴们的列宁主义正直行为作证。他说，他的伙伴们是好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他们同党的不和谐只是暂时现象。在列宁 1917 年返回俄国之前，他自己也有某些地方做得不对。但是只有那种身在党内而又与党脱离的人，以一个局外人的恶意来对党进行观察，现在才会把那些旧的分歧重新提出来，并起劲地对这些分歧加以利用。至于托洛茨基，他在十月革命中作用不大。的确，他善于指挥战斗，但他只是在执行中央委员会意志；而且可以顺便说一下，甚至后来转而反对革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也打得挺好。“实践总部”是起义的实际领导者，托洛茨基甚至没有加入这个部。这就是斯大林对“修正”历史作出的第一个贡献，那些还记得起义实际过程的人对此大吃一惊。但是，整个说来，斯大林的论点听起来又有其合理性；托洛茨基认为，党的领导看来是一个不灵活的组织，它的行为需要列宁经常的鞭策，这必然会损害党的自尊心。甚至列宁遗孀即使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被说服出来庄严地对她丈夫的两个最亲密的信徒予以维护；对于一般党员来说，问题由于她的证明而解决了。

斯大林政治传记

“著作辩论”仍没有停止。斯大林把他在1917年所写文章的集子出版发行，并增加了一篇有关的序言。这场辩论转入当前阶段，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这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中有充分的表现。

1924年秋，斯大林第一次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思想。很快忠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检验就变为是否坚信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信念。在随后的十年到十五年中，只要有人经不起这个检验，那么他就要受到谴责和惩罚。但是，如果人们对斯大林文章的“导论”部分进行研究，就会对这一事实有所注意：斯大林第一次提出这个论点时不是刻意的，看来仅仅是作为“著作辩论”中的一个论点顺便提及而已。在数月中，直到下一年的夏季，作为斯大林的对头，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其他两个巨头，都认为不值得辩论这个论点。斯大林自己也在犹豫当中。1924年初，在他发表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他尤为强调指出，虽然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掌权，然而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行的。他说：

可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还没有解决。缺少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是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的，不能在一个国家内使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可以完成，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如果单靠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努力，是达不到目标的，——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个目的。

但是，他在 1924 年早些时候写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却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的修改，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断言。他停止发行《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版，把它作为伪经而予以抛弃。起初，他还对情况很快会使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缺乏认识。他在暗中对这个公式进行探索，当他认为自己正在朝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努力时，仿佛发现了新世界。

无数次证明托洛茨基是一个伪列宁主义者，并使托洛茨基名誉扫地是他当前的目的。三巨头对托洛茨基的过去进行了研究，托洛茨基 1905 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发动一场争论来对它进行反对；在争论的过程中，斯大林把他们的公式完成了。由于他的“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最初是为了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而提出的，所以理应总结和分析一下它们彼此的关系。

不断革命论理论是托洛茨基从马克思那儿借来的，并把它应用到俄国的革命中。他所说的“不断革命”有两层含义：一是他预见到，革命将在形势的压力下，由反封建主义转变到反资本主义阶段。二是，不同于当时一般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是先进的西欧国家而是落后的俄国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但是，只靠俄国是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的。革命也不可能只限于它的国界之内。它必须从国内的阶段向国际的阶段过渡。在俄国的影响之下，西欧也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到了那时，在一个广阔的国际基础上社会主义才会建立起

斯大林政治传记

来。因此，托洛茨基说，现在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人类进步，而且民族国家也在阻碍人类进步。革命的最终目标只能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包含于这个预言中。托洛茨基在 1906 年问道：“如果革命停止从俄国传到西欧，事情将会是什么样？”他严肃地答道，那时一种情况是它会屈服于保守的欧洲，另一情况是它被俄国经济和文化极端落后的环境腐蚀掉。

人们记得，在 1917 年以前，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个人贡献正是这一理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不接受它。列宁曾在一两个场合隐约提出对未来不无相似的看法；但是总体而言，他的政策的坚实的基础是：俄国革命的目标只限于反封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不断革命论”，予以拒绝。然而他也的确认为，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受到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刺激；到了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了那时，俄国在“先进国家”的帮助下，才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不对革命的国际性进行反对，而是对俄国在西欧以前从事社会主义的内在能力进行否定。他责备托洛茨基不重视农民，因为只有忽视农民依恋私有财产的人才会认为，在像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里，只靠自己就能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人们也许还记得，列宁 1917 年的想法转变了。他的党在一切实质上都对不断革命的论点予以认同。革命的任务也的确从反封建主义转变为反资本主义。一直到最后，列宁和他的追随者都期望着革命能够在俄国以外的地方进行。这时，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受到包围的堡垒，但是有足够广阔的力量和空间来坚持住。根据他们的看法，如果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来组织这个堡垒，那么它的内部生活方面能够作出重大的进展。在对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追随者完成这个任务进行鼓励时，列宁强调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在他们眼前展开社会主义试验工作的可能性。但列宁基本上还是从国际出发来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我们知道，斯大林在 1924 年仍然说，“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是达不到目标的。”但是他现在却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工作的完成只靠俄国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迄今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极为富足的经济。高度发展的工业能力是它的前提，能够保证整个人民的高度生活水平也是它的前提。问题就出现了：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甚至不存在微弱的工业，怎么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呢？斯大林指出，俄国广袤的空间和极为丰富的原料是它巨大的资产。照他看来，无产阶级政府只要能控制工业和信贷，就能发展这些资源，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因为在这样的努力中，包括农民在内的大多数人民会支持它。

斯大林公式的这个最本质的部分是十分简单明了的。它以清楚的语言告诉人们，自给自足是俄国革命的特点。的确，斯大林在没有解决很多问题前就作出了这个结论。他甚至对于他的批评者后来对他的论点提出的异议都不想答复。其中的一个异议说，大多数农民由于对他们的私有财产的迷恋，肯定要坚决反对集体化。他对此只是简单地把它说成是在恶意地诽谤农民。他也没有对另一个论点进行认真地考虑，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大多数先进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的密集工业化；而俄国只靠自己是无法赶上那些国家的。他的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击败资本主义的前提是社会主义能够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批评者推论说，如果俄国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从长远角度出发，俄国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成功。斯大林也没有企图对那些批评者的以下预言进行反驳：在一个匮乏的经济中，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一种新的和明显的物质上的不平等是必然会出现的。

但是，只是党内最有教养的人才能看得出斯大林推理中的缺点，他的公式对政治却是很有效的。一种清晰而积极的主张毕竟包含其中：我们能够自给自足，对社会主义大厦进行建设并完成它。这是因此，这个公式对于实际目的和论战都是有效的。对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它用另一个清楚明白的代替物代替了它。然而，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的考虑，斯大林却以一种复杂而模糊的形式提出他的论点。他用各种保留和限制的说法对它进行束缚。其中的一种保留就是：只要周围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威胁存在，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不可能实现。不可能像他的批评者说的会败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便宜货物”；而武装力量可能会击败它。在随后几年中，斯大林就经常谈到威胁俄国的这种危险，因而似乎对他的辩论起到了削弱作用。而且，他还继续表示相信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虽然这种信心处在逐渐削弱当中。总之，他在论点中一方面肯定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否定。

这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奇特之处还表现在其他地方。在争论过程中，斯大林把认为在俄国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说强加于他的批评者身上。于是他就把这场争论说成是发生于以下两类人之间的争论，一种人相信革命是具有“创造力”的，另一种人对革命是“灰心失望”和“茫无所措”的。到了此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他的批评者肯定认为俄国

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也断言过，这个国家组织经济的原则可能是而且必定是按照社会主义路线进行。特别是托洛茨基，内战结束以后，他就敦促政治局对于经济的管理工作要抓紧进行并予以强化；在早些时候，他还提出了许多主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他提出的一部分主张得以体现。

一种奇怪的感觉常常出现在研究这场争论的学者心中：很难把这场争论的目的说清；无限的激情和怨恨由它引起，结果却化成泡影。除了那些争论中的暗讽和曲解，研究者还惊奇地发现，这场辩论最后的焦点是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事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或应不应该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于单凭一个孤立的国家是否可以达到这个建设的目标。打个比方说，可不可能和愿不愿意建设他们所希望的大厦并不是敌对双方争论的焦点；敌对双方也不是不同意以什么形状和用什么材料来建设它。表面看来，可不可能给这座大厦盖上顶子是争论的惟一要害所在。斯大林断然说当然可以，而反对派则断然说不可以。但是他们双方都认可的是，这个“顶子”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能盖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一两代人才能实行。双方也同意，在建设的任何阶段，敌对力量都可能破坏这座大厦——他们经常在俄国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最后，也像他的批评者一样，斯大林承认说，在盖上屋顶以前很久，就不存在他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按马克思当时所设想的，西方的革命将使社会主义的俄国建立起同外界的联系。

争论者认为，这似乎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实际的活动家，他们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表现表明，他们还能够并肩工作很长时间，而让职业性的经院学者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那么，整个争论是不是在掩盖个人野心冲突？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肯定是个人敌对。但是，如果历史学家如此简单地看待整个事情，他就太荒谬了。他就仍然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而从上到下发生分裂；为什么它被俄国整整一代人争论不休；为什么这个伟大民族四分之一世纪的观点取决于它。也经常出现另外一种说法，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提出目的在于减少外国政府的怀疑，因为它们已经开始担心莫斯科指挥的“颠覆”活动。这种说法更是毫无意义。当斯大林对这个理论进行制定时，他的名字对于国外而言还是很陌生的；即使到了后来，减少外国怀疑的想法，也并没有使他停止对欧洲共产主义发出这样的声明，即使外国保守势力为之战栗。

就像发生在一些重大争论中的情况那样，争论的双方都强烈地对某种共同的原则进行信奉。因此，就不能从争论者表面的话，而且肯定不能从他们对“共同”原则的热情申诉中，而必须从他们论述自己论点的重点不同的微妙而经常是不易察觉的变化中去寻求这种争论的缘由。还可以进一步从争论者发表谈话和行动时周围的心理和情绪中去寻求这种解释。归根结底，都是从那些情绪中产生了理论上的争论；情绪是可以产生共鸣的，它向到处流传的表面看来是不易辨认的各种公式传达着重要的声音。由于争论者信奉的原则是相同的，所以听众们对他们的争论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争论是老一套的仪式。但是听众们还是侧耳倾听双方的各种暗示和暗讽；而且还饶有兴致地对双方话语中的含义和没有说出来的结论进行研究。从那些似乎是矛盾的保留条件和例外条件中他们很快就了解到了任何公式的起作用的部分。

现在斯大林论点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即其中真正生动

斯大林政治传记

而新鲜的地方，是他对于俄国革命的自力更生的断言。其余的布尔什维克老话都是非常传统的，有一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另外一些则是麻烦的东西。但是还必须不断地重复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从学说上来看，它们还是体面的。斯大林的一些新鲜的论点，表明了一种激烈修正党的要求。但是这种修正是以下面的方式提出来的：似乎它是赞同修正，是一种直接继承的正统思想路线。在许多学说的历史上，这种方法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我们不想引导读者对于这一场教条主义的丛林战争作进一步探索。只消说一说下面这个情况：斯大林正竭尽全力地把他的公式融入他从列宁那儿继承下来的整个学说里面。

有一种事实比这种教条之争更重要，那就是在革命后第七和第八年的现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是党内的大多数，虽然模糊但却确定地感到，需要估量和修正意识形态。这种需要不是理智上的而是情感上的；而且感到有这种需要的人，决不想脱离布尔什维克正统观念。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掌权七年必将会在它的观点上发生深刻变化。布尔什维克这时对于管理这个“占世界 1/6”的国家已经习以为常了。由于他们享有政权中的责任和特权，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感已经渐渐增强了。他们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所发表的那些特有的学说和观点，已经与目前的观点不能完全吻合。他们需要一种思想或口号使其能够充分表达新赢得的自信心。“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就是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对于不能控制的 5/6 世界的依赖感有所减轻。它在理论上给他们一种慰藉：只要不发生战争，任何东西也不能动摇他们对俄国的主宰。对私有财产迷恋的农民，在工业上国家的弱点，低的生产率，甚至生活水平的低下——所有这些都不能威胁旧制度的复辟。不管谁谈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到那些对革命带来危险的情况时，就会对党的自满情绪有所触犯。

仅仅统治阶层内存在这种心理状况，但有更为广阔的暗流存在于它的下面：党和工人阶级已经厌烦了布尔什维主义所朝思暮想的世界革命。在 1917、1918 和 1920 年这种期待曾破灭过，到了 1923 年，德国的骚动中这种期待又再度升起。这次全党又对希望的迟迟不能实现而灰心丧气。“欧洲的工人阶级对我们表示支持；他们听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话，沉迷于资本主义的纸醉金迷生活”——简单地说，许多有政治头脑的工人对西方日常消息的评论也不过如此。这种思想是令人头痛的，它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联系在一起。因为不管怎么样，人们认为外国共产主义的胜利或失败将最终决定俄国共产主义的命运。通常在对“落后的”俄国和“先进的”欧洲进行谈论时，有些党的演说人甚至把俄国贫穷和西方富足的一些有力的比较数字列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一般的布尔什维克一心一意地要同这种思想决裂，而斯大林好像为他们提出了那种理论。

大概说来，斯大林对党的宣告就是：我们当然对世界革命充满期望。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下我们成长起来；我们知道，当代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国际性的。我们当然仍然相信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即将到来；尽我们所能地去加速这种胜利的到来是我们深感荣幸的事情。但是，不必过于担心世界革命。即使它无限期地被推迟，即使它永远不会到来，我们这个国家也同样成为一个强大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那么为了进行这项伟大的建设工作，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有些人说这是乌托邦，也有些人说我正在鼓吹民族狭隘思想，他们这些人本身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就是投机者或者是胆怯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和我们很多受鄙视的农民，为社会主义做的工作比所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做的工作加在一起还要多；而且我们还要联合我们的农民，去做其余的工作。

将在名词术语上的虚夸和伪装的辩证法深度除去，斯大林的理论在根本上是一些实话。但是作为它的创造者的斯大林，这时却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理论家了。现在他既是总书记、党的行政专家，又是一个创作新教条的人了。一些老的、有教养的布尔什维克认为，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没有料到的事。记得在那些日子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斯大林被一场理论的争论纠缠住了，一个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梁赞诺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打断他的话并说：“算了吧，柯巴，不要再逞强了，谁都知道你不擅长理论方面的知识。”但是，梁赞诺夫只是讽刺，并没有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变成了国家的信条进行预防。尽管它是旧传统，但一定的份量和存在的理由包含在斯大林的这一发明当中。一般说来，理论有两种：一类始于一系列智力活动，大胆地对遥远的、还不清楚的未来进行探索；另一类虽然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创造性的预见，但却总结了一种有力的趋势和从未有人表达出来的舆论或情绪的趋势。斯大林的理论显然应当归为第二类。

对稳定的渴望是俄国社会在二十年代中真正悲剧性的特点，因为经历了最近的一些事情之后，是必然会出现这种渴望的。任何国家的未来都是不稳定的，但俄国是最不稳定的，因此俄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对这种风险予以延缓。二十年代晚期以前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所作的解释，就为稳定的前景提出了希望。另一方面，托

斯大林政治传记

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一名称就使人感觉是对已经疲惫不堪的一代人的不祥警告，说他们在有生之年得到和平和安静是不可能的。这个警告后来变成了现实，但它却几乎不为人所注意。

很多布尔什维克对担风险和不稳定的前途感到害怕，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时就对这一点进行了直接的利用。他称呼托洛茨基为冒险家，习惯于对革命的把戏进行玩耍。这种指责肯定是缺少根据的。在所有关键时刻，托洛茨基证明自己作为革命战略家是最认真的，并不倾向于进行轻率的冒险，他也不曾要求党在国外实行政变，而斯大林却与他不同。托洛茨基坚信在阶级斗争的一般进程中西欧的共产主义会依靠自己内在的势头取得成功，外界的倡议或帮助虽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其作用只是辅助性的。斯大林在对西方共产主义的机会进行估量时是抱着更加怀疑的态度的；而且他的怀疑是逐渐增加的。尽管如此，“不断革命论”的理论家却被坚定地称为“冒险家”。斯大林甚至走得更远，指控托洛茨基喜欢在搞恐怖活动，这种恐怖活动曾经使列宁都感到害怕。这种指控也是有失公正的，特别是这出自斯大林之口。托洛茨基在内战中时常使用恐怖手段，但他并不乐于使用它，类似于外科医生不喜欢放血。但是，在刚才描述的情况下，这种指责却是比较有力的。人们对继续实行恐怖政策感到害怕，就容易认为，把这种指责向托洛茨基提出的人，他本身至少不是心胸狭窄的。

斯大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能十分敏锐的察觉党内外所有心理上的潜流，如默默的祈求和无言的希望等。他认为自己代表这些潜流。在这方面，他大大不同于其他两巨头。在刚开始进行“不断革命化”时，他们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到了后

斯大林政治传记

来他们就出现了分歧。正如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后来承认的，他们开始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把列宁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一些过时的话加以引用，来削弱托洛茨基的声誉；但在心目中他们并没有争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一思想在党内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因此他们对托洛茨基理论的攻击就是虚伪的；他们不过是在无意义地挑剔革命前流亡期中早已被遗忘的插曲。他们甚至从未想过用自己积极的理论去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却并非如此。他认为，开始时它只是意识形态的假想敌，后来一场真正的意识形态斗争才真正开始。辩论的论点演化成了争端。他开始逐渐憎恶他的敌手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用某种积极的东西来抗衡它。他了解自己在哪方面的论点可以引起党的工作者和官员的最强烈反应，也就是说哪些方面可以用来动员舆论。这种工具落到“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这一理论之上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受到了神的指示，一种实际不存在的东西，即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幻景，立刻迷住了他。但是它的实现源于它符合许多人潜在的心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很长时期中对于他们伙伴的这种变化没有觉察到。他们对斯大林在单独一国可能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这一奇想只是耸耸肩膀；他们只认为它是一条棍子，在智力上较差的那个伙伴用它去攻击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就没有详细研究它的必要。甚至在1925年3月至4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正式批准这个理论的要求，而且果然得到了批准时，他们两人也没有异议。只是到了翌年秋天，在斯大林提出这一观点后已经一年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它的意义，并批评它把传统的布尔什维主义抛弃掉而赞成民族共产主义。托洛茨基在1926年以前还没有攻击这个教条，而

斯大林政治传记

那时这个教条已经广为流传了。

斯大林理论的实际含义是模糊的。这时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达到革命后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但是迄今这次变化还只是对它的精神方面而不是对它行动方面产生了影响。可以把这种变化的大致路线归纳如下：此前，布尔什维主义一直认为俄国是现代文明的边缘。在这个边缘，革命首先开始了；社会主义在那儿成为现实。从那儿，西方和东方的革命变化被推动了。俄国在世界范围的社会改造中，被看作是倡议整个运动的强大的人。但是现代文明的真正中心仍然是西欧；而且老布尔什维克认为，正是在这个中心形成新的社会生活形式而不是发生在那个边缘。整个过程是一种双重的影响的过程：首先是西方受到俄国的影响，然后是西方影响社会主义的俄国。

按照斯大林的理论，俄国不再处于文明世界的边缘了。正是在俄国国内，正在探寻和创立新社会的形式。成为一种新文明的中心正是它的使命，它在各方面都比正在以巨大力量捍卫自己的西欧资本主义文明要优越。这种对未来的新观点，无疑是俄国共产主义恼火于自己的孤立的反映；但是光辉灿烂的前景却为孤立镀上一层金。已经筋疲力尽和大失所望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正在倾向于民族主义，俄国怀着痛苦的心情展望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前景。

第八章 “大转变”

斯大林持中庸之道——托洛茨基的失败和三人执政的终结——出现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领导的右派——斯大林对亲农民的政策的支持——争论世界资本主义情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而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并联合托洛茨基——爆发伏龙芝事件——斯大林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维护、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反反对——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获得胜利：“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忠于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揭露斯大林——托洛茨基提出的“克里蒙梭声明”——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屈从于斯大林——斯大林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分裂——农民威胁要使城市陷于挨饿的境地——斯大林的农业的集体化——政治局决定驱逐托洛茨基出俄国——右派领袖遭到贬黜。“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斯大林发出“向富农发动进攻”的命令，并宣布计划把俄国转变成为工业强国——农村中出现混乱和实际上的内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苏联的总体情况——克伦威尔和斯大林——斯大林的民族感情——斯大林随从中爆发政治骚动——纳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即斯大林的妻子于 1932 年 11 月自杀身亡——斯大林关于社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会政策的论述——劳动管理、强迫劳动和对平均主义的反对——工业化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的“原始积累”

在 1929 年，也就是在列宁逝世后五年，苏联又开始进行它的第二次革命，斯大林一手策划了这次革命。从其规模和对约一亿六千万人生活的直接影响中，可以看出它甚至比第一次革命都更激进、更彻底。它使俄国迅速工业化；一亿多农民在它的压力下放弃了小而原始的土地财产，建立起来了集体农庄；它无情地把原始的木犁从农民手中夺下，迫使他们手握现代拖拉机的方向盘；千百万无知的人在它的驱使下进入学校，学会了读写；它从精神上使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脱离了欧洲，而又使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更加靠近欧洲。这次革命的收获虽然令人惊讶，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它使思想和政治的自由在一整代人中完全消失。这次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剧变，对它的艰巨和复杂性的估计需要丰富的想象力。甚至不同时代人们的一些丰功伟绩也不及它，与俄国历史上的一些最大的改革者如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以及其他民族的一些大改革者相比，这位总书记的形象是无比巨大的。

但是，这件巨人的袍子不适合斯大林的身材。第二次革命的规模严重地与它的制造者的才干不相称；在 1917 年的革命中这种不相称的情况却是模糊的。在 1917 年的革命中领袖和事件的伟大程度是相当的；在这次革命中，事件的伟大也使得领袖伟大起来。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达到他们革命的目标以前很多年就对它已有所预见和准备了。他们的思想肥沃了俄罗斯的土地，这有利于 1917 年的收获。但斯大林却不同。第二次革

斯大林政治传记

命的思想不是他提出的，他既没有预见到它的到来，也没有为它作准备，但是他却完成了它。他起初几乎是在紧迫的危险和压力下匆忙地去完成这一庞大任务的。他尽管心中有所恐慌，却开始了暗中的探索。后来，他处于两难的境地，就几乎取消了休息或停顿，大踏步地前进了。千千万万双疲惫而流血的俄国人的脚跟随在他的后面，在一个国家中寻求社会主义的一整代人也跟随其后。他的形象几乎接近于神话的程度。但是走近时发现，他仍然是一个具有极普通才干和思想一般的人。只有他的拳头和脚不适合他真实的身材——他的拳头和脚是巨人型的。

上面我们已经对斯大林在 1925 ~ 1926 年的生活进行了叙述。从那时以后，斯大林的共产党对手们曾经一再用反革命的反动派领袖称呼他，而在他身上大多数反共人士长久地看到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共产主义幽灵。但是，斯大林在二十年代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可以说是一个持中庸之道的人。他天生就对当时那些竞相要求党承认的极端观点厌恶之极。产生一些准则，尽可能和解两个对立的极端正是他的特殊任务所在。党内犹豫不决的多数党员认为，他的话听起来很普通。他们接受他的领导，是希望党的前进路线是可靠的“中间道路”，指导原则是“安全第一”。可以说，他就如同布尔什维主义中的鲍尔温或张伯伦、哈定或胡佛一样，同布尔什维主义是不和谐的。

他从未能够把中间道路坚持下去，这既不是他的过错，也不是他的功劳造成的；而且他常常在最大风险的压力下而被迫放弃“安全”的考虑。对于中庸之道和“常理”，革命照例是不会容忍的。革命队伍中那些想持“中庸之道”的人，常常发现他们脚下是正在裂开的大地。斯大林就曾为了避开断裂带而

斯大林政治传记

进行无规律而突然的猛烈跳动，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将看到他多次地或者走向极右，或者走向极左。他的阵发性的完全相反的跳动，是一个执中庸之道的人企图在社会大变动中保持平衡的痉挛性发作的最好的说明。使人感到吃惊的是，他把这种平衡保持得很好——如果是一个缺少弹力的领袖，别说多次，只一次跳动就足以摔断脖子了。

因此，尽管他的倾向是把布尔什维克中间的分歧予以调解，他却是一个不能妥协的人。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分歧根本无法调和，另外一个原因是那种调解人的性格是他所不具备的。他同那些能够妥协的人之间的惟一相同之处就是，他也对走极端的效果产生了怀疑。但是他缺乏平和之气，缺乏说服人的本领，一个政治调解人去缩短相反意见之间的距离的乐趣并不吸引他。他的性格完全不同于妥协，他思想和性格的分歧，为他的行为奠定了基础。他在党内坚持的准则，一部分来源于布尔什维克右翼，一部分来源于布尔什维克左翼。这种妥协原则是令人奇怪的，因为使两个极端靠拢不是它的目的，它的目的是助长两个极端，然后把它们摧毁。他不去调解那些比他更左或更右的人，而是干脆消灭他们。独裁是他中庸之道的具体化，是为了去对付革命后社会上出现的所有难以驾驭的理论和思想；这种中庸之道使独裁已失去了其中庸性。

对于斯大林鼓吹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教条我们先前已有所谈及。现在让我们把他在继承列宁的斗争中所进行的以下几个步骤迅速地追溯一下。1925年1月，他终于使托洛茨基不再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作为部队首脑的托洛茨基手中仍握有一张最可怕的王牌。如果他想击败那三个巨头，他可以搞一次军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事政变。但他离开他的职位时却默不作声，丝毫也不打算把他曾经建立和领导了七年的军队集合起来捍卫自己。不管党怎样领导或由谁在领导，他仍然视工人阶级是党的合法的发言人。所以他认为，如果他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予以拒绝，他就会代表别的阶级利益来反对工人阶级，他不认为波拿巴主义道路将是他会去走的道路。托洛茨基在辞职之后，就按照斯大林的指派，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机关中的次要工作。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一年多完全不参与一切公开的论战。

在托洛茨基退出斗争舞台之后，把三人执政联系起来的惟一纽带就断了。一直到了最后，季诺维也夫还叫嚣着以更为残酷的手法来对付托洛茨基，甚至要把他监禁起来。斯大林对这一要求持反对态度，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说，托洛茨基是不可能被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的。不久以后，他就对三人执政采取主动的破坏措施：他在政治局会议之前不再与他的另两个伙伴商讨他的动议。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他已稳稳掌握了党的政权，即使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组织之中的地位仍牢固，而季诺维也夫对于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也在继续领导着。不过，尽管斯大林已经牢固地把党控制住了，他还是只能借用合法手段，代表政治局中多数派发言来坚持自己的领导。党内集权主义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使它的党员向任何单一领袖的赤裸裸的独裁屈服的程度。的确，斯大林当时仍在重复他的老话，没有一位列宁的学生能够独自一人继承列宁的衣钵，只有作为一个集体才可望将列宁的衣钵继承过来。政治局就是这个集体；是通过多数票来合法地表现它的意志。1925年，有七名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三人执政完结之后，现在完全依靠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三名政治局委员来支持斯大林，他们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这个新的组合恰好吻合于党和政治局中的右翼。1925年上半年开始了这个过程，于1925年下半年完成。这一新倾向的主要发言人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而出面领导左翼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个新的组合与以前的几次组合完全不同。在列宁掌权的大多数时期里，左派共产党人的领导人布哈林，而在十月革命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最温和的集团的代言人。在列宁的时期里，各种派别的分界线既不固定也不明显。随着政治舞台的变化派别随之出现并又解散；个人随着情况、问题和态度的改变，在不同集团之间转换。昨天是左派，今天又成了温和派；或是反过来也是如此。当时忠于集团、小圈子和小派别的观念还不存在。现在这个组合的面貌完全变了。它的论战观点是固定的，分野是严格的；特点是不可改变的已成定局。左翼和右翼彼此对抗的纲领和口号存在于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斯大林不属于两翼中的任何一翼。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不得不联合右翼的发言的人们，因为他们在政治局里投赞成票是他所要依靠的。与他从前的那些伙伴们相比而言，他更亲近于新右翼的人们。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接受了，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这一理论进行驳斥。公平地说，这个理论的合作者之一可以说是布哈林。布哈林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论据，并把学术的光泽加在了斯大林的多少有些粗糙的说法上。斯大林同右翼领袖们结盟的原因还在于性格上的相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基本说来是一些空想家，布哈林当然也属其中。但如同斯大林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样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主要是行政官员。李可夫这时领导人民委员会，即他是苏联的总理。工会的领导者是托姆斯基。他们两人都通过极大的谨慎、坚强的现实感对巨大的行政机器进行管理。他们同斯大林讲的习语是一样的，即行政官员的习语。然而，在他的新联盟中斯大林还有丝丝的不安。作为政治局中惟一的中间派，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已被他的盟友们所俘获。他利用得到的第一个机会来对自己的地位予以加强。在 1925 年 12 月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进入政治局。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就由他们组成，虽然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关注更多是右翼而不是斯大林。作为一个思想迟钝而古板的人，莫洛托夫却极有耐心和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从 1913 年斯大林在他的协助下出版第一期《真理报》起，他就紧密地与斯大林保持一致。

怎样实际解释新经济政策是这场新论战中的主要问题。这个国家在新经济政策下，具有非单一的经济结构。国有工业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组成部分。在商业和小规模工业中，处于优势的是私人企业。私有制统治着农业。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同私营企业的竞争中才能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建成。

问题由此产生。究竟竞争应被控制在多大限度之内，将采取什么形式进行竞争呢？大家一致认为，两个部分之间一定程度的和谐和合作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如果食物和原料不从个体农民那里购买，不出售给他们一部分产品，就无法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商品是依赖于私商进行分配的。但是它们之间一定程度的敌对包含在这两部分的竞争中。农民吵吵嚷嚷地要求工业品更多和更便宜一些，要求高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工业从废

斯大林政治传记

墟中恢复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生产很少的货物而价钱很高，也吵吵嚷嚷地要求食品和原料更便宜些。笼统地说，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协调一致的合作一直是“布哈林集团”所强调的，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对它们之间利益的冲突十分强调。

这个总的问题演进为两个更为特殊的问题：俄国工业化进行的速度；政府如何看待私人农业。左翼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业恢复缓慢是社会主义危险所在，因此要求迅速地实行工业化的愿望很迫切。右翼则认为，社会主义的阵地必须确保，即使代价是放慢工业化的速度也无所谓。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工业化，但它需要资金。这就必须通过向私营企业和私人农业尽可能地征收才能获得。布哈林担心私营企业的主动性会被这样的征服破坏掉，从而把已经不稳定的经济平衡打乱了。左翼争辩说，无论怎样农民和商人都不愿提供货物，只有投入市场更多和更便宜的工业品，才能促使他们把更多的食品和原料卖出去。

与此同时，扩大在新经济政策下对他们的让步是农民们一直吵着所要求的。他们要求对农业税进行缩减。富裕的农民要求废除雇工的限制的愿望很迫切。由于土地的出售被限制住了，他们对允许长期出租土地，以及在农业上自由投资的要求很迫切，等等。执政党坚决主张同贫农和“中农”“联盟”，而不是同富农“联盟”。实际上还必须向富农作出妥协，因此他们还经常拒绝提供粮食给城市，并引诱别的农民也这样做。在二十年代中期，农民仅出售给城市他们在战前出售的三分之一的粮食。

1924年夏，农民的暴动在格鲁吉亚爆发。在1921年的入侵中，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感情受到损害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所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现在才作出反应。对经济情况的不满是一部分原因。斯大林把党的各农业组织书记召集起来开会，并警告他们说，“俄国各地都会重演格鲁吉亚发生过的事件”。他总结说，党已经脱离了农民；必须比以前更加小心和信任地同农民重新建立联系。

但是不仅仅是宣布要信任农民。政治局还没有决定下一步如何做。起初，这一争论引起的分野还是不明确的。给农民在苏维埃中更大和更多的实际管理权是季诺维也夫的坚定主张。托洛茨基争辩说，需要在经济上刺激他们。后来当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一种明确的亲农民政策的主张时，这个分野就不再模糊了。他们三人要求政府对于能够给城市提供粮食的富裕农庄的发展进行鼓励，因为贫农甚至中农不能生产出多余的粮食。这种态度的结果就是，要求党不再敌视富裕农民。布哈林认为，这些富裕农民无法形成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只要政府把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统帅地位”的工业、运输和银行控制在手。最后，按照布哈林的看法，甚至富农也能够带着一定愉快的心情被吸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虽然社会主义的航船的前进速度是按发展最慢的部门的步子。布哈林坦率地对农民发出“发财吧”的号召。

起初，斯大林在政治局里倾听着这场辩论时没有表态。为了实际的便利，他接受亲农民集团的政策倾向比较明显。但是他在心里却完全同意这种倾向，特别是当右翼公开对向富裕农民让步的政策进行鼓吹时。他企图说服他的同事们不要过于鲁莽，他拒绝负责布哈林坦率地向农村资产阶级发出的呼吁。当最后他把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出来时，他的说法却具有中庸色彩。实际上他已认同了布哈林所鼓吹的路线，但又急于把自己

斯大林政治传记

是布尔什维克正统的信徒的意向表现出来。

1925年4月间一次党的会议，把最近这些辩论的均势打破了。削减了农业税，大幅度撤销对出租土地、雇工和资本积累的限制，初步胜利是属于亲农民集团的。它主张这条路线并不是因为自己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喜欢，而是因为看到改善城市粮食供应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这种农业。

随着国内政策的改变，人们也接受了对国际形势的一种新观点。斯大林和布哈林告诉全党说，欧洲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其紧张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稳定已经获取，这肯定要使苏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陷入孤立境地。右翼的发言人预言，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将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也许与1914年以前的情形相近。斯大林小心地对可能打破“稳定”的情况进行了突出论述，但人们从他议论的一般调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把大战的后果克服了，国外任何新的革命危机还不是近期能发生的事。现在看来，出现在1929年大萧条以前两年的这些预言，似乎使人吓了一跳。这些预言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当时苏联政治中的渐进主义的倾向的后续。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正是在对苏联的费边主义进行反对中成为反对派的。他们对亲农民的政策进行谴责说，富裕农民越强大，他们就更加不愿意向城市人口供给粮食，并迫使政府越来越多作出妥协。一句话，他们就越容易对苏维埃国家造成损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政府应该把对中农和贫农的税收减少，而增加对富裕农民的税收。这时国家面临周期性粮食危机的威胁。以前，地主的大庄园保证粮食的供应，现在这些大庄园已经被分散了。革命前有一千六百万个农庄存在于俄国，现

斯大林政治传记

在却有二千四百万到二千五百万个农庄。政府应该开始对大农场进行建设，大农场即商品粮食的生产者。但大农场不是富农的大农庄而应该是大的集体农庄。

左翼布尔什维克认为，强迫农民进入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得到农民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逐步实现从个体农民到集体农民的转变。只有政府适当引导集体农庄，如供给拖拉机、肥料、种子等等，贫农群众才有参加集体农庄的愿望。这些东西将促进农业劳动的产量的增加，使其他小农对集体农庄的好处持赞同态度。但是，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有提供这样的一些东西的可能。此外，还必须教会农民如何使用机器。因此大家都认为，农业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左翼分子说，至少政府应该下决心展开这一改变。

左翼布尔什维克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看法持反对意见。他们一再重复列宁的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的爆发，也使全世界革命转变的时代到来了。他们认为，国外共产主义运动浪潮暂时的涨落，对这个时代的基本的革命性质并没有产生影响。左翼布尔什维克指出，中国的革命正在蓬勃发展，英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临近。

1925年，这场辩论从政治局到报刊和公众集会上都在进行。季诺维也夫把他的《时代哲学》一文和《列宁主义》一书也予以发表。10月间，一个备忘录由左翼领袖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自由辩论所有的争议问题。这份备忘录与托洛茨基以前的几次干预相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和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上面签名。

在两个极端派中真正的论战正在进行。斯大林没有对这场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论战贡献出任何一点自己的思想。他在一旁对那个大胆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不置一词，并称呼他以前的那些伙伴和追随者为“超工业化者”，虽然他们的计划同他几年以后提出的那些计划比较起来几乎可以说是很胆怯的。他谴责他们有破坏工农联盟的企图，虽然同 1929—1930 年的集体化运动相比，左翼布尔什维克还是相当温和地提出“反农民”的措施。他认为右翼所鼓吹的方针是很保险的，而且有利于眼前形势的发展。

但是他煞费苦心地在党内表现为一个赞成中间路线的人。他支持农民，支持贫农和中农，但反对富农。他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责难，说他们所鼓吹的恰恰不是在敌视富农而是在敌视中农。他称呼他们为超工业化者，然而工业化的思想却包括在他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计划中。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直到 1928 年末，工业化实际上被搁置了，正在执行的是右翼的纲领。斯大林模棱两可的中间原则是非常有效的，它既批准了右翼的政策，又不触犯那些选择左翼的人。

同时，这样的情况也有利于斯大林，即托洛茨基和那两个前执政者还没有决定是否携手合作来反对斯大林，虽然这时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多。从这种有利的立场出发，斯大林对他的分裂了的对手们予以关注，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疏远了还有猜疑和怨恨。他火上添油，模模糊糊地向托洛茨基示好，他的对手们因此而更为混乱。这位总书记的代理人殷勤地对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作出提醒，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季诺维也夫表现得要比斯大林更恶毒。在斯大林 1926 年 1 月发表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则完全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攻击，而抑制着不对托洛茨基说一句不友好的话，托洛茨基分

斯大林政治传记

子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拉狄克和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就力促他们的朋友们联合斯大林。另外一些人则厌烦这位总书记和他以前的伙伴。一个托洛茨基最亲近的朋友穆拉茨柯夫斯基就曾对任何联合的危险性进行简洁的描述说：“斯大林把我们骗了，而季诺维也夫又不出来主持大局。”另外一方面，曾经强烈灌输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们去反对托洛茨基，现在却要他们把托洛茨基的论点重新再进行论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历史的嘲弄。这时，总书记已经把铁腕伸向了这些新的持不同政见者，类似于他过去对付那些老的人。总书记已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们的职务。普通的工作人员还对他们过去由于赞成前反对派而使一些人丢掉了饭碗的事情记忆犹新，所以这次就没有发表意见，敢于冒这个危险的是那些最有勇气的人。总书记发出的“铁的纪律”则约束那些犹豫和动摇的人，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 1925 年 11 月，它表明，党也要对于“铁的纪律”的最无理的要求条件反射似地加以服从。伏龙芝代替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他最近病倒了。针对他的病，一些医生建议他进行外科手术，而另一些医生却因为担心他身体太弱而否认了上述建议。于是政治局作出让这位人民委员接受外科手术的決定。伏龙芝不情愿地服从了，结果手术失败，伏龙芝因此丧命。托洛茨基后来暗示，一些奉承的医生接受了斯大林的命令，向政治局表示同意进行手术，因而同季诺维也夫站在一边的那位人民委员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很难说清事实的真相。但政治局竟然有权决定纯属私人的事情，这是值得深思的。包括总司令或省委书记在内的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对党是绝对忠诚的。离开了党，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斯大林政治传记

他的上级甚至对他私生活中最隐秘的方面也加以审查。不用说，连伏龙芝都已向这种体制屈服了，一般的党员对于自己的权利就更不敢坚持了。党作为一个机构，被这位不宽容的总书记所利用了。

因此，无怪斯大林能够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把他以前的合作者打败，即使季诺维也夫成功地把列宁格勒的代表联合起来，进行了一场惹眼又规模庞大的斗争，但最后仍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他和加米涅夫两人对这位总书记的统治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过迟地想让全党关注列宁的遗嘱。这时，托洛茨基加给他们的、而在一年前他还为他们辩护的罪名都一古脑儿地被斯大林加诸于他们身上。他称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工贼”和“逃兵”。像过去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样，斯大林开始支持新的合作者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说他们对党的领导是坚定不可动摇的。他说，现在的批评者曾选举他担任这个职务，而他曾多次不想再干下去了。列宁格勒的代表们就高喊，“现在就辞职吧！”的口号，但多数派的愤怒吼声以及高声赞扬斯大林和“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列宁主义中央”的声音淹没了这一呼喊的口号。从这时起，这一具有特征的用语就流行开来。党在名义上还是由一个集体进行领导，但这个集体的领袖已无可避免的归于斯大林。按照党的章程，总书记不能作出其地位高于其他中央委员的要求，但实际上人们已公认他是“同辈之中居首位者”。多年以后，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已经下降为他的影子以后，他在名义上还是总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把反动派从它在列宁格勒的堡垒中赶走是他的第二步。这座极有影响的“列宁的城市”，不能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斯大林派谢尔盖·基洛夫到列宁格勒去代替

斯大林政治传记

季诺维也夫——在 1934 年谢尔盖·基洛夫被刺死，这为三十年代晚期恐怖行动开了一个头。在此以前巴库组织的书记是基洛夫，他还未被老布尔什维克所熟知。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组织者，他又擅长演讲。他被赋予要求列宁格勒人遵守纪律的全权。他很快，至少是表面上表现了这个目的。这个城市虽然继续对反对派持同情态度，但却被迫听命于那位总书记。

1926 年春他们遭受打击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最后坚决联合托洛茨基。这时，托洛茨基的地位已经进一步削弱，因为他否认了他的国外支持者发表的列宁的遗嘱。他甚至说这个文件不是列宁的遗嘱。因此，只不过是先前两个分离组织的残余组成了这两个反对派的联盟。

在斯大林听到他的对手联盟的消息后对他们挖苦地说：“唉，他们彼此赦免了对方的罪刑。”为了使他的三个敌手的联合显得可笑，他只消对最近期间他们三人相互之间都说了什么和写了什么稍作回忆即可。全党还听到这样的“内幕消息”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谈到他们自己以及斯大林阴谋反对托洛茨基。这些透露使人们对这些阴谋家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信任。因为人们习惯于把政治局看成是一切美德、特别是无私地为革命作出牺牲的场所，对他们而言，这些消息听起来是荒谬的。事实上，此时另有用心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也使这些消息的可靠性更令人怀疑了。他们透露给托洛茨基及其密友的事情的确是令人吃惊的。他们以肯定的语气对托洛茨基作出警告，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还透露，脱离斯大林以后，为了防备万一，他们已经立下了遗嘱。他们形容这位总书记为狡猾的、极具报复心的虐待狂，虚荣又贪恋权势。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如果这些是确实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和斯大林合作

斯大林政治传记

达三年之久？他们对此也没有感到惶恐，仍然继续去做他们大获成功的黄粱美梦。加米涅夫曾告诉托洛茨基：“只要我同季诺维也夫在主席台上一起出现，就能够重新执掌全党的统治权。”

不久以后，他们的幻想就被斯大林打破了。他知道，这个混合起来的反对派已经使托洛茨基陷入失败的犹豫不决之中。他也知道，这个斗争只会在党内进行。反对派从未想到要组织单独的党，因为人们已形成这些的共识：在苏联只有一个单一的党存在着，如果两个党互相竞争，其中之一肯定是反动派。不过，在形势发展的压力下，反对派不得不起一个反对党的作用。它每起一次反对党的作用，它的领袖们就增加一分懊悔和恐怖的情绪。于是走一步退一步，公开承认错误；再走一步之后，仍然满怀遗憾。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认为，这种不真挚和不诚恳的态度，必然会使反动派的追随者感到灰心丧气。

反对派在军队中的行为是最微妙的问题。伏龙芝死后，军事人民委员由伏罗希洛夫担任，这仿佛是察里津集团在报复托洛茨基。但是，伏罗希洛夫的副手仍是季诺维也夫的朋友和支持者拉舍维奇。不像 1924 年的反对派，现在的反对派没有立刻决定开始在军队中进行这一斗争，而是犹豫了半天。1926 年 7 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对拉舍维奇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说他是军队中反对派同情者的半秘密组织的领导人。这对反对派的打击是粉碎性的。拉舍维奇被开除军职，他的保护者季诺维也夫则被开除出政治局。

斯大林现在可以对反对派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反对派在这种威胁下撤退了。10 月 4 日，声明由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科夫、索柯里尼柯夫和其他一些人联合签署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了，在声明中他们承认触犯了党章，并保证把他们党内之党予以解散。他们还拒绝承担自己队伍中的极端派的责任，这个极端派的领导人是 1921 年的反对派头子施略普尼柯夫和麦德维捷夫。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同伙虽然承认没有严格遵守党纪，却又庄严而坚定地把他们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政治批评重申了一次。

这时斯大林再次采取了行动。1926 年 10 月底，他把托洛茨基从政治局中开除了。反对派在这个机构中现在已经没有代表了。他把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中的职位罢免了，并向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对他提出了控告，执委会批准了对季诺维也夫的罢免提议。在一次党的中央会议上，对政治局人员的变动予以批准，并在施略普尼柯夫和麦德维捷夫模范地承认错误之后吸纳他们入党。这样一来，就树立了一个未来的模式，即开除出党、承认错误和重新入党。

经过这些事件，1927 年上半年有一段休战时期，但这段休战期是不真实的，最后的时刻就要来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斗争之火又重新燃起。5 月 12 日，英国警察突然对在伦敦的苏联商务代表团驻地进行了搜查；两星期以后，英国同苏联的外交关系破裂了。6 月 7 日，一个俄国侨民刺杀了苏联驻华沙的公使沃依科夫。大约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立场转向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在此以前，他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并且中国共产党还加入了国民党。反对派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斯大林曾支持蒋介石，并制约了俄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蒋介石转为反共立场使斯大林很难堪。苏英两国没有达成协议也使他极为窘迫，因为他曾鼓励两国工会对反对派进行了抵制。这些事件造成的气氛如

斯大林政治传记

战争一般的紧张，一个有说服力的宣言此时由八十三个反对派联合发出，因为最近的所有失败而谴责斯大林和布哈林。

1927年夏，托洛茨基在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发表了所谓的“克里蒙梭声明”，这一声明为理解十年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提供了线索，在此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出现了。托洛茨基声明的要点是，他断言，如果战争席卷了俄国，反对派对待统治集团的态度，就如同克里蒙梭在1917年危机中对马尔维和凯鲁的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一样。换言之，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进行了谴责，指责他们缺乏远见、效率低下和犹豫不决；他并且警告说，紧急情况一旦发生，他将努力转换政府职能，以便把全国团结在一起，并有效地把一切人力和物力组织起来进行防御。按照允许对任何政府进行自由选择的标准来看，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是有一定的正常性的。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从某方面来说，邱吉尔就在英国采取了“克里蒙梭策略”的措施。总书记发表了一个反声明对他予以答复，说这是“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建立的反苏统一战线”。

从各方面来看，这时并未宣布反对派为非法，即使声称已被开除出政治局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仍然还属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对批准发表他们为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备忘录一事予以反对，反对派的成员们就在并未完全公开的情况下印刷了它。为了这事，中央委员会把这些领袖开除了。1927年11月7日，在官方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活动中，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追随者在他们首领的领导下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街头举行单独的游行。虽然游行是非暴力的，而且游行者的旗帜和口号没有明确地反对统治集团，这一事件却把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斗争推向了高潮。党立即开除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1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对反对派进行追随和宣传它的观点是违背了党员的称号的”。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维护反对派，但会场中的持久而发狂的吼声淹没了他俩的声音。斯大林说：“够了，同志们，这场游戏应该结束了……在反对派已在这个台上作出的发言中加米涅夫所作的发言是最不老实的、虚伪的、无赖的和卑鄙的。”代表大会对反对派的领袖提出了放弃并谴责自己的观点的要求，说如果他们想继续成为党员那么他们就必须这样做。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的辩论是无效的，他们说，这种要求背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放弃了，他们只会丢自己的脸而得不到党员的尊重。12月18日，代表大会决定把反对派的七十五名领导成员全部开除出党，此外还有很多人早已受到开除或监禁的处罚。

一天以后，反对派的分裂就开始了。托洛茨基派这一部分不服从代表大会的要求。托洛茨基的流放地是阿拉木图、拉柯夫斯基的流放地是阿斯特拉罕。但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追随者却发表了一项放弃了自己的观点的声明。在反对派遭受失败的原因中，这次背叛所起的作用同斯大林的报复只相上下。随着这次的背叛，那些加诸于投降者身上的屈辱还不过刚刚开始。代表大会没有采纳反对派的无条件投降，准备由总书记去考虑准许重新入党的决定。斯大林完全战胜了他以前的合作者，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对托洛茨基的胜利。

后来发生的事在很多方面都不具有多样性，类似于先前发生的那些事件，所以不怎么值得对它们展开详细论述。斯大林同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联盟在打败他们的对手后不久

斯大林政治传记

就宣告分裂，同托洛茨基辞职以后三人执政垮台的情形完全一样。进一步说来，虽然这个新阶段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与以前相比大不相同，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在主要演员们的个人野心，他们的事后聪明和恐惧，他们事后去找寻新的结盟，如此等等这些方面，都是类似的。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的新老对手大大低估了他的能力；他们对这一错误很快就认识到了。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败北的反对派预言，在清除左派以后，斯大林的领导将结束，领导权将转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手里。托洛茨基不断提醒说，一次具有决定性和近在眼前的“向右转”正在发生当中，最终资本主义的复辟将可能发生。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认为他们已经战胜了斯大林。代表大会后选举的政治局的人员组成，似乎也对他们的优势作出了保证。有九名委员组成了政治局。斯大林有把握掌握四票：他自己、莫洛托夫，以及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他们两人刚刚加入政治局。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可以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但是当最终决定时刻到来时，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却转而支持斯大林。布哈林后来说，“我不知道斯大林对他们的影响有这样的大。”基洛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和其他人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当中除了乌格拉诺夫一人以外，都是支持斯大林的。斯大林依靠多数人的支持，开始从行政上的重要职位和党的核心中把布哈林的支持者驱逐出去，但暂时没有对在政治局的对手们加以反对。

一个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如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所预见的，已经发展起来；反对右派的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从代表大会裁决他们以后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饥荒的威胁就降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临了俄国大小城市。1928年1月，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粮食，还不足以维持城市人口的最低需要。于是政治局命令“非常措施”立即开始运行，斯大林认为，“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都是“非常措施”的内容所在。不同于他最近的一些声明，斯大林现在断言，由于富农不把粮食卖给政府，他们正在“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6月间，公布了新的非常措施；到了7月，斯大林就号召全党对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予以坚决打击。在农村中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一命令是不赞同的，因为最近三年以来，他们已深刻认识到了“同农民联盟”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还被告知，托派异端的明显标记就是对农民的敌视。从3月一直到6月，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内，总书记命令在全党进行“春季清党”，把那些阻挠“非常措施”的工作人员撤换掉。

在政治局内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曾经企图阻止这条新路线实行的行动没有成功，他们为清洗的牺牲者鸣不平。但是他们小心谨慎地把这一争论只限于党内。因此在全国看来，他们也部分地负责非常措施的实行。斯大林对他的自由处置权充分加以运用，向全党保证说，政治局一致通过了非常措施和清洗的决议。他还在10月间说过，“右倾分子不存在于政治局内”。一个月以后他又说，“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是彼此团结的”。在一次中央全会上，他只对布哈林的一名追随者、新任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的讲话进行了攻击。弗鲁姆金说：“农村中只有一小部分贫农没有反对我们的情绪”；又说“中农基本群众对我们是深感失望的”。到1929年4月，这场斗争已经开始一年多了，斯大林才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布哈林在领导右翼反对派。

斯大林政治传记

先前的反对派至少还同斯大林搏斗了一阵才宣告失败，但布哈林集团甚至连接受他的挑战的能力都不具有。1928年7月，在争论的初期，布哈林曾企图联合加米涅夫，类似于当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想联合托洛茨基。在这两件事情中，这些以前曾同斯大林合作的人所“透露出的东西”不存在相左之处，他们都具有那种恐慌和模糊希望交织的心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对托洛茨基生命发生危险的情况有所论述。布哈林现在也怀着惊恐的心情小声对加米涅夫说，“他会把我们绞死的。”“作为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他利用一切满足他的权力欲望。为了达到把某个人摆脱的目的，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危害到革命的存亡。这条路线会使我们陷入失败的境地。我们同斯大林的争执要严重于你们的争执。”仿佛是为了增强信心，布哈林还把支持反对派的组织和有势力的人物一一列举了出来。但是他以同样的语气恳求他的对谈者不要把秘密谈话的任何内容泄露出去，因为政治警察已在严密监视他们。当他同加米涅夫道别时，他怀着畏惧之心称呼总书记为“成吉思汗”。托洛茨基和那两个前执政者联合反对斯大林的时机已晚了。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联合更是太晚了。

事情所以会出现如此遭透的情况，当然不只是一个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大林在逐步增大对全国政治生活所实施的压力。各反对派相继败下阵来，大幅度减少了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能性。联合斯大林，使每一个反对派的领袖即使将对手打败，自己获得更大的自由活动的余地的可能性也不大。每一次关键时刻之后，原先深得人心的行动都被横加指责。过去斯大林还不能因为托洛茨基提出了“克里蒙梭声明”而借此

斯大林政治传记

开除他，即使这个声明有推翻现政府的意味在内。他只能以一些特殊过错，例如违犯纪律、秘密印刷和未经批准而上街游行等，才能使 1927 年对反对派的报复行为有理由可寻。但不到一年以后，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悔过的反对派领袖被判以重罚，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秘密谈话，即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谈话，为此布哈林泪流满面地要求政治局原谅。选择屈服，这种陶片放逐法让人更难忍受。因为宣布如何处理“犯罪者”的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革命队伍中的同事，这使得“犯罪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造成这种咄咄怪事的原因还有一个，这就是斯大林的手对手们越是陷于无望的境地，就越无法团结一致。布哈林曾经对加米涅夫说：“你们同斯大林的争执不如我们的严重。”布哈林的真正意思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专制，不择手段，无视舆论，轻视党内知识分子精华这些举止态度。在这一点上，所有新老反对派实际上都深有同感。但是，他们没有因此结成一个单一的、紧密的团体。相反地，斯大林最近抛弃亲农民的政策，加重了他的批评者的队伍的混乱状态。他抢先接下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于是总书记的代理人们这时就拜访了许多流亡的老反对派领袖，劝说他们不要再执拗下去了。他们说，斯大林最后还是按照老反对派领袖的主张做了。他采取措施打击了富农并实行国家的工业化。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是斯大林和老反动派领袖们共同的敌人，斯大林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现在布尔什维克党非常需要你们的才能和经验时，你们这样停留不前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们要公开地恢复名誉。情况紧急，维护党的威信是最重要的。你们为什么还要要求党的领导承认自己的错误呢？个人的尊严不是党的一种美德。此外，你们所

斯大林政治传记

做的确实不符合纪律的要求。党要求你们的只是一种例行的手续，丢掉那种过时了的态度。回到党的怀抱中，你们才能继续为革命做贡献。

拉柯夫斯基和托洛茨基是坚决不会屈服和投降的。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皮达科夫、拉狄克、斯米尔加和其他许多人则被迫“违反自己的良知”。1928年和1929年，接连有一些在流亡地的反对派成员通过“悔过”回到莫斯科来。这些悔过的反对派觉得，斯大林突然地摆到左边，这种形势对他们有利，在合适的时候他们会再次掌握党的政权。同时，他们还批评那些坚决不悔过宁愿流亡或受监禁的人，说他们的策略让人不能理解。因此，当斯大林打击新的反对派时，他对追随老反对派的人实行了宽松政策。一些因失败而失去信心的老反动派的领袖，这时就警告布哈林和他的同事们不要采取一些毫无希望的冲突措施。亲农民的集团此刻也只好小心从事了。它认为，全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正走向灭亡，因而他的免职是一定的。现在要做的是，积极地为这一关键时刻的到来进行充分的准备，并在政权从斯大林手中滑脱时紧紧地抓住它。

1928年底，危机确实严重化了。不过斯大林已经看穿了敌手们的策略和企求。斯大林明白，最大的敌手仍是托洛茨基，敌人和朋友对他的不妥协态度表示敬佩。所以在1929年1月18日，斯大林向政治局提议并得到了通过，把托洛茨基逐出俄国，布哈林在当时提出过抗议，但没有起作用。这一事件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日益严重的情况，正是这种逐步升级发展到了血腥的冲突，使危机达到了高峰。1929年时，斯大林还不敢公开地在俄国监禁托洛茨基，但七年之后，他就毅然绝然地宣判了整个“老近卫军”和托洛茨基的死刑。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在把托洛茨基逐出俄国政治舞台之后，马上就把右翼领袖们摧毁了。李可夫出任苏联政府总理职务的决定被取消了。托姆斯基则因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工会反对工业化而被免除了在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布哈林将要接替季诺维也夫担任的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领导职务的决定被撤消了。1929年还没结束时，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已经对自己的看法进行了反省，从而争取了几年的喘息时间。

斯大林现在已经使自己的支配地位得到了加强。争权夺利的斗争已告结束。所有敌手已被消除，政治局的所有同志都不敢挑战他的权威。在年末的几天，莫斯科隆重地庆贺他的五十岁生日，就像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收到了从俄国各地发来的贺词。各地的党组织书记夸大的颂扬他的美德。莫斯科的墙上被斯大林的大幅画像覆盖，他的全身和半身塑像摆满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这使有些老人回忆起列宁的五十寿辰时的情景。这是一次小型的庆祝活动。当时仰慕列宁的人喜欢讲究排场和虚礼，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列宁才勉强地参加了那场小型的庆祝活动。现在这种新的对斯大林的迷信已经明显地同老的对列宁的迷信联系起来，甚至比过去更加严重。在一些庆贺活动中，斯大林登上了座落在红场上的列宁墓，高大的列宁墓就好像是他的继任者的踏脚石。

假使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要反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场权力之争中，他个人的目的并不是惟一的或最重要的法码。在1928到1929年那段特别危急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日子里，整个苏联的前途未卜。

从表面上来看，危机的开始很简单，仿佛是一些没有任何联系的事情。那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农民们拒绝给城市运去几百万吨粮食，出乎预料的却引发了一场斗争。农民们拒绝出售粮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也并不意味着推翻苏维埃政府，虽然富裕农民中一些有政治思想的分子有推翻苏维埃政府的目的。农民群众是由于经济形势所迫而采取“怠工行动”这种特别形式的。当时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只能满足自己。1917年的农业大变动，造成了十年后的不良影响。在内战中，布尔什维克通过把大农庄分成许多小农户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但是其结果却使农业的生产力大大地削弱了，或者说农业供给城市人口粮食的能力降低了。同时，大农户要求提高粮价，粮价抬高给城市人民带来了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而且大农户们还要求政府对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一定的让步。此时斯大林面临的问题确实非常棘手。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他答应农民的要求，作出一定让步，就会引起城市工人阶级的危险对抗，而城市工人阶级整体来说特别是当政府在1927年左右把工业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之后，是十分支持政府的。但是不向农民作任何让步，结果也会引起饥荒和城市动乱。这是一个需要作彻底处理的问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当初建议政府，尽早采取抑制大农户和鼓励逐渐集体化的措施，如果那样做现在就可能不需要采取剧烈的紧急措施就能够获得粮食。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他在思想上毫无准备，很容易导致他采取一些失去控制的行动方针。

如果斯大林在前几年没有公开宣布过他的观点，那么不可思议的是，他现在对从事第二次革命考虑不周并抱有实用主义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态度。一直到了最后时刻，他还对这个大变动的规模和暴烈程度没有任何考虑，而且畏缩不前，在这方面，不仅他这样，还有许多人都是如此。在布尔什维克的集团、派别或小圈子中，谁都想不到目前由斯大林发起的工业化运动是如此地迅速和集中、农业集体化是如此地剧烈和全面。甚至最极端的布尔什维克左翼也有同样的感觉，集体化的改革应是渐进、缓和的。只有一个人即尤里·拉林曾经鼓吹在农村进行“第二次革命”，他是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曾经是孟什维克右翼。尤里·拉林早在1925年就谈到了在农村进行“第二次革命”，而斯大林对此不以为然。他严厉批评了那些想在农村中激起阶级斗争的布尔什维克……是在空谈……在重弹孟什维克老调。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对他提出一个非常苛刻的问题：“在不挑起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怎样同富农斗争？”斯维尔德洛夫以同样的语调十分有理地说，挑起阶级斗争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党在农村中是不会挑起阶级斗争。

1928年5月，在已经实施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后，斯大林仍坚持说，“剥夺富农是愚蠢的”。他并不想在将来的四年里把更大一部分农业按集体化的路线进行重新组织起来。在1928年年底批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到1933年最多只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户实现集体化。到1929年春天斯大林已经公开批评布哈林集团是推销资本主义农业时，他还是坚持认为，“个体贫农和中农经济在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和粮食方面……在近期内还会起主要作用”。

过了几个月，“全面”集体化声势浩大地展开了，个体农户的前途就确定了。斯大林在1929年底说道：“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走上了新的社

斯大林政治传记

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时政治局已经把希望放在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上，指望它们会供给城市一半的粮食。1929年底的几天，克里姆林宫就传出了斯大林全面展开“对富农的攻势”的命令。“向富农进攻”，意思是击破富农并彻底消灭富农阶级。不实现这些目的，进攻就成为高调、空喊、扭打……进攻富农，就是准备实际行动，打击富农，而且把他们彻底打垮。他不再把剥夺富农指责为愚蠢的行为了，他辩解说：“是否可以允许……剥夺富农财产呢……真是一个荒唐的问题……脑袋都割掉了，头发也就不值得怜惜了。”

斯大林关于工业化的重大声明中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说明，同样存在着让人惊讶的矛盾。在二十年代中期，俄国工业每年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政治局讨论了有关产量增加的速度问题，即在现有工厂充分开工之后产量还能扩大多少。政治局的每个成员都同意，当工业实现了充分开工之后，每年的增长率就会小一些。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认为，每年产量仍然可能提高不到百分之二十。斯大林称他们是“超工业化者”。他的对手提出在第聂伯河修筑大水电站时，斯大林将此搁置一边，并且说，建筑第聂伯水电站对俄罗斯而言就好象要农民去买一架留声机而不是买一头牛，这是不切合实际的。1927年12月斯大林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国家的工业状况是令人满意的；不过他也认可了反对派的主张，认为在今后几年中，每年工业产量应该增加百分之十五。

经过了一年，斯大林不再满意工业状况，认为俄国工厂的技术是“十分落后的”，现在他开始力促加快工业化的发展。考虑到他的许多听众一时不能接受，斯大林辩解说：“彼得大

斯大林政治传记

帝深入了解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致力于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不过所有旧的阶级……都改变不了我国落后性的状况。”俄国社会的新结构为工业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斯大林的计划即使到了现在，仍然是适中的。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同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发生争执，因为弗鲁姆金只希望在预算中拨出六亿五千万卢布作为投资资本；而最高经济委员会希望得到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斯大林也努力争取更多的拨款。

一年后，即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实际的投资比斯大林的最高估计几乎多五亿卢布，高达十三亿卢布。到了1929年中，工业化急剧进行并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资本投资的拨款上升至三十四亿卢布，比财政人民委员所希望的高出五倍，高达斯大林自己要求的四倍，政治局很快就进入了狂热的工业化浪潮中。1930年6月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狂傲地声称：“苏联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他预言，在三年、甚至两年半中，许多工业部门都将完成计划，根本用不了五年。他向代表大会提出，明年的工业生产已经规定提高近百分之五十。这种妄想真正是超工业化的了。

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可以凭借一个绝好的方法就使整个苏联彻底地转变。斯大林似乎生活于索引、统计数字、工业命令和指示中，对他和布尔什维克而言似乎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他独创了一句话说：没有什么堡垒是布尔什维克征服不了的。这句话写在全国各地的旗子和招贴上，在许多年里一直被所有的作家和演说家颂扬。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演示了工业化的狂热性。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1928年俄国的铁生产量为三百五十万吨。在

斯大林政治传记

五年计划下，苏联将在 1933 年年底生产一千万吨铁。斯大林对于提前一年或两年完成计划仍不满足，他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需要的生铁是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吨，不是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千万吨。”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经理提出了合理的目标，认为斯大林的目标过高而不可能实现，斯大林把他们称做是“破坏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1941 年，当希特勒入侵俄国时，俄国的生铁产量才达到斯大林在十年前就要求实现的数量。

前面我们曾提起，斯大林由于 1928 年和 1929 年粮食的周期性危机，突然加速了集体化的进程。他的一些反对者认为，通过进口粮食，可以避免这种危机。但是却没有用以支付的资金，外国也不会为苏联政府提供贷款，因为从十月革命以后外国就开始对俄国的财政进行抵制，现在仍旧如此。如果把本来已经不多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基金用来购买外国粮食，必然会导致已经较快发展的工业连中等速度都实现不了。工业的停滞又会造成新的粮食危机，城市中的形势随之会更为紧张。

摆脱困境的一个简单方法，即：洗劫富裕农民的谷仓和隐藏起来的财物。相对于城市所遭受饥荒的危险，这个方法也可以接受。但是在党和警察的帮助下，行政当局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去规避它的管理和控制，城市的行政当局也会感到力不从心。这种管理和控制的任务只能靠本地的一部分农民来完成，没收更是如此。因此斯大林就采取贫农去反对富裕农民的措施。他不能无偿地让贫苦农民大众这样做，他们需要得到一定的回报。广大的最贫苦农民只拥有极小块的土地，由于没有马和牛，而只能用木犁耕种，还要受

斯大林政治传记

制于富农和高利贷者，所以集体农庄是很有诱惑力的回报。政府答应组成集体农庄后，资助他们一些富农的耕畜和农业工具，甚至还有拖拉机。

在二千五百万个体农户中，还不明确究竟有多少属于最贫苦的阶级。一般认为是五百万到八百万户，其中至少有五百万最小的农户是用木犁耕种的。而与此相对立，则有一百五十万、或许二百万富裕的农户。在两者之间，“中农”有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因此，农民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拥护这一“大转变”。设想斯大林在这次改革只把最贫穷的农户联合起来，并在最贫苦的农民和最富裕的农民之间进行财富的适当的再分配，那么集体化就不会变成现实中已经发生的那种血腥的社会大变动。如果集体农庄能够给予中农工具和机器的资助，使其进而得到政府的技术帮助和贷款；能够明显地改善庄员的生活，那么很多所谓的“中农”很可能会参加。

大约在 1929 年，运动的发展势头冲昏了斯大林的头脑。集体化在开始时取得了一定成就。当斯大林的桌子上摆满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报告时，他就开始加快集体化的进程，使其大大超过原先的速度。他把许多人派到农村里去，训令他们“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并把许多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中农驱赶进去。我们可以从他在 1929 年 12 月对党的土地问题专家代表的讲话中体现出这些命令的精神。他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来打消听众的犹豫不决。听众们也认为，在一场革命中，可以而且必须对一小部分剥削者进行坚决的打击，但是却不能打击千百万小农所有者。斯大林引证了恩格斯的下列说法：“而我们则坚定地站在小农方面，我们会努力想办法使他们的处境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有决心这样做，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

斯大林政治传记

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么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思考。”斯大林告诉他的听众说，恩格斯的态度“过分慎重”，他说的情况不适合于俄国，只适合于西欧的情况。不用给予小农时间去考虑他的财产的集体化问题。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说，对富农要加以剥夺。有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富农的财产被剥夺后，应允许他们参加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斯大林没有告诉听众，这二百多万富农在被剥夺了财产和被拒绝进入集体农庄之后，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在短暂的时间里，俄国的农村地区就像一座地狱，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政府进行坚决的反抗。集体化发展成一种军事行动，引发了一场残酷的内战。机关枪包围反叛的村庄，迫使其投降。众多的富农被流放到遥远的荒凉的西伯利亚。富农的房屋、农具和谷仓转交给集体农庄，据斯大林估计，集体化过程中被转交的财产价值超过四亿卢布。大多数农民决心把自己的财产尽可能少地带到集体农庄去，在他们看来，集体农庄将成为国营工厂，他们不过是其中的工人。于是他们感到绝望就屠宰牲畜，就把工具毁坏并烧掉谷物。这是农民规模较大的鲁德式叛乱。等到 1934 年 1 月，一些结果才被斯大林透露出来。1929 年，俄国拥有三千四百万匹马，到 1933 年一千八百万匹马被屠宰了，只剩下了一千六百六十万匹。被屠宰的还有占总数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三千万头大牲畜；占总数三分之二的一亿头绵羊和山羊。大片的土地荒芜。城市和乌克兰黑土地带的大草原被饥谨笼罩着。

斯大林企图在工业上也试一试在农业上的这一绝招。这时加快实现机械化农业成为了关键性的问题。大规模的农业需要

斯大林政治传记

一个比小农业高得多的技术基础。马匹必须被拖拉机所代替。在大量屠宰牲畜以前，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的集体化所必需的拖拉机不能少于二十五万台，还必需有很多其他的机器。而集体化开始时，全苏联只有七千台拖拉机。在作了各种努力之后，斯大林才在 1929 年弄到了近三万台拖拉机。这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离开了机器和技术指导，就不可能对农业劳动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分工。许多集体农庄刚成立起来就面临着解散和瓦解的处境。工业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提供大量的机器，这是现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油井必须生产几百万吨石油，才能满足拖拉机使用；使农村电气化就要建立一些新的电站；最后就是要千百万农民去参加培训以便操纵和驾驶各种机器和车辆。但是大小工厂生产这些东西的原材料却极为紧缺。煤、钢、石油和别的原料都不能满足需求。也没有人能够训练一无所知的农民学习驾驶拖拉机。

整个过程十分愚蠢，所有的逻辑规律和经济原则都黑白颠倒了。就像整个国家突然抛弃和摧毁了自己的房子和茅屋，全部搬到一些在现实中连个影子都还没有的建筑中去；就像全国只是在拼命的迁移之后，才开始去制造砖坯，砌造新墙，但后来却发现甚至连制砖坯的稻草都少得可怜；就像全国饥寒交迫，满身疾病，却开始拼命地四处寻找稻草、砖坯、石头、建筑工和泥瓦匠，为了能够着手建设比匆忙摧毁的破旧的房屋要卫生和宽敞的多的家园。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它是被一个普通、平凡和相当认真的人所诱惑和迫使才从事这种超越现实的事业的。一种半现实半梦魇的幻觉支配着这个人的思想，他把自己看作一个超级法官和超级建筑师，看作一个现代的超级法老。简单地来说，这就是当时俄国奇异的生

斯大林政治传记

活，痛苦和希望并存，悲怆和滑稽同在。斯大林在其中所起到就是这样的作用，只不过他驱赶着人民去建筑的不像金字塔那样毫无用处。

在斯大林看来，他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现代的法老，而是一个新的在沙漠中领导着一支上帝特选的子民的摩西。这位无神论的独裁者心中充斥着各种杂乱的基督教圣经的形象和信条。他那平淡无味的文章中间或存在着一些形象和隐喻的句子。“向社会主义天堂”进军就是经常被看到的一个句子，甚至当他在巴库或梯弗里斯领导着少数几个“委员会人”时便是这样的。这时“向社会主义天堂”进军在他听起来就更显其真实了。尽管他同克伦威尔、他的追随者同那些清教徒在时间上相差几百年，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但麦考利所描述的克伦威尔及其属下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斯大林：

在那个特别的团体中大部分是一些热心的共和派成员。他们在奴役自己的国家时，却认为，他们是在解救这个国家，简直是在自我欺骗。他们最尊重的那本书，为他们提供了那个经常挂在嘴边的先例。然而，无知而不领情的子民们还对这些解救者产生了抱怨。尽管另一支上帝特选的子民对那个领袖也曾有过怨言，他还是领导着他们通过痛苦而阴郁的道路，从受奴役的境况中解脱出来走向了繁荣的地方。那位领袖不管他的人民是否情愿总是拯救了他们；对于那些轻视给予他们自由的人，对于渴望着寻欢作乐的人，对于崇拜埃及和监工的人，那位领袖是不害怕制造一个可怕的榜样的。

斯大林政治传记

当斯大林向人民提交他的计划，要求他们作出努力和牺牲时，简单地把它解释为应付当前的经济需要是不够的。他试图寻找一种更为形象的号召力。这时他除了宣扬社会主义感情外，还第一次公开地激发了人民的民族感情。社会主义在单独一国胜利的理论足以具有这种双重的号召力。最终，他还是克制住而没有公然地挑动民族的骄傲和雄心。因为人民对于布尔什维克对这些感情的敌视是记忆犹新的，对这些东西的公然宣扬，都将使他遭到对手的批评而使自己弄得处境难堪。这一系列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斯大林早年的思想中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到了1931年2月，他开始高唱这种新调子是在一次对企业行政人员的著名讲话中。有些人主张以较慢的速度进行工业化。他同那些人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辩论。他解释了实施他的政策的国际和国内原因。社会主义需要工业化，世界无产阶级对苏联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非常关注。他说，他甚至认为国际义务要比国内义务重要。但是，斯大林谈及这个问题的国际社会主义方面时表述得杂乱无章，他的言不由衷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谈到这一政策的纯粹的俄国动机时，他的话才让人感到一种力量和生机。

不，同志们！速度绝不可以放慢！与之相反，必须竭力和尽最大努力的提高速度。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负有义务。我们对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负有义务。

延缓速度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们绝对不愿意挨打。旧俄历史……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遭受列强欺辱。旧俄曾遭到过蒙古的可汗、土耳其的贵族、

斯大林政治传记

瑞典的封建主义、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以及英国、法国的资本家、日本的贵族的打击和欺辱。因为落后，大家都打过它。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列强为了这种既能从中获利而又不会受到惩罚的原因，都打过旧俄。革命前的一位诗人曾说过：“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

……我们与先进国家相比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用不到十年的时间跑完这段距离。要么我们做到这一点，要么我们被人打倒。

斯大林在号召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首先使城市工人充满了希望。年轻的一代早就梦想俄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另一个美国”。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企业和第聂伯水电站以及许多规模巨大最具有现代化的工业联合企业，给他们带来了新文明的景象。在这种新的文明中，人们将使机器服从他们的意志，而在过去，人们则要服从机器及其主人的意志。许多青年工人，特别是共青团员，都自愿地来到荒凉的地带。他们憧憬新世界，而不管这个新世界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比较现实的一些人同样支持工业化，因为它将改变自新经济政策以来就摆在俄国工人面前的失业现象。

这一次运动的势头再次冲昏了斯大林的头脑。他那样地好高骛远，让所有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都不敢轻易行动。但奇怪的是，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上没有一点经验。他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训练，虽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他对经济理解比普通的政治家稍周密。列宁领导时，斯大林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所起

斯大林政治传记

的作用是不重要的，他主要负责政治管理工作。此外，在那些年代里，俄国经济十分落后和原始的状况，也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决定。在后来的几年里，斯大林主要领导布尔什维克的核心组织去反抗敌手们；在负责下达政治事务的指示外，他很难接触和考虑其他事情。因此，他发动这场工业革命时，他还不明白国家有限的资源，不了解人民的忍受程度。他的一切经历使他过于依赖严密组织和无情的行政权力。利用这些权力，他曾消除了一度强大的敌手。他曾把一度很不听话的党变得顺驯起来并使它成为一个意见统一的团体。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成功地去解决那些杂乱的农民群众的问题呢？为什么他不能要求这些工业领导人实施计划去生产出大量的煤、钢和机器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他和政治局要对农民、群众、领导人接连不断的施加压力。在对下属施加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一级级下传时，没有人能比过他。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是首要的恫吓者、驱赶者和诱骗者。

当他终于意识到农村中集体化运动造成的不良后果时，斯大林就赶快采取措施来安抚农民和推脱责任。1930年3月2日他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企图实现这两种目的。他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于过分热心的官员。他承认已经有一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了；在很多时候曾使用了强迫手段；有一些集体农庄是快要解体了。而在三个月以前，他还威逼着党派住农村的代表，要抓紧时间完成小农“财产”的集体化，他亲自发出了使用强迫手段实现集体化的命令。现在他却辩解说，他们误解了自己的命令：“实现集体农庄切忌使用强迫手段，这是一种荒唐和反动的做法。”他责骂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歪曲者”、“傻瓜”、“喧嚣的左倾分子”和“胆怯的市侩”。他

斯大林政治传记

号召他们不要过分地偏离目标。令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可思议的是，斯大林把自己称为“农民的保护者”。他没有同他们商量。他依旧是不经过这些人而直接向农民呼吁的，这些曾作为斯大林共犯的人，而现在仿佛成了主要的罪人。甚至当时对他很听从的中央委员会，对斯大林使用他们来逃脱责任和转移人们的愤怒而表示反抗。于是斯大林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说，号召停止使用暴力的命令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意见。

不论真相如何，斯大林采取措施强有力地压住了这个集体化运动。在后来的三年里，实现集体化的农户不过 10%，因此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实现农户集体化的仅有 6/10。集体农庄的性质也有所改变。运动初始，农民的几乎所有财物都被宣布为集体财产；庄员的劳动报酬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在三十年代早期和中期，斯大林向农民的个体经济进行了许多让步，实行了一系列的“斯大林改革”。集体农庄抛弃了过去的公社而转变成为一种合作社。庄员享有农庄的利润。允许保有自己私人的小块土地、家禽和一些家畜。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分化：农庄有贫富之分，庄员有贫富差别。当局是鼓励“富裕的集体农庄”的。斯大林命令停止大多数的国营农场，把它们的四千多万英亩土地转交于集体农庄。因此，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就取得了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使得政府能够通过比较缓慢的速度几乎完全实现了集体化，而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1929 年到 1930 年那种血的代价起了一定的作用。到了三十年代晚期，俄国农村中新的曾在十年前开始时就被动摇了基础的社会结构也取得了一些加强。

工业革命的进程也不轻松。人们还记得，1930 年，斯大林要求本年内铁和煤的产量要增加 50%。正如他在第二年承

斯大林政治传记

认的，结果不过提高了6%到10%。制造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受到了发展缓慢的采矿工业的影响。斯大林一意孤行坚持要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新建现代化规模巨大的铁矿和煤矿，几乎不考虑所存在的困难。一个美国目击者和参与者写道：“我在马格尼哥尔斯克很快就进入了工业集体化运动中。他们把我分配到钢铁战线上去。成千上万的人忍受着极为紧张的艰苦生活去建设高炉，而且很多人带着很高的热情并且是自觉自愿的，从我到达那一天起就被深深感染了。”这位作者最后总结道：“我敢担保，在俄国冶金战斗的过程中造成的伤亡比马恩河战斗所造成的都要严重。”

在耗费了人的生命、原材料和能源之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的确并没有达到；而且除了在反德战争的年代以外，斯大林再也没有让工业实行他最初所设想的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工业生产每年增长高达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四；正是有赖于这个比较适当的计划，1932年到1937年，工业化的进展得到了巩固。

在重大的灾难中要坚持这一危险的事业只有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专制统治者才能做到。斯大林在那几年表现出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沉着冷静。在沉着冷静背后，必然存在着紧张和苦恼。其中仅有一次，他似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整个1932年，灾难和挫折不断出现，他独处室中大生闷气。这时他已是名誉扫地。他对各种不满的反抗极为紧张。他已经看到了被击败的对手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眼里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神情，因为危机正威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各种思想和派别，所以他们才没有行动。党内已经不

斯大林政治传记

存在右翼和左翼的旧的分裂，代之而起的是普遍的希望改变现状，斯大林的一些死党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有一个备忘录在他的最接近的随从人员中流传着，在备忘录中要求罢免他。这是由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签署的，斯大林曾依靠他们两人击败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西尔佐夫甚至还接替李可夫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席。还有一份与此同样的经宣传负责人柳亭和其他一些人达成协议批准通过的备忘录。最终这部分人以搞阴谋的罪名遭到监禁。严格地说，他们只不过是敦促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合法手段罢免斯大林。而他们所做的不能算是搞阴谋，斯大林表面上不认为中央委员会有合法的权利可以罢免他的职务。乌克兰也让斯大林失望，反对派在暗中搞破坏活动。斯大林的一个亲信波斯蒂舍夫被派到乌克兰负责清理那里的政府，而这个政府一般认为是由服从斯大林领导的人组成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斯科利普尼克在这次清理中自杀。

在形势达到最高潮时，斯大林的家里也发生了悲剧。他的妻子，工人阿利鲁耶夫的女儿，叫做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比斯大林年轻得多，在此以前一直盲目地崇拜她的丈夫，现在开始怀疑斯大林政策的明智性和正当性。1932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夫妇二人到伏罗希洛夫家作客，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在场，大家一起对有关政策的问题进行讨论。纳杰日达·阿利鲁耶娃谈到饥荒和全国的不满情绪，谈到大恐怖使党的道德败坏，这些都是她的真切的想。当时斯大林的精神高度紧张，在众人面前，他就粗鲁地痛骂了他的妻子。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在离开伏罗希洛夫的家后就自杀了。

一位曾在俄国生活过许多年的法国的前共产党员作家 V·

塞尔日，这样写道：

报纸谈到了这次出人预料的早逝。开始起传言说：这位年轻的妇女不能忍受全国恐怖和饥荒的景象，因为她在克里姆林宫的舒适生活和她极其难过的发现全国到处都张贴满了她丈夫的画像，她感到郁闷，为此憔悴不堪……

看着妻子的尸体……斯大林真像他自称的是一个钢铁般的人。那个时候，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向同事们提出了辞职的要求。“也许我已经的确影响了党内团结。为此，同志们，我准备退离工作岗位……”政治局的成员们对此大为吃惊。谁都不敢于答复说：“不错，老伙伴，你应该离开。事情就是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是很明智的。”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因为谁要是这样说，别人不支持的话，他的命运就危险了。因此没有任何反应……最后还是莫洛托夫说：“不要这样了。全党都是信任你的……”这个事件到此为止。

斯大林的自信心暂时垮台了，仅有这一次。经过沉闷的几个月之后，他又在1934年1月向中央全会作报告。他的报告虽然在口气上是辩解的，但也显示了他重新树立的自信：“国家在党的鞭策和督促下向前进……落后了一百年并有遭到灭亡威胁的国家必须要有督促。”他实际上承认没有按计划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理由是：由于远东的战争威胁，工业要为军火生产服务。日本征服满洲就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是否认为日本进攻俄国的危险紧迫，因而要大幅度地调整经济计划，这还是不能肯定的。因为这时希特勒将要掌权，他却向国家保证说，

斯大林政治传记

危险结束了，不再需要强求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在以后的二三年中，俄国的任务是巩固已经获得的成果，并掌握工业技术。

过了几天，斯大林又出现在讲台上，告诉人们农村中的形势充满了危险。他认为集体农庄对现存政权的威胁比个体农户更严重，这使全党都大为惊奇。他说，过去农民是分散的，行动不灵活，缺乏政治组织的能力。集体化以后，农民团体组织严密，政府可能会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也可能比个体农民更容易转向反对苏维埃。党组建了农村中的政治部，目的是对集体农庄实行严格有效的控制。同这些措施同步进行的，还有须着手解决另一个特别的任务。过了一年，斯大林向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说，二百万农民已经在这一期间训练成为驾驶员而这些人过去根本没操作过机器；大约二百万的男人和妇女已经训练成为集体农庄的管理人员；被派到农村的农艺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員高达十一万一千人。文盲的人数已经缩小到只占人口的10%。这次所谓的文化革命开展得极度匆忙，所以是不深刻的。不过，它还是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俄国的习惯和观点开始发生大的变化。

提到斯大林在第二次革命中的作用，不讲新的社会政策，就会显得不全面。他所提出的新的社会政策也许比“大转变”的其他组成部分更为直接。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政策存在着明确的对比。1929年年末，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劳动政策，由于表述含混不清，人们很难全面的认识它的重要性。在新经济政策下，劳动政策具有高度自由的特点：工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即使这种自由由于受到失业的威胁而变得不真实。经理们也多少有权力可以自由地雇用和解雇工人。但是迅速的工业

斯大林政治传记

化立使得劳动力严重短缺，这也就宣告了自由放任的结束。在斯大林看来，这就是在劳动市场上“结束自流”。在讲英语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后来被叫做劳动管理。管理的形式有许多种。工业企业同集体农庄达成协议，规定集体农庄承担向城市中工厂提供一定数量的男女劳动力的义务，这是基本的方法。“强迫劳动”这个词是否能够在里使用是有争议的。但是在运动的早期阶段，使用强迫手段是非常严重的。当时那些被剥夺了庄员资格的多余的集体农庄庄员，同由于经济需要才去受雇的失业工人的地位具有一些相同之处。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到了城市后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了。斯大林的目的在于利用法令为工业提供有保障的劳动力储备，而在大多数国家里，人力的储备是通过贫穷的农民长时间自发地涌入城市而进行的。

严格的说来，强迫劳动是对那些以暴力拒绝集体化的农民采取的强制措施。他们被看成罪犯而遭到监禁。历史与俄国人民开了一个恶毒而阴险的玩笑。苏联早期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对监狱制度进行了改革，把监禁犯人看成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一种再教育的手段，他们让罪犯做一些有用的工作。犯罪者获得工会的保护；他们按工会规定的标准获得报酬。由于农民叛乱不断增多，他们被组织于巨大的劳动营中，从事修铁路、开运河和伐木等等工作。规定中给予他们的保护在三十年代早期的饥荒和悲惨生活中，被完全忽视了。奴隶劳动，草菅人命代替了“再教育”，这给第二次革命抹上了一个大污点。后来斯大林宣称，在苏联，劳动“已经从一种耻辱和痛苦的重担转变成为一种英勇、光荣和英雄主义的事情”，他的话就像是在嘲笑劳动营中的犯人。这话对于那些在工业化中较幸运地获得了进

斯大林政治传记

步的工人，还是正确的。工业劳动和技术效率用它们所具有的魔力，吸引着一代青年。报纸、剧院、广播和电影都在对“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们”进行颂扬，就像其他国家吹捧著名军人和电影明星时使用的方式一样。各类技术学校向来自工作台的工人开放，这类学校增加的速度惊人。斯大林号召布尔什维克们“应当掌握技术……成为专家”。斯大林还说：“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在整个三十年代，新的知识分子迅速增加，以致斯大林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同苏联社会两个基本阶级——工人和农民地位相等、或者是更高的社会集团。新的知识分子同老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政治素质上相比非常不同，老的知识分子在沙皇统治下掀起了革命，在早期工农共和国中起着领导作用。新的知识分子被教养成为没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具备老知识分子的那种美学的精致性和知识的敏锐性，他们根本没有对世界事务的好奇心，他们意识不到俄国和世界其余地区命运相关这一点。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机器和技术发明，发展落后省区的大胆规划。行政工作，管理企业的艺术都是他们感兴趣的。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表现出一种粗俗的习态，外国专家将此作为笑料。但是这种粗俗却同异常的求知欲、精明的接受能力以及拓荒者的性格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斯大林所称的“边疆派”一代。

在这个过程中，老的知识分子遭到了贬黜。由于他们许多人爱批评具有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色彩的观点，斯大林不信任他们。斯大林的计划遭到老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作者的敌视。有些人还和一些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少部分人抱有失败主义的态度，阻止计划经济的实行，甚至搞破坏。起初，斯大林跟其他无产阶级掌权者一样，对于老一代的技术人员和行政人

斯大林政治传记

员表现得十分谦恭。后来，随着他的自信的增加，当他同那些守旧的或对工业革命的速度以一种理智且现实的态度加以对待的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发生冲突之后，他就开始敌视他们，抛弃了尊重的态度，他咒骂和污辱他们。他因为少数人的犯法或犯罪，而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他还举行了几次公开对“破坏者”和“怠工者”的审讯，一些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就像拉姆金教授及其同事们都被交付审判。工人和工头们监视着经理和技术人员，这使工业遭到了灾难性结果。而且，要训练新的知识分子，也离不开那些老知识分子的自愿合作。最后，斯大林只好亲自来保护老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他的讲话自相矛盾，反映了他力图挽救形势时的犹豫不决和病态的害怕。

他最重要的社会政策，也许是他同平均主义展开的斗争。他认为，工人的物质报酬必须要区别明确，以便鼓励有效率和熟练的劳动。他讲到，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均主义者没有相似之处；他用马克思著名的论述来论述他的论点，说即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工人的工资开始要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来分配。但是，在布尔什维主义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很明显。例如，在列宁执政时期，执掌政权的人的最高工资收入不能超过操作娴熟的工人的标准，甚至最高的执政党成员也不例外。因此，工业化的需要就同受限制的生活标准产生了矛盾；而由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得不到一定的物质吸引力，就影响了工业方面的熟练劳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工资和薪金的差别在整个三十年代被推到了极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使许多技术不熟练和工资较低的工人同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和官僚具有了区别，这条鸿沟影响了俄国文化和工业的发展，这同早期出现的平均主义观点

斯大林政治传记

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反对斯大林的人，特别是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主要就是抓住了斯大林在社会政策中存在的局限性，攻击他是新的特权阶层的头子，他确实下大决心提倡过收入的不平等。并且，他在“大转变”以前就这样做了。他早在 1925 年就高深莫测地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一定不要提平等之类的词句，否则就像玩火。”在这以后，他极度地反对“平均主义”，他所以要这样做，使人感到，是为了掩饰他的政策中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环节。说它敏感，是因为高薪和特权的经理集团已经成为支持斯大林政权的重要力量，这种经理集团在这个政权下已有了既得利益。斯大林相信，他个人的政治越牢牢地建立在利益和势力的等级制度上，就越稳固。说它脆弱，是因为要在被社会革命刚刚打击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等级制度，是特别危险和困难的。这场革命激发了人民对平等的潜在的渴望。当领袖们感到不能满足人民的这种要求并着手去压抑它的时候，革命已经发展到了最危急的阶段。他们的反对者称这些领袖所从事的工作是对革命的背叛。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不正当的做法，他们感到紧张和不安，以致要把一切怨气都对“背叛”他们的受害者发泄。正因为如此，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或斯大林都对他们那个时代的平均主义者进行了强烈的打击。

第二次革命的果实只是到了三十年代晚期才开始成熟。等到这个十年快结束时，俄国工业力量已经赶上德国。它的组织效率和能力还相对较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如此。在矿业的总产量、工厂和基本设备方面，却已接近欧洲大陆一切最发达的国家。而欧洲大陆国家是在外国资本家的帮助下，经历 70

斯大林政治传记

多年的工业化后才取得的。另外一些大陆国家，俄国人几年之前还难望其项背，而现在已经落在俄国后边了。工业革命从俄国中部和西部深入到它亚洲部分遥远的荒芜之地。集体农庄也开始取得了正面的成果。到这个十年的末尾，农业已经摆脱了三十年代早期的衰退情形；工业最终也能够供给大量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具，农庄实现了程度极高的机械化。外部世界对于这个重大的变化，以及它所造成的国际均势的改变，开始感到有些陌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惨败，使外国观察家怀疑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一系列的“清洗”审讯也掩盖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虚弱。可以肯定，这种脆弱的因素是存在的；如果回顾过去，站在四十年代时的角度来看，这种脆弱的因素看来还要更大一些。但是与三十年代相比，有力的因素强大了许多。

即使仅仅拿俄罗斯民族的抱负这一尺度来衡量，成就是显著的，也的确是这样的。它为俄国新政权在不同的规模上奠定了基础，就像克伦威尔颁布的“航海法”曾经奠定了英国海上优势的基础一样。有许多人根据国家的雄心和威望来看待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在他们看来所有那些增强俄国威力的统治者中，斯大林应排第一位。许多流亡在外的白俄罗斯人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激励下，也开始把斯大林当成民族英雄来看待。但是第二次革命的意义不是仅仅就俄国而言的，它的重要意义对于全世界来说，这是首次对计划经济的真正巨大的试验，是首次由一个政府对本国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计划和管理，指导它的国家通过增强工业力量来快速地增加国民财富。当然，这一思想并不是由斯大林创造的。他大量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其中包括他的敌手们，因此人们指责

斯大林政治传记

斯大林是真正的剽窃者。但是，他第一次把抽象的理论转变成了现实的管理。的确，德国政府和总参谋部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在实际的计划工作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因而列宁经常提到这一先例，认为未来将以此为发展方向。斯大林在计划工作中，不仅仅是一种战时的试验，而且还是和平时期经济生活的正常模式，这是他的独创之处。在此以前，各国政府仅是因为战时需要而从事计划工作。斯大林五年计划的目的，也是要大量地生产大炮、坦克和飞机；但这些计划的贡献并不在于武装俄国，而在于能够使俄国的社会发生转变和实现现代化。

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在“大转变”过程中出现的那些愚蠢和残酷的事情。我们由此回忆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示的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这两者是极其相似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了详尽的叙述，这是最初的暴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一个阶级积累了手中的生产手段，而别的阶级却遭到剥夺而失去土地和谋生手段，成为靠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的劳动者。俄国三十年代发生的集体化过程，也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中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对“圈地”和“清扫领地”的情形进行了描绘，英国的地主和工场主正是利用这些办法剥夺了自耕农的独立性，苏联找到了同圈地法一样的办法。斯大林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讲到了圈地法的做法，为了使土地连成一片，它允许集体农庄“圈划”或“调整”它们的土地。这种方法的实施，使个体农户或者被迫参加集体农庄，或者就完全被剥夺了。马克思谈到了英国的“血腥纪律”，它使自由农民沦为工资劳动者；还谈到“国家为了加速资本的积累

斯大林政治传记

而使用强制的手段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马克思的话对斯大林的许多做法也是符合的。马克思总结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后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社会主义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在一国的胜利。

英国的工业革命尽管“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仍然是人类历史大进步的标志。工业革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和充满希望的文明时代。斯大林的工业革命的功绩也是如此。这种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罪行在更早的世纪里是情有可原的，但现在却不能被饶恕了。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才是有道理的。俄国的历史发展极其缓慢，到十四世纪末英国的农奴制度已经消失，而俄国仍处于农奴阶段。按照英国的历史标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十四世纪和二十世纪都集中于当代的俄国，集中于斯大林。如果在斯大林身上历史学家发现一些类似于中世纪的暴君的性格，这是十分正常的。而且斯大林即使在工业革命最荒谬和最可笑的时期，他仍认为，他的制度至少避免了像西方发达国家所遭受的那种痛苦。他在资本主义出现大萧条的时候说过：“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期间销毁‘剩余’商品和焚毁‘多余’农产品来保持高昂价格、保证高额利润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而在苏联这里，人们会把犯这种罪行的罪人看成是疯子。”

很明显，斯大林已经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方向很远了。他的社会主义具有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派别想象中的新社会的共同点，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经

斯大林政治传记

济。它的特殊点则是，它使社会上一部分人退化，并使革命从过去遗留的贫穷中又出现了显著的社会不平等。但是斯大林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又存在根本的不同，这在于它们对暴力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所持的不同态度。

马克思主义仿佛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一种顽强的产物。它对自由主义存在一些批判，却同它们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自由放任政策的提倡者对政治暴力持反对态度，认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起进步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主义相反，强调在一些历史事例和情况中，暴力对民族和阶级进步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他们也认为，政治暴力对社会前景有效地改变还是很有限的。他们坚持，人们的命运主要是由基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所决定；同这些相比较，暴力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在社会思想方面，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两者对十九世纪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都在不同程度上持乐观的态度，两者都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都自发地实现了他们各自的理想。恩格斯和马克思以一句著名的话反映了两者的共性：暴力是每一个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助产妇。斯大林关于暴力作用的观点反映在他的行动上而不是话语上，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治。斯大林可能把马克思的那句老格言理解为：暴力不再是旧社会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妇，而是建造新社会的母亲。